百年银圆

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



SILVER & GOLD COINS
OF CHINA 1838-1949

（修订版）

孙浩 |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百年银圆

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

（修订版）

孙浩 编著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银圆：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孙浩编著．—2版．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478-3113-7
Ⅰ.①百…　Ⅱ.①孙…　Ⅲ.①银币（考古）-中国-近代
Ⅳ.①K87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0736号

百年银圆——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修订版）
孙　浩　编著

责任编辑：励　真
装帧设计：房惠平
排版制作：黄国兴　谢腊妹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
（上海钦州南路71号　邮政编码200235）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6.5　插页　4
字数　330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2版　2016年6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478-3113-7/G·688
定价：180.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工厂联系调换

前言

回首望长安　往事不如烟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用这一名句来形容中国银圆的兴衰与其集藏、研究是非常贴切的。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华夏文化的悠久性与独立性无庸置疑，许多领域对人类发展都有卓越的贡献，中国也是最早使用硬币的国家之一。然而，旧时代的中国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在学习新事物后对之加以改良，脱胎换骨进而突飞猛进。老祖宗的东西用上几百年甚至于千年也不改进；“既创新，又陈腐”的程度令人惊讶，诚如中国货币史与钱币学权威彭信威教授所言“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没有制度可言的”。他指出，中国古代货币有四大特点。首先是货币的各种职能不集中于一体。金银虽自古即有价值，但“没有铸造金银圆，也不用金银为流通手段。流通手段，基本上都是用铜钱。历代虽有金银钱的铸造，但这种金银钱，只具备货币的形式，目的不是为了流通。铜钱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货币的各种职能。有些职能主要不是用铜钱，甚至于有时完全不用铜钱，例如宝藏手段，主要是用金银”。其他三个特点分别是：制造与流通的地方性、制造工艺的不进步及长期以来铜钱的重量几乎不变。最后一个特点，如621年（唐武德四年）铸行开元通宝和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广东用机器所造之光绪通宝制钱，两者间隔千余年而重量是相同的。“只有晓得这个特点，才能说明中国货币史上的许多现象”。

明嘉靖以后，中国的币制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铜钱与银两间维持一定的比价。铜钱使用是论枚计价，白银在作为交易媒介之时是以成色及重量来计价，然而各地习用的成色与秤法不一，且银子有不同的形状，在鉴定及重量的换算上十分麻烦。外国银圆流入中国后，因其制作精美及成色、重量的划一，可以论枚（圆）使用，非常方便，慢慢成为民间交易的工具，银两在流通上的影响力逐渐式微。道光年间，“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台湾仿洋银形式首创老公银饼。外国银圆的泛滥造成弊端丛生，自制银圆抵制外币之议由初期的受排斥转为逐渐受到重视。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向英国订购机器于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勘地建“广东钱局”，此乃中国正式设立专业机器造币厂之始。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开制制钱，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开制银圆，由于绩效良好，持续运作，各省纷纷跟进，中国自此而始全面以机器造币。当时，清政府尚无划一的币制，广东龙洋的发行仅仅是权宜措施，因此在19

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制定币制、确定主币重量时，有主张仿洋银一圆的七钱二分制的，也有主张中国传统用银习惯的“两”制的，此即所谓的“圆两之争”。在未定案之际，尚有倡议制作金币及施行金汇兑本位制的主张。币制的讨论由光绪朝延至宣统帝登基，后虽有结果，并开制新国币，后因武昌起义，国体变更，新币制未行，紊乱依旧。

民国时期，财政部继续推动币制改革。1914年（民国3年）制定《国币条例》，发行以袁世凯头像为图案的新国币，此俗称“袁大头”的新银圆制作精美，成色、重量划一，颇受民众欢迎，在完善的策划及大力推行下，很快将外币驱逐殆尽。仅数年光景，中国原本最通行的墨西哥鹰洋已大量消失，不是熔化改制，就是运送出口，影响力无法与昔日相比，中国的银圆被“袁大头”统一了。北伐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政令趋向统一，随即进行币制整顿。讨论的过程中曾有金本位制之议，因各界质疑而仍实行银本位制。1933年（民国22年）颁布的“废两改元”政令正式宣告了银两制度的终结。

然而，20世纪初西方主要国家皆已放弃贵金属本位币制，改行管理通货的信用纸币制，使白银从货币变成了商品。在这历史的转折之际，全球银价却剧烈波动，导致我国银圆外流，造成通货紧缩，进而发生金融危机。国民政府因此在1935年（民国24年）11月紧急实施法币政策，改行信用纸币制，废除了银本位，使中国的货币自此与白银脱钩。法币政策实现了币制的统一，堪称成功，但因紧接着的抗日战争波及皆为较富庶的省份，以至法币贬值，各地物价上扬。之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严重至无法收拾的地步。法币信用一落千丈后，当局拟以发行金本位制的金圆券，并试图筹措发行金币来稳定局势，但因军事失利纸币彻底崩溃，各地纷纷恢复使用银圆。然而，此情形如昙花一现。在世界潮流与物价的变动下，二战之后，仅有少数国家还发行银币流通，20世纪60年代末银币完全退出流通货币的领域，走入历史的长河。世界各地的硬币逐渐减重缩小，改以廉价金属制作，发行权由中央政府独占，成为信用货币。

在旧中国进行货币改革的时候，由于缺乏现代工业，刚开始仿西洋方式造币时，无可避免地仰赖外力。此时，除了经济以外，社会、政治与国际局势都发生了剧烈动荡，造成许多文献的散失，导致今人查证上的困难，所幸有些海外的原始文献保存尚属完整，在“礼失求诸野”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还原部分真相。本书与其他同类书籍较为不同之处，即在于引用大量来自英美造币厂与其官方机构的原始资料，以及外籍钱币学者的研究心得。由于泉学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笔者所知有限，但秉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的原则，对于不熟悉的领域仅能点到为止或略过，若为求全而勉强纳入，实系超过个人能力范围。

本书所录的钱币图片以北京诚轩公司总经理左京华女士提供的钱币照片为主，其他图片提供者包括美国邦地尼奥机构（Ponterio）、CNG机构以及曾泽禄、何代水、何泰山、刘继武、周士杰及诸多前辈与同好，少数为个人藏品，图版由周沁园协助制作，谨在此一并申谢。由于图片来源不同，或许在视觉上无法达到整体的一致性，但这也正好说明了每一枚钱币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及与众不同的光彩。

孙　浩

2011年10月


廣東省造
庫平七錢三分

目◉录

壹·清代银圆——地方篇



1 广东省造银圆 002
2 湖北省造银圆 011
3 北洋造银圆 017
4 江南省造银圆 024
5 安徽省造银圆 033
6 奉天省与东三省造银圆 037
7 吉林省造银圆 044
8 黑龙江省造银圆 051
9 四川省造银圆 053
10 浙江省造银圆 062
11 福建省造银圆 066
12 台湾省造银圆 068
13 “京局制造”银圆 069
14 湖南省造银圆 073
15 云南省造银圆 076
16 陕西省造银圆 082
17 山西省造银圆 084
18 新疆银圆 086
19 西藏银圆 093





贰·清代银圆——总厂篇

1 造币总厂 096
2 “圆两之争”时期试制的样币 099
3 “宣统年造”大清国币系列样币 105
4 “宣统三年”试制的样币 107
5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之“曲须龙” 111

叁·民国银圆——人像篇

1 开国纪念人像银圆 116
2 袁世凯像银圆 122
3 北洋政府造人像银圆 129
4 孙中山像试制样币 139
5 金本位银圆 143
6 孙中山像帆船银圆 147
7 孙中山像布图银圆 153

肆·民国银圆——地方篇

1 四川省造银圆 156
2 新疆省造银圆 160
3 云南省造银圆 164
4 湖南省造银圆 167
5 贵州省造银圆 168
6 甘肃省造银圆 173



伍·近代银饼与银两币

1 台湾“老公银”“如意”“笔宝”银饼 176
2 福建“漳州军饷”银饼 182
3 上海银饼 183

4 贵州“黔宝”银饼 186
5 “上海壹两”与“关平壹两” 188
6 “富字一两”与“鹿头一两” 191

陆 · 近代金币与金章



1 大清金币 194
2 袁世凯侧像洪宪飞龙金币 197
3 袁世凯像洪宪飞龙金银章 199
4 袁世凯像嘉禾金币 202
5 唐像金币与滇字金币 203
6 龙凤龘龖金币 206
7 孙中山像布图金币 207
8 金圆券金币 208
9 伪“满洲国”金章 212
10 中央造币厂金条 214

柒 · 苏维埃红军银圆

苏维埃红军银圆 216

捌 · 币海掇英——延伸篇

1 臆造币 222
2 “铸币”与“机制币” 228
3 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史事 230
4 近代机制币著名人物列传 234
5 浅说钱币品相鉴定 247

参考文献 250
后记 252

壹



清代银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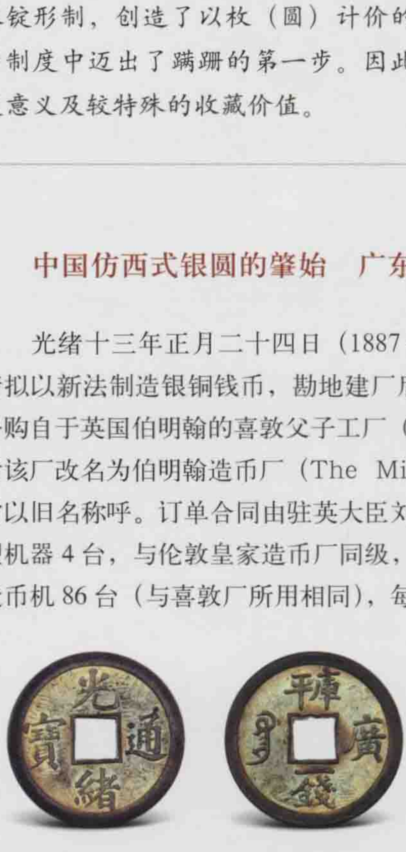
地方篇

1 广东省造银圆*

广东是中国最早设厂以专用造币机器生产仿西式钱币的省份，率先打破了传统的浇铸法的造币工艺，改变了千年以来以重量及成色计价的银锭形制，创造了以枚（圆）计价的中国银圆。古老的中国从旧式货币制度中迈出了蹒跚的第一步。因此广东所造的银圆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及较特殊的收藏价值。

中国仿西式银圆的肇始　广东钱局设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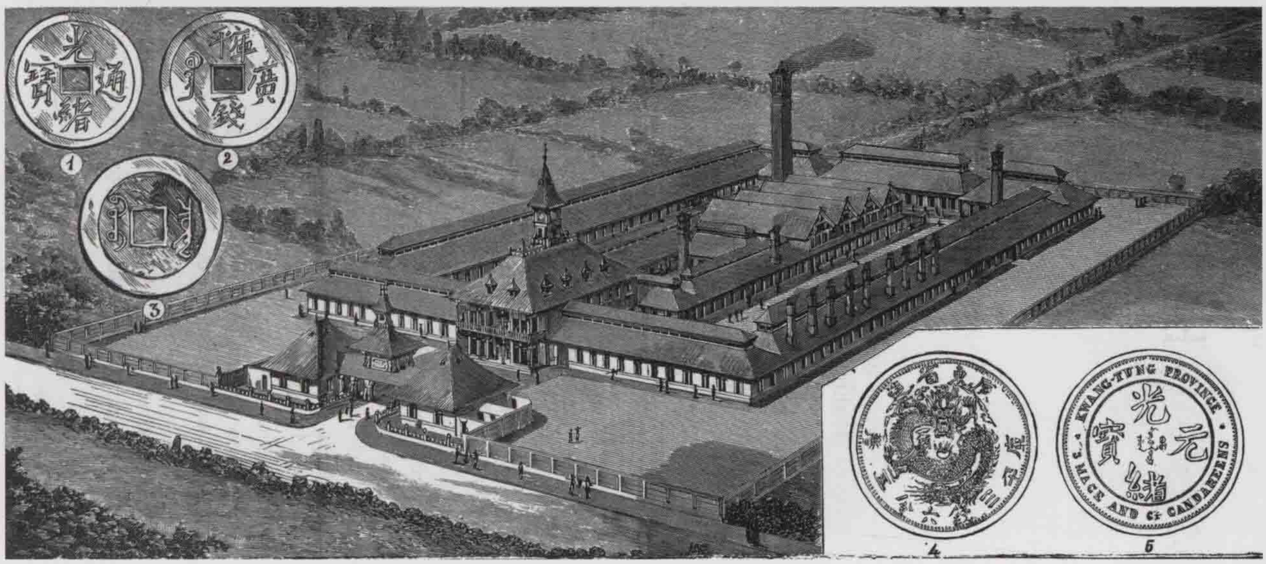
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1887年2月16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拟以新法制造银铜钱币，勘地建厂后将之命名为“广东钱局”。机器设备购自于英国伯明翰的喜敦父子工厂（Ralph Heaton & Sons），虽两年后该厂改名为伯明翰造币厂（The Mint，Birmingham），但各界习惯上常以旧名称呼。订单合同由驻英大臣刘瑞芬代办，主要造币用印花机有大型机器4台，与伦敦皇家造币厂同级，每台日产银圆2.5万枚左右；小型造币机86台（与喜敦厂所用相同），每台日产铜钱3万枚左右，这日产银圆10万枚、铜钱270万枚的规模在当时各国造币厂中堪称之最。合同中也要求代聘英国技师随同第一批机器到厂料理安装等事宜。此外，模具由该厂代办，其他还包括车床多架及“作钢模之大螺旋机一座，用此机器由子模可做无数钻钱文之钢模”。



I-1-01　广东钱局开制时所造方孔一文制钱

广东钱局的厂房规模长约200米、宽约130米，由伯明翰市的米德顿（Edwin C. Middleton）设计，喜敦厂依约在18个月内完成全部设备制造。负责协助建厂及试车的是爱德华·韦恩（Edward Wyon），爱德华率领包括主计长、轧片机师、印花机师及制模师等洋匠4名驻广州两年，由于绩效良好，爱德华被延聘为广东钱局监工，直到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调派北京筹办“京都制造银圆局”（京局），爱德华在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因“办事出力”获颁双龙宝星勋章，他在文件中的名字是“卫安”。虽有若干工期的延迟，但该厂仍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初正式投产，首先开制的是一文制钱，当年产量约6 000万枚。

*［编辑注］银圆泛指近代圆形的机制银币，特指重26.7克左右的“一圆”银币，俗省作银元；由银圆一词派生出的货币单位“圆”，亦俗省作元。



I-1-02
刊于 1888 年 5 月 19 日伦敦 *Graphic* 杂志的广东钱局厂景素描图，其厂房规模长约 200 米宽约 130 米，有造币机 90 台，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造币厂

七三反版系列银圆　开创中国钱币新局面

张之洞在奏请机器造币时拟定的银圆主币重量为七钱三分，钱币正面中间是汉文和满文的“光绪元宝”四字，背面是蟠龙和“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字样，正面外圈刻上英文以便与洋人交易。据悉此文字为光绪十二年底时任广东巡抚，也是著名的金石家、书画家的吴大澂所书。币文的宝字从“尒”，即将“珤”（读音同宝）的笔画写作“珎”（读音同珍），此书法可见汉隋古碑，吴大澂将“珍、宝”合体为一，不愧是精于金石书法的大家。

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六（1889 年 8 月 31 日），张之洞将广东钱局按原奏试制的大小银圆 5 种各 10 枚分装两匣呈御览。因英国代刻模具中只有 4 种，无三分六厘五面额者，故此面额币模应是后来追加，并在广东钱局制成，此由宝字从“缶”可看出并非同时写样交付雕刻。另外，喜敦厂在先前曾送交一文制钱样币 100 枚、“一角”、“二角”及“五角”银样各 5 枚、“一圆”主币样 10 枚至中国驻伦敦大使。

广东七三系列的币模由英国著名雕刻师艾伦 · 韦恩（Allan Wyon）设计雕刻，刻妥后由喜敦厂转交广东钱局，此事曾刊载于 1888 年 5 月 19 日的伦敦 *Graphic* 杂志。韦恩是德国移民的后裔，其祖父于 19 世纪初即在伦敦开办私人的雕刻坊，替各工厂制作钱币及奖章或纪念章用的模具，艾伦继父兄之后主持该工作坊，而非受聘于任何造币厂的雕刻师。显然各方合作愉快，故后来许多来自英国的中国钱币模具皆由艾伦操刀。

生产七钱三分银圆的本意是“与洋银一同行用”以抵制之，故比市面流通的墨西哥鹰洋重一分。但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下，因分量稍重反而被囤积私毁，形成“亏耗重”而“流通滞”。当局旋即以商民已习惯于旧制，汇丰银行商请代为附造为由，减重至与外国银圆一致便于交易。

七钱三分系列的生产时间很短，估计因设备安装初期“机器尚未全开，工匠亦未募足，而且诸少熟手”，实际制成的数量有限。但由原奏中拟“先铸一百万圆”以及 1890 年 5 月七二系列流通版银圆正式生产之日起，至



I-1-03

2010 年 12 月美国邦地尼奥（Ponterio）公司在香港举办的拍卖会上出品罕见的全套七三反版银圆，估价 15 万～20 万美元，最终以 47.5 万美元落槌，加上 15% 的手续费总价超过人民币 363 万元



1891 年 12 月 31 日止制成总数及金额的记载（详见后），结合目前收藏市场上所见来逆向推测，以稀少度而言，“一圆”主币与“五角”两种最少，产量可能各仅数万枚，其次是“二角”，“五分”则稍多，最多的是“一角”。然而“七三系列”因含银较多适得其反，大半被回炉改制，故整体存世量不多。

七二反版系列银圆　功亏一篑

广东钱局在七钱三分系列银圆发行不畅后，将“一圆”主币的重量由七钱三分减为七钱二分，其余面额依序递减。币模是在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原来所提供的模具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其中部分面额的模具在蟠龙两侧各添加一花星。然而，从七钱二分版背面的阿拉伯数字“2”观察，其笔法相当拙劣，雕刻水平与原本的“3”字相去甚远，加上龙鳞较浅，显然不是由原雕刻师所为，而是广东钱局自行刻制字模，再利用喜敦厂提供的模具辗转进行复制的。由于这两套最早生产及自行刻模的银圆因英文出现于正面而与后续的不同，被泉界称为“反版”，其中“七二反版”系列是真正在中国制作原模的第一套银圆，仅试制若干而未正式发行，故极为珍罕。



I-1-04
七三反版与七二反版正面的阿拉伯数字“3”与“2”的对照，其雕刻水平有明显差距，必然不是原雕刻师操刀，而是广东钱局自行镂刻的

I-1-05
七二反版全系列银圆。与七三反版同场出品的全系列七二反版银圆，由于异常罕见，以更高的 62.5 万美元落槌，总价近人民币 480 万元





I-1-06

同场出品的七二反版铜样一枚，以 86 250 美元成交，合人民币 57 万元左右

光绪元宝七钱二分正式发行

洋文与汉字同列于银圆一面招致了若干批评，认为商民辨识不易，故当局以体制不合为由，将“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二分”10 个汉字改列正面，于光绪十六年四月（1890 年 5 月）正式开制银圆。正面皆汉字的“正版”开始大量发行后，因成色及重量划一且制作精美，广被各地接受。光绪二十三年底，户部尚书奏请令广东代制大小银圆，并在次年运至北京搭放俸饷。光绪十八年的《申报》报道，广东新制银毫因式样新颖，有相当数量的“二角”及“一角”被携至新加坡流通及供玩好之用。另因当时各地制钱缺乏，福建商号备银向粤省购买银角以供市面周转来舒解钱荒的压力，随后推广至浙江、上海等地。由于广东推行自制龙洋的成功，各省纷纷设局仿造，所造银圆在形制、成色及重量上，均与其相似。

粤省银圆正式开制时，面额分为 5 种：“一圆”主币七钱二分（成色 90%），“五角”辅币三钱六分（成色减为 86%）；“二角”辅币一钱四分四厘，“一角”辅币七分二厘及“五分”辅币三分六厘，后面 3 种辅币成色均为 82%。其中，“一圆”主币的成色规定必须十足九成，其余辅币的数量只要足够流通即可，因其制作较主币更费工，制作成本较高，因此成色递减，为所谓的名目货币。

然而，实际开制后并非如原计划以“一圆”为主，由于次年国际银价的上扬，九成色的“一圆”“每铸一千两，盈余不足二十两；若制作八成二小洋，每千两可获利约百两”。自此，广东开始改以生产小洋为主；另推测因中国物价较低，银角即足以应付日常之用，且找零更为方便。七三版“一圆”及“五角”罕见，可能是一发行即被大量搜罗改制之故。据海关报告的记载，开制后至1891年底止，各面额产量为“一圆”43 933枚、“五角”17 847枚、“二角”5 667 381枚、“一角”16 098 579枚及“五分”1 158 945枚。由于“一角”小洋花纹浅容易磨平而常遭商家挑剔，因此“二角”小洋产量逐渐增多，到1898年时所造占银圆总值近八成，1899年“二角”小洋总值的比例更超过九成，其影响所及使广东省“物价之标准、契约之缔结及租税之征收，均以毫洋计算”。广东当地盛行“二角”小洋或多或少也影响到邻近省份。由于利润较高，后来全国均有大量生产小洋的现象。



I-1-07/08/09
量产的七二版系列银圆。此版流通后可能因中国物价较低，银毫足以应付日常之用，且找零方便，广东及邻近地区渐以行用一钱四分四厘的“二角”银毫为主

宣统元宝　改朝换年号

清德宗于岁次戊申的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驾崩，新帝溥仪于同年十一月十九日（1908年12月12日）登基，是为清穆宗，定年号“宣统”。次年各地就将所出银圆改换为“宣统元宝”，粤省也不例外，于宣统二年正月初一开始行用。同年度支部整顿币制将各省造币厂或裁或并，广东因绩效尚佳未被裁撤，改名为“度支部广州造币分厂”，并依令改产新版“大清银币”，但新模并未发下因此仍用旧版生产。直到宣



I-1-10
宣统皇帝1908年12月12日登基，广东造币厂发行“宣统元宝”银圆，除换帝号外，没有明显差异，但只发行“一圆”及“二角”两种

统三年八月开制新国币，不料当月十九日（1911 年 10 月 10 日）夜武昌新军起义，全国震动，粤厂遂停造新币又转而生产旧版银圆。宣统帝逊位后，广东龙银的生产随即走入了历史。

耿爱德根据所得海关资料统计，至 1901 年止，广东造币厂共造银币“一圆”4 259 115 枚、“五角”226 093 枚、“二角”269 113 501 枚、“一角”117 081 619 枚、“五分”2 509 585 枚。遗憾的是，他无法取得 1902—1910 年的数据，而 1911 年的数据是“二角”29 214 000 枚。

喜敦版与普通版

广东初造七钱二分正版系列大小银圆时，乃利用喜敦厂提供的制模工具改刻币模，故保留了许多原来的形态。后因模具的损耗，部分字模冲头只能自行雕刻，故使以后生产的出现变化，其中与原版近似者就被称为“喜敦版”，可细分多版。

I-1-11
喜敦版正面：①“广东省造”的“广”字与“造”字笔画与英国所雕刻者接近；②“库平七钱二分”的“库”字中的车字不出头，且“钱”字中的部首“金”的笔画也不出头；两侧花星为中央有凹点的十字花星。背面：英文 KWANG-TUNG 中间的连接号“-”短，两侧花星亦为中央有凹点的十字花星



I-1-12/13/14
普通版在稍后的新刻字模上有修改，正面的“广”字与“造”比较明显；两侧花星由 4 个点构成。背面 KWANG-TUNG 英文中间的连接号变长，两侧花星亦为“四点花星”



“广东寿字壹两”——中国第一枚机制纪念币

自古以来，中国的币制就不太讲究，动辄实行权宜措施，加上史料的散失与不公开，使得今人在考证时常遭遇困难。譬如新皇帝登基，以新年号铸钱，背改镌如“大清一统”、“天子万年”等吉祥语或龙凤纹纪念。然而语焉不详又缺乏文献记录，事过境迁被后人当成压胜钱，很难说清楚。

泉界大珍的“广东省造寿字壹两”，由于未见史料记载，其来龙去脉众说纷纭，并不明确。综合而言，以前辈张絅伯在《泉币》第七期所论可为代表：“本品因未纪年，殊难遽断，然观其图案，谐作福寿，环绕双龙，幕无英文，意含颂祝，大异常制。由此以推，或为纪念币之一种，专以祝慈禧太后七旬万寿者也。”将之视为纪念币并未有太多异议，只是在确切日期上，“因未纪年，殊难遽断”莫衷一是。其制造时间有光绪二十年（1894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及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等3种说法，亦有人认为其系臆造。光绪二十年之说，来自清王无生《述庵秘录》书中所述朝廷大臣刚毅生性贪诈好财，有“巡抚广东，以甲午（光绪二十年）入都祝嘏（慈禧六旬寿），希大用。时内地通用银，广东独制银币。刚谓总办某道曰：‘为我制银币三万，携入都。’某曰：‘诺。’制成赍往……”云云，按刚毅并未担任过广东巡抚一职，此处应为“巡视安抚”之意；惟虽有记载，未加描述形制，无法得知其所造究竟为何，但常被作为此论之引证。光绪三十年说则认为是慈禧七十大寿所造，一般以采纳此说者居多。另也有此币乃“圆两之争”产物，系光绪三十一年制说法的观点。

然而，前天津造币厂李伯琦的《中国纪念币考》上却记有：“至光绪甲午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时，外省已设银圆局铸银圆，亦闻他国有纪念币之事矣。广东银圆局遂议铸一圆银币，庆祝万寿，币式一面仍蟠龙，一面中篆文团寿字，而围以卐字纹，适我军战败，奉诏停止庆贺，遂未铸呈，惟案卷中存此图样模型耳。木雕模型，今已不复见，案卷亦不存。”按慈禧太后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甲午年适逢其六十大寿，而该年六月底日本挑起丰岛海战，清政府因之在七月一日对其正式宣战。但随后八月中时清陆军在平壤之战以及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均告失利，日军掌握主动后迅速向中国境内推进，月底时已渡过鸭绿江。在慈禧寿辰前清军可说连番败阵，所有祝寿活动被迫中止。

I-1-15
“广东寿字壹两”阴版，2008年北京嘉德春拍品。阴版局部放大，可见蝙蝠翅膀呈空心状





I-1-16
“广东寿字壹两”阳版，台北鸿禧美术馆藏。局部放大，可见蝙蝠翅膀饱满

I-1-17
马定祥旧藏之寿字壹两银币厚版铅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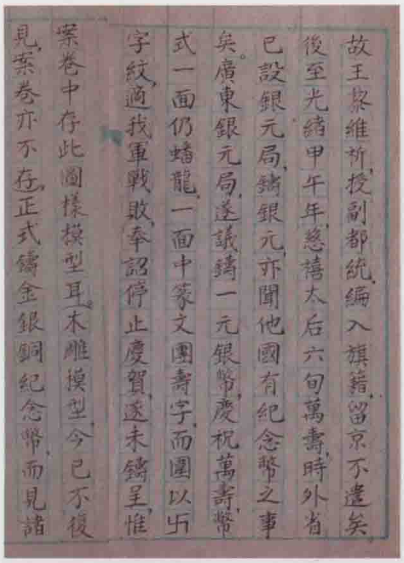
3 种推论皆有其据，笔者认为光绪二十年（1894 年）试制而又中止的说法，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来说，有较高的合理性。尤其李在《中国纪念币考》文内提到的“惟案卷中存此图样模型耳。木雕模型，今已不复见，案卷亦不存”等语，表示他应见过所谓的案卷及模型实物。官场办事须签准后执行乃理所当然，若为宫殿营造建筑，则帝王将相虽位高权重也很难仅凭图画及文字描述来想象完成后的模样，故因此而制作木雕模型也不足为奇，只是文献现已散失无法进行考证。

钱币大师马定祥曾藏有广东省造寿字壹两银币及其厚版铅样各一，此铅质单面样为耿爱德旧藏，耿爱德民国 38 年（1949 年）离开上海前因其厚度超出钱币保存纸板过多，无法和其他银圆并列，故与马老交换。此两者均收录在《钱币学大师马定祥》图册内，并说明“为祝贺慈禧六十大寿而特铸”。根据以上资料，笔者倾向于此中国首枚机制纪念币乃光绪二十年（1894 年）试制之说。

寿字壹两银币按照正面蝙蝠两翼的形式有两种版别，一种翅膀呈空心状者俗称“阴版”，另一种翅膀饱满的称为“阳版”。目前所知有十余枚，其中李伟先及施嘉千所藏各一枚已捐于上海博物馆，其余分散海内外。

I-1-18
李伯琦撰《中国纪念币考》之马定祥亲笔抄本

I-1-19
香港造币厂开制时送英国皇家造币厂的木雕模型，是李氏之说并非无中生有的旁证


故王景維祈，授副都統，編入旗籍，留京不遣矣
後至光緒甲午年，慈禧太后六旬萬壽，時外省
已設銀元局，鑄銀元，亦聞他國有紀念幣之事
矣。廣東銀元局，遂議鑄一元銀幣，慶祝萬壽，幣
式一面仍蟠龍，一面中篆文團壽字，而團以卐
字紋，適我軍戰敗，奉詔停止慶賀，遂未鑄呈，惟
案卷中存此圖樣模型耳。木雕模型，今已不復
見，案卷亦不存，正式鑄金銀銅紀念幣，而見諸



湖北省造银圆 2

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州创办了中国首家机器造币厂后，却在量产前于光绪十五年(1889 年)奉命调任湖广总督。他在湖北大力推行洋务运动，除创办新式教育，也编练新军，开办工厂。光绪十九年，张之洞会同湖北巡抚谭继洵以鄂省“据江皖上游，地当南北要冲，兼为华洋通商口岸，商贾云集，用钱最广。但市面因制钱短缺渐形萧条，奏请援照广东成案开铸银圆”上奏朝廷。奉旨允准后，利用武昌阅马场原守备署改建厂房，并从德国进口机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五月银圆局正式开工，湖北成为中国第二个正式设厂生产机制银币的省份。

推行洋务运动 湖北造新式银圆

湖北银圆局创始时规模不大，所用的印花机厂牌为德国甘拿秘(Knape)。初期只有员工 50 人左右，由日产能仅万圆上下来看，至多只有 2 台印花机。产量甚低，行用不广，主要行销于苏、皖等省。故次年再向国外增购机器 15 台，内小型机 8 台，中、大型机各 1 台，共 10 台先行交付。

鄂省仿造广东式样制造大小计 5 种面额的银圆，由蟠龙图形几乎相同来看，可能是由广东提供冲头及英文字模，而正面汉字则另行书写，重新

I-2-01
湖北银圆局仿广东省大小银圆式样所制造的 5 种面额“光绪元宝”银圆，蟠龙图形几乎相同。因主币与辅币之成色比例不一的关系，“半圆”并非两枚可兑换“一圆”，故不受欢迎，较少见



雕刻。据国外的资料，发行最初只录得“一圆”、“二角”及“一角”3种。张之洞在调任湖广总督后，把筹备中的广州炼铁厂移到汉阳开办，由于加设枪炮厂、火药厂等，规模宏大，随后又不断扩建，因此湖北省工业水平甚高，虽初期聘请外籍化学师一人校验成色，但目的只是取信商民，技术上已无需过度依赖洋人协助。

流通银圆大珍——“湖北本省”

I-2-02
图示大名誉品“湖北本省”七钱二分，为所见品相最佳者。此枚在1978年11月澳大利亚Spink主办的“近代中国硬币”拍卖会上，以12 500美元成交。后由台北鸿禧美术馆珍藏，2007年北京成轩秋拍以总价人民币436.8万元成交，创下了当时中国银圆成交价的最高记录

大名誉品“湖北本省”银圆的制成日期与发行理由，以往因缺乏文献记载，常被人误解为开制之初所造的样币。本世纪初，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周祥在整理馆藏文物时在一张湖北官钱局光绪二十三年六月签发的“九八制钱一千文”钱票上，发现背面印有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日（1896年5月14日）湖广总督的告谕：“……既准完纳本省公款，必须加铸本省字样，方免混淆滋弊。……兹议定每新铸之本省银圆准作制钱一千文，该商民等照此价赴局购买，即照此价赴关卡州县完纳，无丝毫增减以昭大信。一面



增购机器添铸对开、五开、十开、二十开小银圆亦加铸本省字样，其价照一千文以次递减，亦如制钱之可以零星使用。”此考证结果发表在2005年上海《钱币博览》（总46期）杂志上。至此，其来龙去脉完全揭晓，大名誉品“湖北本省”银圆乃是因机器制造耗时甚久且运送路途遥远，在这青黄不接之时，鄂督所采取应急措施下的产品。



I-2-03
湖北官钱局“九八制钱一千文”钱票。背面印有湖北总督告谕，道出了“本省”银圆的发行缘由



I-2-04
湖北本省“一角”

由钱票背文的告谕日期及“新铸之本省银圆……增购机器添铸小银圆亦加铸本省字样”等句，可确定系于该年年初所造，而非光绪二十一年湖北银圆局开制之初所造。至少在其告谕日期前，已制成标注本省字样的一圆。其加上本省字样的本意是商民必须使用湖北省造的银圆纳税，目的是推广湖北银圆以间接抵制外省与外国所造银圆，并抑制银圆、制钱的兑价，而非只能在湖北省使用。另外，《张之洞全集》卷内之《推广行用银圆及银圆票示》记载：“外府各属州县……必缘距省遥远，商民人等来省兑取不易，致未通行。”表明，显然只有邻近省城的州县才见使用。

又据1896年10月2日英文报纸《华洋通闻》（*The Celestial Empire*）报道：“虽然总督坚持一圆银币兑换制钱一千文，但此时市价一圆只合制钱八百五十文，故无人收受，而充当军饷发放的银圆也很快收回……”由此亦可佐证当时制钱缺乏，商民不愿以一千文高价向银圆局购用“本省”银圆纳税，当局告谕形同具文。“本省”银圆在窒碍难行之下很快便退出流通并被销毁化银，留存至今者寥寥无几。“本省”银圆应有5种，目前仅见“一圆”、“二角”及“一角”3种。

双龙图案之“湖北壹两”

银圆虽然广泛流通，但是尚无法取代银两根深蒂固的地位，许多大宗收支，仍须折算成银两。而朝廷内外对银币计圆还是计两的争论始终没有定论。原本是开明派的张之洞，在这场争论中，却倾向保守派的一方。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前，是主张维持仿西式计圆的七钱二分银币的，之后则转变支持生产计两的一两银币。可能是他在稍后奉命至京师厘定学堂章程时，受朝中保守派的影响，不仅大力支持，还付诸行动。光绪三十年八月（1904年9月），张向朝廷奏请在湖北试制一两银币：“为体验官民行用情形……试行三个月后，察看销数是否畅旺，咨报户部、财政处，藉资考核。”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一（1905年1月6日），湖北银圆局改名银币局开制新银币，正面中央铭文“大清银币”，上缘镂“光绪三十年湖北省造”，下方刻“库平一两”。背面为双龙戏珠，中央纪值“壹两”，外缘上下为



I-2-05
“湖北壹两”大字版。“大清银币”四字较大，罕见

I-2-06
“湖北壹两”小字版。“大清银币”四字较小

英文。依“大清银币”四字的大小，可分为大字、小字两版。模具由日本大阪造币厂制作，预计日产3万枚。

此俗称“湖北壹两”的银币，是中国最早在币面上铭文“大清银币”的，也是流通币中，除吉林“厂平壹两”外唯一的“两”制币，巧合的是两者背面皆为双龙图案。“湖北壹两”推行并不成功，失败原因主要是相异于原本通行的七钱二分银圆的形制，使用不便，反而增加困扰；其次，各地平法不一，仍然要相互折算才能通行；再说成色也是问题，英国驻汉口商务领事报告指出：因为成色只有 87.7%，比同等重量的七钱二分银圆含银低，故不受商民欢迎。

产量方面有不同说法，一般最常见的说法是“七十余万枚”，此说的根据可能来自光绪三十三年袁世凯等人的奏折中所提到“鄂造壹两银币发出七十万两，不惟藩库收发，商民信用，即江海关税，亦按库平足纹一律收纳，……嗣因部文改铸一两零六分者，不得不将旧铸陆续收回”。但是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在宣统元年致度支部尚书载泽的函中称：“宣怀去年过鄂，据局中人云：南皮（即张之洞）初铸库平一两之银圆四十万圆，以二十万咨送湘省，即行退回，鄂省除发过一个月薪水之外，皆以不用缴还而止。此事两湖南北人人知之。”其他如《东方杂志》第六年（宣统元年）第八期登载张之洞“试铸库平一两银圆数十万，分给湖南，退还未用；湖北本省，除发委员薪水外，均未行用，旋即停铸，仍铸七钱二分”。另外，英国领事商务报告记载，次年 1 月“湖北壹两”曾以军饷发放。

海关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的《汉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记载：“一两重之银币于去年 12 月 14 日（按：阳历）始出，此为张宫保所颁行，拟试办有效，即作国币以为全国银币平色改良之准则。惜不甚通行，所出仅十四万七千枚。其成色千分中有银八百七十七分、铜七十分、锡五十三分，计一千枚合关平银九百七十八两四钱二分。而以之完税，则定作关平银九百七十八两四钱。”由此可知一两银币的成色确实低于标准银圆。

耿爱德之《中国币图说汇考》(*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所载是 64.8 万枚，美国克劳斯《世界硬币目录》即采纳此数据，笔者推测可能耿氏采用的是鄂局向中央呈报的产量。若论实际发行的数量，海关报告必有资料根据，比较可靠。不论哪一方正确，不受各界欢迎而终未能推广是事实。目前所发现的“湖北壹两”，根据其正面“大清银币”四字的大小可分为大字版、小字版两种，以前者罕见。

湖北省造宣统元宝

光绪皇帝驾崩后，新帝继位改元“宣统”。次年湖北省所造银圆即改为“宣统元宝”。除年号变更外，其余不变，但面额只有七钱二分、一钱四分四厘（二角）及七分二厘（一角）3种，其中以“二角”最为稀见。一般来说，生产顺畅后逢年号变更，未必需要再试作铜样呈报，惟中国国家博物馆内藏有“宣统元宝七钱二分”铜样一枚，非常罕见。

清末由于银贱铜贵而形成钱荒，各省造币厂在利益的驱使下大量转而生产铜元，因此自20世纪起，银圆产量锐减，品种也较少。



I-2-07
存世量极少的宣统元宝“一角”



I-2-08
极罕见的宣统元宝“二角”。2011年8月香港拍卖会上一枚NGC MS-61以298 750美元成交，折合人民币超过190万元。图片中边缘4个白色物体是鉴定盒固定硬币用的“四爪”，这种固定方式的优点是可以看见边齿



I-2-09
湖北省造宣统元宝“一圆”

宣统三年湖北省造大清银币壹角

清政府整顿全国币制、裁撤各省造币厂之时，鉴于幅员辽阔，各地造币厂非天津总厂所能应付，故保留鄂、粤、川、滇四处为分厂，同时新设计的“宣统三年”系列大清国币定案并交付生产。此原定划一形式的国币不知何故，出现一种与宣统三年大清银币形制相同，却标示“湖北省造”的壹角小洋，目前仅见镍质样币，存世量极少。



I-2-10
宣统三年湖北省造大清银币壹角镍样，存世量极少

湖北龙银知多少

清代鄂局所造龙银，据海关资料统计，1895年至1901年生产主币“一圆”7 659 902枚及价值6 524 346圆、数量超过5 600万枚的各面额银辅币。此后至民国成立前为空白，只有铜元的生产数量。在综合其他方面的数据后，笔者估算此时段主币“一圆”产量约1 800万枚、银角近4 800万枚，即折合龙银“一圆”的总数约2 600万圆，其中光绪年号者约2 100万圆；若将该局在1915年（民国4年）改产“袁大头”前所造银圆（多数为前清龙洋）计入，则主币“一圆”超过3 000万枚；银角则在1亿枚以上，

其中以“五分”最少，仅在开制之初少量发行，其次是“半圆”，可能不到 100 万枚，“二角”约 5 800 万枚，“一角”约 4 900 万枚。

湖北省造光绪元宝银圆铜样

存世有湖北省造光绪元宝银圆铜样 5 种一套，此非开办时所造。光绪二十五年清政府筹设京师银圆局时，召鄂局人员协办，当时湖北银圆局特制红铜样币呈送北京“以示无须赁用洋匠”，惟所搭乘船只逢八国联军侵华在天津被击沉，京局亦毁于战火。使用铜质材料的原因是要与通行币有所区别，避免有贿赂之嫌。据悉，这套铜样共制成 40 套，但大部分在送京途中都散失了。

I-2-11
湖北省造光绪元宝银圆铜样



3 北洋造银圆

北洋，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名号，乃泛称并非实体。要解释北洋，得先解释北洋大臣。话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增多，涉外事务频繁，清政府乃于咸丰十一年（1861 年）新设习称总理衙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管理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等三省的对外通商、交涉事务，以及监督海防和其他洋务。同治九年（1870 年）改称“北洋通商大臣”另加钦差名义，按惯例由直隶总督兼任。这是“北洋”一词的起源。北洋大臣的地位，远高于管理东南沿海各省的南洋大臣。

北洋机器局　兵工厂兼造钱币

至于币面镌“北洋造”字样的钱币，要从生产军火的北洋机器局说起。北洋机器局即清代三大兵工厂之一的“军火机器总局”，该局于同治六年（1867 年）在天津开办，习称“天津机器局”，分东、西两局。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1896 年 1 月 27 日），改称“总理北洋机器局”。光绪十三年（1887 年）该局向英国格林活铁厂（Greenwood & Batley）购买

I-3-01
北洋机器局造光绪二十二年壹圆，是中国最早在币面上标示“壹圆”面额的银圆，仅制作了 3 000 枚，大珍。图为 2007 年北京诚轩秋拍出品，以总价人民币 39.2 万元成交。2011 年 1 月纽约拍卖会出现一枚 NGC MS63 鉴定币，以 25.3 万美元成交，约合人民币 160 万元



机器在东局试制方孔制钱，然而因铜价上涨，生产入不敷出，导致停产。与其同时开办的广东钱局，虽在生产制钱上遭遇同样困境，但在发行银圆上获得成功，有了盈余而能继续经营。紧接着湖北省也设厂制造银圆，推出后也因广受欢迎而扩充规模。北洋机器局虽率先购置造币机器，但附于兵工厂内生产，实非独立运作，以顺利地持续发行而言，排名第三。

虽然粤鄂两省银圆已开始投产，但数量仍然不足，流通区域也未达其他各省，无法有效抵制外国银圆。由于清政府当时尚未了解币制不统一的流弊，匆忙鼓励各省跟进，甚至打算节约费用准备以“官督商办”方式向民间招股制发银圆，在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建议下，方改为统筹官办。北洋机器局首先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七月，利用原有的造铜钱机器试制了二角、一角及半角 3 种小洋，另外再添购设备压印一圆及五角，因陋就简是早期北洋造银圆质量欠佳的主要原因。

北洋机器局开制银圆的时间大约是光绪二十二年底，根据海关报告记载，该年所造银币“计一圆 3 000 枚，五角 2 500 枚，二角 12 500 枚，一角 5 000 枚，半角 7 000 枚，共值银 7 600 圆。”从美国驻天津领事呈送全套 5 枚回国的时间来看，年底已发行。次年中旬英文《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曾报道初期所造大小银圆乃当军饷发放，但一圆主币因成色不足而遭钱庄拒收，随后又刊出被收回重造，因此原本产量不多的北洋造光绪二十二年版系列银圆就更加稀少了。

海关报告同时也记载了北洋造光绪二十三年版的产量：一圆 1 120 000 枚、五角 20 963 枚、二角 146 782 枚、一角 147 770 枚、半角 38 814 枚，共值银 1 176 555 圆。北洋造光绪二十四年版的产量：一圆 2 806 000 枚、五角 176 000 枚、二角 350 000 枚、一角 614 000 枚、半角 231 000 枚，共值银 3 030 950 圆。

I-3-02
北洋造光绪二十二年银辅币，因产量低，均属见少品种



中国最早标示“壹圆”面额的银圆

北洋机器局开初所造银圆的特点是采用圆、角计数制面额，与其他省份的两、钱计重制面额不同，可惜发行时间很短，仅有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3种。其中，光绪二十二年版与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版相比，特别之处在于背面没有“大清”的英文“TA TSING”字样。自光绪二十五年版起，面额就改为与其他省一致的计重制，二十五版产量为“一圆”1 566 000枚、“半圆”57 000枚、“二角”152 000枚、“一角”153 000枚及“半角”97 000枚。由于“北洋”只是泛称而非实际地名，故新款设计时，币面刻“北洋造”而不是“北洋省造”。





I-3-03/04
光绪二十三年版北洋造壹圆，英文多“TA TSING”（大清），有圆眼及斜眼两大版式

I-3-05
光绪二十四年北洋造壹圆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洋机器局在该年五月底被摧毁，该年度产量无统计数字可查。两年后，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在河北西窑洼（现天津大悲禅院旧址）新开办北洋银圆局，专事造币。光绪二十九年版北洋造七钱二分银圆即该局所出，由于当时铜钱缺乏，生产铜元获利较高，故虽名银圆局，生产上反而以铜元为主，银圆生产呈停顿状态。此后铭文为“北洋造”的银圆还有光绪三十一年一钱四分四（二角型）、



I-3-06
光绪二十五年起，北洋造银圆的面额改为计重制的七钱二分，形式与粤省相同



I-3-07
光绪二十六年版七钱二分，除纪年变更外，其他差异不明显。光绪二十六年因八国联军侵华，机器局被攻占破坏，故此年份的不多

I-3-08
光绪二十九年版七钱二分，该年所造银圆系民间以银锭委托改制

三十三年及三十四年的七钱二分（一圆型）。

有趣的是，根据《海关十年报告》（*Decennial Reports*）而知，标示“29th”的光绪二十九年北洋造银圆是民间提交银锭委托制作的，数额是 1 405 017 枚。该年的津海关贸易报告中没有记载，但明确说明往年银条、银圆出口比进口多二三倍，因日俄战争需要现银而形势倒转。此后几年续造者究竟是奉户部之令还是受民间委托就不得而知了。国外资料显示，光绪三十一年“二角”可能亦为民间委托而造，数额为 161 993 枚。据考查铜币大臣陈璧的统计，自光绪二十八年开办至三十三年底，北洋银圆局共造“一圆”主币 5 711 901 圆，“二角”辅币 152 091 枚。此数据在“二角”方面颇为接近，但主币相差甚远，实际产量待考。金银本位时代，各国造币厂接受民间备料代造金银币，光绪三十一年庆亲王奕劻所拟《铸造银币分两成色章程》条文八即有“各省督抚及官商军民人等需用新式银币，均可备银交造币总厂及南北洋、湖北、广东各分厂代为铸造。”

财政部整顿币制时局名变更为分厂，在新设的造币总厂开制后，“北洋造”的字眼就从银圆上消失了，也没有出现过宣统年号的钱币。

为何光绪三十四年版北洋造大洋数量特别多

光绪三十四年版的北洋造“一圆”银币原本数量就不少，并非稀见。北洋银圆原本只在黄河以北地区较为通行，但辛亥革命以后，因清政府派兵镇压，调动大军的话，必须要携带巨额现银以应付各种开销，北洋银圆的影响力便随之南下进入江南及两湖一带。尔后，北洋政府又选择北洋银圆为新国币发行前过渡期官方结算收付的标准，故各地造币厂纷纷转而生产北洋银圆，直到“袁大头”正式生产为止，因此数量庞大。虽未见官方文献说明后造版的形式，但可断定大多数是光绪三十四年版。

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资料显示，天津造币厂重建完成后，于 1914 年（民国 3 年）生产一圆银币 57 472 816 枚。此数量当包括光绪三十四年版北洋造“一圆”及民国 3 年版袁像一圆。



1-3-09
光绪三十三年版北洋造七钱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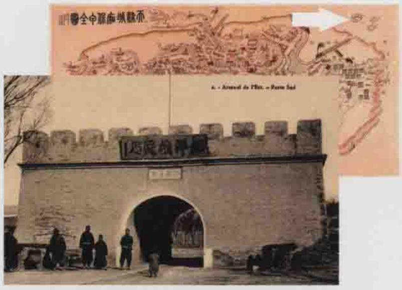
1-3-10
光绪三十四年版北洋造七钱二分，此年份版的银圆因产量
巨大而版式颇多



1-3-11
"4"字笔画特殊的"艺术字版"，图示此枚品相极佳，罕见



1-3-12
光尾较短，十分稀少



I-3-13
天津机器局“北洋机器局”东局南门。同治年间设立，原名天津机器局。距天津内城五六公里，北方有近代西式机器工厂之始。光绪十三年，户部向英国购设备于东局内生产宝津一文制钱以解钱荒，因铜价上涨亏损停工。光绪二十二年以旧机器造小银角，添购新机器造主币银圆，庚子事变时损毁严重，后局址被占用没有原地复工。此照片摄于20世纪初叶被法国人占用期间。照片背景是光绪二十五年绘的《天津城厢保甲全图》，地图右上方箭头所指即“机器东局”的所在位置

造币厂中的天津三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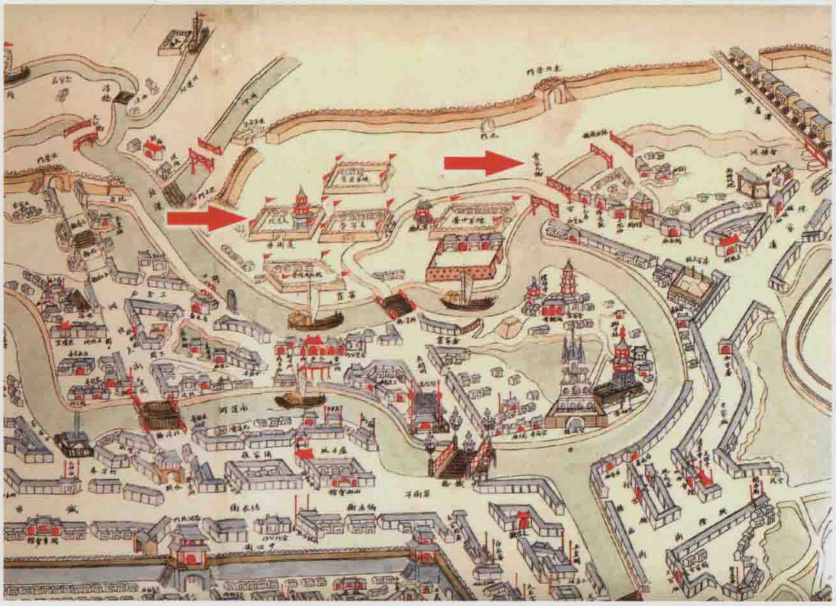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东部，滨临渤海，简称津，别名津沽、津门等。早称“直沽”，明永乐二年（1404年），改称天津，即天子渡口之意，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带，筑城设天津卫。咸丰十年（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由此开始的军事近代化，以及铁路、电报、电话、邮政、采矿、教育、司法等方面建设，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城市和金融中心。清末民初，天津一地先后有3座机器造币厂，其沿革错综复杂，易造成混淆，谨简述如下以使读者形成大致概念，名称以最习用者称之。

北洋机器局：同治六年（1867年）清政府在天津城东贾家沽道正式开办“军火机器总局”，通称“东局”，此北方拥有近代西式机器之始。同年稍后在城南海光寺基址设立“南局”（又名“西局”），两者习称“天津机器局”。由于钱荒，户部拟以机器来造制钱，向英国购设备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于东局内生产宝津制钱，后因铜价上涨，亏损累累而停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更名北洋机器局后因陋就简，以旧有小型机器造银铺币，另添购新机器造银圆主币。庚子之乱津局被毁，没有原地重建。币铭有“北洋机器局”与“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六年北洋造”者，皆出自此处。袁世凯代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呈准在山东德州新建兵工厂，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工，定名北洋机器制造局，简称亦为北洋机器局，此后与造币无关。

北洋银圆（元）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在河北西窑洼（现天津大悲禅院旧址）设局，初名“北洋铸造银圆总局”，先后更名为“直隶户部造币北分厂”（1906年）、“度支部造币津厂”（1907年），后在宣统二年（1910年）被裁撤。虽名银圆局，但因当时市面缺乏铜钱，改产铜元利润甚高，故出品若以数量论则铜元为多，除铭文“北洋光绪元宝”字样的铜元外，还制造过以“户部”为名的。民国成立后又复工，与造币总厂合并，称“西厂”，专造铜元。铭文光绪二十九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及三十四年“北洋造”的银圆即出自此处。该局开工时之机器设备来源未见明确的记载，后来所用机器有英、德、美、日等厂牌，其中一部分系原北洋机器局残留堪用者，以及自他省调拨而来。



I-3-14
“北洋银元局”正门外景。此照片是光绪二十八年开办时所摄。左为镇海塔，门前种植的小树枝叶稀疏。该局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后改名“直隶户部造币分厂”。后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将户部改为度支部。户部被废，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再改名为“度支部造币津厂”。由于与稍后创建的造币总厂在时间及地点上都非常接近，后来被并入又一再更名，故经常被混淆



I-3-15
光绪二十五年绘的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出“北洋银元局”所在的“大悲院”与“护卫营”（左侧箭头）。至于造币总厂的地点则在“贾家大桥”上方（右侧箭头）。此图绘成日期虽然早于银元局与总厂的成立，仍可看出天津造币三局的位置



I-3-16
户部造币总厂光绪三十一年竣工时的大门外景

造币总厂：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清政府整顿财政，在天津大经路（今中山路）设“铸造银钱总厂”，其造银铜币机器设备由天津德商瑞记洋行向美国常生厂订购。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竣工开机，当时北洋银圆局仍在生产银圆，故先行制作铜币，随后改名“户部造币总厂”、“度支部造币总厂”。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开始制造银圆，但因币制未定，没有正式发行。次年才再造铭文“造币总厂”的“一圆”、“二角”、“一角”等 3 种银币。归属户部，而非直隶省管辖。

在袁世凯的纵容下，民国元年（1912 年）北京发生兵变，3 月 2 日天津造币总厂遭乱兵焚毁，1914 年重建后称“东厂”，专造银圆。根据该年《天津造币总厂原有机器统计表》记载，当时，东、西两厂旧印花机共有英、德、美、日等四国多种厂牌计 68 台，但其中多台被焚后不堪修复、32 台压力不足弃置未用，实际上可用的仅 28 台，多数由西厂使用。

对天津地区的 3 座机器造币厂有了基本认识后，再进行个别的探讨会有比较清晰的轮廓，不至于张冠李戴。

4 江南省造银圆

所谓的“江南省”，是顺治二年（1645 年）清军占领南京，将南京改名为江宁后设置的行省，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苏省和安徽省，为当时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清初其赋税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康熙初年，江南省划分为江苏与安徽两省，前者名称取自江宁、苏州，省会设在苏州；后者名称来自安庆、徽州，省会定南京。后来江苏省会迁至南京，安徽省会迁至安庆。也就是说，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 江南造币厂筹办的时候，“江南省”建制早已消失了二百多年。“江南省造”钱币是中国货币史上唯一标注“有名无实”之省份的钱币，这也是引发集币者兴趣的原因之一。

虚无飘渺间的江南省

江南银圆是设置于别称金陵、简称宁的南京的江南造币厂在开办之初制作的。该厂全名为“江南铸造银圆制钱总局”，设备于光绪二十二年向当时尚未更名的喜敦造币厂订购，计划日产银圆 10 万枚及制钱 100 万枚，要求在 6 个月内建厂完成。喜敦厂派遣总工程师雷诺(E. Reynolds)监督，机器在光绪二十三年底全部安装妥当。江南造币厂分东、西两厂，东厂制作银圆，开工稍早，西厂专造制钱，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8 年 1 月 17 日）正式开制。有些书谱将江南造币厂落成时开制银圆的时间列为 1897 年，是没有正确换算成公历之故。

风华历久弥新之“老江南”

在众多年份的江南龙银中，以俗称“老江南”的一版最受青睐。这头版生产的银圆与后来所造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正面无干支纪年，背面蟠龙有外圈。自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起历年所造的江南银圆都标注干支纪年。由于“老江南”与“江南戊戌”实际上产自同一年，根据该年产量：“一圆”140 万枚、“半圆”10 万枚、“二角”700 万枚、“一角”800 万枚、“五分”10 万枚的数据无法细分两者，但仍可看出蛛丝马迹，由于江南戊戌银圆无“半圆”及“五分”，这两种面额的就是“老江南”。



I-4-01
镜面老江南“五角”，2011 年 1 月纽约 CNG 拍卖会出品

1-4-02

镜面老江南“一圆”。开办之初币模由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代办，制作精美，蟠龙造型深受藏家喜爱。镜面精制币更令人震撼，存世仅有数套，此为 2010 年 12 月 Ponterio 香港拍卖出品







江南特色　干支纪年

到乙巳年（1905年）止，币铭“光绪元宝”的江南银圆计有无干支（老江南）、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及乙巳等9种。宣统朝后仅制作了“二角”、“一角”的“宣统元宝”，未生产“一圆”主币。清末，由于铜价上扬造成的钱荒，各省赶工生产铜元致使银圆产量锐减，乙巳年底起银圆的生产陷于停顿。根据海关报告统计，该年江南造币厂共造银币“一圆”634 670枚、“二角”828 130枚、“一角”681 450枚，而铜币生产达4.96亿枚，以面额论是银币的近6倍，以数量论是银币的230倍。

在五花八门的江南龙银中，“老江南”以其背面那尾栩栩如生的蟠龙而深受藏家喜爱。其可按正面“省”字有无缺笔分为“目省”及“日省”，再由边道为直齿边或人字边，可分出四大版别。1896年，“老江南”原模在英国雕刻完成，由喜敦厂档案室留存的样币可知当初模具“省”字无缺笔，“日省”应是后来模具损伤之故造成。英国留存的样币品相甚佳，“一圆”主币为光边是其特征，亦有铜样存世。“老江南”系列银圆中，“五角”最稀少，其余年份仅庚子、己亥有此规格，亦属罕见，这可能是该地区银辅币以“二角”为主的缘故。

半圆银币不流行，主要是由于民众缺乏主辅币及十进制的观念。因此两枚成色86%的半圆辅币在使用时，兑换不到一枚含银90%的一圆主币，即便找零也不方便。而“二角”以下的成色（理论上为82%）也不一致，不如直接使用“二角”银毫换算起来省事，这种情况在全国多数地区都差不多。在一份1904年海关资料上提到江南造币厂时尚有记载：“半圆银币的制造数量极少，从未进入流通，都被私下取走。现已不再生产。”



I-4-03
“老江南”正面“省”字无缺笔的称“目省”

I-4-04
“老江南”正面“省”字缺笔的称“日省”



I-4-05
“老江南”多数为滚压成形的鹰洋边，龙银中仅此一种，齿边的反而较少

以江南厂制作人字边的工艺而言，压印图文与滚边的工序是分别进行的，生产过程中有漏网之鱼的可能，故除非品相为proof级，否则不应视作样币。另外，滚人字边时无法在进料时精确地控制正背面，故顺时针或逆时针之方向皆有。由于那一年干支“戊戌”的加入，“老江南”的生产时间十分短暂，故数量很少，成为江南币爱好者追逐的目标。以年份而言，收藏难度以“老江南”最高，其余依次为乙巳、癸卯、己亥、戊戌、庚子、辛丑、壬寅、甲辰，其中甲辰民初时用旧模重新生产，故为最多见的江南银圆。

江南银圆能在龙洋中独领风骚，除了其本身制作精美、版式丰富外，也有人亲土亲的地缘效应。上海自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国商业重镇，后世收藏之风一直影响着原本富庶的江南地区，至今依然如此。



I-4-06
江南戊戌普通凸眼龙版

I-4-07
江南戊戌凹眼版中另有龙鳞上多一小点的龙版，俗称“珍珠龙”，较稀少



I-4-08
江南己亥老龙“一圆”



I-4-09
江南己亥老龙“半圆”，罕见



I-4-10
江南己亥新龙。己亥年背面蟠龙重新雕刻，故有老龙与新龙两大版别



I-4-11
江南庚子大字版。庚子年正面的“光绪元宝”字形有大小之分，大字版较少



I-4-12
江南庚子“半圆”，罕见



I-4-13
“庚”字底下两撇分开，俗称“八字庚”，较稀少



I-4-14
江南庚子小字版

江南银圆上的“HAH”记号

江南地区虽然富庶，但造币厂的经营并不顺畅。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因销路迟滞，大小银圆先后停产；次年复工后又因早先所造主币“一圆”成色不足，遭商民诟病，为挽回信誉，特委托汇丰银行“延请头等





I-4-15
辛丑年生产一段时间后，币面开始加上“HAH”英文，早期的无英文版较少

I-4-16
辛丑“HAH”

I-4-17
辛丑“HAH”也分大小



1-4-18

币面右侧的“辛”与“江”中间还有5个或6个小点，相当稀少，此为六点花版，罕见



1-4-19

壬寅年“寅”字第一笔直头



1-4-20

“寅”字第一笔斜头



1-4-21

癸卯年的“癸”与“江”字中间有花星



1-4-22

癸卯无花，罕见

化学洋员到厂，银圆皆加戳记，以为取信中外之计”，此洋技师名H.A.Holmes(文献记载称“霍教习”)。此即辛丑年江南银圆上“HAH版”与“无HAH版”的由来，“HAH”记号一直使用到光绪三十年（岁次甲辰）为止，乙巳版上未见，此时霍教习应已离职。至于甲辰版上的“CH”、“TH”以及乙巳版上的“SY”等英文缩写，还尚待考证。

甲辰龙洋为何多

江南银圆中以甲辰版的数量最多，版式亦杂，在龙洋中与北洋三十四年版相当。其数量之所以巨大，是因南京造币厂在民国初年使用旧模所造之故。根据1929年3月财政部钱币司资料编制的《历年铸币数目一览表》记载，南京造币厂在1912年（民国元年）4月起至1914年9月止新模未颁以前，均系以江南旧模制造，计造“一圆”主币约3 654万枚。由此档案数据与存世情况看，南京造币厂在那段时间所造的江南银圆当是甲辰版。

I-4-23
甲辰版产量大，版式也多，币面仍然保留“HAH”、“CH”等英文，背面“7”前有点

I-4-24
甲辰旁有点（左）及无点（右）

I-4-25
甲辰旁点加星，或称四点花，少







I-4-26
甲辰“TH”版，较少

I-4-27
乙巳版无外国化验师名氏，但有“SY”的英文缩写，其意不明

该表亦注明宁厂于1916年以江南旧模制造“二角”约200万枚、“一角”约59万枚。

江南宣统元宝

南京造币厂在宣统年间仅生产少量的“二角”及“一角”两种小洋。币制改革后，新国币图案统一由中央颁布，“宣三”银币虽大量生产，但宣统年号的江南小洋产量不多。武昌起义后，江南厂曾赶制宣三大清银币以充军饷，但已无法挽回大清王朝的覆亡。

耿爱德资料中宣统三年宁厂的产量为：主币“一圆”160.3万枚、“二角”31.5万枚、“一角”23万枚、“五分”9 585.5万枚。推测“一圆”者即宣三大清银币壹圆，“五分”数量巨大，且江南五分只到岁次辛丑无英文版，这可能是十文铜元（一分）之误。由此看来，江南宣统年号的“二角”、“一角”的产量分别为31.5万枚、23万枚。



I-4-28
江南宣统“二角”，开制后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清帝退位，故产量不多

I-4-29
江南宣统“一角”，少见



I-4-30
戊戌年版式相当多，以“戊戌”倒置错版最为罕见，是江南银圆除样币外的珍品，目前仅见数十枚。伪品颇多，一般都以常见版式中的凸眼龙改刻，而真品是较少见的凹眼龙



I-4-31
真币正面“省”字处有重影，“绪”字的“日”未封口，第一笔稍微向上

戊戌错版　江南大珍

在江南银圆的流通版式中，有一种将干支“戊戌”倒置成“戌戊”的错版，当局在发现错误后即收回，目前仅见数十枚，是江南银圆流通币中数量最少的。由于两字笔画非常接近，早期未被藏家发现，王守谦（1935年）、蒋仲川（1939年）、施嘉干（1949年）及耿爱德（1954年）等出版的泉谱都未收录。直到1981年张璜出版的《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予以披露后方受各方瞩目，当时稀少程度由其所记“至今仅见此一枚”可知。消息一经传出，发现的数量逐渐增多，目前估计存世有数十枚，所见大部分币面都有戳记若干。

美国ANS早在1937年即收到一枚品相颇佳的戊戌错版，是一位曾在1930年来华的资深会员的遗族所赠，但未注明错版，可能是其不谙中文之故。

安徽省造银圆 5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1897年3月）安徽巡抚邓华熙以皖省制钱不足为由，奏请购机建厂制造银圆，便利市面流通。获准后随即派遣候补道潘汝杰赴上海洽购机器，三月与德商订立合同，限期5个月交货。但实际上，设备在次年二、三月间才陆续运抵，厂房则在春季竣工，机器安装妥当后开工。"雇用熟悉工匠，按照广东、湖北银圆分两、成色并凿明年份及安徽省造字样，铸成大小银圆五种"。

龙银大珍——"二十三年安徽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样币

耿爱德根据海关报告上所述的资料认为，皖局开工日期是光绪二十三年底（1897年11月）。然而，由本章引文所抄录自两份奏折的内容可知，安徽是在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间才正式开始以机器制造银圆并咨送进呈军机处的。然而存世极罕的"二十三年安徽省造"光绪元宝银圆，其铭文与开制日期不符，显然不适合作为当时呈送式样之用，故毫无疑问是一枚样币。

早期泉谱如王守谦的《中国稀见币参考书》及蒋仲川的《中国金银币图说》中皆未记载此"二十三年"系列的安徽省造光绪元宝银圆，首见于1949年施嘉干编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但只有二角型的一钱四分四厘一种，据称为国内仅见品。据耿爱德1954年出版的《中国币图说汇考》记载，该币是1947年在上海出现的。由于其与安徽"二十四年"系列银圆相似，故耿氏认为应有存在全套的可能性。至于它的来源有多种说法，然而以该年安徽银圆局尚无机器，故可确定是别处制作。可能是供应厂商的机具虽备妥，但其他方面未配合完全，待开制时，年份已不适用而弃置重新刻模。由于供应中国造币设备及模具最多的英国伯明翰造币厂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才向安徽提供铜元的造币机器，故可将其排除。

I-5-01
2008年北京诚轩秋拍出品的一枚XF级光绪二十三年安徽省造七钱二分银圆，底价人民币25万元，因边缘有碰痕而无人问津，事后议价转让

I-5-02
2011年1月美国邦地尼奥（Ponterio & associates）公司在纽约拍卖会上出品一枚同款PCGS MS-62的光绪二十三年安徽省造七钱二分银圆，以28万美元落槌，加上18%手续费后总价超过33万美元，合人民币218万元



1965 年 6 月英国伦敦的 Glendining & Co. 举办的拍卖会上出现一枚“二十三年”系列的未流通状态的七钱二分银圆（编号 330），它印证了耿氏的推论。同年 9 月，美国钱币协会月刊 *The Numismatist* 登载一篇由 Jean-Paul Divo 署名的短文，叙述他在不久前于编目录时发现了这枚出谱的中国银圆。经笔者比对，图片与伦敦拍卖会上的那一枚相同，再细阅序言得知他就是拍卖目录的编写人，来自瑞士苏黎世。1986 年 9 月香港拍卖会上出现了七钱二分、三钱六分各一枚，两者均标示为 AU/UNC 等级。

2001 年新加坡拍卖会上出现了一枚安徽二十三年五分样币，来自德国，声称孤品。其实早在 1979 年时，美国加州 Money Company 的邮购目录中已出现黄铜样币一枚，只是当时通信不如今日发达，未被人注意。2002 年香港拍卖会出现一枚德国的铜质广告币，其龙图与安徽二十三年“二角”样币的龙图几乎相同。此币正面有中文“光绪元宝”及“库平一钱四分四厘”、德文“INGEN WITTLINGER STUTTGRAT”；背面为龙图及德文“GEPRAEGT MIT DRUCKRGLERPRESSE”。其正面文字的大意是“斯图加特市威特林格厂制造”或“斯图加特市威特林格设计”。威特林格是姓氏，INGEN 则是 Ingenieur 的缩写，应为工程师事务所之意；背面的大意是“以压力调节器式压印机制成”。由背面文字可知，威特林格不是雕刻师名字。令人惊讶的是，其也与浙江二十三年及奉天无纪年的“二角”样币形式如出一辙，除中文字体书法近似外，“厘”字也缺角，其内圈珠点数亦为 96 粒。从实物的图片来看，上述 4 种的龙图均极神似，而上述安徽、浙江、奉天及黑龙江七钱二分“一圆”样币的正面内圈珠点数皆为 123 粒。2012 年 6 月德国 Kunker 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出现一批中国清代钱币模具，证实这几种样币出处是德国。总计五省 42 件的正背面中国钱模内，除上述四省外尚有新疆。据介绍，舒勒厂最早可能是在 1895 年接到中方的订单，造币机由舒勒厂生产，币模的制作则转请专精于此的 Otto Beh 公司负责。1897—1898 年间，后者提供了 200 套以上的中国钱币模具。以上证实孙仲汇等编著的《简明钱币辞典》中“此类币传为安徽订购德国造币机器时，德国厂商代铸之试样币”的推论是正确的。



I-5-03
德国 WITTLINGER 机器厂的铜质广告币，其“光绪元宝”及“库平一钱四分四厘”字体与安徽二十三年、奉天及浙江二十三年 3 种“二角”样币一致，“厘”字也缺角，其内圈珠点数亦为 96 粒

目前所知此系列有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及三分六厘 4 种。另有黄铜样币，其中台北鸿禧美术馆藏有七钱二分一枚，美国华裔藏家藏有三分六厘一枚，七分二厘尚未见，可能深藏某处待发掘或已永久遗失。

安徽银圆铭文的有趣现象

安徽省所造银圆的正面文字，与其他省份比较，颇为有趣。首先是“二十三年”造银圆正面内圈镌有 4 个英文字母，真正含意不明，依其排列方式有不同的解读。一般以自左起直读“ATSC”时译为“安徽大清银币”(An-Wei Ta-Ching Silver Coin)；自左下起旋读“TASC”解释成“大清安徽银币”(Ta-Ching An-Wei Silver Coin)；另则有人认为“大清银币”四字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 年）才出现于币面，欧美语法为自上方左起横读，于是应该为“ASTC”，加上与中文的对照，遂作“安徽省造钱币”(An-Wei Sheng Tsao Chien/Coin)，笔者采取此说。



I-5-04
二十四年安徽省造七钱二分“ATSC”版。正背面外圈文字与二十三年版相同，各字的间距相同，采取满版形式



I-5-05
二十四年七钱二分无英文，“四”字较高的“高四”版



I-5-06
无英文二十四年七钱二分“扁四”



I-5-07
光绪二十四年所生产的还有“戊戌安徽省造”七钱二分，清末各省造币自行其是可见一斑

一般而言，钱币在设计上如属同系列，多半图案一致、形式相同，只是按面额的递减规格缩小而已，同年份也极少出现两种，譬如同样是1898年生产，安徽所造银圆却有“二十四年”及“戊戌”两种。另外，ASTC英文字母出现在“二十三年”及“二十四年”版上，但后者也有一款无此英文字样的，同一年份有多种形式的状况十分罕见。构图上的缺少一致性也增加了收藏的乐趣，而这正是收藏者乐此不疲的原因之一。

安徽银圆局营运时期很短，光绪二十五年六月（1899年7月）就奉旨停产了。根据芜湖的海关报告，机器设备同年搬运至广东。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再次开局后，专事生产因长期钱荒而兴起的铜元，至清朝覆灭前都没有再生产银圆。银圆局开办的时间只有一年多，生产期短暂是安徽省造银圆稀少的原因，当然也不曾生产之后宣统年号的安徽银圆了。皖



I-5-08
只标省名，不标年份的“安徽省造”七钱二分

I-5-09
“二十五年安徽省造”龙银仅见三分六厘一种



省龙银的产量目前无资料可查。

安庆造币厂及皖省银圆行用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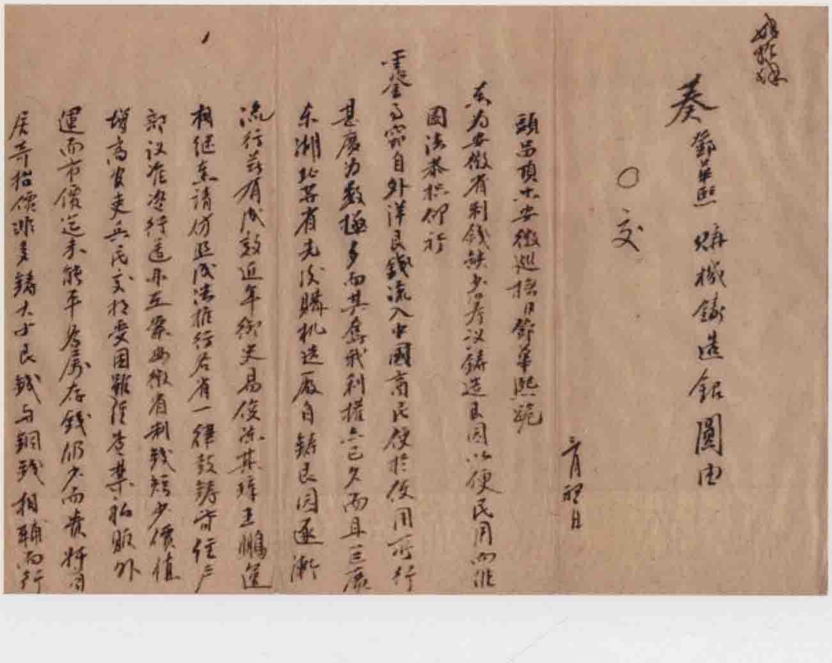
I-5-10
清末的安庆造币厂。安庆造币厂建于省城东门内鹭鸶桥火药库旧址。皖局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1898 年 4 月 3 日）开制，次年停办。光绪二十八年再度启用后专产铜元，于三十四年四月（1908 年 5 月）停工，改成安徽机器局专造弹药及修理枪械，此图为宣统年间美国旅行家盖洛（W. H. Geil）所摄，拍摄时间不详但以说明原造币厂“现为兵工厂和发电厂”看，可能在停工改用途之后。此图刊登于 1911 年出版的 *Eighteen Capitals of China*，山东画报社 2008 年出版其译本《中国十八省府》



安庆造币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再次开局后，为何未能恢复银圆生产？我们从海关出版的通商各关贸易册里可看出端倪：生产铜元的获利远超过生产银圆。按紫铜每担价值银 30 余两计（按：每担为 100 斤），每斤可造铜元约 90 枚，故每担紫铜能生产价值大洋 100 余圆的铜元，“其获利之厚亦不待言矣”。

此外，该年的海关芜湖口报告书记载：“皖省附近本口各城镇向来喜用本洋，究竟本洋比鹰洋犹轻少许，且系远年所铸，至今存亦有限，往往周转不灵，以至于本年每圆提价至一两有余。省宪知民间受累不小，特张晓谕禁止本洋抬价，只准与鹰洋、龙圆一律行用。无如本洋价已抬高，仍不稍落，行用与鹰洋、龙圆大相悬远，何其藐视示谕如具文耶。”次年（1903 年）：“本洋作价，周年常在鹰洋一圆五角左右，此项本洋乃西班牙之旧币，在本口所用者为细边版，另有粗边一式名为建版，其洋文中字画微异处，非详察莫辨，殆即铸造先后之记，讵本埠人挑剔不收，如强之收用则作价最低。今年有人见本洋大涨，特从他处办运数千圆进口，以为奇货可居，迨经钱商验系建版，甚不合销后，竟从贬价售去，不识亏蚀若何也。”本洋即西班牙银圆，制造于 1821 年之前，在皖省特别受到偏爱，可能是因芜湖工商业鼎盛又是重要稻米转运中心，被商人大量携至交易，习惯后不愿改换其他货币。据史料记载，本洋在芜湖流通至 20 世纪 20 年代，使用时间较其他地区长许多。

I-5-11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安徽巡抚邓华熙《购机铸造银圆由》奏折



生产银圆除了利润远不如铜元外，市值比不上本洋也是当局兴趣缺乏的原因之一。辛亥革命后，安庆造币厂在 1919 年（民国 8 年）12 月开工，先造铜元，后来也生产银圆，在 1922 年仿制低色（40% ~ 58%）广东二毫小洋被上海报纸举发。安庆造币厂在 1924 年时因所出的民国 8 年版“袁大头”含银过低（76%）被上海商界抵制，且海关阻止生银输入皖省，1926 年（民国 15 年）该厂被勒令关闭。

奉天省与东三省造银圆 6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1896年2月），盛京将军依克阿唐以奉省制钱短缺、凭帖容易伪造常生流弊为由，奏请设局制造银圆。获准后随即派员“分赴粤、鄂细查设局章程，其花纹、年号、成色一切按照该省模范，以期一律”。另在天津德国礼和洋行订购各式机器锅炉，并于稍后在省城东关外东边门里奉军旧营舍地基内修建厂房，1897年6月完工。德国制机器不久陆续运到，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九（1897年7月8日）开工试制，当时尚缺银角印花机，只造了“一圓”及“半圓”两种呈样，所有工厂章程均仿湖北省办理。

无纪年奉天省造光绪元宝银圆样币

存世的无纪年“奉天省造光绪元宝”共计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4种，未见银质样币，仅有铝、黄铜及合金样币，可能因采纳邻近的北洋银圆以“圆”、“角”计值的形制，故未正式发行。因其样币材质为国内罕用的铝、黄铜及合金，故很可能是向德国订购机器时在国外所造。一说由安徽代制，查皖省所订购的德国机器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1898年3月）后始陆续运抵，此时奉省机器局早已开工，故此说之可能性无，

I-6-01
无纪年奉天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合金样币

I-6-02
三钱六分铜样

I-6-03
一钱四分四厘铜镀银样币

I-6-04
七分二厘铜样





I-6-05
“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奉天机器局造一圆，形制与北洋机器局早期所造相似，但英文与满文均放在正面，且满文在外圈，与其他省的设计完全不同



I-6-06
“大清光绪二十五年”奉天机器局造一圆

应与安徽“二十三年”同处所出。本系列样币中的七钱二分、三钱六分背面英文皆误拼为“TENG–TIEN”。

奉天机器局开工之初生产军械弹药兼造银圆，但运作并不正常，设备常挪作他用。该局所造流通银圆均镌刻年份，无纪年的皆为样币，初期采用“圆、角”为单位的计值方式。不数年即逢庚子事变，俄军入侵东北，奉局全毁于战火。根据依克阿唐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1898 年 11 月 9 日）的奏折得知，开制之初的 3 个月共造大小银圆折合 14 万圆，但现所见者无光绪二十三年者，仅有铭文“二十四年”及“二十五年”两种年份，其形制明显模仿了北洋机器局早期的式样。

癸卯奉天省造光绪元宝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奉天省城被沙俄军队攻陷，机器局遭严重破坏，后经交涉索回重建，光绪二十九年（岁次癸卯，1903 年）重新建厂，当时机器只有两台不敷使用，添购设备后与机器局分开，改设“制造银圆总局”，次年开制岁次甲辰的小洋。所出银圆改成干支纪年及计重面额，回到与原本拟议的粤、鄂银圆相似的形制。此年所造银圆中央满文有错刻，故有“奉宝”及“宝奉”两版。



I-6-07
奉天银圆局在日俄战争中再度被俄军强占，翌年（1905 年）才交还，故那年只造了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甲辰“二角”小洋

甲辰年（1904 年）又因日俄战争，奉天银圆局再度被俄军强占，翌年才交还，故那年只造了“二角”小洋，据《沈阳造币厂史料 1896—1948》记载，共计生产了 5 888 143 枚。同年户部奏请裁撤各省银圆局，奉省亦在列。



I-6-08
癸卯年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的“奉宝”，一眼辨识法是满文处中间有点



I-6-09
癸卯年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的“宝奉”，点在右侧

中国龙银大珍之首——奉天癸卯一两

名列中国龙银大珍之首的“奉天癸卯一两”，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著名的“圆两之争”币制大讨论下的产物。当时朝廷各部与封疆大臣为本位币“计圆计两”各执己见，电讯交驰相持不下，争论多年。主张采用民间已盛行多年的仿外国“一圆”银币（重约七钱二分）制造以“圆”计价的银币者，是以度支部尚书载泽与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盛宣怀为主的“帝党”；主张恢复传统计重银两制生产以“两”计价的银币者，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张之洞等以慈禧太后为后盾的“后党”。两派相争多年，主张制定“两”为银币面额单位的保守势力曾暂居上风，因此在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四年间，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都曾进行试制“两制”的金银币，奉天机器局所造的“癸卯一两”即其中之一。

当时大乱甫定，百废待举，商民元气未复而市面银钱俱缺，奉省当局认为币制混乱有待整理，因此盛京将军增祺将造币厂与机器局分开，单独设立奉天制造银圆总局。推测在此中央与地方都在酝酿币制措施的情形下，奉省筹划了“奉天癸卯一两”的试制。

目前所知，“奉天癸卯一两”最早见诸文字记载是见于中国参加1904年美国举办的路易斯安那博览会的《中国参展品目录》上，在这本由中国海关编写的目录上，奉天省海关牛庄口（Newchwang）展项内，载有奉天造币厂“尝试制作了一两银币，因不受欢迎，未流通而取消”。中国机制币大师耿爱德在其1954年出版的《中国币图说汇考》的第328页转述

I-6-10
龙银大珍之首的奉天癸卯一两。台北鸿禧美术馆珍藏20年后于2011年转内地藏家接手，在2012年经PCGS评级入盒。此币自20世纪50年代公开以来，每20年才曝光一次





I-6-11
1991 年 6 月加州“古德曼中国钱币集藏”拍卖目录上奉天癸卯一两的照片

了以上内容。耿爱德特别提到他多年以来不遗余力追求此币，非但他本人，即使志同道合的华籍藏友也无缘见其踪影，直到 1950 年 10 月耿爱德从香港得到一张清晰的拓片并按出让者的索价支付了 2 000 美元，才辗转纳入收藏。此币奉天的英文拼法为 FEN–TIEN，与七钱二分上的 FUNG–TIEN 不同，汉语拼音在当时并无统一标准，不能视为错误。奉天癸卯一两在见诸报道后近半个世纪，世人方得识其真面目，迄今该币仍为孤品。

耿爱德逝世后，遗藏分批拍卖。第一场在 1971 年 6 月举行。奉天癸卯一两的成交价为 3 000 美元，而 20 年后的 1991 年 6 月加州“古德曼中国钱币集藏”(The Irving Goodman Collection of Chinese Coinage) 专场拍卖会上，起拍价 35 000 美元为该场次 2 000 项拍品中最高的。经过激烈的竞拍，最后以含手续费一成的总价 18.7 万美元成交，创下中国钱币在国际拍卖会上的记录，落槌后在场人士全体起立鼓掌。得标者系台北鸿禧美术馆，据经纪人事后透露：委托人志在必得，授予竞价权限为 50 万美元。中国钱币以往在国际上成交价偏低，究其原因是以往国人富裕程度不足，无力将珍贵文物购回，最近 10 年形势已经扭转，流失在外的国宝级古玩珍宝逐渐回归。此乃中国之幸，收藏之幸。



I-6-12
奉天造币厂。此照片因年代久远已模糊不清，但由其匾额上的“机器制造银圆总局”来看，应是奉天、吉林两银圆局合并改名后的银圆局，摄于光绪三十三年之后。改名前是“银圆制造总局”



CHINA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EXHIBITS

AT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ST. LOUIS, 1904

PUBLISHED BY ORDER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CUSTOMS.

SHALLCROSS PRINT, ST. LOUIS.

I-6-13
关于奉天癸卯一两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光绪三十年由中国海关编写的这本《路易斯安那博览会中国参展品目录》(*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Exhibits at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St. Louis, 1904*)。海关因 1873 年奥匈帝国举办维也纳博览会，邀请中国参展，清政府授权中国海关负责搜集物品筹划展览事宜，由于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 (Robert Hart) 准备周详，把中国的传统艺术、工艺品、农产品及对外贸易数据完整地介绍世人，获各国好评，此后在全球各地举办的大小博览会均由海关负责

东三省银圆制造总局

奉局停造银圆后，不出几年市面就开始短缺通货。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奏准恢复开办。此时清廷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行省，由徐世昌担任总督，徐将奉天、吉林两局合并成“东三省银圆制造总局”，所造银圆铭文均为“东三省造”，该年所出铜元改干支丁未。次年，所出东三省造银圆有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及七分二厘 4 种，因东北地区通用双角小毫，到年底时其他面额银圆被大量回炉改制。光绪皇帝十月二十一日驾崩（1908 年 11 月 14 日），次年新帝登基改元“宣统”，为配合民间使用习惯只造了“二角”银毫一种。

宣统二年，户部整顿币制，各地方造币权收归于中央，造币总厂设置于天津。东三省银圆制造总局更名为奉天造币分厂，仍然只造“二角”小洋，总计生产了约 174 万枚。由于“生产不正常，时断时续，其产能只能是个概数”，《沈阳造币厂史料》如是说。1913 年（民国 2 年）财政部泉币司调查，东三省银圆总产量为“一圆”大洋 1 464 万枚、各类小洋 4 579 万枚。







I-6-14
东三省造光绪元宝“一圆”

I-6-15
东三省造光绪元宝“半圆”

I-6-16
东三省造光绪元宝“二角”、“一角”

东三省造宣统元宝“二角”小洋

末代皇帝溥仪在位时间很短，但有其年号的小银毫实际生产时期很长，数量庞大且版式丰富，其中还有币面中心不用满文、梅花为图案者，缘由何在令人好奇，对其来龙去脉有所了解可增添收藏的趣味性。

关键词：背景

清末，圜法紊乱，中央整治无方，各省擅自为政毫无节制，而东北地区紊乱的程度堪称第一。因为东北地区除了官僚腐败的人谋不臧以及严寒、干旱、水患等天然灾害之外，还有日、俄等外国势力在该地区相互角力的



I-6-17
东三省光绪元宝“二角”小洋，版式丰富，正面两旁的花星为明显的版式特征

影响，其复杂情况远超其他地区。

东北流通的货币混杂异常，市面以纸币为主，其中有官帖（官银号）、羌帖（俄国卢布）、金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及朝鲜银行）及民间商号、钱庄印发的各式私票等。该地区有许多反常的金融现象，如1913年（民国2年）金银出口超过160万两，大连海关贸易册记录："查贸易出口者多，则金银入口者广，是为理之自然。今乃反其例，贸易出口盛而金银亦如之。一统计间，即呈此怪奇之现象。推其故，由于满洲内地小银圆价趋低贱，而谋利之徒则趁机广运出口，往沪改熔宝银，是以数目陡形极巨。然各项宝银之进口者，亦属畅加，系奉天各银行暂就目前多发纸币易日本金票，以兑宝银作弥缝底款之计划，致金银进口之数回异寻常。"换句话说，奉天各银行进口宝银作发行准备，然后大发纸币兑换日本金票，再用来换小洋转铸银锭。

而日本自身也在减少龙银的实际价值，如日金二十钱龙银原重5克，成色80%，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减至4克，成色不变，五十钱龙银由原重12.5克减至10克。宣统二年海关安东口报告书记载："查出口日金，自半角至一、二、五等零金出口甚多，究其缘故，系日本国家欲收回前铸大角钱，改铸小式角钱之意。"因此东北地区小洋的缺乏有其深层原因，不是用一句"奸商囤积居奇"就可一言蔽之。

关键词：产量

《沈阳造币厂史料》记载，奉、吉两局并改东三省银圆制造总局后所造"二角"小洋在宣统二年的产量是174万枚；至民国2年底停产时，总计生产了17 345万枚；至民国6年止总计生产了24 921万枚。海关宣统元年安东口关册记载："今年春间，又将北洋大龙圆八十七万圆，改造二角小洋。本年七月二十日起至十二月初十日，所用银料共值六百万两。造成二角小洋，送至营口、大连、安东及内地各埠，所得之利银，计有三十万两。"

关键词：成色

宣统二年四月十五日，清廷颁布《币制则例》，通令各省停造大小银圆，东三省也不例外，因此真正在宣统朝时所造的东三省宣统元宝"二角"小洋，生产期不过一年多，数量有限。这时的"二角"小洋重5.2克，成色80%，较光绪"二角"小洋的89%的成色为低。

民国初年，市面小洋严重缺乏。此时北洋政府虽已公布《国币条例》，但并未颁发币模，故时任奉天都督的张锡銮在经财政部核准后，命奉天造币厂在1914年（民国3年）3月，将原来的宣统元宝旧模稍作修改，赶制含银70%、币面中心无满文的"二角"小洋。由于市面缺现洋可用，故虽成色较从前为低，但商民还是乐于接受，也不须贴水。原本财政部函准暂造10万枚，而该省制成之数七八倍于此，当时日本政府以劣币使日本商人受重大损失为借口，令其驻华公使出面照会财政部要求赔偿，逼迫北洋

政府下令回收减色银毫，奉天造币厂随即停产，因此这批减色、币面中心无满文的宣统元宝小洋，只生产了一个多月。

1914 年 4 月 24 日，在财政部的授意下，造币厂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签署协议，规范新造的宣统元宝“二角”小洋，成色必须达到 80%、币面中心“暂时添印梅花之记号”，同时旧版的回收、兑换、改制等情况，应详报日本派驻奉天的总领事，并准许其参观造币厂、银行等机构以了解实情。1916 年 4 月中旬，英文报纸《满洲每日新闻》（*Manchuria Daily News*）刊载沈阳造币厂“形同关闭”，由此估计其生产时间不足两年。

1914 年至 1916 年初，其间的产量在 7 500 万枚以上。因此，币面铭文为东三省宣统元宝的“二角”小洋，生产总量仅次于广东省造光绪元宝小洋，远远超过广东宣统元宝小洋。

关键词：版式

东三省造宣统元宝“二角”小洋版式极多，耿爱德的《中国币图说汇考》内即举出了 33 种，如果再进行细分，则远超此数。东三省宣统“二角”小洋存世量大，价格不高，喜欢收集研究版别的泉友，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按照其制作顺序可分几种主要类型。

（1）中心满文（宣统元年造）：这是在宣统元年时所制，其背面上方英文有“1st YEAR OF HSUAN TUNG”及“FIRST YEAR OF HSUAN TUNG”两种。有些专家认为前者六角花星形式较接近光绪年造的“二角”小洋，应是最早生产的版本；后者是晚期所制，而花星改五角形，正面又可分一星与三星两式。英文有错版，将 PROVINCE 拼成 PROVIENCE。

（2）中心满文（宣统二年及三年造）：实际为宣统朝后所制，其背面将“MANCHURIAN PROVINCE”移到上方，下方英文改为 1 MACE AND 4.4 CANDAREENS(一钱四分四厘)。此也可由正面珠圈分为疏、密两版，背面龙身无火焰。

（3）中心无满文（1914 年 3 月造）：此为用原宣统元宝原模修改的低成色小洋。正面均为八点花形式，有少许差异，背面则有六点与八点两种花。

（4）中心梅花（1914 年 4 月至 1916 年初造）：这是在与日本协议后成色改回 80%、中心加上梅花的小洋，由正面梅花分内有点、无点两大类，根据花星仍可再细分。

宣统年号的“二角”小洋，因产量巨大、版式繁多，在此仅能简单描述，无法一一列举。

I-6-18
宣统元年造中心满文

I-6-19
民国造中心无满文

I-6-20
民国造中心梅花



7 吉林省造银圆

泉界通常将中国第一次以现代机器制造钱币的荣衔，给了光绪十五年（1889 年）开制的广东钱局。然而，东北的吉林机器局早在光绪十年就已制作“厂平”系列的银两币并发行流通，只可惜后继无力让粤省拔了头筹。即便如此，“吉林厂平”银两币仍然在中国机制币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吉林机器局的创立与“吉林厂平”银两币

光绪初年时，因传闻沙俄将派舰队东来侵袭中国沿海，为防止沙俄觊觎东北，朝中遂有设船厂于吉林的提议，钦差大臣吴大澂于光绪七年（1881 年）奉谕筹办吉林边务。奏准后朝廷拨银 10 万两在省城外松花江北岸设机器局，调津局宋春鳌总理局务，次年国外机器运到，厂房则于翌年完成。两年后又增建洋火药厂，规模逐渐完备。该局向来不雇洋员洋匠，全由国人自行管理，经营绩效良好，外人参观时评价甚佳。

当时吉林地区制钱缺乏，商铺私帖流行，造成银价高涨、物价上扬，影响市面交易。光绪十年十二月时，吉林将军希元向朝廷报告已试制银钱行用，从军饷中提取白银 5 000 两，交机器局制造面额为一两、七钱、五钱、


I-7-01
“光绪十年吉林机器官局监制厂平壹两”，产量仅 198 枚，大珍

三钱、一钱等以“两”为单位的5种银两币。其中，一两币正面上刻圆形“寿”字，中列方格，内书“光绪十年吉林机器官局监制”3行共12字，双龙环绕；背面亦为方格，内书“厂平壹两”4字；四周各有一满文，左为“吉林”、右为“平”，上为“一”、下为“两”；地章饰有卷云纹，正背边饰均为圈点纹。三钱以下因币面空间不足，仅书“光绪十年吉林官局制”9字。满语中“吉林”即“船厂”之意，当地银衡习用厂平，故此套银两币俗称“吉林厂平银币”，图案与文字皆为金石名家吴大澂的手笔。吴大澂在光绪十二年底任广东巡抚，中国首枚仿西式银圆广东光绪元宝“七三反版”的币文亦由其书写，两者合一可谓美谈。

由于吉林地处偏远，且生产数量不多，外界并不清楚，因此这中国机制银币的鼻祖，数十年来湮没无闻。直到民国初年，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参赞罗斯在上海钱铺获得半两一品，并于1921年（民国10年）在调派汉口后于当地自费刊印名为*A Tael Coinage for Kirin*（《吉林银两币》）的18页小册之后，遂为国内泉界知晓。后张䌹伯在《泉币》创刊号透露曾在北京义启斋购得该币全套模具，后被伍德华得知，坚请割让，可惜此套币模后来下落不明。不过张䌹伯将该小册出版日期错记为民国4、5年间。

根据机器局宋春鳌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三日（1884年12月10日）向吉林将军希元呈报之《机器制造局申请粮饷处奉谕发来银两制造银钱已完竣解交》，可知实际上粮饷处仅发来2 000两。其制作明细如下：一两198枚、七钱1 071枚、半两1 420枚、三钱866枚、一钱825枚，共计4 380枚，总值银1 996两4钱。一钱银币有“壹”与“弌”两种写法，后者罕见。其余较明显的差异，可按龙背有无毛刺分“毛龙”及“光龙”两种版式，两者字体略有不同。另外，此光绪十年厂平系列有黄铜样及铅样存世。

吉林将军希元是先试造再向军机处呈样查照，奏请“广为铸发”，但军机大臣奉旨批了个“览钦此”而未置可否，此案最终不了了之。其奏折

I-7-02
“厂平柒钱”，产量1 071枚，罕见

I-7-03
“厂平半两”，产量1 420枚，此枚中心有焊接痕迹，可能曾作为饰品之用

I-7-04
“厂平三钱”，产量866枚，罕见

I-7-05
“厂平弌钱”。“厂平壹钱”及“厂平弌钱”产量共825枚，罕见，“弌”字更稀少





I-7-06
中间穿孔，左右列汉满文“吉”字的“光绪元宝厂平五钱”，可能是试制厂平银币时的初样，待考

日期以公元论虽是 1885 年，但实际上早已制作，属先斩后奏，故其年份标示为“光绪十年”（1884 年）也无不当。

“光绪八年厂平壹两”及“光绪元宝厂平五钱”

存世另有一种“光绪八年吉林机器官局监制厂平壹两”样币，字体为隶书，正背面外缘为 16 个半圆弧，背面因地章空间大，刻有仿西汉草叶纹的铜镜纹饰。此币也是罗斯小册所披露的，素来被视为珍品，耿爱德也只见过铜样，从未见得银样，而银质仿品却极多。有人认为该年吉林机器局尚未完工，应属臆造，但罗斯披露之际，泉界尚无人知悉吉省造厂平币之事，何来臆造之说？且订购之机器于光绪八年时已运到，故仍有可能试制样品或委托制造机器的国外厂商代制。目前无具体资料可考证其出处。

另有一种正面为“光绪元宝”，背面上为“厂平”、下为“五钱”、左右列汉满文“吉”，中穿圆孔的银钱。若按光绪十年十二月吉林将军希元奏片中的“仿制钱式样，铸造银钱以济现钱之缺”字句，有可能是厂平银两币发行前的试制品，因穿中孔，所需工序较多而未被采用，确切的制作时间待考。

无干支的吉林省造光绪元宝

I-7-07
无干支七钱二分，中心图案为花篮，亦称万年青，有说寓意为“大清万年”，按“吉”字笔法分“土吉”、“士吉”两种

I-7-08
“士吉”版无干支七钱二分

吉林虽地处边陲，但随着移民不断流入垦荒，该地区银钱缺乏情况日趋严重，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吉林将军长顺经奏准后，于年底委托吉林机器局试制银圆，至次年底陆续制成 5 种，用银 44.7 万两，获利约 3.7 万两。由于当局大力推广，成效良好，后再试办一年，盈余逾 19 万两。



吉林试制龙洋成功后，将军延茂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把吉林开制龙洋等次、轻重及行使章程开具清单，恭呈御览，并将银圆式样送户部查核备案。这批在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所制的银圆与后来的吉省银圆最大的差别在于没有年份，一般称之为“无干支”系列，以别于后来者。

其正面中央有万年青花盆及“光绪元宝”四字，上缘为“吉林省造”，下缘纪重“七钱二分”，左右分列两颗花星。背面中为蟠龙，外围系英文地名及纪重，两侧满文左“大清”右“国”。根据币文的“吉”与“宝”的书写方式，可分为“士吉尔宝”与“土吉缶宝”两大版别。推论前者应属初期版，其中满文下无花星者可能是最

初生产的，有花星者的出现时间应接近后来图案较相似的干支系列币。

吉林设厂造币的时间未落后他省的另一原因是，当时沙俄在吉省修建中东铁路，需现银甚巨，由于机器局试办成功，俄方只好以大银条兑换吉林银圆行用，客观上延缓了羌帖（俄国纸币）势力的扩张，据统计，当时收熔洋条约 70 万两。

干支纪年系列“吉林省造”银圆

自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起，吉林所造的银圆皆加注干支纪年。光绪二十五年造者币面中心仍为花篮图，次年的庚子年份增加太极图，到丙午年时，又改回花篮图，戊申年时，则有 3 种版式：中心花篮，中心满文“吉宝”，中心刻数字（七钱二分者为“11”，表示换一角小洋 11 枚）。干支系列前后共有 10 个年份版别。光绪三十四年，吉林银圆局奉旨停办，后随即与奉天银圆制造总局合并，成立“东三省制造银圆总局”。此后，



I-7-09
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起，开始加注干支纪年



I-7-10
己亥“半圆”



I-7-11
庚子年中心花篮图



I-7-12
庚子年中心太极图



I-7-13
辛丑年中心太极图



I-7-14
辛丑“半圆”



1-7-15
壬寅



1-7-16
癸卯



1-7-17
甲辰



1-7-18
乙巳



1-7-19
丙午年币面中心图案改回花篮，背面面额误为“3.2钱”



1-7-20
丁未



1-7-21
戊申中心花篮



1-7-22
戊申中心满文





I-7-23
戊申中心 11，此年份的均极珍贵

I-7-24
中心“吉”宣统元宝“二角”。吉林局与奉天局合并成立“东三省制造银圆总局”后再无采用吉林省名称制作的银圆，只有铭刻造币分厂中心阳“吉”的宣统元宝“二角”小洋一种

再无采用吉林省名称制作的银圆，只有造币分厂中心阳“吉”的宣统元宝“二角”小洋一种。

吉林省银圆的特色

吉林银圆局于光绪二十四年开始运作，到光绪三十四年停产，其确切的产量因 1916 年 5 月该厂毁于大火，所有数据归于灰烬而无案可查。英国钱币学者李察 · 伟德（Richard.N.J.Wright）根据中东铁路的报告找到部分统计数字：1901 至 1917 年间，“一圆”4 734 717 枚、“五角”12 719 553 枚、“二角”22 508 562 枚、“一角”953 875 枚。另有数据显示，该区夏季每日熔银六七千两，冬季减半，换算每年约值 200 万圆，与中东铁路报告尚吻合。总额推算如下：“一圆”650 万至 700 万枚、“五角”1 900 万枚、“二角”3 300 万枚、“一角”1 000 万枚、“五分”550 万枚。统计数字乃伟德梳理调整而得，止于宣统元年，而光绪三十四年仅生产“二角”约 20 万枚，“一圆”、“五角”、“一角”各约 10 万枚。

吉林龙银产量虽不少，但不能和北洋、江南、湖北、广东等省相比。“中国圜法混乱，而吉省尤甚，银圆原定兑钱二吊五百，后银价为四吊四百，每银圆仅值银五钱七……，大银圆均为奸商销毁殆尽”（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东方杂志》）。东三省通货紊乱乃全国之首，官局商号各印钱帖；降了沙俄大发卢布（羌帖）外，日本盘踞期间，亦推行日本龙银及纸钞（金票），换银圆熔化后从大连出口甚多。如平日银价有波动时，大量银圆、银锭即转运上海，经此反复冲刷所剩不多。由于吉林龙银制作粗犷，极富特色，颇受收藏者青睐。

吉林银圆版式杂多，仅中国机制币大师耿爱德个人搜集的藏品，就有 1 800 种不同的版别，这还仅仅是他 1952 年 5 月以前的统计。以耿氏自己推算，估计应在 2 500 种左右。

仿俄式风格的“吉林辛丑双旗”半圆

中国机制币大师耿爱德，早年藏有两枚仿沙俄钱币风格的“吉林省造辛丑三钱六分”。他在 1949 年离开上海之前，曾请马定祥检视其藏品，被告知老上海钱商平玉麟曾私制吉林“半圆”，此是其中之一。故耿氏在编

写《中国币图说汇考》时未将之列入伪造币（FORGERY）而视为臆造币（FANTASY），编号 B40。

19 世纪末，沙俄向远东扩张势力，1895 年底设立华俄道胜银行，次年兴建中东铁路染指东北地区。1900 年义和团事件爆发，俄国借口护路在 7 月下令出兵。9 月 22 日俄军进入吉林省城，次日即占领吉林机器局。后经吉林将军长顺交涉，才允诺将银圆局厂房及造币设备归还，但条件是双方合办银圆局。侵华俄军的入境，加上原本筑路所需的大笔工料费用尚待支付，俄国货币无论是俗称羌帖的纸钞或叫铜子儿的铜币均流通无阻，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东三省的金融。

在主权及经济利益皆受损害的形势下，代理银圆局事务的佐领讷音布在 1901 年 8 月（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岁次辛丑）建议吉林将军长顺以“铜价高昂，若鼓铸制钱亏损甚巨”为由，仿照俄国铜币形式自行造币，“商民必然乐用”。当时所附的成本核算单中，有当二十、当三十、当五十及当一百 4 种面额。目前仅发现当二十、当五十及当一百 3 种，均属罕见之品。此系列铜币的特殊之处在于背面图案仿俄国戈比（kopek）铜币的设计，上方有英文省名，下缘面额部分有长条旗帜状的外框，故在国外昵称为吉林的“banner coin”，其中“当制钱五十个”是华裔美籍藏家陈丹尼（Daniel K. E. Ching）在 1972 年购得的，陈氏撰文发表此币于 1981 年 8 月 4 日的 *World Coin News* 双周刊，之后此币始受藏家瞩目。

陈丹尼在文中指出，居住香港的著名德籍东方钱币学者布威纳（Dr. Werner Burger）在 1974 年拜访他时，看到了他的“吉林通宝制钱五十个”铜币。这位清钱博士极重视这枚俄罗斯风格的吉林铜币，当即愿出价 2 000 美元购买。布威纳解释，他仅仅在东京的日本银行展览间中看到过 3 枚同系列的俄式风格吉林钱币，除了一枚当五十和一枚当二十铜币外，还有一枚“半圆”银币，此 3 枚币的所有人为日本天皇。至此泉界始知确有风格相同的五角型银币存世。笔者推测：由于日本有掠夺文物的作风，应是日俄战争时日军进占东北搜刮后呈献给日本天皇的战利品之一。

耿爱德旧藏之一后馈赠美国钱币学家包克（Howard F. Bowker），另一枚在 1971 年 6 月拍卖会后被美籍藏家古德曼(Irving Goodman)购入。1991 年 6 月专场上被列入“FANTASY”类别，但落槌价是预估的 12 倍，由旅美华裔藏家标得并收藏至今。在铜币披露而为泉界接受后，现此三钱六分仿俄式风格的“吉林辛丑双旗”银币，已被认为亦属同系列品种，所知存世仅数枚。

I-7-25
俄式风格的“吉林辛丑双旗”三钱六分，珍稀

I-7-26
风格相同的辛丑“吉林通宝制钱五十个”铜币，珍稀



黑龙江省造银圆 8

黑龙江是中国地处最北的边陲省份，以往既未闻设有造币厂也无以此省为名的银圆。1944年7月上海发行的《泉币》杂志第25期上登载“黑龙江币则从所未闻。近戴（葆庭）君获一黑省光绪半圆铜样于津门，足征黑省当有开铸之议，或未实行也。……盖仿湖北币样，而花纹之精美，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并附有拓片，是所知最早披露黑龙江省银币铜样存世的报道。

黑龙江省设局造币的“开铸之议”

1949年上海出版的施嘉干编《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上，亦见“半圆”照片，文字说明是黄铜样币。收录黑龙江省银币黄铜样的泉谱多半只有照片，描述也以钱币本身的图文设计为主，一般均认为此当系外地所制，对出处未多予讨论。由于黑省曾因制钱缺乏奏请将官兵奉饷交湖北省代造银圆，故早期有出自鄂省之说，亦有样币来自国外的看法，有些书谱对此存疑而未予收录。

近年来由于文献档案陆续公开，许多资料容易查阅，如《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载有“1896年5月黑龙江将军恩泽等奏，黑省制钱缺乏，请将部拨丙申年（1896年）俸饷，划解鄂省，鼓铸银圆，藉资补救……”等语。1898年2月，黑龙江将军恩泽再次上奏，要求来自湖北的协饷内搭配银圆供该省使用；“协饷”是清代税收富裕的省份对地方贫瘠、收支不能平衡的省份的补助款。1899年7月，黑龙江将军恩泽再奏要求拨款设局制造银圆，得到的批复是“该省需用银圆，尽可就近由吉林搭铸，毋庸另行设局。”随后恩泽以“黑龙江省银圆附吉林搭铸，诸多窒碍，仍请准自铸，俾敷通省之需”由黑龙江将军寿山体察情形，再行复奏。1900年5月寿山的奏文中出现“黑龙江购到机器，



I-8-01
黑龙江省七钱二分黄铜样，非常罕见

I-8-02
黑龙江省三钱六分黄铜样

自铸银圆，以资流通”的字句。

1896年至1900年间的《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内，黑龙江省至少有5次与委托鄂省搭造或请准自造银圆等相关事项的记载，不仅说明了黑龙江当局想做什么，还记下做了什么。由此可知，黑龙江省设局造币一事确实有“开铸之议”，且也计划请已有往来的湖北省派工匠协助，并非只是见诸公牍鼓吹，虽“或未实行”，却是在进行中，甚至已“购到机器”。另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在1897年的奏折中，有向天津德国礼和洋行购定机器的记载。同年7月31日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刊出德国机器在6月运到的报道。然而受到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俄军在该年7月入侵东北，四处劫掠并占地多处，黑龙江省争取多年要求设局造币一事终未能实现。

2012年6月德国Kunker公司举办的拍卖会上出现一批中国清代钱币模具，证实黑龙江当初确实向舒勒厂（Schuler）订购了设备，并由该厂委托其精于制作币章模具的合作伙伴Otto Beh公司代办。

德国舒勒厂简介

舒勒厂（SCHULER AG），旧译名苏勒，由刘易斯·舒勒（Louis Schuler）1839年成立于古平根市（Goeppingen），1852年，他在参观伦敦世博会后开始对金属片板的加工机械发生兴趣，1879年推出全球首座机械带动的离心式深抽冲床，1884年建立自有的铸造厂，1895年交运首批造币机至中国。由于不断的改进，到20世纪30年代已向约50个国家输出超过1 000台造币机。舒勒厂是目前包括硬币压印机在内全球最主要的金属成形机械制造厂之一，员工有约4万人，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造币厂现均使用该厂机器。舒勒已在中国成立子公司，在上海、大连、天津等地均设有工厂，生产各式压力机。



I-8-03
德国舒勒厂历史悠久，是目前全球重要的冲床制造商，有多款广告小铜章，此枚为1902年所制

该厂成立虽早，但开始制造硬币压印机的时间颇晚，与中国往来时大约就是该厂进入生产造币机此行业之始。笔者曾以电函洽询，该公司回答其与中国来往的详细资料已无档案可查，但首批交运中国造币机器的时间是1895年，中国可能是其造币机器的首位客户。目前在可查的国内文献中只找到云南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向德国舒勒厂订购制造银币的机器。

四川省造银圆 9

有关成都造币厂筹建经过，一般皆引述1915年（民国4年）川厂报告书中“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总督鹿传霖向朝廷奏请开办银圆局。新建厂房地点在成都机器局内，经费借自县库与藩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厂房落成，洋匠艾文澜、强必尔送机器到。次年六月，奉旨将各省银圆改归鄂、粤代铸，川厂因而停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川督奎俊以该省地僻道险，求邻靡易为由，奏准后重新复设。经向藩库借款及派员赴鄂考察，于十月开局专铸七二银圆。次年设成都重庆两分局，专司营销回换事宜。”然而，此记载仅言其大概，未详尽说明机器、模具的来源。

银圆局开工的经过

同借助外力开办的造币厂一样，川厂启用的情况在原厂的记录中相当完整。成都厂机器以及模具的供货商，是距离美国费城造币厂不远的汉立克纳浦机器公司（Ferracute Machine Company），由于位于新泽西州，常被误解为新泽西厂。该厂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时接到中国政府通过在上海的茂生洋行（American Trading Company）转来的询价，包括3座造币厂：两座生产新式制钱和铜币，分别设置于武昌与成都，产能分别为每日30万枚与25万枚；另一座生产银币，产能每日15万枚，位于成都。汉立克纳浦厂档案室并未留存其合约价格，却有一未具名之德国竞争者的估价单，上面注明在汉堡交货价为“3 560英镑”，以当时汇率换算约17 000美元，合纹银25 000两左右，汉立克纳浦厂的报价显然低于此金额。

得标者须负责提供全套设备，因此汉立克纳浦厂除了印花机、冲饼机、冲孔机、制模机外均必定要向其他厂商购置熔炉、退火炉、浇铸炉、轧片机、锅炉、传动配备以及一座维修车间来支持工厂的日常运作。汉立克纳浦厂可能只制作了冲饼模具，因为制作印花币模所需要的工艺非该厂擅长，而且冲孔机及模具也要能打方孔或圆孔，并能压出新式制钱方孔周边与币外缘的凸出部分。机器在1897年初完成，并于3月22日试车，费城造币厂也派代表至现场观礼，这是汉立克纳浦厂首次销售设备至外国，故慎重其事记录完整，全部机具于试车完成后装箱运出。

同年底，技师强必尔（Henry Janvier）从新泽西州启程出发，在西岸的旧金山乘船经日本横滨再到上海，与茂生洋行的英籍雇员艾文澜（Henry Everall）会面，在翻译陪同下于次年元月底动身乘船溯长江抵达万县再经

I-9-01
刊登在1887年8月14日美国《哈泼周刊》（*Harper's Weekly*）杂志上的四川光绪元宝银圆的素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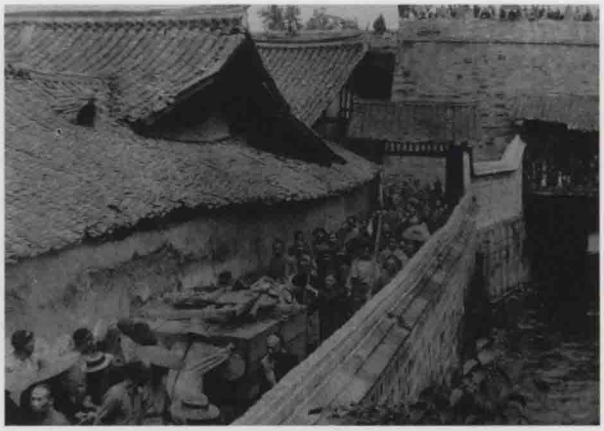


过陆路六百余公里跋涉，终于在 1898 年 4 月 3 日抵达四川省城成都。

造币厂设在实际已为兵工厂的成都机器局内，此时该厂生产一种需两人操作的鸟枪。有些机器是英国造的，但全部由当地中国人操作。汉立克纳浦厂原来的设计，是在同一间厂房内制作铜币及银币，不巧的是把蓝图留在了上海，最后当局盖的是两间不相连的建筑，必须把带动机器的传动轴切成数段，并且得重新布置。在使用蒸汽机的时代，动力由中央系统输出，经传动轴和皮带送到各机器上，非现代装备小型电动马达的机器可各自独立驱动。

强必尔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先前运出的机器尚未全部送到成都，部分搁浅在不远的岷江中。岷江水位低时，船易陷于泥泞；水位高时，船则无法通过桥洞。最后在河道上筑坝调整水位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机器在宜昌待转运时置放岸边，不料江水暴涨淹没货品达 6 周之久，以致防护油脂完全失效，机件锈死动弹不得。技师强必尔回忆说："机器锈得像废铁，4 台铜币印花机、冲饼机及发动机、锅炉、传动轴都一样糟，若要区分，则以冲饼机受损情况最严重。有些必须破坏才能拆开，所有零件都要清洗，部分得新做。"接下来就是清洗机件，经过几周折腾，洋行办事员艾文澜成了一位熟练的工匠。





I-9-02
技师强必尔乘船由长江前往四川万县途中

I-9-03
造币机器设备于成都卸货后在城内运送的情景

1898 年 7 月 12 日完工试车。机器虽顺利运转，但钢模因浸水严重锈蚀。由于当局怀疑机器是旧货，且新模运输已费时数月，强必尔为想早日归国，避免节外生枝再被误认借机敲竹杠，故未代为续订新模而以锈蚀币模试制。"钱币龙身上有许多伤痕，其余部分也有瑕疵……我把样币交艾文澜呈送清廷官吏，他回来后告诉我，官员对这些缺陷并不在乎，反而认为是防止伪造的额外保障。"强必尔原计划出差时间为 6 个月，结果过了 10 个月才归国。

四川光绪"尒宝"银圆初始模具的由来

四川省造光绪元宝图样与广东银圆形式非常相似，尤其是"宝"字从"尒"，而开制时模具是哪位雕刻师操刀的呢？答案是费城造币厂总雕刻师巴伯（Charles E. Barber）。汉立克纳浦厂与巴伯签了私人合同，由该厂提供广东银圆作为样本并指示只要更改省名。美国费城造币厂藏有四川光



I-9-04
美国费城造币厂雕刻原模所制的四川光绪“尒宝”铝质样币，刻工十分精美，除省名外与广东版完全相同，背面“2”字非常工整

I-9-05
川龙名版之一的“平头车”，是成都厂所造四川龙银最初的版式，好品难求

绪元宝银质及黄铜样币各一套5枚，记载于该厂1913年编写的馆藏币章目录内。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所展出的“四川省造光绪元宝”一套5枚，就是在美国以原模制成的样币。由币面的颜色及其上手写“Cu 77 1/5–5/5”字迹看，应该是黄铜样。

仔细观察美国原模所作样币，正面除仿广东省通行龙洋将地名改为四川外，还有下列特征。其“造”字横撇不连、“库”字车不出头及“平”、“钱”、“分”等写法与广东银圆中所谓的“喜敦版”雷同，左右两侧十字花星中心无点；背面的蟠龙类似，由此可推测是以广东最初发行的流通银圆为样本，但雕刻更为深峻，故鳞片清晰可见。英文雕刻较佳，体稍粗而“2”字非常工整，左右两侧亦为中心无点的十字花星。川龙中的名版“平头车”与此最为近似，其为四川龙银的始祖应无疑义。

“平头车”可再分几种细版，笔者认为“花星中心无点版”最早，理由是其龙眼上的眉毛与样币同为“山”字形而非“川”字眉，而文字面花星中心有点配龙面“川”字眉则在后。至于还有一种与后者接近仅仅是正面“库”字黏连的，应是模具此处崩裂后生产的，不应自成为一版。再则龙面略有区别，有称“四角剑毛过渡龙”的版式。总之，万变不离其宗，对四川龙银族谱有兴趣的收藏者可依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与同由外国代刻模具的广东、江南等局相比，为何独有川龙版式如此繁杂？此主因乃随机器设备运来的模具因江水暴涨，被淹没锈蚀而当局对这些缺陷并不在乎，技师强必尔也没有代为续订新模。由川龙也有极少数品相极佳者存世推测，再度开办后钢模或系委托外地仿原模新刻，以湖北或广东两地可能性最大。然而，成都厂工匠技艺欠佳，印模复制技术不够而造成新原模损坏，加上经验欠缺，未采用印模转制母模的方法，而不断由当地工匠重新雕刻，制作粗糙之外更有英文字母倒置之误，故版式杂多。



I-9-06
原厂铝样的“造字告不连”与“库字平头车”的细部

I-9-07
平头车版的“造”字、十字花星、“库”字与“钱”字的细部





I-9-08
龙的头部按大小、形状的不同分多种版式，初期版龙脸较窄，俗称“小头龙”

I-9-09
四川光绪元宝七钱二分“大头龙”

光绪年间海关文献中有关四川银圆的记载

重庆海关 1898 年的年度报告书中记录了造币厂设置的经过，同时也注明该地未见成都所造的银圆流通。次年的报告依然重复此点，可见当时四川龙银行用的范围非常有限。重庆海关对四川银圆开始流通的记录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重庆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本省大宪前，于省城内设厂购器鼓铸银圆。竭力经营屡更寒暑，直至本年十月间（1902 年 11 月），始经制军出示晓谕，一体通行，以渝平银七钱一分为一圆之定价。但本省向行川锭，民间相习成风，且以银业营生者为数甚伙，一旦欲将笨重之银锭，易而为零便之银圆，非在上者以权力相加，恐不能改弦更张，使黎庶从流行无滞，是亦本省圜政之一端也。”显示刚发行时并不成功，遭回炉改铸成川锭者“为数甚伙”，也解释了何以初期所造版式好品难求。

据统计，成都造币厂在光绪年间，一圆主币总产量约 648 万枚，其各年实额为：二十七年及二十八年合计 140 万枚、二十九年 78 万枚、三十



I-9-10
四川宣统元宝七钱二分，正面“二”字压印清晰的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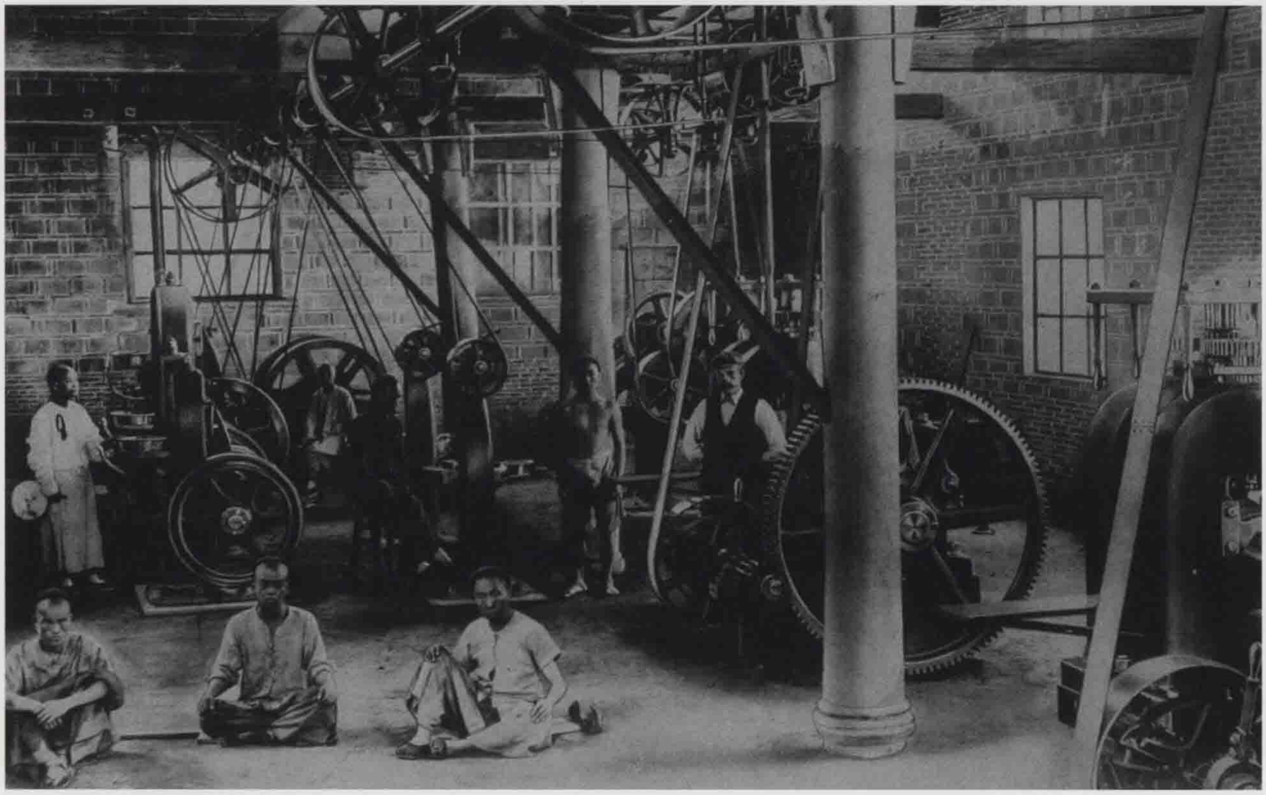


I-9-11
背面英文错版（PROVINCE 的 V 错为倒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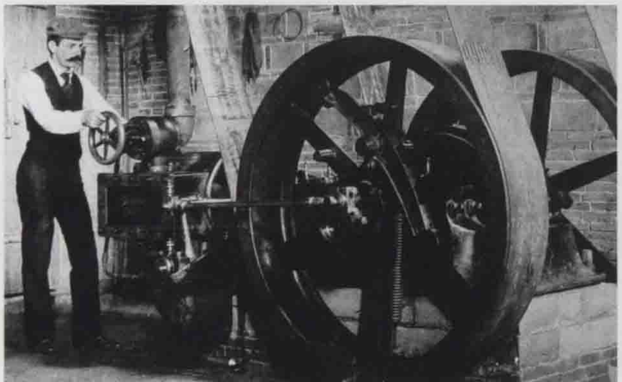
年 32 万枚、三十一年 22 万枚、三十二年 108 万枚、三十三年 149 万枚、三十四年 118 万枚。产量先盛后衰再逐渐增加，与海关报告书中初期并不顺利之记述相符。其年产量最低（22 万枚）与最高（149 万枚）相差近 7 倍，可知是需求问题而非产能之故。宣统朝四川“一圆”主币的产量约 285 万枚。若算上四川龙银七钱二分再度开制后的数量，则光绪二十七年至宣统三年（1901—1911 年）的 10 年间总产量为 933 万枚。



I-9-12
美国雕刻原模所制的四川“缶宝”三分六厘铜样（非原大）



I-9-13
四川银圆厂内部，清代中国机制币工序照片相当罕见，由于技师强必尔喜好摄影，故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照片。右一身着西服者即强必尔



I-9-14
强必尔在厂内操作蒸汽动力机



I-9-15
艾文澜（右一）与成都造币厂官员合影

大珍之一的四川光绪元宝楷书“缶宝”

四川光绪元宝银圆中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版式，其“宝”字从“缶”，俗称“缶宝”或“四川楷书”。有关其出处的看法虽不一，但由于制造精美又异常稀少，故以样币视之未有争论。目前所见有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和三分六厘全套 5 种面额。史威尼（James Sweeny）在 1981 年出版的《伯明翰造币厂史》中收录了这枚“缶宝”一钱四分四厘，并说明：“伯明翰造币厂藏品室中，虽存有此币，但无任何证据显示其为该厂出品。”笔者原本以其雕工甚佳，推测“缶宝”为英国代制且制造时间可能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理由是 1896 年 10 月 9 日上海《华洋新闻》（*The Celestial Empire*）登载将有新式银币在该省流通，且“总督已备妥新银币模待用”。

事实上银圆局造币设备的订单在该年年底时才下达，而且是由美国厂商承包，竞标对手是某德国厂商。2011 年 7 月出版的《文物天地》（总 241 期）刊载的《清代银圆珍品考述》一文中，作者周祥质疑此新闻报道可能只是传达四川当局有自造银圆的计划，并提出现存 3 种面额的钢模制作水平不一，七钱二分雕工最佳，一钱四分四厘次之，三钱六分较差，显然非同一雕刻师所为。

笔者在比较后发现确实差异明显，同系列大小银圆在委托外国造币厂制作时从未出现过这种现象，即使国内雕刻的也无此状况，有悖常理。此外，注意到七钱二分银圆背面的数字“2”相当别扭，字形有如广东七二版，不像是外国雕刻师所为。上述文章亦提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四川按察史文光奏折中有“觅雇洋匠”以及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川督奎俊奏折中有“招考工匠学习”，等等，显示川省当局或许对模具锈蚀后所造银圆有了意见，拟另起炉灶。因此笔者认为四川光绪元宝楷书“缶宝”为国内制作，各面额的银圆由洋匠参与在内的多位雕刻师所刻；日期可能是与“尒宝”的相近，最终没有采用的原因或许是大小银圆的形式不一，而川厂又奉谕停工所致，还有待深入查证。

I-9-16
四川省造光绪“缶宝”七钱二分。
上海博物馆藏，银圆大珍之一

I-9-17
四川省造光绪“缶宝”三钱六分。
上海博物馆藏

I-9-18
四川省造光绪“缶宝”一钱四分四厘。
上海博物馆藏



清代唯一的帝王像币——四川卢比

由于地处偏远加上交通不便，西部青藏高原大量使用自英属印度流入的卢比银币，除了有碍主权外还造成清廷利权外溢。四川总督锡良遂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奏请“近以成本不敷周转，爰饬照印度重三钱二分为一圆之卢比，自行试铸”，在川省机器局试造银币并标示汉文以通行卫藏地区抵制外国银币，年底朱批：“财政处、户部议奏。钦此。”次年二月庆亲王奕劻议复“拟请准如该督所奏办法”。与国内其他省份银圆不同的是一卢比主币的重量为三钱二分，辅币按比例递减，有重一钱六分的半卢比及重八分的四分之一卢比共 3 种。形式也非常特别，没有采用蟠龙图案而是采用光绪帝的侧面像，背面则镌“四川省造”四字。虽然锡良奏中提到仿印度卢比样式造四川卢比是为了“通行卫藏”，但币面没有藏文。所谓“卫藏”又称“藏卫”，是“卫”（前藏）与“藏”（后藏）的合称，故四川卢比亦称藏洋。

四川卢比是清代银圆中唯一以帝王像为图案的，在形制上仿照印度卢比，当时国内币章还没有雕刻人像的习惯，故工匠技艺欠缺，几乎是完全照着印度卢比上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像仿刻而成。背面也只是把英文换成汉字。四川卢比的版别颇多，基本上按正面光绪帝像有无衣领及背面汉字中央花饰的直向或横向来区分；亦可由光绪帝像头形大小、唇部分开或闭合等可再细分。另外，与其他省份银圆不同的是，四川卢比有金质样币，可能是呈样之用，所见为有领直花版，十分罕见。



I-9-19
由左至右：无领直花版、有领直花版、无领横花版

I-9-20
有领横花版，此版较稀少

I-9-21
重一钱六分的半卢比





I-9-22
四川一卢比及四分之一卢比金样，重量分别为 19.4 克及 5.6 克

四川卢比开制时间

由官方的档案来看，四川卢比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获准开制，故国内众多泉谱皆以此为准。然而，王承志在《四川藏洋》（见《中国钱币》1988 年第 3 期）一文中指出："《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记录成都造币厂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始铸藏币"以及黄云鹏《四川财政录》记录成都厂光绪二十八年造一圆藏洋 230 340 枚。"究竟谁的记录更接近真实情况？从目前国外发现的资料来看，1902 年造的论点更有说服力。1903 年 9 月法国杂志 *La Georaphie* 已有文章描述四川卢比的 3 种面额；1905 年法国造币厂报告及 1906 年英国造币厂报告中亦均有记载；此外，1906 年 6 月德国出版的钱币杂志上还附有全套四川卢比照片，后被译成英文刊在同年 10 月出版的美国钱币杂志上，这也是耿爱德将其生产时间列为 1903 年的原因。由此可以确定，四川卢比的开制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

另外，《四川藏洋》记载：藏洋总产量一卢比 2 550 万～2 750 万枚、半卢比约 13 万枚及四分之一卢比约 12 万枚。其中成都厂清代约造 1 000 万枚、民国元年至民国 5 年约造 750 万枚，合计约 1 750 万枚，前者成色 90%、后者减至 75% 左右，最后因无利可图而停产。由于不再生产，且经熔化改制饰物及自然消耗等原因，市面逐渐开始短缺现银，从而影响商务，



I-9-23
民国西康十两圆锭。康定在三国蜀汉时称"打箭炉"，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历史名城。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改设康定府。民国 28 年（1939 年）正式建省，新中国成立后，1955 年西康省撤销并入四川省，原藏族自治区更名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由于中原多用银锭及银圆，关外通行藏洋，康定居中担任集散角色，故皆可使用，当地银铺商号从中兑换调济，因此银锭退出流通时间甚迟，此十两圆锭即是一例

因此川康边防总指挥在旧名打箭炉的康定设厂造币，民国19年（1930年）5月4日正式开工。新币减色至70%，至民国22年间的产量为180万～230万枚；民国22年至民国24年间再度减色至65%，产量140万～170万枚；民国24年至民国28年间成色又渐降至50%上下，产量200万～260万枚；最后，成色竟渐降至不足10%，至民国31年停产，最后这批制作粗糙的低色卢比被称为“红头藏洋”。康定造币厂在营运的12个年头中，约生产一卢比藏洋800万～1 000万枚。

卢比中的珍品——云南卢比

存世有一种形式与四川卢比雷同，但文字大异其趣的卢比。其币正面在人像两旁加上“YUN–NAN PROVINCE”（云南省），背面为“SILVER COIN”（银币）英文字样，虽然标示地名为云南，因形制过于接近四川卢比，故列在此处以便比照。至于人像，有说是光绪皇帝，亦有说为时任云南都督的岑毓英，但岑毓英早已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病逝，币面文字也无纪念意味，故此说存疑。云南造币厂在光绪三十四年正月（1908年2月）方正式开制，所造者为七钱二分系列龙洋。四川卢比在云南流通于滇西的中甸、丽江一带，在当地俗称“帽圆”；还有一说则认为，从四川卢比发行到云南有能力自制银圆这段时间，该币系滇省当局委托川省机器局试制以抵制外国银圆。惟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文献可考，故云南卢比的“身世”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I-9-24
云南卢比。此币很明显系仿四川卢比制成，但其出处及生产时间待考

I-9-25
英属印度卢比。英属印度卢比1862年开始发行，尔后数年一直在孟买造币厂生产，至1874年前币上所镌年份均未更动，1877年起将人像两侧的英文由“VICTORIA QUEEN”（维多利亚女王）改成“VICTORIA EMPRESS”（维多利亚女皇），直到1901年维多利亚去世为止。图示为后来为收藏者所特制的镜面币，并非当时的产品

10 浙江省造银圆

浙江地处沿海，很早就已使用洋银，而大量生产银圆则是民国以后的事了。由于筹建较迟，才开工就奉命停办，再次设局后只生产铜元，因此龙银上镌有“浙江省造”者十分稀少，七钱二分银圆有此字样者就更稀少了，目前存世有“光绪二十三年”、“魏碑”（或称草书、介宝）及“浙江楷书”（或称缶宝）3种，皆为清代银圆的珍品。

浙江银圆局的开办

浙江首座正式的造币厂是由巡抚廖寿丰向朝廷奏准所设的浙江银圆局，自德国购置机器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正月开制。后来清廷以各省设局过多，成色、重量参差，不便商民使用，徒糜经费为由，于该年四月下令除特许外均停造银圆，因此浙江局于那年七月奉旨停办，设备拆运至北京，作为筹办“京局”之用，后京局造币厂次年毁于八国联军战火。存世的浙江省造光绪二十二年“一角”与“二角”两种小洋，有说系委托他省代制，不过，一般而言代制的钱币应仍然镌委托之省的省名；但当时浙江并无正式造币设备，应是由杭州兵工厂所出。

浙江光绪二十三年与魏碑版银圆

光绪二十三年版银圆因币面上镂刻年份，故制作时间无争议，其出处与“安徽二十三年”同，是德国代刻的样币。魏碑版银圆早期被认为是光绪二十八年试制的样币。后王荫嘉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泉币》第20期指出：“幼时数见不鲜，整百如新者，至今犹历历在目……绸伯兄试铸之说，同人咸赞同之，而不以予言为然，然予实矢之，亦不信当时试铸说也。”此说随即得到编辑郑家相“所见相同，吾道不孤矣”的回应。第26期有蒋保厘出示其父所留家藏檀箧装开制原品一套，上刻跋曰：“光绪戊戌己亥之交，浙江设银圆局，锡之实从事焉。嗣有沮者，事逐止，识者惜之……”至此泉界这才了解浙江魏碑银圆乃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所制，小毫稍多，“半圆”及“一圆”稀少。

魏碑版银圆产量不详，没有大量流通，在张璜编著的《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内亦有论及：“此币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铸就后即送往上海银行公会请求允与流通。盖上海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后经该会化验认为含银程度未够标准，须打折扣流通，谈判未有结果，浙江当局宁可收回熔毁，已流通者听其自然，故流传于市者甚稀。”查魏碑版制成的时间在



I-10-01
二十三年浙江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ANS 藏



I-10-02
二十三年浙江省造一钱四分四厘



I-10-03
魏碑七钱二分



I-10-04
魏碑三钱六分



I-10-05
魏碑一钱四分四厘



I-10-06
魏碑三分六厘

蒋保厘出示盒装开制原品后，其跋文所记与银圆局设置时间吻合，故可确定为光绪二十五年，张璜对此的记载显非正确。另书内所提到的上海银行公会始于 1915 年（民国 4 年），正式成立则为 1918 年（民国 7 年），应该是记错了对象，笔者推测可能为成立时间较早的钱业公所。至于内容方面，王郑蒋（保厘）张四人不谋而合，因此张璜对魏碑版未能通行的论述应与实际情况相去不远。

龙银大珍——浙江楷书

浙江光绪元宝楷书版的出处在早期不太为人所知，仅知是样币，近年由于国外文献逐渐披露而明朗：光绪二十七年浙省再度设局造币，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在次年三月接获伦敦贸易商代购机具的订单。从订单中获悉，整厂产能为每日银币或铜币 5 万枚，机器与模具皆于同年运交。由此得知，浙江楷书乃系伯明翰厂所代制，其确切日期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但浙局在光绪二十九年开制时只生产铜元，未制作银圆。浙江楷书版光绪元宝是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为清廷代刻的龙银模具中的最后一套，也是唯一完成于 20 世纪的一套，全系列存世计有“一圆”、“二角”、“一角”及“五分”4 种，独缺“半圆”；伯明翰厂档案簿内有“半圆”的记载，不过没有尺寸资料，可能是大部分地区都不通行这种规格的银圆，所以在列入计划后被取消，未见实物。部分“一圆”样币为银质，也有铜质及铜镀银样币存世。



I-10-07
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七钱二分银圆合金样币，伯明翰厂刻制的是 CHE-KIANG，与杭州厂生产的魏碑版流通币英文 CHEHKIANG 拼法不同

I-10-08
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七钱二分银样，伯明翰造币厂制，鸿禧美术馆藏



I-10-09
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一钱四分四厘银样

I-10-10
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七分二厘银样

I-10-11
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三分六厘银样

楷书版未量产的原因

浙江楷书版为何未能量产？从浙江再度设局后海关编写的贸易总册中可看出端倪。根据光绪二十九年《杭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中对新厂开制时间及状况的记录“4 月间杭州之铜元局开制当十铜元，以一台机器每日出铜元 12 万枚，初时每鹰洋一圆可换铜元 110 枚，以期人之乐用也。继而减至每圆 100 枚，后知仍有违禁运往上海者，因该处市价每鹰洋一圆只可换 84 枚也，故于 7 月间又减至每圆 90 枚”可知，清末民间以当十铜元为小额交易的主要通货，有一段时间由于铜价上涨，银币相对处于贬值状态，制造铜币的利润高出约 3 倍，因各厂皆赶工生产铜元牟利。此后海关连续 3 年皆有详尽记录这种情况，当时海关负责编纂《贸易情形总论》的造册处税务司马士（H. B. Morse）说“各厂无暇制造银圆之故，即为赶制铜元”。马士在中国海关任职 35 年，1904—1908 年就职于海关造册处，1909 年退休后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外交关系与汉学的著名专家。马士也收藏中国钱币，其中部分藏品现存于大英博物馆。

将文献对照之后可知，浙江造币厂再度筹办且向国外订购机具时，伯明翰厂即雕制不同币模并试制数套随机器一同送交。而浙厂开工后却因生产铜币更有利可图，遂大肆滥造，从而影响了银圆的生产；浙厂急于开工赶制铜元，而银圆则因市面已有充沛鹰洋可用，自制银圆计划被冷落而终遭弃置也不足为奇了，因此，用“生不逢时”来形容浙江光绪元宝楷书版未被采用，再恰当不过了。



I-10-12
浙江楷书版七钱二分币模

11 福建省造银圆

对于大额交易，传统制钱携带和使用起来非常不便，加上清末制钱缺乏，影响范围极广，因此通货逐渐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广东造银圆之初因国际银价的上扬，生产成色82%的小洋获利较高；加上低物价地区小洋购买力已够用，找零更为方便，故改以生产毫洋为主。影响所及，小洋也在邻近的福建省广为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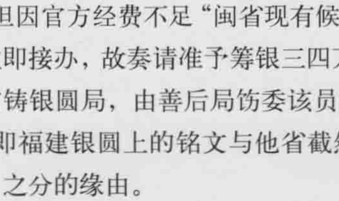
“福建省造”及“福建官局造”小洋

由于制钱的短缺，福建当局筹款汇交广东善后局代造小洋以纾解市面困局。当时福州乡绅、原浙江候补知县孙葆经批准，以商人孙利用的名义自备工本开设商办银圆局，仿广东银毫制作“二角”、“一角”及“五分”龙银。然而，不久接到户部公文不准商人付搭股本及自行制造。饬令停产后，闽浙总督边宝泉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1896年11月）奏请官造福建银圆，但因官方经费不足“闽省现有候补各员，于铸造银圆事宜多未领会”而无力立即接办，故奏请准予筹银三四万两向商人租用现有厂房机器，“改为福建官铸银圆局，由善后局饬委该员认真试铸，仍责成该局提调督同办理”。此即福建银圆上的铭文与他省截然不同而有“福建省造”及“福建官局造”之分的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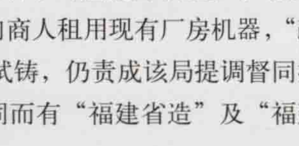
福建曾设立民营造币厂，起因一是制钱缺乏而通用钱庄票，为防一旦钱庄倒闭，商民不致受累；二是向广东购买银毫颇为费事，“官督绅办”的币厂自产本省银币有利可图。然而闽省并不富裕，银毫已足够行用，因此所出皆是小面额的“二角”、“一角”及“五分”“福角”。按理商人将本求利，设备够用即可，此时其应无大型机器。然而存世有“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银圆一种，虽未标注年份也无文献记载，但能确定系改官办以后所造。

英国学者李察·伟德根据海关及英美造币厂报告统计，“福建省造”银角产量为：“二角”约700万枚、“一角”约550万枚、“五分”约600万枚。“福建官局造”银角产量为：“二角”约2 250万枚、“一角”约500

I-11-01
福建省造“二角”。“官督绅办”所造的银角，文字为旋读，与众不同



I-11-02
福建省造“一角”。“官督绅办”所造者有些比较粗糙，“一角”背面英文有“EOO”的错版



I-11-03
福建省造“五分”



I-11-04
福建官局造“二角”。“官督绅办”改“官办”后所造，币面铭文改与他省相同



I-11-05
福建官局造“一角”

万枚、“五分”约 200 万枚。

最为旧时藏家所珍视的“福建官局造”七钱二分龙银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 年 10 月），新任闽浙总督许应　奏请准予续造银圆，同年十月朱批“着照所请，户部知道。钦此”，故一般认为七钱二分银圆是此年或次年所制。据 1899 年海关报告记载，“福建‘一圆’及‘半圆’模具已备妥，拟于次年使用”，按此推测，当局确实对“铸造银圆事宜多未领会”，误以为先前“官督绅办”期间的机器设备能制作各等面额银圆，而不知该厂当时并无大型压印机，故已委托他处雕刻币模。由此币背面阿拉伯数字“2”观察，其笔法与广东省造七钱二分银圆的“2”近似；判断其出处应是由已有往来的广东造币厂代刻的，制成时间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



I-11-6
银圆大珍之一，“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

福建省在清代与民国时期，由官办造币厂所出在市面流通的，只有“二角”以下的银辅币。推测闽省当局未继续推行“一圆”及“半圆”银币，乃该地区商民所日用的以小面额银角为主，没有发行大银圆的必要。

此福建官局造库平七钱二分银圆存世极罕，《泉币》第 19 期中有秦子帏藏钤“䌹伯鉴定”印的拓图，并有编辑补充：“福建陕西银圆，最为藏家所珎，录之以饱读者眼福。”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该币已有仿品出现，但工艺粗略，容易识别。据悉美国纽约 ANS 存有真品一枚。虽然海关报告中福建官局造“半圆”模具已备妥，但从未被发现。以近年来泉界对中国机制币的各项考证经验所得而言，若无强有力的佐证，像这种失踪百年的特定版式样币，应归入永久遗失的珍品之列。若有以所谓祖传、修路、拆屋等名义得而求售者，在未查证前均应以伪品视之。

12 台湾省造银圆

沿海地区对西方接触较早，17世纪初，荷兰与西班牙商人先后侵入台湾，输入了各式各样的西方银圆，因此台湾清代文献中常见“番银”、“佛银”以及“鹰银”等。台湾极少使用大陆通行的五十两重大型元宝，缴纳税款或交易买卖，多使用小型银货。即便是当时与台湾联系密切的福建，也只通行十两重的闽锭。清初时官方文献上用的都是计重的“银两”，民间则以论枚计算的番银为多；到乾隆年间，使用计重纹银的已寥寥无几，咸丰年因海禁开放，“番银”更为盛行。

物以稀为贵的台湾小洋

中法战争期间（1883年12月—1885年4月），台湾也是战区，军火需要大陆供应。因此，战后张之洞为台湾代购了制造枪弹机器一套，巡抚刘铭传在台北府城北门外设置机器局，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完工，这是台湾有近代化工厂之始。

广东于光绪十六年起批量生产银圆后，其中的一部分当年即经淡水海关进入台湾流通，但具体数量不详。在此之前市面的洋银以俗称“港角”的香港小毫较多。台湾何时开始生产龙银，目前尚未见原始文献，不过在光绪十九年五月十七日（1893年6月30日）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 上曾刊载文章报道官府开始使用造弹壳机器自制“二角”与“一角”小洋，台湾银角应是在此新闻见刊前不久问世的。次年英国领事报告中也提及因机器压力不足改而制作“一角”与“五分”两种小洋。

台湾小洋以铭文可分“台省制造”及“台湾制造”两大版式，币面都没有满文。前者不见“五分”，可能是先造；后者“一角”较多，“五分”也少见，两种版式的“二角”均极罕见。光绪二十一年三月（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因此台湾小洋的生产时间很短，不及两年，产量有限。除产量低外，存世者多半流通痕迹明显，全品罕见，近年来市面常有制作精美的高仿币出现，收藏者购买时谨慎为宜。



I-12-01
台省制造“一角”，罕见



I-12-02
台湾制造“一角”



I-12-03
台湾制造“五分”

“京局制造”银圆 13

自古以来，中国货币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制造与流通的地方性。然而，这种特点或方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近代中国币制发展的需要，从而成为清末全国币制混乱的原因之一。光绪二十五年四月（1899 年 6 月），清政府规定除粤、鄂两局外，其余各局一律停造。后因各省督抚抵制，又核准了江南、北洋与吉林三局续造。与此同时，庆亲王奕劻请求会同户部在京师试办造币厂制造银圆，上奏获准，定名“京都制造银圆局”，简称“京局”。最具传奇性的中国龙银也自此诞生。

京局的创始

京局开办时的造币设备来自奉谕停办的浙江银圆局，浙局向德国购得的机器被拆卸运至北京，成立“京都制造银圆局”。此事除了《议铸铜元银圆奏疏择要》、《海关十年报告书》有记载外，在英国皇家造币厂及美国造币厂年报中均有提及。1899 年 9 月 9 日的英文《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刊载：广东钱局主管爱德华 · 韦恩被推荐担任总管进行京局的建厂规划。同年 12 月 2 日，《京津泰晤士报》报道机器已运达京师。由于资料散失，京局的地理位置未见文献，根据当时外国驻华人员的回忆，是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中国通商银行北京分行旁。



I-13-01
与“京局龙”极为相似的龙袍上的龙图

另据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档案记载，清廷驻英大臣罗丰禄在 1900 年 3 月 6 日与该厂签约订购“北京帝国造币厂”（Imperial Mint at Peking）用机具，此造币厂当然就是京局了。合同金额为 3 502 英镑，半数于订约时预付，订单包括 1 座蒸汽机、6 台轧片机、10 台车床、1 台四号印花机及杂项设备。所谓四号印花机是可压印“一圆”主币的大型机器，另在 3 个月后追加车床至 16 台。这是韦恩到任后评估厂内设备有所欠缺需增添若干而向其老东家订购的。此外，币模委托其家族中曾雕刻中国第一套机制银币广东七钱三分反版模具的艾伦 · 韦恩担纲。

所添购的设备合同中规定于 1900 年 8 月 6 日前交运，延误将被罚款。惟当时北京陷于战火，京局亦已被毁，机器运到也无法交付使用，故机器的去向不明。若是在天津上岸后存仓栈，最可能的结果当是 1902 年北洋银圆局开办时被征用了。

“京局”轶事

京局尚未开制，即于庚子年的阳历 6 月 22 日深夜在义和团攻打与中











I-13-02/03

京局七钱二分光边样币。原台北鸿禧美术馆收藏，雕刻师自存品编号950，有编号者存世仅此一套

———

I-13-04

京局三分六厘光边样币，编号954



国通商银行北京分行为邻的奥匈帝国使馆时被焚毁。由于该局生产的钱币从未发行，此事鲜为人知，仅有少数“二角”、“一角”银币流入市面，最早登载的泉谱是上海钱币商王守谦在1935年印行的《中国稀见币参考书》，而后续发生的事，更加深了京局银圆的神秘色彩。



I-13-05
京局三钱六分光边银样。原台北鸿禧美术馆收藏，边道打印雕刻师藏品编号951

当时有人自京局废墟中找出除“一角”钢模以外的4套钢模，卖给后来担任《天津日日新闻》社长兼主笔的大藏家方药雨，民国年间方氏经张絅伯介绍，将所藏古钱、唐宋明银锭以及京局钢模以20万银圆转让给上海陈仁涛，陈在1947年移居香港。20世纪50年代初，陈仁涛因商场不得意拟出售藏品，中国文化部知悉后出价港币90万元购得。现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有京局“一圆”、“五角”及“二角”正、背面祖模共3套。由于上海泉界的资深藏家经常聚会交流，得知模具曾借给王守谦私制数套，于是京局银圆有了“原制”和“后制”之分。王守谦后来亦迁居香港继续经营，据其遗孀在20世纪60年代向从她手中购入除“一角”以外的后制版京局3套的美籍藏家古德曼（Irving Goodman）表示，王曾拥有全数后制版计8套，但模具已损坏无法再用。古德曼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日本出售了2套，剩下的在1991年拍卖会拍出。

20世纪80年代，英国老牌钱币商Spink & Son Ltd. 从韦恩家族遗产中获得2套计10枚的京局银圆光边样币，分别为“一圆”、“五角”、“二角”、“一角”及“五分”。此系雕刻师自行在家族工作坊制作以作留底之用，因此其中的一套在边道上刻有编号，按面额由大到小依次为950～954，这2套出现后，随即由台北鸿禧美术馆买下作为馆藏。其中有编号的一套已于2010年转让，由于是在工作坊单独压印的，所以其重量、尺寸与标准规格不尽相同。另有币模及相关档案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

“原制”与“后制”

根据研究京局银圆达20年之久的美籍钱币学者史威尼（James Sweeny）追查，除了无法得知的私人买卖，以历年的公开交易记录推断，京局银圆若不含上述的2套光边样币，则存世的“一圆”、“半圆”、“一角”、“五分”4种计10～15套，“二角”计20～25枚，此数据包括所谓的“原制”及“后制”两版。另史威尼曾于1981年送各面额银币多枚至英国皇家造币厂检测，结果发现两枚“一圆”银币的成色、重量、尺寸和边齿数都不相同，推论“后制”不止一次，所以数量也超过王守谦遗孀宣称的8套。此外，1973年6月美国Superior Stamp & Coin拍卖还出现“一圆”及“半圆”的金币（编号578、579）。老一辈的收藏家对后制版颇不认同，如熟知泉界轶闻的前香港钱币会长张璜在其1981年出版的《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即不予收录，但他当时可能并不知道光边样币的存在。



I-13-06
原制版京局“二角”



I-13-07
原制版京局“一角”

综合而言，京局银圆有下列几种版本。

光边版：雕刻师在伦敦工作坊制作的样品，全套5种面额，存世2套。



I-13-08
后制版"一圆"放大图。正面文字有双影现象，"光"字最明显

原制版：存世仅知"二角"及"一角"两种，制作地点应在北京，但不完全排除在英国制作，数量各 10 枚左右。

后制版：在上海或香港以除"一角"钢模以外的原模后制，估计制作了 10 ～ 15 套，"二角"数量可能稍低于此。后制版中至少有"一圆"及"半圆"金币各一枚。

无论是何种版式的京局银圆，均为难得的罕见珍品。由于其身世的扑朔迷离，"京局制造"银圆可谓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国机制银币之一。

湖南省造银圆 14

为了治理币制上的混乱，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对收归造币权于中央作了一番努力，下令除粤、鄂、江南、北洋四局以外全国各局（厂）一律停造银圆。这道命令使中国近代银圆出现极少数只有样币而没有流通币的情形，湖南省在奉旨前曾造了为数不多的“光绪元宝”银角流通，惟七钱二分主币造而未发，实乃其中之奇。

清代湖南省机器造币沿革

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湖南巡抚陈宝箴以“湘省钱少，赈给碎银诸多窒碍”、“来自外省究不若本省自铸之较为近便”为由，奏请试制小银角。当时自粤局取得小型印花机一台并由粤局代刻币模，在长沙城内开办，此乃湖南设局造币之始。存世有数量不多的以“戊戌”及“己亥”纪年的一角型银毫，应即此处所造。



I-14-01
湖南戊戌“一角”



I-14-02
湖南省己亥造“一角”

湖南机器局最早在光绪元年开办，因规模小无甚发展，何时停办不详。而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五年间的机器制造局，属官商合营且非兵工厂性质，故鲜有文献记载。

沧海遗珠之银圆大珍

关于湖南正式开办造币厂的始末，目前尚未查到国内完整官方文献记载；而在国外资料上，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档案中录有 1898 年 4 月 28 日经由伦敦贸易商 John Palmer, Junior & Co. 转来的订单，交运一套设备至湖南，包括冲饼机、光边机、手工操作螺旋压模机各一台，此订单中没有印花机，显示是供应运作中造币厂的增添设备。另有七钱二分、三钱六分银圆用的祖模及子模（matrices and punches），按惯例应有若干样币随机器模具运交。留存在伯明翰厂档案室中只有上述两种面额的样币，但资料中记载的还包括“二角”、“一角”及“五分”在内的全套 5 种。

因适逢清廷通令各省停办故未生产，机器可能封存或转运他处，其模具及样币也下落不明。然而有若干样币流传于外，位于纽约的美国钱币学会（ANS）1924 年时收到一封居住上海的罗姓人士（P. C. Row）来函，欲推销一种费用低廉的硬币简易摄影术，其所附样本中即有湖南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圆的照片，而拍照用的原物就是意大利驻上海的外交官罗斯（Giuseppe Ros）在 1922 年请罗姓人士拍摄时所用的。但此信息未曾公开，故外界无人知晓，直到美国钱币学者史博禄（Bruce Smith）于

1993 年在 ANS 搜寻档案时才发现。罗斯曾在 1919 年 5 月造访 ANS，希望能由该学会出版其新著 *Chinese Imperial Struck Coins*（《中华帝国机制币》），只因当时该会经费不足才作罢。

在国内，最早收录此币的是王守谦编写的《中国稀见币参考书》，但没有图片也无定价，此亦为样币曾流入国内的旁证，但目前为止尚未见实物或照片。其他早期钱币书，如蒋仲川、耿爱德及施嘉干等编著的各谱均无记载，钱币收藏界几乎忘了它的存在。

平地一声雷　震撼钱币界

湖南七钱二分银圆埋没多年始终不为国人注意，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人李察 · 伟德（Richard Wright）对中国机制币进行深入探讨，并在伯明翰造币厂搜集资料时，才在厂档案室中发现了这批旧藏，除了样币外还有七钱二分正面冲模一只、三钱六分正、背面冲模各一只。伟德于 1974 年英国皇家集币学会年度会刊 *Numismatic Chronicle* 中发表文章论及此事，此为湖南省七钱二分样币的第一张公开照片，尔后才广为泉界所知，后该枚样币由台北鸿禧美术馆收藏。1975 年湖南省七钱二分样币首度现身美国公开拍卖，以 15 500 美元成交，创下中国钱币价格突破 1 万



I-14-03
湖南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圆大珍中名列前茅，此枚为 1981 年出版的《伯明翰造币厂史》中原物



I-14-04
湖南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2006 年北京诚轩春拍拍品，此枚为 1974 年李察 · 伟德披露图片的原物，是所知湖南“一圆”银币最早的照片。该币以总价人民币 236.5 万元成交

I-14-05
湖南省造光绪元宝三钱六分。2006 年北京诚轩春拍拍品，珍稀。成交总价人民币 90.2 万元

美元的记录。2006 年北京诚轩春拍出现七钱二分、三钱六分及三分六厘各一枚，分别以总价人民币 236.5 万元、90.2 万元及 57.2 万元成交。此枚即李察 · 伟德于 1974 年英国皇家集币学会年度会刊上披露的湖南七钱二分银圆，由台北藏家所得。

据伟德表示，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原有 12 枚左右；前香港钱币会长张璜则说共有 10 枚，伯明翰厂自留 3 枚，出售 7 枚。根据目前资料可查知，经伯明翰厂流出者只有六七枚，包括香港汇丰银行自伯明翰造币厂取得的一枚，该行所有藏品目前由伦敦大英博物馆保管及展出。



I-14-06
湖南省造光绪元宝“二角”



I-14-09
湖南光绪元宝三钱六分正面冲模。原存伯明翰造币厂档案室



I-14-07
湖南省造光绪元宝“一角”



I-14-08
湖南省造光绪元宝“五分”，珍稀。2006 年拍出价 57.2 万元

15 云南省造银圆

云南省位于中国西南，自古为重要白银产地，《西汉·食货志》所记载的朱提银即产于云南昭通的朱提山，故云南习用生银与其他各省无异。清末时，云南出产一种形制特别的银锭，即俗称“牌坊锭”或“马鞍银”的五两银锭。云南最早大量引进银圆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接受搭拨在来自湖北“协饷”内的饷银，“协饷”是清税收富裕的省份对地方贫瘠、收支不能平衡的省份的补助款。

云之南的新老银圆

20世纪初由于滇越铁路的兴建，以法国贸易银圆为主的大量外国银圆流入中国作为发放工资及支付运费之用。据《新纂云南通志·币制考》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锡良移节督滇，当时川、鄂两省所造大小银圆数量充裕，在向其换取运回开通风气后，民众渐知其方便之处，银圆渐受市面欢迎。通用的中国龙银以湖北的为主，来自四川、广东的亦多；洋银除俗称“坐洋”的法国贸易银圆外，英国“站人”也很通行，滇西则以印度卢比较多见，“鹰洋”在云南流通不广。虽然每年由建造铁路公司输入百余万银圆，加上边境贸易流入的，但当局仍嫌通货不足。同年，当局派员至上海信义洋行洽购德国苏勒厂（Schuler）制造银圆用机器筹设云南银圆局，次年购地建厂并于是年底完成，机器则经香港分批陆续运到。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1908年2月）滇局改名为度支部云南造币分厂并正式开制银圆，这是清代成立最晚的造币厂。当时清政府正在整顿币制，裁撤各厂，由天津总厂负责，但顾及幅员辽阔，仅保留鄂、粤、川、滇四处改为分厂，后增加南京共计六厂。该年度海关蒙自口报告记载：“查滇省龙圆局业经起造，凡造出龙圆流通不少。后面当中铸龙样，边用英文，铸明云南省七钱二分；正面当中铸光绪元宝，边铸云南省库平七钱二分。”此为云南以机器制造银圆之滥觞，后因碾片机压力过小，又通过上海地亚士洋行添购大型碾片机一台及碾轮。同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驾崩，溥仪登基次年改年号为宣统，各省也随之将币铭改为“宣统元宝”。滇厂所添设备先后于宣统二年五月（1910年6月）运到，因逢市面铜元缺乏，转而生产铜元。就在此时，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规定“自本则例奏定之日起，所有各省现铸之大小银铜元一律停铸”。中央为统一币制，将各厂收归部办，原有大小祖模一律销毁。



I-15-01
“老云南”光绪元宝“二角”



I-15-02
“老云南”光绪元宝“一圆”

I-15-03
“老云南”光绪元宝“半圆”

I-15-04
“老云南”宣统元宝“一圆”

I-15-05
“老云南”宣统元宝“半圆”

“老云南”与“新云南”

云南省造光绪元宝银圆有两大类，最简单的辨识方法就是看背面有无英文。由光绪三十四年的关册中可知，最初发行的是“中铸龙样，边用英文”，此版银圆在当地俗称“粗字满龙”或“粗字粗龙”，泉界习称“老云南”。与其他省份龙银相比，“老云南”图文较为深峻。

另一种设计简洁、龙面无英文者，是民国成立后制造的。清政府虽推动新国币拟统一全国的银铜币，但新币尚未发行，武昌却事起，在未领到部颁祖模以前，云南地区仍需大量银圆以供流通，在原有模具销毁的情况下只有另起炉灶。自行生产的新币当地称为“细字小团龙”或“细字细龙”，泉界习称“新云南”。1924 年出版的《昆明市志》记载：“宣统三年，为统一币制起见，乃将粗字粗龙各祖模全行销毁，专铸细字细龙者……以后流通甚广，遂专工铸造，其余多停铸，故现今流通市面者，多系细字细龙各币。”



I-15-06
图案简洁而没有英文的“新云南”系列银圆



I-15-07
“新云南”光绪元宝“一圆”版式多，如龙面火珠下小圈数目不同，据悉是民国时期加铸时减色，为容易分辨而刻意加上的记号

I-15-08
“新云南”光绪元宝“一圆”，龙面火珠下小圈数为 4

两种银圆的数量以新版为多，但“新云南”相对于“老云南”有一特殊之处在于有不少银币铜样存世。由于有款边铭是德文，笔者推论当时订购机器之际也委托德方代刻币模，此模具即“新云南”，可能因形制与他省不符而未被采用。民国时期厂方将留存的进口德国币模整修后投产造币。《昆明市志》记载销毁的粗字粗龙祖模应是在国内制成，也就是说，以币模制作时间的先后而论，“新云南”才是“老”云南，“老云南”其实是“新”云南。

根据《云南近代货币史资料汇编》抄录自《富滇新银行档案》的云南造币厂历年统计表的数据表明，该厂在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年开制后至宣统三年间，于光绪帝在位时造“一圆”972 076 枚、“半圆”1 989 755 枚，无“二角”、“一角”银毫，此当系“老云南”。宣统帝在位的 3 年共造“一圆”1 919 463 枚、“半圆”8 874 789 枚、“二角”371 522 枚。清代产量总计“一圆”2 891 539 枚、“半圆”10 864 544 枚、“二角”371 522 枚。

笔者再依据资料中光绪三十三年至民国 6 年间（1908—1917 年）所造银币总额，扣除上述数字后，所得“一圆”59 031 枚、“半圆”118 525 714

I-15-09
“新云南”光绪元宝“半圆”版式亦多，此龙面火珠下小圈数为 2

I-15-10
“新云南”光绪元宝“半圆”，龙面火珠下小圈数为 3



枚、“二角”160 990 枚及“一角”902 822 枚，其中以“新云南”为主，但可能也包括唐继尧像“半圆”在内，虽耿氏必定有所依据才能精确到个位数字，但显然无法区分版别。之所以未直接引用《云南近代货币史数据汇编》所列的数据，是因该数据中民国时期的统计是云南造币厂“自造自发”者，不包括代银行及商号委托附造的部分，故数量低于耿氏，在此列出作为“新云南”银圆产量的参考。



I-15-11

极富地方特色的云南银锭，俗称“牌坊锭”或“马鞍银”

I-15-12

云南银圆产量大，版式丰富



唯一加注季节的银圆——大珍“庚戌春季云南造”

I-15-13
大珍“庚戌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七钱二分。此币在2002年现身北京春拍，以人民币108.9万元成交，是国内首次破百万元成交的钱币。同一枚币于2007年诚轩秋拍，创下人民币319.2万元的高价。次年香港诺曼·亚克斯专场（The Norman Jacobs Collection）出现第二枚，据悉是其在1952年以400美元购自伍德华旧藏。当时估价为15万～20万美元，品相虽较佳但没有成交。此枚2011年9月再次出现于美国Heritage洛杉矶拍卖会，终以47.5万美元落槌，加上手续费15%，总价为54.6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0万元

存世有一种币面铭文为“庚戌春季云南造”的宣统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圆，稀罕之程度，以见多识广的前香港钱币会长张璜的一句话可为概括：“亲近中国钱币近一甲子，与此币之真品缘吝一面，虽屡经追求一真品之照片或拓片亦未能如愿。”耿爱德也未能收藏此币，在其著作《中国币图说汇考》内仅有根据照片绘成的素描图。其照片即来自前述的1924年上海罗姓人士欲推销给纽约美国钱币学会硬币简易摄影术所附的样本，原物为意大利驻上海外交官罗斯所有。罗斯除专精中国机制币外，也是欧洲人士中收集中国书籍的佼佼者，他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及昆虫学有高度兴趣，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所收集的地方志、少数民族图谱等非常丰富，估计以万册计，成为他藏书中最耀眼的部分。

此云南宣统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圆最特殊之处，在于“庚戌春季”四字。中国钱币以干支纪年不足为奇，注明季节则绝无仅有，其缘由目前尚未见文献记载。按在此之前云南省所造银圆，铭文皆只有帝号而未标纪年，但此币不仅有确定年份还加上特定季节，为何是“春季”而不是夏、秋或



冬等其他季节？有果必有因，若非有重大事件发生，当局不应多此一举。

究竟宣统朝在庚戌春季有何重大事件发生呢？经查，此年二月二十二日（1910年4月1日）滇越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云南省的第一条铁路，长465公里，轨距1米，是比全国标准轨距1.6米为窄的米轨铁路，在云南境内称“滇段”。此铁路全线由越南海防为起点，在越南境内称“越段”。法国自1871年提议修建，到1885年与清政府会商，1887年法国政府和议会立案，1899年与清政府签订《越南条约》确定修建并开始勘线，1903年动工兴建，1910年正式通车，历时三十余载。滇越铁路是人类近代史上最艰巨的工程之一，也是当时中国的第二条跨国铁路、大西南的第一条铁路。它打破了云南因地处边陲而落后、封闭的状态，是滇省对外开放及现代化的开始，活化了云南经济的发展。



I-15-14
无独有偶，“戊”字笔画不妥的中国钱币还有新疆在同年发行的红钱十文铜元

滇越铁路沿线地形险峻，修筑工程浩大，工程进行到一半时，1904年海关蒙自口报告中评述“兴此不易，成之大功，将来定永垂不朽耳”。1905年云南“省垣以及城外东南两方共约八万五千人……现南溪河一带，筑路苦力死者已约五千人，合每百人之七十矣”，可知其艰难程度。筑路之初，因沿线人民的强烈反对被迫变更路线，但商界知其通车后将带来巨大利益而莫不欢迎。此工程由法国公司承揽，分成数段施工，承包商以意大利人居多，这或许是罗斯获得云南庚戌春季造银圆的原因。

由全线正式通车的时间看，在该年春分（庚戌年二月十一日即1910年3月21日）之后，与币面铭文“春季”吻合。据此推论，“庚戌春季云南造”宣统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圆，可能是当局为纪念此意义重大的建设竣工而特意筹备以资纪念的，或许是试制完成后，当局发现“戊”字笔画不妥，或赶制铜元无暇生产等其他原因，最终未予采纳发行。

16 陕西省造银圆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泉界分量最重的银圆是“陕西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湖南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虽出现在谱上，但似乎无人理会；而奉天癸卯一两还未见于国内文献记载，也只是闻其名而不见其踪。这时期扛起中国收藏事业半边天的上海，有谓“藏银币大家，辄以有无陕西、福建银圆为断”可见陕西省造银圆之珍贵，以及它在当时藏家心目中的地位之高。

藏银圆大家之断——陕西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

话说各省纷纷以各种理由加入奏请设厂造银圆的热潮，陕西省也没有缺席。巡抚魏光焘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也在奉旨会同户部试办的情况下，通过上海德商瑞生洋行（Buchheister & Co.）向英国伯明翰造币



I-16-01
陕西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陕西造币厂尚未安装机器设备即被裁撤，只有极少数在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制作的样币存世。旧时上海泉界以有无陕西或福建银圆为藏银圆大家的指标，故异常珍贵



厂订购全套机器设备，包括 1 台印花机及代办整套 5 种面额的 10 套银圆模具在内，总价花费了 26 900 两白银。伯明翰厂接单后依约将机具完成并在次年初交付运出，但是那年正值清政府整顿造币厂，陕西省列在裁撤名单之中，已运至上海的机器只有设法移交他厂使用了。

当时魏光焘原拟改请京局提用，但没有达成协议。后陕西巡抚改由端方担任，而在裁撤名单之外的湖北银圆局此刻正扩充产能需要增添机器，经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多次电报往返后，光绪二十五年底鄂省按合约在转运汉口后 7 个月给付陕西省未清的尾款白银 9 000 余两，早先支付的白银 17 820 两货款在一年内分两次还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张之洞及湖北银圆局分别致电上海道台与陕西驻沪委员，请他们通知代理商放行。张之洞愿意承接陕西机器是由于他在办理湖北银圆局的实际经验中，认识到伯明翰厂的机器最适用。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在中国的业务，除广东钱局直接与之往来外，其余皆通过上海瑞生洋行代理。

机器最后由上海改送到湖北，早期泉界之所以有陕西省银圆为湖北代造一说，可能即因此而来。样币当时随机器运到中国，显然没有妥善保管而分散流出，使藏家难以集成全套。如耿爱德即未能将“一圆”纳入收藏，他的书上用的是拓图，只藏有“五角”一枚。据他表示，上海泉界在 1948 年以前没有见过陕西“二角”，出现后被某藏家以 1 200 美元高价购得。上海博物馆展品中有李伟先捐赠的“一圆”一枚、施嘉干捐赠的“五角”一枚。由于机器根本没有运到陕西，所有样币都制作于英国。

英国伯明翰造币厂的档案中除留有文字档案外尚有实物，包含“一圆”、“五角”、“二角”、“一角”及“五分”全套 5 种，但没有币模。20 世纪 70 年代，伯明翰厂因扩展业务需要资金，将档案室中留置的各国样币的复品出售筹款，有数套样币因而流入市场为藏家所得，品相均为十分精美的 proof 级。英国拍卖场还出现其他形式的试样币，包括单打龙面的“五角”合金样币、“二角”铜质样币，应都是从雕刻师工作坊流出的，非常罕见。





I-16-02
“二角”单面试打铜样，2007 年北京诚轩春拍出品，日本秋友晃旧藏，到目前为止是独一无二的

I-16-03
2010 年香港拍卖黄华枢旧藏之伯明翰厂造陕西光绪元宝系列银币半套，经 NGC 鉴定为 SP65 ~ 66，品相一致，十分难得

17 山西省造银圆

有"表里山河"之称的山西，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省份。到清代时，山西对全国金融影响力最大的是它的票号，各地的汇兑乃至于官方的解饷都仰其办理。而各地银两平法及习用成色不同所造成的差别，是汇兑的主要收益来源，在晋商影响下，山西省惯用银锭，没有设局的必要。因此山西的宣统元宝"二角"小洋的由来，值得进行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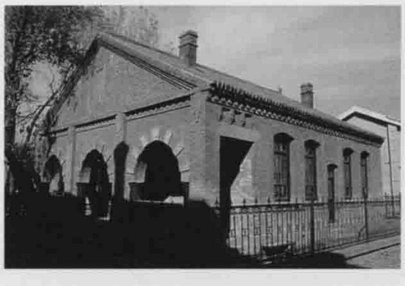
山西省唯一的龙银——宣统元宝一钱四分四厘

在存世的龙银中，有一种币面标示"山西省造宣统元宝"的一钱四分四厘小洋，是唯一标明由山西省制造的银圆。由于山西并未设有近代机器造币厂，即便后来阎锡山扩充太原兵工厂，顺搭生产铜元，也是民国时期的事了。此币工艺粗糙且背面英文为"MANCHUIAN"（东三省），因此一般都认为系民间所造。

当对此币稍加观察，即可发现其与东三省"二角"小洋极为相似，连背面英文也有"FIRST YEAR OF HSUAN TUNG. MANCHUIAN PROVINCE"及"MANCHUIAN PROVINCE. 1 MACE AND 4.4 CANDAREENS"的不同版本，明显仿自东三省小洋，但未见可信的考证。早期的钱谱尚语带保留，如蒋仲川著民国28年6月上海出版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上记载"此币不知由何处铸造，尚待考查也"，施嘉干编印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则是"出处待证"。其他一些钱刊书籍也不予收录或将其列入私造，总而言之，连"待考"两个字都免了。

1917年（民国6年）在上海出版的英文版《亚洲文会北华分会年刊》中，载有罗斯《中华民国钱币》一文，这篇专论民国时期钱币的文章，却收录了这枚宣统年号的小银币，而且说明了纳入的原委。

罗斯是这样记载的："我被告知，在革命后不久，山西都督即核准在太原府生产这些小银币。革命后山西宣布独立，领头者自任都督，上台后却发现省府公库一无所有，在竭力收集银铜后于太原府兵工厂生产了上述银币。使用宣统年号的原因是让民众误以为是已经流通多年的银币，因而不会对其产生怀疑。在中国，新钱币发行时都会被怀疑……有一位省府官员向我保证，这枚被质疑的钱币是山西巡抚在宣统二年时委托天津所制，但我认为这是对天津造币厂的诽谤！"《克劳斯世界硬币目录》（*Krause's World Coins*）即根据此文，将此币收录在山西省部分，即认同此币系军阀在1913年左右制作的。



I-17-01
太原的山西机器局旧址

罗斯文中的太原府兵工厂即山西机器局，开办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是山西最早的近代机器工厂和近代兵工厂。光绪二十年甲午败战后中国丧失了制海权，沿海兵工厂极易受外敌攻击，清政府决定把军火工业的重心移向内陆，山西机器局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筹办的。开办时占地 38 亩，初期以修理枪械为主，兼造大刀、戈矛，后来逐渐制造步枪。民国 3 年 7 月改称山西陆军修械所，民国 7 年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为厚植实力，扩建厂房增设铜元局后方开始制造铜币。

I-17-02/03
标示“山西省造宣统元宝”的一钱四分四厘小洋，实际上是民国 2 年（1913 年）制造的。可按背面龙头宽窄分大头龙及小头龙两种版式。大纲钱性质的品种，山西省制造的银圆仅此一式两版

山西票号的兴衰

山西票号在清末的势力极大，以各地习用银两平法及成色的不同来获利。光绪末年最为发达，尤其是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仓皇中缺乏现银，路过票号所在地的太谷、祁县、平遥三处时，与票号有往来的虽无汇票仍可提款，纾解了许多皇亲贵族的急难。事平后大受信任，国库汇解的大宗款项均归票号代理，几乎包办全国的汇兑业务。

机制银圆因其成色、重量较为一致，日渐普及，加上交通日益便利及外商银行、大清银行陆续的设立后，小笔的汇兑或大宗的官款都逐渐减少，不再是独占事业。银行纸钞的通行也减少汇票的需求，且银行存款利息高于票号，导致营收降低。然而票号却墨守成规，未随时代的变化改进，如官方筹组户部银行时邀票号入股被回绝。辛亥革命时各地动荡，票号业应对无方，存款的急于提现加上放出去的却收不回，吃下大批倒帐后纷纷歇业，不数年即全军覆没。因票号股东负无限责任，在债权人到总号登门索偿时部分股东只得变卖家产，有些人晚景十分凄凉。

I-17-04
山西省“咸丰四年十一月永宁州郝毓海”五十两银锭



18 新疆银圆

新疆位居西北边陲，内接甘肃、青海、西藏等，外与俄罗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为邻，古称西域，清光绪十年（1884年）置新疆省，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设省以前，新疆已铸有“光绪银钱”等数种计重五分的银币，嗣后又造“饷银”、“光绪银圆”、“光绪元宝”、“宣统元宝”、“宣统银币”、“大清银币”等各式名称的银圆，种类之繁杂堪称全国第一，此处仅择其中一些名誉品，作大致介绍。

“足银壹钱”方孔银钱



I-18-01
“足银壹钱”。仿制钱形式的方孔银币，背面是意思相同的察合台文。重湘平一钱，合3.6克，直径22.5毫米。附图此枚经NGC鉴定AU55入盒后摄影，故有4只钱币固定夹

同治年间新疆发生叛乱，阿古柏（Mohammad Yaqub Beg）侵占南疆。清政府在同治五年（1867年）派遣钦差大臣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拟订“先捻后回”策略，于光绪元年（1875年）入疆，3年后平定南疆。

左宗棠为准备收复新疆，先进驻甘肃省城兰州，并设立“兰州机器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据左宗棠军师麦士尼（William Mesny）回忆，因缺少铜钱对付小额开销，就用兰州机器局内造弹壳的机器制造面额相当于100文的银钱。这种仿制钱形式的方孔银币，正面刻汉文“足银壹钱”，背面是意思相同的察合台文，以湘平而非库平为计重单位。

原本左宗棠希望此以“范银为钱，用银片捶成，不须熔铸”的银币能“为新疆创此永利，以救圜法之穷”，但由于效率低、成本高、亏损大，制作时间很短，此后官兵开始使用新疆造币厂生产的小银币，可能生产于光绪二年或三年。这是该地区最早以机器制造银币之始，也是唯一的方孔银币，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虽然未能继续生产，广为流通，但其以湘平计重单位的方式，成为新疆银币的一大特色。

“天罡”银币

阿古柏盘据南疆期间，曾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喀什噶尔设厂造币，仿中亚伊斯兰钱币式样以手工打造金银铜币。银币为数颇多，称为“天罡”（tanga，突厥语银币之意），直径12～15毫米、重约1.7克。左宗棠平定新疆后，为消除阿古柏残余势力及恢复大清王朝的主权象征，首先在光绪三年（1877年）令帮办新疆军务的广东提督张曜在库车招募银匠，仿阿古柏天罡银币式样打造五分小银币以及汉文“光绪银钱”的壹钱小银币以收缴替换之。阿克苏、喀什噶尔、和阗、英吉沙等地收复后，也开始制作。



I-18-02
阿古柏“天罡”银币



I-18-03
光绪“天罡”银币



I-18-04
“光绪银钱”壹钱

迪化造三体文“光绪银圆”

此币正面的“光绪银圆五钱”是以汉文、察合台文（左）及满文（右）3 种文字书写，故称“三体文”，由代理巡抚仿洋银于光绪十六年（1890 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制作的，为新疆地区最早以蟠龙为图案的银圆，也是除小天罡银币外唯一有满文的银币。由于亏损累累，不久停造，因此数量稀少，是新疆币中的珍品之一。其开制之初，有五钱、三钱及二钱 3 种，每百两银一半用来造五钱及三钱，一半则配造二钱，现在所见只有五钱及三钱两种面额，理论上产量最多的二钱反不见踪迹。



I-18-05
清政府驻兵库车后，新疆帮办张曜仿阿古柏半钱银币式样，造银币作为军饷用。正面有汉字“楚”，背面为察合台文“五分”及回历“1295”。此币铭文及设计与众不同，少见



I-18-06
三体文“光绪银圆”五钱。重 18 克，直径 35 毫米。图案精美，非常罕见

I-18-07
三体文“光绪银圆”三钱。重 10.5 克，直径 32 毫米。新疆银圆珍品之一

迪化造“光绪银圆”

“三体文”试制失败后，迪化就未再造币。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新疆巡抚潘效苏以邻近的喀什与阿克苏自造银圆绩效良好，饬令比照办理。经拓地建厂在该年再度开制“光绪银圆”，在币面两侧加上地名及重量，直到光绪三十三年停产，改由机器局接办。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新疆布政史王树枏在省城迪化水磨沟机器局开制“饷银”银圆，作为发放官兵薪俸之用。开局初期有五钱、三钱、二钱、一钱 4 种。宣统二年新任巡抚袁大化到职后，自上海添购机器，加造一两

I-18-08
“迪化光绪银圆”系列





1-118-119
各种不同版式与面额的迪化造"饷银"龙银

重饷银。“光绪银圆”与“饷银”两种银币的版式皆杂多，字体书法及位置有多种形态。

喀什道“大清银币湘平弌两”——唯一以“道”名义发行的钱币

此币制作粗陋，正面中间为“大清银币”四字，上方为“喀什道”三字，下缘纪值“湘平弌两”四字，右边是维文“喀什制造”，左边是维文纪值“一两”和纪年“1325”（回历，即公元 1907 年，清光绪三十三年）。背面蟠龙，上方为类似菊花或太阳的图饰，左右为不同花叶装饰，下缘是彩带结。虽然制作粗糙、压力不均，且图案文字不很清晰，但它存世之珍罕为泉界共知。



I-18-10
“喀什道大清银币湘平弌两”唯一以“道”名义发行的钱币，罕见

这枚银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以行政机关“道”的名义发行的钱币。过去许多学者藏家认为，“道”字是“造”字的笔误，其实不然。“喀什”是“喀什噶尔”的简称，为初创之意。“道”是行政上的一种设置，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府或州，由道台管理。“喀什道”包括英吉沙县、疏勒县、莎车县等。

新疆建省时以迪化（今乌鲁木齐）为省会，刘锦堂为首任新疆巡抚。全省先后设镇迪、阿克苏、喀什、伊塔四道，下辖府十六、厅十一、直隶州二、州一、县二十一、分县二。自此新疆在行政组织上便同中原各省完全划一，各级官吏均由中央政府任命。由此可见，“道”是清代省府之间集军事、政治、经济于一体的行政机关。既为省级行政机关，以道政府的名义发行钱币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该币另一个特点是使用笔画较少的“弌”字代替传统的大写“壹”字，此与吉林“厂平弌钱”相同，推测其目的一是避免笔画太多，从而影响钱文在压印后的清晰度，二是避免笔划太少而显简陋。整体而言，新疆喀什道湘平弌两大清银币非常有边区地方钱币的特色。由于发行单位记名的特殊及存世数量稀少，虽然制作粗陋，但身价不菲。

琳琅满目的喀什银圆

新疆银圆若以面额、书法、图案、花饰等不同以及制造年份区分版别，可谓洋洋大观。其杂乱纷繁，仿佛各地造币者随心所欲而为之，喀什所造银圆只是其中之一。喀什即古代的舒勒国，清康熙时为准噶尔所灭；乾隆朝发生叛乱，清廷出兵平定后纳入大清版图。同治年发生阿古柏之乱，左

I-18-11/12
“光绪银圆”：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二年间制造，有“伍钱”、“叁钱”、“贰钱”、“壹钱”4种面额





I-18-13
"喀什光绪银圆"：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间制造



I-18-14
"喀造光绪银圆"：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年间制造，有"伍钱"、"叁钱"、"贰钱"3种面额



I-18-15
"喀什大清银币"：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间制造，有以湘平为单位的"壹两"、"伍钱"、"贰钱"3种面额



I-18-16
"喀什光绪元宝"：光绪三十一年制造，有"伍钱"、"叁钱"、"贰钱"、"壹钱"4种面额



I-18-17
"喀什造宣统银圆"：宣统元年及二年间制造，只有"五钱"一种



I-18-18
"喀什造宣统元宝"：宣统二年至三年间制造，只有"伍钱"一种



I-18-19
"银圆"：宣统三年造，有"叁钱"、"贰钱"2种面额



I-18-20
"喀什饷银"：宣统三年造，民初仍继续生产，只有"五钱"一种

宗棠于光绪三年入疆平定后建议改省分治。光绪十八年，喀什道李宗宾同意疏附县稽查及商会所请，委托候补知县罗正湘试造银钱，面文“光绪银圆”，此为其造银圆之始。光绪二十二年起，币面加上地名“喀什”字样，尔后再改“喀造”或“喀什造”；但在宣统三年时却出了一版只标示“银圆”的龙银。

新疆省造“光绪银元”英文“SUNGAREI”龙银

新疆省造“光绪银元”，目前在官方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其出处的文献记载。新疆使用近代机器造币的时间较晚，若在当地制作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设机器局或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水磨沟机器局之时才有可能。此系列龙银背面英文地名SUNGAREI翻译过来就是今新疆北部地名“准噶尔”，并不能代表新疆；该系列以库平计重，与当地其他银圆皆以湘平为标准不符；而其标示的七钱二分、四钱、二钱及一钱之递减重量形式又与中原习用的币值体系不符；加之面文“光绪银元”亦与通用的“光绪元宝”有异。此外，此系列龙银还欠缺乾隆皇帝统一新疆后为便利少数民族识别，规定货币上必须要有的维吾尔文。



I-18-21
“光绪银元”二钱。直径24毫米，新疆龙银珍品

I-18-22
“光绪银元”一钱。直径19毫米，新疆龙银珍品

耿爱德以其形态近似吉林丙午（1906年）系列龙银，推论可能系吉林代造，并将其制作年份定在此年。也有观点认为其曾经流通过，但缺少可信依据。2012年6月德国Kunker公司拍卖会上出现的币模也包括新疆省造“光绪银元SUNGAREI”四钱、二钱，其受委托制作的时间为1897年，即当局筹措设机器局之际订购的。

“饷金”金币

新疆除了生产数量颇多的各式大小银圆外，也发行过少量的金币。新省财政原本依赖中央及中原各省协助，因清末国力衰弱入不敷出，偏远地区难以应付，故发行金币。新疆与实施金本位的俄国为邻，交易时受其牵制，因此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新疆主管经济事务的布政史王树枏奏请购金在水磨沟机器局试行造币，因其“辅饷糈之不济，顾市面之流通”，故称为“饷金”。

“饷金”金币实际生产时间应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度支部收到皇帝批准之后，当时只生产一钱及二钱两种：前者重3.6克，抵纹银3两；后者重7.2克，值纹银6两。开制后4个月停产，共使用黄金



I-18-23
“饷金”二钱金币。直径24毫米，未使用，底板上的同心圆痕迹清晰可见



I-18-24
“饷金”一钱金币。直径19毫米，未使用。背面察合台文与汉字意思相同



I-18-25
“饷金”一钱金币。此版无察合台文



I-18-26
“饷金”五钱金币，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引自吕章申主编《中国古代钱币》(2011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I-18-27
迪化水磨沟机器局造币厂旧址，引自王永生著《新疆历史货币》，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

5 001两。据悉宣统二年（1910年），新任巡抚袁大化自上海添购机器加造五钱金币，但非常稀少，目前仅知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枚。工艺尚称精美，因存世数额不多，向为藏家所珍视。

19 西藏银圆

论自制银币，位处西南边陲的西藏是中国最早开制的地方，然而西藏地区使用及制造的银币都轻且薄，俗称“薄片”。青藏高原因地处偏远，与中原交通不便，而与尼泊尔的联系反多，因此在没有自行造币以前通行尼泊尔的钱币不足为奇，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8世纪末。

西藏使用银钱历史悠久

西藏自16世纪中叶起，因贸易便利逐渐习惯于使用尼泊尔重约5克的银钱，不过后来乾隆皇帝认为使用外国货币不成体统：“我国家中外一统，同轨同文，官铸制钱通行无滞。区区藏地，何以用外番货币？”与晚清沿海及内地纷纷采用西洋银圆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时的大清王朝国势尚强盛，这是西藏开始自造银币的肇因。之前西藏地方政府曾在乾隆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763—1764年）及乾隆五十年（1785年）两次自铸钱币，但都是权宜之计，未生产多久，便停造了。

西藏自造银钱采用藏历纪年，背面中心内为莲花图案，外圈是八吉祥图案，俗称“久松”银钱，“久松”是藏历13饶回的读音，“久松”银钱有“1791”、“1792”、“1793”3个年份，与尼泊尔钱同重，清末四川所造的一钱六分半卢比银币的重量与之相当。乾隆五十八年设宝藏局开始铸造“乾隆宝藏”银钱，并在币面标注纪年，开了中国钱币标示年份的先河。至此，尼泊尔银钱影响力逐渐式微，最终退出了西藏地区，这第三次的造币意义重大。



I-19-01
久松西阿银钱1791年版（藏历13—45年）

西藏“乾隆宝藏” 开纪年银币先河

“乾隆宝藏”银币发行的第一年有重一钱五分、一钱及五分3种，其后乃至后来的嘉庆、道光、同治年间所造宝藏银币都只有一钱，“宣统宝藏”



I-19-02
“乾隆宝藏五十八年”、“乾隆宝藏五十九年”、“乾隆宝藏六十年”



I-19-03
“嘉庆宝藏元年”

I-19-04
“道光宝藏元年”、“道光宝藏二年”、“道光宝藏四年”

有二钱及一钱两种。由于西藏地处偏远，清末国势日益衰弱，中央无暇顾及地方事务，驻藏大臣也多为被贬官员或庸才，钱币时造时停且产量有限。清政府对西藏控制力丧失后，西藏地方政府也制造过“甘丹颇章”、“格桑章噶”等银币，还从印度购置旧式压印机设立造币厂进行造币，但西藏钱币可能因所处地理位置偏远与文化差异，始终未受中央重视。“宣统宝藏”是驻藏大臣联豫到任后，以造币权归属中央、地方不得私自设厂为由，派军查封地方政府的造币厂，恢复对西藏造币的监管后所制。



I-19-05
“宣统宝藏”



I-19-06
“甘丹颇章”



I-19-07
“格桑章噶”



I-19-08
“桑冈郭母”

贰



清代银圆

总厂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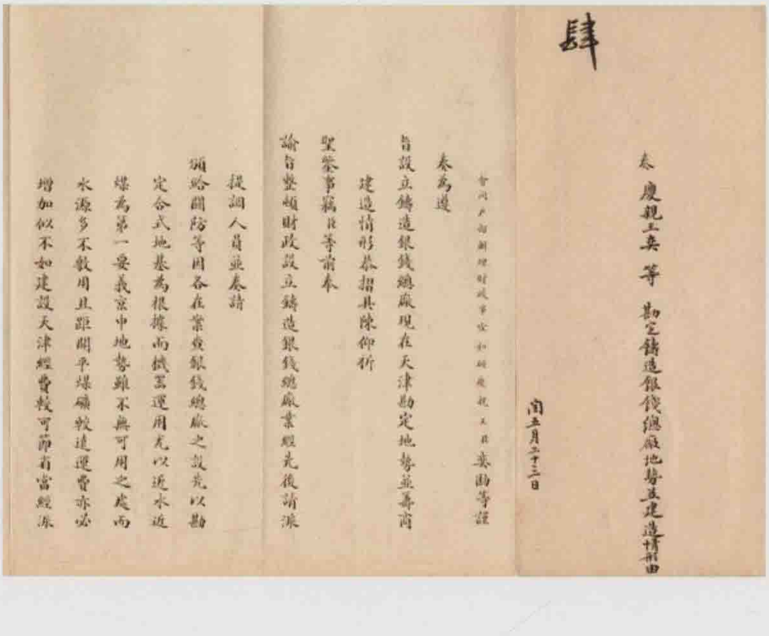
1 造币总厂

自古以来，中国货币制造与流通呈现地方化的特点，在封建社会，此尚不至于引起混乱，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各地与外界往来频繁，此种落后的制度在清末各省纷纷设厂造币后终于造成混乱，这也是外国银圆如西班牙本洋、墨西哥鹰洋等在华流通无阻的原因，由于国币的缺位，洋银还成为各方计价的标准。清政府也逐渐意识到统一币制的重要性，只是有心无力，多次尝试皆以失败告终。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户部造币总厂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清政府颁布《京师设立银钱总厂》谕，以“从来立国之到端在理财用人……各省所用银圆形式、重量、成色均不相同，最为商民之累，自应明定画一银式”，下令户部在京师成立总厂认真整顿，这就是设置造币总厂的法令依据。由于当时工厂动力均依赖燃煤蒸汽机，故筹备时财务处认为厂址宜坐落靠近水源及开平煤矿不远的天津，因此开办地由京师改为天津。

户部奏派徐世昌、陈璧、张允言、瑞丰等主其事，拨款银 400 万两为开办资本，由天津德商瑞记洋行向美国常生厂订购造银铜币机器及其他生产设备。根据合约，设备每天工作 10 小时可造大小银铜币 65 万余枚，其细目为：银币重一两 5 万枚、五钱 7 500 枚、二钱 2 万枚、一钱 6 万枚、五分 3.6 万枚，大小银币合计 11.35 万枚；铜币二十文 6 万枚、十文 30 万枚、五文 6 万枚、二文 12 万枚，大小铜币合计 54 万枚。印花机为大型 7 台，中型 5 台。虽说机器是“向美国头等著名常生厂订购”，但笔者按照其名称发音（Johnson）搜寻，未能在所知美国著名生产造币机器的工厂内查出其名。


肆
奏 慶親王奕 等 勘定鑄造銀錢總廠地勢並建造情形由
閏五月二十三日
會同戶部辦理財政事宜和碩慶親王臣奕劻等謹
奏為遵
旨設立鑄造銀錢總廠現在天津勘定地勢並籌商
建造情形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前奉
諭旨整頓財政設立鑄造銀錢總廠業經先後請派
提調人員並奏請
頒給關防等因各在案查銀錢總廠之設先以勘
定合式地基為根據而機器運用尤以近水近
煤為第一要義京中地勢雖不無可用之處而
水源多不敷用且距開平煤礦較遠運費亦必
增加似不如建設天津經費較可節省當經派

II-1-01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奕劻等会同户部办理财政事宜的《勘定铸造银钱总厂地势并建造情形由》奏折

造币总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在天津大经路（今中山路）竣工开机，当时北洋银圆局仍在生产银圆，故先行制作铜元。开制初期“机器未免行涩，人手亦未熟谙，出数尚少”。

光绪朝唯一的“中央造”银圆

筹设时原名“铸造银钱总厂”，随即改为“户部造币总厂”。次年户部撤改为度支部，厂名因此改称“度支部造币总厂”。翌年开始制造银圆，但因币制未定没有发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才再造铭文“造币总厂”的“一圆”、“二角”、“一角”银圆3种，其成色及重量虽然规范，但在币制未定的情况下，“以无条理之计划，欲挽回已坠之信用”是徒劳无功的，只是增加一种市价较高却无统一能力的货币。



II-1-02
造币总厂“一圆”

造总银圆数额尚多，若英国外交部档案数据中此年“天津造币厂产量”(Tientsin mint figures)是指造币总厂的出产量，则“一圆”为2 588 850枚、“二角”为1 011 200枚、“一角”为775 000枚。外国资料其实均来自清政府外交部门所转送之财政部数据，而财政部数据是由各厂列表呈报汇总的。这是清光绪年间，唯一以中央政府名义正式发行的银圆。

宣统二年，度支部奏定《币制则例》，总厂根据新条款筹备新国币，“造币总厂”四字自铭文中消失。造币总厂“一圆”在市场上是受追捧的品种，也是受伪仿之害颇重的灾区。



II-1-03
造币总厂“二角”及“一角”。龙尾有点

II-1-04
造币总厂“二角”及“一角”。龙尾无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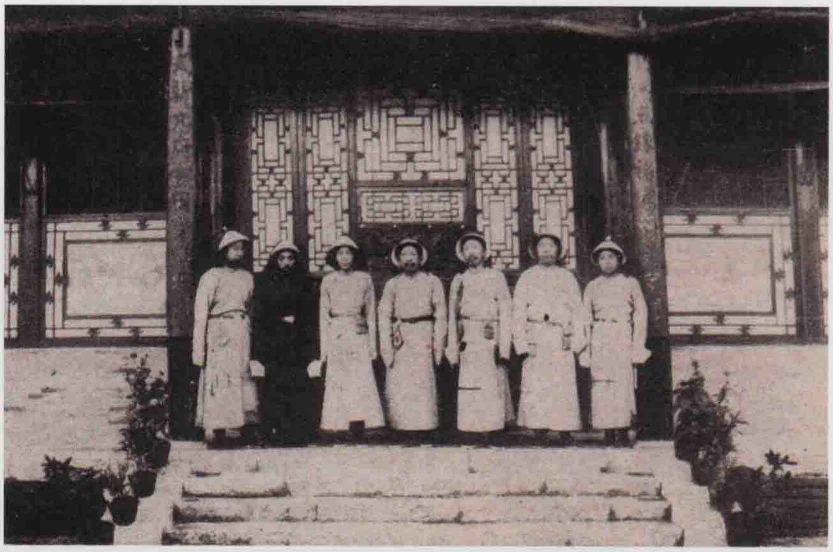


II-1-05
进呈用“天津造币厂经造各种币样”一盒计19枚，编号“二号”

后记

1912年2月29日，北洋军第三镇因裁饷引发所谓的“北京兵变”（或称壬子兵变），3月2日漫延至天津后，造币总厂遭乱兵洗劫焚毁，后利用北洋银圆局（度支部造币津厂）旧址开办分厂，生产铜元。1914年重建后与裁撤的北洋银圆局合并为财政部造币总厂，俗称“东厂”，专造银圆。新建厂改用英国制造的机器，设备新颖但厂牌不明，尔后的袁世凯像新国币即在此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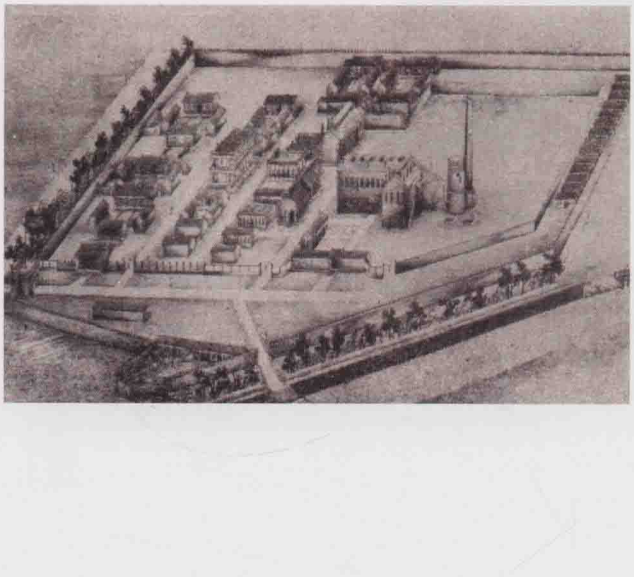
由于原始文件的佚失及天津三厂关系复杂（参考北洋部分的“造币厂中的天津三局”章节），尤其北洋银圆局与造币总厂合并改分厂后易生混淆，统计数据难以分开，仅引用海关报告中此两座天津造币厂在宣统元年至民国5年（1909—1916年）“龙银”的产量记录如下：“一圆”77 153 042枚、“五角”1 571 258枚、“二角五分”1 410 000枚、“二角”7 797 642枚、“一角”7 593 493枚。此数据应包括“造币总厂”、“宣统三年”及民初后造版北洋三十四年七钱二分、民国3年袁世凯像银圆等。从数据中有“二角五分”银圆来看，铭文“宣统年造”所未发行的系列银圆亦在其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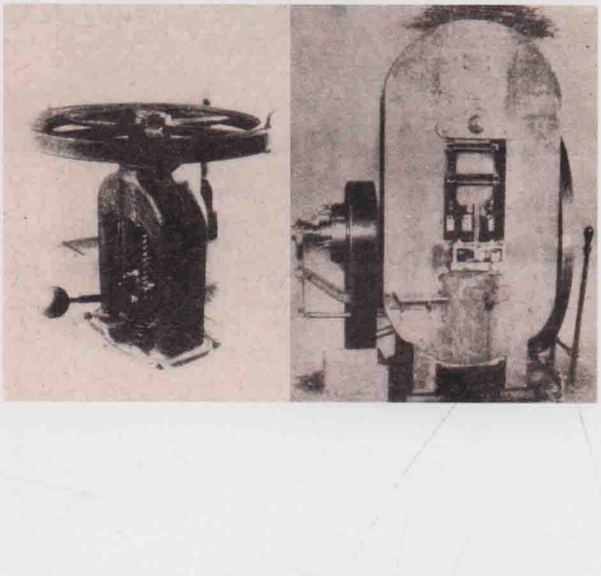


II-1-06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工前造币总厂高级主管合影

II-1-07
造币总厂鸟瞰

II-1-08
造币总厂开工时所用的压钢模机与印花机





“圆两之争”时期试制的样币 2

中国机制银币的币制单位问题，在其开制之初即已产生。在广东设局造币获得成功后，就有人主张中国龙银应以传统计重单位的“两”来结算，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底京城拟筹备设立银圆局，当时军机处及户部致电各省询问主币龙银重量应重若干。然而各地意见不同，有关龙银究竟是以计数的“圆”，还是以计重的“两”作为其币制单位的论战“圆两之争”正式端上了台面。

“圆”与“两”

西方人根据大型银币通行几百年来所累积的经验，认为25～28克是比较合适的规格，较此更重的大银币，无论在制造、携带或行用上都不方便。在近代，西方列强所用的大型银币都差不多在25～28克，小型银币如英国一先令、德国一马克及法国一法郎，则在5～6克。清朝末年，国内最通行的大型银币是西班牙本洋及墨西哥鹰洋两种重约27克的外国银币，故中国新造银圆仿其形制，将主币龙银的重量定在接近27克的库平七钱二分，结算时以“圆”计价，俗称“一圆”。至于“两”，是指清政府用银的重量标准“库平两”。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库平两”每两重37.312 56克，一般简化为37.3克，各地方在实行上则稍有出入。

“光绪元宝户部一两”——龙银中的巨无霸

当各部的大臣在为本位币“计圆计两”争论不休之际，庚子年爆发的义和团事件导致当时兼造银圆的北洋机器局毁于战火。次年袁世凯接替故世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翌年奏准在河北西窑洼护卫营址（今天津大悲禅院旧址）设厂，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1902年12月15日）正式开制，命名“北洋铸造银圆总局”。随后，总局按照袁世凯指示，进行一两银币的生产，并委托日本正金银行代办模具。其洽询的日本大阪造币局认为，若以边缘凸起处为准，钱币的直径应为其14至15倍；如以钱币本身底板的厚度为准，则



II-2-01
户部一两。北京诚轩2006年春拍出现的五彩美品



II-2-02
五彩包浆的户部五钱

II-2-03
户部二钱、一钱、五分

直径应在 17 至 18 倍。以这样的比例为标准，一两银币的直径应比七钱二分银币加大一成为宜。一则可防止新旧混淆，二则直径与厚度的比例大，轻敲时音脆，可避免声音混浊而不易分别良劣，造成百姓的误会。

北洋银圆局依照此建议制作了坯饼，经试压证明薄者音清脆、厚者音沉闷。在袁世凯批准后试制了六七千枚，但没有发行，原因不明。以现在的存世量来看，绝大多数应被回炉改制，泉界习称此为“户部一两”。由日本大阪造币局的沿革年表中，亦有 “1903 年 6 月，清国委托货币模具 25 组制造完成”的记载，足证此一两的模具来自日本并由大阪造币局制作。“光绪元宝户部一两”的背面有英文年份 29TH YEAR OF KUANG HSU，根据《造币总厂报告书》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底正式开制前已委托雕刻模具及试制，预定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发行。

II-2-04/05
“户部一两”系列的银币金样



“户部一两”系列龙银有 5 种面额，分别为一两、五钱、二钱、一钱及五分；小洋的图案相同，只是尺寸缩小，面额不同。经实际测量，一两币的直径为 43.4 毫米，边缘高起处为 3.1 毫米，比例 14 ：1，确实在文献记载的范围之内。然而，其重量竟有 36.2 克、37 克等多种，以贵金属币最大误差为千分之三的规定来说，与标准库平一两的 37.3 克差异颇大。

“户部一两”为中国最大的机制龙银，在筹划之际朝野都寄予厚望，譬如光绪二十八年海关报告书中即记载：“袁宫保急图整顿，即拟铸一两重之银圆，实于北方不无裨益。从来洋圆虽按两计，并无一两重者，若能照一两广铸行使，当有准则矣。”可惜清政府举棋不定，未能修成正果。“户部一两”可由“两”字笔法从“人”或从“入”分为两版。由于留存数量极少，在“民国八九之间，平津市值，每套不下三百金，今且数倍过之矣”，前辈张䌹伯在 1940 年 9 月《泉币》第二期上如是说。

丙午户部“中”字壹两大清银币

户部造币总厂的设备是天津瑞记洋行从美国常生厂引进的，总厂经两

年的筹建于光绪三十一年开工，为舒缓钱荒先行试造铜币。然设厂之目的是整顿币制，故命名为“总厂”，在简明章程中清楚规定“所造三品之币，即文曰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通行天下以归一律”。

翌年岁次丙午（1906年），该厂以户部名义试制了币铭为“大清银币”的“两制”计重系列银币4种，面额分别为壹两、伍钱、贰钱及壹钱。此系列龙银设计新颖，正面中央有阴刻“中”字，泉界习称“中字壹两”。面额壹两者在币边外缘有水波纹饰，非常别致。试制时币制未定，“圆两之争”的当事双方仍在角力中，所以成品也没有发行。另外，此币虽重一两，但直径40.8毫米仅比标准七钱二分银圆直径39毫米稍大。若按北洋银圆局试制“户部一两”，委托日本大阪造币局雕刻模具时所采纳的建议“重一两银币之直径宜比七钱二分者大一成。一则防止新旧混淆，二则避免声音混浊容易作伪”来看，此币直径仅稍大半成，其成品想必声音沉闷。此反映雕模者不清楚银圆在制作工艺上的某些道理，以两厂近在咫尺，却无横向联系，交流经验，清政府不同衙门各行其是的状况可想而知。

此币以模具状态可分两种版式：一种地章表面平整无瑕，通称“原制”；另一种的地章表面有不规则粒状凸起，疑系钢模锈蚀后再使用，通称“后制”，亦有“痱子版”之戏称。但就纯技术上的观点而言，模具在制作过程中需经退火，早期在处理时使用炭粉，若操作不当会造成币模表面出现凹孔，惟事过境迁已无法查证。无论如何，前者因没有瑕疵，在观赏及收藏价值上均优于后者。由于“丙午一两”在实物上也是重量不一，记录有重达40.0克的，令人相信后制之说不是空穴来风。

旧时泉界有云“过了丁未进中档，有了丙午上高档”，视之为收藏等级的门槛，跨越此门槛方称得上大家，可见丙午“中”字壹两的分量了。只是随着钱币收藏风气的普及，丁未在一般泉友眼中已是高档的了。

II-2-06
“中字壹两”系列龙银。丙午户部“中”字大清银币的面额分壹两、伍钱、贰钱及壹钱4种





II-2-07
北洋一两。背面龙珠“三点”

II-2-08
北洋一两。背面龙珠“无点”

北洋一两　再接再厉

II-2-09
北洋一两币模，2008年北京诚轩出品之一。由模面锈斑及龙面底部裂痕可知，所谓购置者以此再版之顾虑实属多余

“计圆计两”在各执一词的状况下讨论了好几年，期间反复制订了币制单位的章程多则，造币厂在听命行事下也只得不断制作样品呈报，但是在朝廷拿不定主张的情形下皆无疾而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北洋库平一两”即其中之一。俗称“北洋一两”的龙银，是“圆两之争”中最后的一种“两制”银币。



此币的设计与户部一两相同，正面除将“户部”二字改成“北洋”外，其余不变；背面则只是将发行年份更新，并将厂别英文由HU POO改为PEI YANG。两者尺寸相同。从后者设计风格沿袭户部一两以及户部此时筹设的造币总厂已开工，并在先前已试造丙午“中字壹两”等来推测，应是改称“直隶户部造币北分厂”后更名为“度支部造币津厂”的原北洋银圆局所制。北洋一两只有一种面额，由其背面龙珠火焰下有3个极细微的小点或非常明显的凸点，可分成俗称的“无点”及“三点”两版。根据各钱谱，北洋一两的重量也有多种记载，如34.2克、35.2克、37.2克及37.4克等。耿爱德著

《中国币图说汇考》第 331 页上虽记录为 51.2 克，超过其他样本三至五成，但其直径相同（43.5 毫米），厚度 3.5 毫米与一般所见至少也在 3 毫米，差距并非特别多，有笔误或排版疏忽的可能。

末代光绪银圆——“丁未大清银币”

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度支部以“一两银币，与各省旧铸龙圆，重量不同，奏宣以来，外间多以为不便使用。……东西各国通用银币，其形式重量，大半相类，盖过小则价值太轻，过大则难于携带”等理由，奏请“因民所利，则下令如流水之原，似不如改从七钱二分之制，以便推行。……如蒙谕允，即由臣部饬令总厂先行试铸，以备应用”。

奏准后，造币总厂依此试制通用银币一系列，面额计壹圆、伍角、贰角及壹角 4 种。主币的设计上，仅将丙午“中”字系列外圈的水波纹饰缩小，去除部分文字，改岁次为“丁未”及改单位为“壹圆”，此版数量稍多，根据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九日（1907 年 8 月 17 日）度支部尚书载泽等《进呈新铸通用银币及议定成色分量章程》奏折所记载，当时呈样币是 400 套，实际制成者当不止此数。

惟此时主张“两制”的大臣如张之洞、袁世凯纷纷竭力反对。在各方意见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原本主币重量定在七钱二分的币制再度搁浅，甚至出现了扭转的情势，光绪三十四年九月颁布上谕“着即定大银币一枚计重库平一两，又多铸库平五钱重银币，以便行使……”，然而，次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双双驾崩，“丁未大清银币”成了光绪朝的末代银圆。紧接着主张“两制”最积极的张之洞也在翌年（宣统元年）去世，一两银币的推动后继无人，拉锯多年的“圆两之争”就悄悄地画上了休止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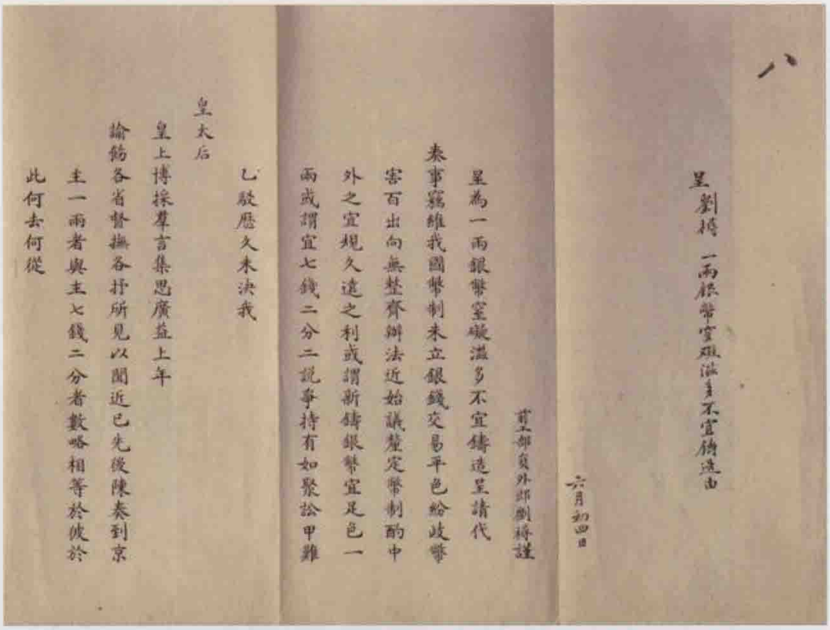


II-2-10
“圆制”的“丁未”大清银币系列龙银

物以稀为贵　落选才是宝

在钱币收藏上有个奇特而有趣的现象，就是样本制作出来而没有获选或批量生产后没有发行而销毁的品种，在若干年后都成了宝贝。也就是说，当初未得青睐的，后来都成为藏家追求的目标，麻雀只只变凤凰。“圆两之争”自从端上台面后，在天子脚下的造币厂受到的影响自然最大，其间所试制的以上这几款龙银，都成了拍卖场上的宠儿，在物以稀为贵的通则下已是千金难求。

“圆两之争”到宣统二年（1910年）终于在度支部奏定《币制则例》后尘埃落定：国币单位正式定名为“圆”，但在此之前已制妥的“丁未”（1907年）与“宣统年造”（1910年）系列的“圆制”银币却也未发行，当局的想法叫人摸不着头脑。待到正式发行新国币之时已是宣统三年，而且还是在武昌起义后为调兵镇压充当军饷之用而仓促拨付的，没有举行发行仪式或发布正式的公告，筹备多年的新制标准国币竟如此草草面市，甚至大清王朝的国祚也随之结束，抚今惜古，令人感慨万千。


八
呈劉楟 一兩銀幣室礙滋多不宜鑄造由
六月初四日
前工部員外郎劉楟謹
呈為一兩銀幣室礙滋多不宜鑄造呈請代
奏事竊維我國幣制未立銀錢交易平色紛歧弊
害百出向無整齊辦法近始議釐定幣制酌中
外之宜規久遠之利或謂新鑄銀幣宜足色一
兩或謂宜七錢二分二說爭持有如聚訟甲難
乙駁歷久未決我
皇太后
皇上博採羣言集思廣益上年
諭飭各省督撫各抒所見以聞近已先後陳奏到京
主一兩者與主七錢二分者數略相等於彼於
此何去何從

II-2-11
《一两银币窒碍滋多不宜铸造由》奏折。前工部员外郎刘楟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四呈。“圆两之争”时的奏折之一

"宣统年造"大清国币系列样币 3

清政府为整顿圜法而设置造币总厂，"圆两之争"告一段落，并终于在宣统二年（1910 年）颁布《币制则例》，规定大清国币单位定名曰"圆"。依此则例，总厂制作了一系列纪年为"宣统年造"的"大清银币"以及"大清铜币"标准新国币，面额单位为圆、角、分、厘，试制若干但没有发行流通。

唯一由维也纳造币厂雕刻币模的中国龙银

在大多数泉谱中，都注明"宣统年造"大清银币系造币总厂（或天津造币厂）所制，包括早期蒋仲川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施嘉干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以及近年来的几本书皆是如此。甚至于对中国机制币极有研究的伍德华与耿爱德两人，均在著作上说明模具乃意籍雕刻师乔奇（Luigi Giorgi）所为。仅有任职于上海意大利总领事馆参赞罗斯于 1917 年（民国 6 年）5 月撰写 *Coi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钱币》）时，在这篇有关民国时期钱币论述的专辑内，提及此系列大清银铜币的模具乃制于奥地利。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英国钱币家李察 · 伟德即根据这短短的几行文字深入追查。经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Kunsthistorisches Museum）的舒兹博士（Dr. Karl Schulz）证实，此系列银铜币的原模的确是在维也纳造币厂刻成，其制作模具的工具仍保存于该馆。负责雕刻的技师有三人，分别是纽伯格（Rudolf Neuberger）、霍夫曼（Adolf Hofmann）及普林兹（Josef Prinz）。维也纳造币厂试车时自然亦制作样品若干，部分曾出现于拍卖会，现仍有一圆银币及二分铜币保存于该博物馆。户部造币总厂主管于 1910 年 10 月赴伦敦皇家造币厂拜会时，曾受赠一圆银币一枚作为见面礼。

II-3-01
"宣统年造大清银币"壹圆。此系列龙银由奥地利雕刻师操刀，龙图风格与国人所刻确有不同



崎岖历程十进制 四银四铜未发行

维也纳造币厂完成币模雕刻后即送交天津造币总厂，这两套币模计有一圆、五角、二角五分及一角银币 4 种；二分、一分、五厘及一厘铜币



II-3-02
“奥地利版”伍角

II-3-03
“奥地利版”壹角



II-3-04
“奥地利版”贰角伍分。宣统年造系列此面额在中国银圆中仅见。目前这种面额大概只有美国硬币还在使用，源自于本洋的八进位制，早期的银本位时代人们在无零钱可找之际常将银圆切割，小额时常要分成4片或8片

II-3-05
宣统年造“大清铜币”系列样币。该系列计有二分、一分、五厘及一厘4种，未采用

4种。4种银币虽均开制生产，但据说因库银缺乏，故数额有限，并未流通，仅五角偶尔可见。据天津造币厂1909—1928年间各面额银铜币的生产统计数据显示，二角五分曾生产141万枚之多，显然多数被回炉化银。另根据宣统二年天津海关贸易报告书记载：“度支部北洋造币厂春间铸有新式银圆一种，稽延至今，并未发出通用。”云云，故应确有此事。同时制作的还有铜币二分、一分、五厘及一厘4 种。

这两套银铜币最终未被采用，面额标示方式不妥应是主要原因：银辅币中的二角五分与习用之二角格格不入，商民未必乐用；铜币采取分、厘为单位，是以往所没有见过的，亦容易造成民众混淆。中国推行十进制的历程非常艰辛。此外，新聘雕刻师乔奇走马上任，必然想展现自己的才艺，其设计的“宣统三年”系列新币美观大方，旧款式被搁置也就不令人意外了。新系列回归到传统银圆习用的一圆、五角、二角及一角的面额组合，铜币的面额亦改回与制钱挂钩的“文”制，其中银币一圆及铜币十文流通全国各地，获得极大成功。



“宣统三年”试制的样币 4

依据《币制则例》制作的“宣统年造”系列国币没有被清廷采纳发行，而是另外重新设计了多种“宣统三年”版样币。在这些样币中，终于诞生了新的大清国币，而这些试制的各式样币亦堪称龙洋中最精美者。

神龙见首又见尾

在一圆面额主币的各版中，正面图案基本相同，主要区别在背面，除最终获采用的“曲须龙”外，其他未被采纳的样币以龙须及龙身的式样不同可分为 4 款。

其一，“长须龙”。此版正面左右花叶与“曲须龙”不同。背面龙头较大，鼻侧左右龙须向下垂于面额“壹圆”近旁，其龙须是这 4 种试制样币中最长的，故泉界称之“长须龙”，龙尾朝左且向上。在为数稀少的长须龙样币中，又可以其正面花叶不同分为两版，其中与“曲须龙”相同的俗称“长须龙配普通版”，更属罕见珍品。

1954 年 2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开罗举办的“埃及皇宫宝藏”（The Palace Collections of Egypt）拍卖中，埃及逊王法鲁克（King Farouk）藏品中有一枚长须龙金币，拍品编号 1324。1971 年 6 月“耿爱德中国钱币集藏”（Eduard Kann Collection of Chinese Coins）专场，以编号 1142 再次亮相，成交价 1 675 美元，由台北鸿禧美术馆收藏。此枚“长须龙”银币金样的背面在七点钟位置有凸起的细纹，系币模破裂痕迹。

其二，“短须龙”。正面大致同“长须龙”，细节上略有差别。背面差异较明显，最突出之处即龙头上端更大而龙须较短，4 种样币中以此版最少，是极罕见的珍品。

据耿爱德表示，1949 年他离开上海前，仅知存世 5 枚。其中芝加哥藏家 Don C. Keefer 有一枚，耿氏有两枚，后为筹款出版《中国币图说汇考》，将其中一枚在 1953 年 6 月交知名纽约钱币商 Hans M. F. Schulman 拍卖，当时底价 500 美元，成交价不详；另一枚情况不明，1972 年 3 月耿爱德专场第三次拍卖出品是他人委托搭售，成交总价 2 100 美元，当时此价格已十分惊人；再度出现是 6 年后的 1978 年芝加哥钱币拍卖会，价格已达 13 000 美元。国内仅知 2004 年在北京拍卖会上出现一次，当时成交价是人民币 118.8 万元，迄今尚未见公开出让。

其三，“大尾龙”。两面的文字图案与“曲须龙”均非常近似，背面龙身由中央上方向左再右旋形成“S”状，但龙尾特大有 11 条，因而得名，为罕见品。



II-4-01
“长须龙背破版”。七点钟位置有币模破裂痕迹



II-4-02
“长须龙配普通版”



II-4-03
“长须龙”



II-4-04
“短须龙”



II-4-05
“大尾龙”



II-4-06
“反龙”

其四，“反龙”。特别之处在于龙身呈“乙”字形状，自龙头向右再左旋，龙尾朝右似隐没在云饰中，由龙尾方向不同而得名。此版亦可由正面花叶不同，分为两版。虽罕见，却是此4种中最多见的。

以上各版目前均发现假币，近期伪品虽十分相似并以人工包浆掩饰，但细心比对仍可辨认，“只有错买，没有错卖”。

这种同年份、多版本的情形，与外国造币厂筹备新币时预备多款以供客户选择的方法类似，但在中国机制币史上是前所未见的。依照“长、短须龙”与“曲须龙”、“大尾龙”、“反龙”截然不同的风格来看，应该是不同雕刻师的手笔。推测是造币总厂于宣统二年（1910年）年礼聘来自意大利米兰的乔奇担任总雕刻师，引进了欧美多稿比较的方式。仔细观赏“曲须龙”、“大尾龙”及“反龙”，三者皆具有西洋雕刻注重立体及线条流畅美感的特点，“长、短须龙”则倾向以抽象手法表现威武，由“曲须龙”有Giorgi签字版存世来判断，前三者应皆由乔奇担纲，而“长、短须龙”非其所为，应是造币总厂其他中国籍雕刻师的作品。而此时总厂中国籍雕刻师中或许不止一人，但知名氏者仅宣三一角小洋龙面模具的雕刻者余子贞，故推测以他操刀的可能性最大。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之“曲须龙” 5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经送样核定发行流通者为俗称“曲须龙”，此币除背面龙形不同外，正面与前章所述4种样币差异明显之处就在于“大清银币”四字笔画稍细。被采纳后即投入生产，江南和湖北两厂在宣统三年五月开始制造新国币，预定年底正式发行。不料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晚上，武昌新军起义，战火波及各地，市面动摇。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军政事务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在八月二十六日急电清政府“鄂省变乱，裕宁官钱局大受影响，持票兑现者纷至沓来，应接不暇。宁省造币分厂尚有造成新币一百余万，请饬度支部飞饬该分厂，尽数拨交大清、交通二分行及裕宁总局，以备应付钞票行用”，批示“着度支部迅速酌核办理”。八月二十八日清廷饬令“造币分厂先拨新币五十万圆交裕宁总局及交通分行应用”。精心策划多年，终成正果的第一枚大清国币，就这样在没有举行任何发行仪式之下仓促面世了。

两江总督是清代位阶最高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由于清初江苏和安徽两省辖地同属江南省，初时该总督管辖的是江南和江西，故称“两江总督”。江南裕宁官银钱局是光绪二十九年开办的，总局设于江宁（今南京），先后在江苏省重要城市如上海、镇江、扬州、海州、苏州、无锡等地设置分局。外省在湘、鄂、皖、赣等省城及重要市镇，也设有分支机构。两江总督急需现银稳定动荡的局势，朝廷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曲须龙“有点”与“无点”两大版式

宣三大清银币在当时原计划由天津、南京及湖北三地造币厂生产，其中，“宁、鄂两厂，定期先行开铸银圆。总厂则先铸铜币，以期早日实施新制”，故初期在天津总厂生产的数量相当有限。而1911年美国造币厂报告（Annu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the Mint，1911）内引南京美国领事报告：“当局准备新国币在南京厂生产800万枚，武昌厂生产200万枚……”显示确实如此。报告中还注明为区分生产地点，币上有以资识别的“记号”（ear mark，原意是在牛耳打上记号以表明所有人）。

多地生产相同设计的钱币时，为方便追踪来源，常在币上加上容易识别的标记来区分，因此形成多种版式，各国皆是如此。宣三银圆上最易辨认的是背部英文面额单位DOLLAR后有的“有点”，有的“无点”。很明显，“有点”、“无点”就是厂记，但目前无法查出其代表的产地。



II-5-01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壹圆无点版

II-5-02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壹圆有点版。以背面英文DOLLAR后有无小点分为“有点”、“无点”两大版式，有点版少见

辛亥革命事发突然，致使非但各厂未能按计划生产，事后的各方报告或资料也凸显出局势的混乱。譬如英国驻华商务领事报告书说，南京厂在年底革命军光复前已生产新币595万枚；意大利外交官罗斯说，1912年初南京厂制作江南银圆时，武昌厂仍在生产宣统年号的国币银圆；英国驻汉口领事1912年未记录有关事宜，却于次年报告上指出：“湖北省1913年没有造币，天津造币厂所制‘大清’(Ta Ching) 银圆大量涌入，似乎可免费提用。”因旧版北洋造无“大清”字样，其所指的“大清”银圆若非旧版“造总”即新版“宣三”。美国造币厂1912年报告上，天津厂在1911年生产了972万枚新银圆；南京厂在张勋掌控时停产新国币改日造“光绪”银圆5万枚，与“大清银币”及其他龙银在南京广泛使用；奉天厂生产一圆“新币”(new currency) 6万枚……。由以上不完整的资料表明，清政府为应付动乱，大量新造银圆，这时候只有发放现银才能调动军队及安定市面人心。由于新国币未正式宣告发行，可能造成若干民众的疑虑，故不得不改产旧式龙银，其形式各地也未必相同，甚至于总厂原计划是先造铜币，迫于形势也转而赶制银圆；当初未在生产厂家之列的奉天厂，似乎也造了少量的宣三新国币。总而言之，宣三大清银币在三厂或更多的地方生产却只有两大版别。迄今对于其确切产地及产量，仍无明确答案，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曲须龙”虽为流通币，但其中有极罕见的雕刻师乔奇签字版，其中一种在龙面约八点钟位置有阳文“GIORGI”字样，极其罕见；另一种相同位置为阳文“GIORGI INC.”，目前为孤品，由台北鸿禧美术馆收藏；还有一版是在正面“年”字左侧阴刻“L. GIORGI”，而在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补遗上增列一枚正面位置相同、有“L GIORGI”字的样币，



II-5-03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 GIORGI 签字版。背面左边八点钟位置有“GIORGI”签字，原台北鸿禧美术馆珍藏。2010 年北京诚轩秋拍的亮点，以总价人民币 448 万元成交。钱币上有雕刻师的署名，这在西方已有千年的传统，这与金饰银器打上银楼或匠名以示担保成色的用意是相同的，中国的银锭自古也是如此。由于国人对硬币也有此惯例的情形并不了解，所以中国钱币上始终无雕刻师之名，至今依然如此，故凡有签名者皆为珍品，而龙银签字版为此中瑰宝

特别注明 L 后无点，但未说明阴刻或阳刻。

“宣三”的银辅币

“宣三”大清银币系列在制定之时包括五角、二角及一角 3 种十进制银辅币，铭文分别注明二枚、五枚、十枚换一圆。背面图案是大致相似的“立龙”，龙珠在左上角而非中央或下方，此种设计在龙银中非常罕见。因新币发行的惯例是主币先行，故计划在新一圆国币通行后再跟进，但辛亥革命的突然爆发使银辅币没有批量生产，数量不多的银辅币中以五角最为稀少。

观察五角、二角及一角 3 种银辅币的雕刻风格，五角应为乔奇作品。按罗斯透露，一角龙面雕刻者为余子贞，以二角的图案与一角比较，两者相同，可判断亦系余子贞作品。



II-5-04
“宣三”银辅币 3 种

余子贞非师从乔奇

有人说余子贞是乔奇所训练出的弟子，此论不成立。天津造币总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开工，先制作铜元，次年始造银圆，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造“造币总厂”银圆 3 种；而北洋机器局与北洋银圆局开工更早，天津以机器造币在这时已有十多年经验，其间生产各种银铜币甚多，从“北洋机器局造”到“北洋造”，银圆改版、改年份多次，再说币模是消耗品，不是一模到底，各局怎么会没有雕刻师？或许知识不足、才艺不精、技不如人，才会有若干模具如“户部一两”、“大清金币”委托日本代制，但不至于所有币模的雕刻都须仰赖外国人。

周学熙在兴办北洋银圆局时，注重工艺教育，在局内附设学堂，学制为 3 年，半年一考，3 年毕业考。姑且不论是否有雕刻学生，由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内“乔奇义技师在造币厂六年，曾遴选学生六人，从之学雕刻，六年技亦成。此六学生……固无学费，币厂且供之宿膳，按月每人给津贴十余元，学生亦无毕业期，至六年，义技师云可矣。遂由币厂监督，授以毕业证书，项目报部，毕业生亦改为职员，留厂任事”可知，雕刻学习生无毕业期，乔奇是 6 年后才点头“可矣”，即使在忙着筹备新国币之余立即开班授课，也不可能让学徒在初习技艺后立即就挑大梁独当一面，故余子贞必是造币总厂原有的雕刻师。

叁



民国银圆

人像篇

1 开国纪念人像银圆

从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奏《广东购用机器制造制钱，自系因地制宜之策》、光绪十九年御史易俊折《请饬各省造银圆》，到光绪三十一年颁布上谕"从前各省所铸银圆，系一时权宜，未可垂为定制"以至宣统二年四月度支部尚书戴泽《厘定币制拟定则例》、八月《设立币制局统一事权》折来看，清政府力图收回地方造币权归于中央，以一统币制的思路越来越清晰。然而，辛亥革命令大清王朝这一系列改革的成果付诸东流，惟民国的建立并不影响中央推动币制统一的努力，只是积习难去，币改的道路上依然充满了荆棘。

辛亥革命爆发迄今已过百年，海内外各界纷纷集会或撰文纪念这一伟大革命。然而"辛亥革命"一词是何人首创？依旅美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看法，这专指在黄帝以降第 77 个辛亥年所生词汇的来源已不可考，至少争议很大，应搁置不论。不过在纪念币的发行方面仍有迹可寻，这里就谈谈曾发行流通的几种"开国纪念币"银圆。

"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的由来

话说 1911 年 10 月 10 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同盟会在湖北武昌起义，12 月 29 日各省代表于南京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次年 1 月 3 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并选黎元洪为副总统。2 月 12 日，清宣统皇帝退位。由于事起仓促以及清政府迅速崩溃，乱局中急需大量现银，各地多使用前清旧模鼓造。民国成立后当不便沿用前朝货币形制，因此 3 月由财政总长陈锦涛呈文大总统："本部拟先行另刊新模，鼓铸纪念币，就中一千万圆上刊第一期大总统肖像，流通遐迩，垂为美谭；其余通用新币，花纹式样，应一律更改，暂应流通。"大总统同意其请并指示："应准照行。其余通用新花纹，中间应绘五谷模型，取丰岁足民之义，垂劝农务本之规。"此即孙像"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币"的由来，在此之前，中国钱币仅四川卢比上有人物肖像。嘉禾也成为民国初年钱币上不可或缺的图案。

民国元年造"开国纪念币"的 4 种"壹圆"

（1）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之"下五星"

正面为孙中山侧面半身肖像，上书"中华民国"四字，下列"开国纪念币"五字，"左右五瓣梅花各一枝，五权宪法意者也"；背面中为面额"壹

圆”，“两旁辅以嘉禾各一枝，每枝一穗三叶，三民主义意也”，并有英文 THE REPUBLIC OF CHINA 在上，ONE DOLLAR 在下，英文字间有五角星，泉界习称“下五星”。产量不详，存世不多。此正背面图案设计所代表的寓意以往未见诸谱记载，笔者自前天津造币厂高管李伯琦撰写的《中国纪念币考》得知上述说法。

另据曾造访南京造币厂的意大利外交官罗斯表示，他被告知钢模为该厂雕刻师何子梁所作。因雕刻师缺乏西洋人像雕塑训练之故，此币谈不上精美。罗斯亦闻前清时期广东造币厂曾尝试以两广总督肖像为图案，但找不到能镂出令当局满意样本的工匠。罗斯是上海意大利总领事馆参赞，此资料来自他 1917 年（民国 6 年）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亚洲文会北华分会年刊》上发表的《中华民国钱币》(*Coi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这是有关民初中国硬币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撰写此文前，罗斯曾走访各主要造币厂，并由服务于中国海关、邮政等单位的洋人协助，信息提供者包括天津总厂雕刻师乔奇 (L. Giorgi) 本人。罗斯文中特别提出开国纪念币铭文的“民”字书法与一般不同，象征推翻帝制，人民出头天。此写法常见于民国初年的钱币或国父孙中山墨宝的文件中，民国 3 年版袁大头的“民”字多一点应也有此含意。



III-1-01
“下五星”版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因背面英文“ONE DOLLAR”（壹圆）无纪念意义而改雕新模

（2）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之“上五星”

正面相同，背面图案相近，英文改成上为 MEMENTO，下为 BIRTH OF REPUBLIC OF CHINA，由于英文的不同，其间的五角花星移至上方，俗称“上五星”。钢模亦系何氏所刻，南京造币厂制造，所谓“天津版”之说乃以讹传讹。

五星版孙像开国纪念币产量不详，柳贻征《江苏钱币志初稿》记载“此项中山币原铸数额计 10 万枚”，又据李伯琦文，五星位置的变更是由于原设计的外圈英文无纪念开国之意，因此新雕背面币模，故孙像开国纪念币五星版有两种版式。



III-1-02
“上五星”版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背面英文改为纪念民国诞生意思的“BIRTH OF REPUBLIC OF CHINA”及“MEMENTO”

（3）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之“戴帽版”

此版的设计与上述孙像币“下五星”版相仿，除正面为黎元洪七分脸半身戎装戴军帽肖像外，其余均同前者，泉界习称“黎元洪戴帽”版。钢模乃武昌造币厂雕刻师朱子芳所刻，镂工也未见高明。此币于民国元年秋发行，据 1919 年 10 月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 刊载，在配送 3 000 枚新币到汉口的银行后，发现有将 OF 误成 OE 的英文错版，当局立即用錾刀将多出部分铲除，而此时已有 300 余枚流入市面，无法追回。另有一种 CHINA 误为 CIIINA，较不为藏家所注意。此版虽产量不详，但传世者比五星版孙像币少，在流通用开国纪念币中，黎元洪戴帽版银圆是比较珍贵的一种。所知最早收藏此币的团体是美国钱币学会（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简称 ANS），入藏日期是 1913 年 11 月 22 日，藏品来自一位名叫查里斯 · 达德（Charles G. Dodd）的会员。

III-1-03
“戴帽版”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

III-1-04
黎像戴帽版错英文“CIIINA”

III-1-05
黎元洪肖像





（4）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之“光头版”

《北华捷报》的同一报道还指出，发现新币有误后，武昌造币厂又制作了新模。显然就是后来所谓的这种“黎元洪不戴帽”版或“光头”版，除“不戴帽”外，脸亦稍朝右成六分脸。这一版也有所谓的英文错版，将 THE 拼成了 TIIE。此版虽较常见，但直到 1912 年底才开始生产，故总额不多，笔者估计应在 10 万枚左右。此推论的依据是英国驻汉口领事在一份每年例行的报告中指出“湖北 1913 年没有造币”，以及耿爱德自财政部抄录来的数据“1913 年鄂厂造一圆银币 37 510 枚，数量之低与前一年的 686 万枚相比几近于没有活动”可与英方说法呼应。湖北省该年银圆产量低的原因可能一是天津方面供应大量现银；二是湖北官钱局的人事及业务革命后受军政当局支配，一有需要即被要求印发官票，毫无节制，而湖北



III-1-06
“光头版”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

官票以往信誉颇佳，邻省照常收用，故初期尚可通行。李伯琦文中叙述为：“谓造像不似黎，令重铸，改黎像为露顶，余均同前。但像改刻亦未佳，与孙像币皆本厂华员所雕，技均劣也。”

以上 4 种开国纪念币产量皆不多，而流通时间短，范围亦不广，大都遭回炉或被人收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纪念币。孙中山先生在宣统皇帝退位后即谦辞大总统之职，以其肖像为图案俗称“孙小头”的新币就匆匆收场了，并未如财政总长所呈制作 1 000 万枚，令人感到世态炎凉，或许这也是一种政治现实吧。

后制“六角星”开国纪念币与其发行时间

另有一种常见的“六角星”开国纪念币，其实是 1927 年才开始制作的。“孙小头”在市面的大量流通，可由该年海关报告中的多处记载得到佐证：其一，《华洋贸易总论》“南京造币厂，消去大条两万条，此外尚有银锭，估值规圆 800 万两……”；其二，南京金陵关报告书“南京造币厂，本年鼓铸银圆共 4 669.65 万圆，辅币铜元，均未铸造。”；其三，汉口江汉关报告书“市面通行货币，　袁像及孙像两种银圆（墨西哥银圆并不通用）……”；其四，上海江海关报告书“……5 月 1 日及 6 月 8 日，杭州、南京造币厂相继开工……其新铸孙文像银圆之初次见于本埠市面者，亦在本季中，察此种银圆之形状，恐系以民国元年之旧模型铸造，而其做工似不及袁像银圆之精致，不过其成色尚与原定标准相符合。”海关报告书乃以英文写成，再译为中文，此段原文尚有“The newly minted silver bearing the head of Dr. Sun Yat Sen appeared on the Shanghai market in June.”意即上海市面是 6 月开始流通的，但中译本未明确其时间。

1927 年 3 月北伐军攻克南京与上海后，4 月 18 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新政府不愿将悖离革命的袁世凯的肖像继续用在国币上，随即令南京造币厂制作新款银圆。因急于改版，将民国元年孙像开国纪念币



III-1-07
“六角星”版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仿“上五星”版新刻模具，但正面“念”笔法不同，背面五角星改六角星，版别极为复杂，产地亦多，产量仅次于“袁大头”

稍加修改后即付诸生产。这在李伯琦文内亦有记载:"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南京币厂又取前模，鼓铸颁行，为通行币，至厂焚始已，铸数已数百万矣。"据悉此六角星版"孙小头"银圆，自南京造币厂开始生产至1929年该厂被大火烧毁前，总计生产了约1.03亿枚。1927年，武昌造币厂生产779万枚，随即停产。生产"孙小头"最多的为杭州造币厂，该厂自1927年9月起到1932年止，共出3亿7 678万枚。六角星版生产总额在"废两改元"以前，仅南京、杭州、武昌三地就造了4亿8 759万枚以上。又据美国造币厂1930年的报告，天津造币厂在1929年生产了1 006万枚一圆银币；若参照1928年12月28日津厂厂长薄以众签署转发财政部命各省造币厂停造袁（世凯）币一律改铸先总理像币（中山纪念币）令，以及"此项纪念币模已领到"的措词，所造的当为孙像开国纪念币。此俗称"孙小头"的一圆银币是中国使用银圆的时期内，发行量仅次于"袁大头"的。连同各地小厂与1949年兵荒马乱之际恢复银本位时再造的部分，总额超过5亿枚。

孙中山像二角型开国纪念币

据张家骧《中华币制史》记载，南京造币厂在5月"开制孙像开国纪念一圆银币，8月续制二角纪念新币、二角金币，以二角银币1 000枚、二角金币10枚，呈财政部"，罗斯文章中则指出，制成数量很少，分送政府官员，并未发行流通。上面两种记述没有矛盾，再与目前收藏界实物的实际状况比较也能符合。虽然在其他数据上，南京造币厂在1912年与1914年分别生产"二角"银币12.3万枚及3.2万枚，但仍然算得上产量稀少。

1944年《泉币》第27期有载："造币厂人云，凡开铸主币，向例由厂首铸金质币十数枚，呈财政部长转赠大副总统内阁总理及各部长人各一枚，以资纪念。"这或许是民国时出现不少银币金样的缘由。



III-1-08
二角型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产量不多

III-1-09
一角型"十枚当一圆"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数量极少

III-1-10
"下五星"版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壹圆银币金样



III-1-11
“六角星”版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壹圆银币金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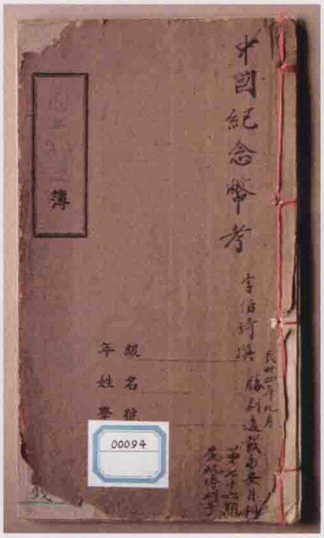
III-1-12
二角型孙中山像开国纪念银币金样

[相关链接]

《中国纪念币考》作者李伯琦二三事

李伯琦（1887—1958），李鸿章四弟李蕴章之孙，熟谙清末民初史迹，在《永安月刊》上发表不少文章。《中国纪念币考》原文发表在 1945 年 9 月上海《永安月刊》第 76 期庆祝胜利号上，钱币学大师马定祥阅后在学生练习簿上以毛笔亲自抄录。笔者有幸获此抄本全文，因其记载消除了笔者许多以往的疑惑，阅后甚感振奋，当即拍照存档。除开国纪念币正背面寓意之外，五星开国纪念币为何有两种；黎元洪像币何以分戴帽与光头两版；大飞龙是戏作币的始末等，在文中皆有其缘由之描述。李伯琦另一重要参考著作，是 1934 年以李国瑰之名发表于《学风》第 4 卷第 6 期上的《中国金币考》。

李伯琦为天津造币厂“厂长”一说，笔者依据的是张璜《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提及马定祥视此抄本为“当时天津造币总厂厂长李伯琦君之手写本”，故初时笔者将其误以为李伯琦手稿，后再查询确定是马定祥亲笔。2010 年出版的《造币总厂》一书，指出掌故大家郑逸梅也有类似说法，然而在《民国职官年表》内天津造币总厂各时期厂长（或监督）中，李伯琦并未见载，故将之暂定为总厂“高管”（高级主管），确切职位待考。



III-1-13
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的马定祥手抄本，存于浙江省博物馆“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

2 袁世凯像银圆

民国肇建，天下并未从此太平。武昌起义与1913年的二次革命一度将银圆市价推向高峰，各厂因此皆赶工生产，故混乱情况依旧，前清所拟的《币制则例》形同具文。然而，银圆充斥之下行情转而低落，当各地不同银圆价差缩小之时，推行新国币的阻力反而减小。新国币的制定与发行必须准备妥善，袁世凯像银圆因规划良好，作为新国币圆满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地位最重要的银圆之一。

统一中国银圆的历史任务

袁世凯就任总统后，财政部起初以金汇兑为本位公布《币制纲要》，但因反对者众并未实施。1914年（民国3年）2月，财政部以《国币条例》确定的银本位为依据，筹备新币。新国币由天津造币厂意大利籍雕刻师乔奇设计制模，“阳面恭摹大总统五分侧面像，上列中华民国三年六字；阴面为嘉禾二本，左右交互，下萦结带，中镌壹圆二字……此项新币与旧日所有官铸银圆，一律通用，不折不扣”。此即俗称“大头”或“袁大头”的银圆，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有重大的意义：驱逐外国银圆、取代前清龙洋，完成了统一国币形制的历史性任务。虽然未竟全功，我们亦不能因收藏市场上其平民化的身价而忽视它的重要性。

III-2-01
民国3年袁像壹圆签字版。正式量产者因财政部要发行“纯中文”钱币而不允许有雕刻师签名，只有为数不多的乔奇（L. GIORGI）签字版留存于世

III-2-02
民国3年袁像壹圆签字版银币金样，非常罕见



《国币条例》公布后，财政部通令各省统一银圆市价，搜购各地成色较足而市价较高及成色较次而市价较低的银圆回炉改制，双管齐下使价差缩小。同时将国币含银量降至89%，利用经济学“劣币驱逐良币”法则以顺利推行新币。

新国币设计经袁世凯亲自核定，由天津造币厂制成祖模后颁发各分厂大量生产，并于1914年12月24日正式发行，首批出自天津及南京两厂。随后广东与武昌亦开工承造，奉天分厂也陆续制作过，杭州分厂则在1920年加入生产行列，而安庆分厂亦曾制作过一段时期。

此币的设计与制作均甚精美，原拟由天津总厂颁模至各分厂使用，



以求形制统一，替换旧币。“袁大头”继承着仅昙花一现的宣统三年大清银币“国币”的未竟使命，由于事先准备完善，加上钱币本身质地优良商民乐用，发行后很快取代洋银，将其驱逐殆尽，堪称中国钱币的“绝地武士”。原本在中国最通行的外国银圆是鹰洋，估计有4亿～5亿枚之多，到1918—1919年间，已不容易见到，不是熔化改制，就是运送出口，只剩少数留存民间。可惜政局日益混乱，中央缺乏威信，规定形同具文，分厂自行其是；加上各省地方军阀或民间私制，“袁大头”版式繁杂，论百上千，可谓“族繁不及备载”，为中国近代银圆之冠。

“袁大头”正面所列年份计有4种，除民国3年外，尚有民国8年、民国9年及民国10年等。但所标示纪年与实际生产时间无关，如1924年（民国13年）时，日本大阪造币厂曾对南京、杭州两厂所造的大头进行化验；两枚币分别为南京厂的“3年版”、杭州厂的“10年版”，其实皆为1923年生产的。化验结果显示前者重26.8774克，成色89.1%；后者重26.717克，成色88.98%。与法定须重26.77克以上，成色须达到89%的标准相比，

III-2-03
贰角因尺寸小，仅名氏L.G.缩写

III-2-04
壹角，L.G.版

III-2-05
五分为镍币，签名改G.L.，位置在背面



III-2-06/07
鹰洋边“袁大头”试制样币，有红铜、黄铜及银质3种。此为红铜及黄铜样币，极罕见



III-2-08
T字边“袁大头”。极罕见

基本一致。

而后因生产厂家增多，良莠不齐，出现了各种不同尺寸、重量及成色的“袁大头”。举例来说，安庆造币厂在1924年夏所出“8年版”，其含银仅在76% ~ 83%，被发现后遭上海商界抵制和海关当局禁运。次年8月上海某“有力人士”也私制20余万枚成色只及56% ~ 76%的“3年版”大头。皖厂设置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后停摆多次。1919年底复工，该厂经营专谋私利，所制银圆偷色减重，遭各界抵制后暂时停工，1926年（民国15年）关闭，耿爱德估计其“大头”银圆产量在500万枚左右。

袁像银圆产量知多少

有关“袁大头”的生产数量问题，恐怕和它复杂的版式一样，找不到正确答案。皆因军阀割据，长期战乱，资料过于杂乱，连究竟有几处造币厂生产过都不清楚，难有确实数据。下列资料以耿爱德及李察·伟德根据财政部及英美自当年其商务领事在华调查所得记录为主，结合部分造币厂报告书内数据来推测，各厂生产情况如下。

（1）天津造币厂

天津造币厂自币制局梁启超呈请1914年9月起开制新国币算起，当年生产的5 747余万枚银圆并未区分龙银与袁币，若以四分之一计算，至1928（民国17年）止，推测约2.7亿枚，各年份皆有（财政部的统计，袁币自发行日起至1918年3月止共计生产84 698 554枚，1920年7月至1929年1月共计生产90 051 249枚，合计约1.75亿枚，缺1918年后三季、1919年全年及1920年上半数据）。

（2）南京造币厂

南京造币厂1915年起开始生产，至1927年（民国16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止，产量为3亿8 220万枚，全部为“3年版”。



III-2-09
民国8年袁像壹圆



III-2-10
民国9年袁像壹圆



III-2-11
民国 10 年袁像壹圆

（3）武昌造币厂

武昌造币厂于 1915 年始投入生产，至 1927 年止，总额为 8 121 万枚，有“3 年版”及“9 年版”两种。

（4）杭州造币厂

杭州造币厂自 1920 年新厂建成后大量生产，至 1927 年止，总产量为 2 亿 2 642 万枚，小部分为“8 年版”，以“10 年版”居多。

（5）广州造币厂

广州造币厂虽在 1915 年即生产新币，但随后改而专造广东贰毫辅币，“大头”产量为 583 万枚。

（6）奉天造币厂

奉天造币厂始造后改产铜元，于 1926 年至 1929 年间恢复生产银圆，总产量为 1 915 万枚，均为“3 年版”。

（7）安庆造币厂

安庆造币厂于 1920 年开工，当年 7 月前产量为 121 万枚，皆为“8 年版”；后直皖战争爆发，拒向北京政府呈报资料。

（8）南昌造币厂

南昌造币厂设于 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专造铜元，曾停办多次。1925 年武昌造币厂因赶工不及，委托该厂制造“大头”250 万枚，于同年 9 月交货，可能是“9 年版”。次年 11 月，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废厂。

其他如成都、重庆、甘肃、康定等造币厂及苏区均生产过“袁大头”。

以上资料中，有案可查者数量约 9.9 亿枚，其他造币厂在 1915 年到“废两改元”期间，产量最大的是成都造币厂，但其生产的是“大汉银币”，中央政府直到抗战时才真正控制四川地区。

在“袁大头”停产的最终日期

III-2-12
民国 3 年袁像壹圆银币金样，非常罕见

III-2-13
民国 9 年袁像壹圆银币金样，非常罕见



上并无定论。奉天造币厂在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停产；甘肃在 1931 年（民国 20 年）以后仍有生产。1949 年（民国 38 年）中期，因通货极度膨胀，被迫恢复银本位币制，云南亦曾生产袁头大洋约 53 万枚，当年 9 月 9 日的《中央日报》曾刊载此发行公告。另据了解，当时广州造币厂除生产船洋、“小头”外，也曾制作“大头”。尔后甚至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成都及沈阳曾分别新造一批相当数量的“大头”，以供西藏地区使用。

综合各方统计资料，“袁大头”的总产量超过 10 亿枚，是中国近代数量最多、流通最广的银圆。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银圆与大头相比，难有匹敌者。耿爱德估计则为 7.5 亿枚以上，耿氏对我国钱币研究透彻，结论亦多准确，他的这一数字尚属保守，可能耿氏认为上述 10 亿枚的统计数字中还包括后制版北洋及江南龙银而将两者剔除了。

“袁大头”的小故事

《国币条例》定下银本位币制后，天津造币厂就开始筹备新币，由意大利籍雕刻师乔奇设计制模，此事众所周知。他设计制样之前未见过袁世凯本人，乃以照片为样进行雕刻，乔奇觉得照片上的袁世凯“苍老虚弱”，然而完成后亲自携带样币赴北京晋见袁世凯时，却发现所镂肖像与袁本人神采差异甚大，无法显示袁的强人形象。乔奇深感挫折，乃要求重刻并获准。重新雕刻后的肖像即“袁大头”流通银圆上的侧面像，而原刻成的样币习称“袁像七分脸”，分 L. GIORGI 签字版与无签字版两种，存世数量极少，为罕见的精制样币。后来采用的“袁大头”也有签字版，

III-2-14
民国 3 年袁像七分脸壹圆签字版

III-2-15
民国 3 年袁像七分脸壹圆



正式量产者在财政部要求钱币上只可标示汉字的国粹主义政策下不被允许。在西方国家，币面加注雕刻师名字是传统，有如首饰上金银匠的戳记。

新币的设计方案经袁世凯亲自核定后正式量产。又据广东顺德县志，袁世凯像银圆的“壹圆”二字出自该县罗复堪手笔。罗复堪（1872—1955 年）名惇，早年与堂兄罗瘿公从康有为受业，后肄业于京师译学馆。民国初年在财政部泉币司供职。后长期在北京艺专和北京大学文学院讲授书法，20 世纪 50 年代初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直至 83 岁去世。



III-2-16
袁世凯像

民国 8 年“袁大头”数量为何少

《国币条例》公布时，对银圆的重量、成色虽有明确要求，但并无任何需要更改纪年之规定。到了 1919 年（民国 8 年）北洋政府币制局为整理币制，拟定《改铸暨铸造银圆办法五条》呈报总统批准办理。此办法的第四条有“各厂所铸银圆，应每年颁发模型一次，注明民国某年字样”。总厂即根据此办法指示赶刻新模，将纪年变更为“中华民国八年造”。然而此时中国币模用钢料皆为进口，因欧洲陷于一战的关系，材料的供应甚受影响，迁延下准备完成之时已届年底，故马上改刻“9 年版”币模，在次年 4 月再次呈样获准后，改用新模颁发各厂，这就是民国 8 年袁像币特别少的缘故。

民国 8 年袁像币模并非英国伯明翰造币厂代刻

泉界有一种说法，谓民国 8 年“袁大头”银圆的钢模系英国伯明翰造币厂雕刻，这种说法十分离奇。众所周知，袁世凯像银圆模具是开制时由雕工精湛的天津造币厂意籍技师乔奇担纲雕刻，他在民国 8 年时被解职，难道因雕刻师离去，中国就丧失了国币肖像“版权”而必须重刻吗？就技术层面而言，币面主图案不变，只是改年份不是件困难的事。当年广东七三反版先改成七二反版，再将英文改到背面时模具都是由粤厂自行处理的，若说身为总厂的天津造币厂无能力应付币模上纪年文字的改动，简直是匪夷所思。

1981 年美国人史威尼的《伯明翰造币厂史》（*A Numismatic History of The Birmingham Mint*）出版，登载该厂档案室中存有民国 8 年“袁大头”钢模及样币，币面写有“1949”阿拉伯数字，因找不出其他相关事项的档案记录，故史氏并未作出结论，而在图片说明的年份旁加了一个问号。或许讹传自此而来。

事实上，1980 年英国学者李察 · 伟德发表在英国 Spink 公司期刊《集币通报》上的文章已披露，根据皇家造币厂档案文献，1949 年 3 月时，有一家伦敦的贵金属期货商至该厂洽询制作袁像及孙像银圆的可能性，该厂征询英国政府财政及外交单位，答复是“必须要有该国政府或其合法承接者同意之文件，才可代造钱币”，到 5 月时，另一家伦敦贵金属期货商也来接洽，皇家造币厂同意先进行刻模，声明若未取得中国政府同意则须将模具销毁。5 月底时，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经理向皇家造币厂询问，是否可由中方供应钢模在该厂生产银圆？几天后，第三家伦敦期货商来洽商生产袁像银圆，这时已是 6 月初，之后所有联系中断。皇家造币厂则继续进行模具开发，并于 8 月份完成，到 1949 年 12 月时，该厂了解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后，即中止结案。由前述数据可以推断：伯明翰造币厂也是在类似情况下刻出民国 8 年袁像币模，除试制了几枚样币外，并没有量产，且时间是在 1949 年。故国内生产的民国 8 年“袁大头”，其模具并非伯明翰厂所刻。

“中圆”——银圆中罕见的面额

《国币条例》规定，一圆主币成色仍为90%，五角以下辅币均改为70%。后来财政部以“因时制宜，与原条例略有出入”为由，改成色为89%。同时为实现金本位币制作准备，将五角辅币名称定为“中圆”。1916年（民国5年）7月，财政部应造币总厂所请，先在天津发行了含银70%的中圆、二角、一角3种新银辅币，并力推十进制结算法。

除天津总厂外，1917年2月南京造币厂呈请部颁中圆、二角、一角新银辅币祖模获准，财政部5月下令将翻印新模送总厂复验，再行开制。同年广东造币厂拟开制新银辅币，以未获部颁祖模为由，欲沿用旧模，未被批准。其余各厂，皆未经中央颁给祖模准予制发。根据1935年（民国24年）出版的《财政年鉴》，津厂自1916年至1929年止，中圆产量约123万枚；宁厂自1917年至1923年止，中圆产量约247万枚，总计371万枚有余。由于南京造币厂翻印银辅币新模要先送总厂雕刻洋技师复验放行才能开制，故其出品应与津厂所造者接近。

III-2-17
民国3年袁像中圆签字版



虽然北洋政府三令五申努力推广新银辅币，但十进制改革效果不彰。到1923年时风潮迭起，十进制几近崩溃：市场仍按含银量折算，新辅币与旧辅币已无分别，天津造币厂还被币制局训令停产。档案中可查到的袁像中圆产量，尚不及同时期一圆主币产量的千分之五。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习用中圆辅币的地方有限，各地最乐用的辅币还是二角及一角。袁像中圆主要在北方各省流通，在十进制改革失败后，使用上无任何便利之处。中圆在上海称“袁像对开”，市价要十三角一二分才能兑得大洋一圆。即使在产地南京，通用的仍以广东、江南、湖北等地造的旧式毫子居多，“大洋角以成色不佳，市面不易行使”。即使是邻近总厂的北京，辅币也是以小洋一角最为通行。

通用半圆者的省份即滥造最多之处，如四川汉字五角，其产量约3 900万枚，远远超过津、宁两厂的10倍，其他如云南也生产了上亿枚半圆辅币。

北洋政府造人像银圆 3

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到张学良易帜的这段时期，习惯上称“北洋政府时代”，其间所试制或发行的各式纪念币章，可谓百花齐放，尤其是天津造币厂的人像银圆和银章，工艺之精湛令人赞叹。虽然这些币章发行的初衷并非用以流通，但还是值得一书。

争权夺利　铁打衙门流水官

民国初期，政局异常混乱，尤其在袁世凯称帝失败郁闷而死之后，继任者无一能掌控局面，总统接二连三换人：“泥菩萨”黎元洪只当了一年零一个月就被“辫帅”张勋搞复辟而赶下台来，代总统冯国璋也没比他的前任多干几天就被迫辞职；徐世昌做了将近4年算是长命，接着黎元洪复出，但位子只坐了一年；“卖布总统”曹锟贿选上台也仅一年就遭逼退；而“临时执政”当家的段祺瑞也不过撑了一年半，其下野后一年多时间里代理人似走马灯般更换，最后以“大元帅”头衔掌权的张作霖则在届周年前被日本人炸死。

其间所谓的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地区有限，各省军阀划地为界，任意行事，可说“一国多府”。国民党则在南方整军经武，1923年（民国12年）2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因所有税款全为军阀把持，大元帅府军费无着，为财政建设，乃筹设中央银行。1924年8月15日，中央银行于广州成立。北伐成功后，1927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制定公布《中央银行条例》，翌年10月6日修正，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并于11月1日在上海正式开幕营业。

北洋政府时代的“军阀币”和纪念章

由于中央控制力薄弱，各部门阳奉阴违，造币机构常钻法规漏洞，目前也尚未找到完整文献记载这些纪念币章发行的缘由或依据。1945年9月《永安月刊》第76期李伯琦的《中国纪念币考》对北洋政府时代发行俗称“军阀币”的人像币章有相当叙述，摘录如下以供参考。

（1）袁世凯像“共和纪念”壹圆

“民国三年天津造币总厂铸，重量同通行币，成色略高，为足九成纯银，面袁世凯，大元帅服，鹭羽冠，大勋章，九分正面及胸像，面稍左侧，背中壹圆二字，辅以嘉禾，上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九字，左右隔二花纹，下英文一圆，面背边皆联珠纹，此为总厂所聘义技师鲁乔奇雕模，极精美，





III-3-01
袁像共和纪念币。雕刻精美，但有点像西方人

III-3-02
袁世凯肖像

像亦极似袁，模初成，技师刻己名于袁像下，财部见之大哗，谓传之后世，必误币中像为鲁乔奇也。令重雕，有名币，祇成数枚，故极为世所珍，去名改刻，重铸五万枚，至民国八年，各处来索已罄，而索者仍不已，而例又不应再铸，予时主币政，重铸一万枚，因不便报部，乃并数于日铸之通行币中，故成色遂同通行币，较前稍逊，然非行家，不易辨也。”

（2）徐世昌像“仁寿同登”纪念银币及银章

“民国十年，天津造币厂铸，成色重量与通行币同，面徐世昌，大礼服，悬大勋章，露顶，九分正面及胸像，稍左侧，背中居仁堂一角，阶上立四人，阶下大树一株，树下仁寿同登四字，上中华民国十年九月八字，左右隔二花朵，下纪念币三字，面背边皆联珠纹，此币已非纪念国事，纪念徐世昌私人而又失时效矣。盖徐继大总统位，已数年，未有铸币纪念事，自九年，勾结曹锟，战败段祺瑞靖国军，满志踌躇，以为自此可政权独揽矣。有献媚者，遂补铸此纪念，去继位期已远，又不便言纪念此，遂有此不伦不类之寿域同登文。”



III-3-03
徐世昌像“仁寿同登”纪念银币

III-3-04
无“纪念币”字样的银章

III-3-05
徐世昌肖像



（3）曹锟像“纪念”及“宪法成立纪念”银章

“民国十二年，天津造币厂铸，成色重量均同一圆通行币，盖曹锟既逐黎大总统，窃据大位，铸此纪念也，面曹锟大元帅，佩各勋章，露顶九分，正面及胸像稍左侧，背五色旗、星旗交叉，两旗中夹纪念二字，四周布六星，面背边皆三角轮齿纹，祇纪念二字，未言纪念何事，理实欠顺也。曹锟等，焉足语此。宪法一圆银纪念币，民国十三年，天津造币厂铸，成色重量均同通行币，锟既得大位，召集赂选议员议宪法，告成，铸此纪念，面曹锟大礼服，佩大勋章，九分正面及胸像，稍左侧，背五色旗、星旗交叉，旗绶绕旗柄，作飘曳势，上宪法成立纪念六字，面背边皆联珠纹。……所订亦博采各国，参之国情，未必尽谬，奈所议非人，国人鄙视，终不能行也。”





III-3-06
曹锟肖像

III-3-07
曹锟像“纪念”银章

III-3-08
曹锟像“宪法成立纪念”银章

（4）段祺瑞像“和平”纪念币

“民国十四年，天津造币厂铸，成色重量同通行币，面段祺瑞大礼服，露顶九分正面及胸像，面稍左侧，上中华民国执政纪念币九字，背满布嘉禾，如通行币，惟中易和平二字，背边皆轮齿纹，时曹锟被禁延庆楼，势不及别选议员，举总统，乃延段祺瑞入都主持，称为临时执政，亦不设国务总理，实则总统、总理权一人操之。时德国希特勒，尚未当国，各民主国，从未有总统、总理权一人兼之者，故段自称为政治革命，铸币纪念，实则仍不免为人傀儡，旋以武人责难，仍设国务总理，召许世英充之。”

III-3-09
段祺瑞肖像



上述 4 种币章，袁像共和纪念币有壹圆面额者是正式制作的银圆，徐世昌像仁寿同登虽说有些“不伦不类”，却非造币厂自作主张，曹锟戎装像（武曹）亦应如此，“宪法成立纪念”（文曹）章则有记载是天津造币厂



III-3-10
段祺瑞像“和平”纪念币



III-3-11
袁像共和纪念币壹圆签字版金样



III-3-12
徐世昌像“仁寿同登”纪念银章金样



III-3-13
“武曹”银章金样



III-3-14
“文曹”银章金样



III-3-15
段祺瑞像“和平”纪念币金样

于 1923 年 11 月 25 日奉命制作的。2010 年出版的《造币总厂》一书内对段祺瑞“执政纪念币”有另一种说法，此应是《益世报》记者采访当时返任的天津造币厂监督（厂长）王桂寿后所撰写的，内容是这样的：1924 年间王因任内亏损累累而丢了乌纱帽，但代理者不愿接任，故 11 月底王桂寿借机“回锅”后，“思得一奇策”凑款并以私购银料仿袁世凯及曹锟之先例制造银圆，“上镌段执政之肖像，以投时机而获利”。笔者认为此报道可信度极高，它解释了何以“执政纪念币”上没有面额。无面额者即不是法定货币，这样可以无需财政部授权而制造。其所指“仿袁世凯先例”应是袁像大飞龙银章，亦是没有面额而无须呈报主管货币的财政部取得发行许可，数量也不受管制。

同年第 49 期《银行周报》有关天津造币厂停造经过的文章记载，王桂寿返任即拟以私人财产弥补公款，于事无济后与银行团协商。银行团要求成立董事会，厂方必须经由银行团同意才能进行生产，监督不得自作主张，王以无法从中牟利而解散员工，弃职离去。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这些币章艺术上的光芒及珍贵的收藏价值，在市场上依然受到喜爱。这几种银质币章都有金样存世，无论是当初呈样用的，还是后来为筹款而添造的，现在都已成文物，值得收藏。

民国 16 年褚玉璞像纪念银章

奉系军阀褚玉朴在 1926 年被张作霖任命为直隶省军务督办兼省长，次年在届满周年时由天津造币厂制作了一款纪念章。此章雕工精美，但数量非常少。可能是褚某官衔不够大，无法与前述几位“总统级”的人物相比，加上他在该年春先于南京下关遭北伐军痛击，秋时又惨败冯玉祥于河南商丘，形势所迫而草草收场。



III-3-16
褚玉璞像“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七日周年纪念”银章

民国 15 年、16 年、17 年张作霖像纪念币

外号“张大帅”的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存世有以其肖像制作的纪念币 3 种。

其一，“民国十五年”正面戎装像，上端刻“陆海军大元帅”；背面中心为“纪念”二字，嘉禾与旭日图案环绕，此嘉禾形式与共和纪念币非常相似。

其二，肖像同前，纪年改“民国十六年”并置于正面；背面为龙凤黻黼图案，上缘镌刻“纪念币”三字，龙凤图与民国 15 年二角相同。

其三，“民国十七年”正面便装像，上端刻“大元帅纪念币”；背面为五色旗与十八星旗图案。



III-3-17

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背“纪念”及嘉禾旭日，嘉禾形式与共和纪念币相似





III-3-18

民国16年背龙凤及“纪念币”，徽饰图与民国15年龙凤二角相同

有趣的是三者皆无中文面额，而有英文面额“ONE DOLLAR”（一圆），参照发行“袁大头”新国币时刻意去除外文以及前厂长王桂寿的筹款“奇策”，其制作缘由值得探索。

民国 18 年孙中山像背地球壹圆

1927 年（民国 16 年）4 月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后，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中心南移。次年底，天津造币厂接到国民政府财政部令：“停铸袁币，改铸先总理像币。绘样镌模需时，准暂用民国元年所铸先总理纪念币旧模先行铸用。”由厂长薄以众的“新模尚未镌就之际，自应派员先赴国民政府领取先总理纪念币旧模以便鼓铸”以及“新币模未经颁发以前，暂用先总理纪念币旧模铸造”等语，推测此时津厂即开始雕刻新模，民国 18 年孙中山像背地球壹圆银币模即在这时段完成，此币雕刻精美，但可能国民政府因已在筹备孙像三帆新币以及考虑将地方造币权收归中央，故而未获准发行。

北洋政府时代这些没有面额的纪念章，设计上的瑕疵不知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以严格的标准来看，制作上或许缺少法理的依据，但就收藏及艺术观点来看，大清王朝崩解到北洋政府结束执政的这段风雨动荡的时期，正是中国近代金银币最辉煌的时期，这些军阀币章也只有在此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才会出现，笔者不认为“缺少法理依据”会影响它们的文物价值。收藏者购买时要注意的应该是钱币（章）是否为后仿假货，而非计较其出身是否纯正。目前全球最昂贵的 1933 年美国 20 美元双鹰金币，2002 年以 759 万挂零 20 美元成交，这 20 美元就是形式上合法化的费用。因为该枚金币是 1934 年此版金币销毁时被调包而流出的，而根据美国法律，未发行币都是政府的财产，非法取得即是“赃物”，政府可没收。故此，法鲁克王旧藏的金币要缴交财政部该币面额的 20 美元，才能合法拥有。另一枚于 2007 年 5 月以 500 万美元转让的“镍币之王”——1913 年自由女神头像五分，是造币厂员工使用未发行年份的模具而私制的，但这些币的出身都丝毫不影响它们在藏家心目中的地位。



III-3-19
民国 17 年便装“大元帅纪念币”背双旗



III-3-20
孙中山肖像



III-3-21
民国 18 年孙中山像背地球壹圆



III-3-22
民国 18 年孙中山像背嘉禾贰角。背面采用袁像币二角模，此辅币精美度较差，雕工不如一圆主币

民国 12 年“龙凤黼黻”银圆

除了以上这些人像币章外，存世还有一种不能不提的俗称“龙凤币”的银圆。此币由来大有文章，首先从图样设计来说，它是中华民国成立后最早采用的国徽，但政府从未公告。其为鲁迅在 1912 年（民国元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时所拟定的，图案和说明书于同年 8 月底呈教育总长范源濂，结果不详，但说明书刊于次年《教育部编纂处月刊》。

此龙凤图案系采用古代的“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养也；黼，取其断也；黻，取其辨也；美德之最，莫不赅备。”设计以取自汉代石刻之嘉禾图案为中心，其后为黼（斧形），上之小圆圈代表粉米；黼下为黻（弓形），山结缕成篆文。正上方为日，左右分别为龙及华虫，各持宗彝，月置龙角火丽其身；华虫啄衔藻，其首戴星。说明书中另有嘉禾简徽，作笺纸之用。两者都算是北洋政府时代中华民国的国徽。

北京鲁迅博物馆内现藏有阳文“鲁迅参与设计的中华民国国徽”的铅样，该铅样图形虽与后来发行的龙凤币略有不同，但显示当时已试刻模具，就此案发生时间及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北京来考虑，其应由天津造币厂担纲制作，而这时挑大梁的雕刻师是乔奇。另据 1994 年 7 月出版的《东亚泉志》（*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Numismatics*）所刊出的附乔奇签名的拓片，故推论此币亦是其作品。

“十二章”的纹饰在清代仅皇帝龙袍上可有，大小官员按职位高低可饰以九、七、五章等。故此国徽虽然图形优美、含意深远，但气氛似乎与“人民出头天”有些不符。由于当时政局动荡不安，进展不详，直到多年后上海筹备造币厂之际，征求新国币图案时，经各界讨论研究才呈报政府。1923 年 3 月，北洋政府以总统教令公布采纳上海方面提案，即现存世之龙凤银圆。因当时上海造币厂未能开工，故交由天津造币厂生产。后可能因图案帝制色彩浓厚，故没有进入量产阶段，其依背面“壹圆”字体大小可分两种版式，亦有银模金币存世。

有趣的是外国钱币书刊均将此币说成“溥仪结婚纪念币”，其实是“浪漫的错误”。事实上，连溥仪本人在其自传《我的前半生》及其英国教师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黄昏》中都没有记载。按溥仪婚礼大典举

III-3-23
民国 12 年龙凤背“壹圆”大字版

III-3-24
民国 12 年龙凤背“壹圆”小字版





III-3-25

清康熙皇帝龙袍，此为香港佳士得（Christie's）2008年拍品。龙袍上绣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的“十二章”图案。其代表意义：“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取其文也；宗彝，取其孝也；藻，取其洁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养也；黼，取其断也；黻，取其辨也；美德之最，莫不赅备。”



III-3-26

“龙凤黼黻图”是北洋政府时代中华民国的国徽，此1921年秘鲁华侨为庆祝秘鲁建国百年在该国首府利马（LIMA）制作的纪念银章上将两国国徽并列，发行时间比龙凤银圆还早上2年

行于1922年12月1日，可能因时间巧合而遭人穿凿附会。

“龙凤”二角、一角银辅币

曾有以龙凤黻黼为图案的民国15年二角、一角银辅币大量流通，或许因其为辅币而不受关注，一般文章论述中较少提及，有幸吾辈在故纸堆中找到了蛛丝马迹。

III-3-27/28
“龙凤黻黼”一角及二角银辅币



报刊新闻中最早见于1926年（民国15年）9月19日北京《世界日报》，该报报道天津造币厂监督李厚祚，因调济市面金融，曾委托各银号钱庄发行龙凤图案一角十进新银辅币；由褚玉璞指令各机关一律按十进使用，违者严行惩办。接着有资料显示10月26日有二角银辅币上市，送各机关查照收受及各银行。由此看来，龙凤小洋是先制作一角，再制作二角，非同时发行。



III-3-29
龙凤二角银辅币金样

同年11月7日上海《申报》刊载：因北京缺乏现银，天津造币厂运送新龙凤银辅币10万圆应变。次年6月8日北京《世界日报》报道：财政部以京津地区市面辅币缺乏，“饬令天津造币厂，即行开铸龙凤辅币，中华等银行共托铸五十余万圆”。同时当局为推行此十进制新辅币，隔月即颁发通令要求各县办理。随后又有报道指出“天津新铸龙凤币暴跌原因，成色质量低减……推行办法不良”，同年多次报道新辅币的流通遇到障碍，1928年2月5日该报刊出“财部训令造币厂停铸龙凤币，并严重取缔奸商操纵”及“辅币自前年发行以来，信用本来很坚固……”。龙凤小洋通行后，津厂管理当局贪图厚利，以低色充数，日产50 000圆而每造万圆获利5 000，终因供过于求，市价暴跌，每12角半才能兑得大洋1圆，在奸商炒作下最低时曾至15.5角，后来才逐渐回升。

又据1929年美国造币厂年度报告，1926—1928年间，天津造币厂总计生产了龙凤二角3 528 885枚、一角4 124 138枚。此数据也见耿爱德1939年发表在上海英文《中国杂志》上的《中国造币史》一文中。

虽然众人多说民国12年龙凤一圆主币因帝王色彩浓厚而没有进入量产阶段，却有以此为主图案的民国15年小洋大量流通，着实令人百思不解。固然事过境迁后再“以今论古”，未必能解释乱世中所发生的事情，笔者在《造币总厂》上看到一则记载觉得非常有趣，原文应来自报刊，摘录如下：“督直期间，褚（玉璞）续娶一房小老婆，又命造币厂为其铸‘龙凤呈祥’辅币，但因商家拒收，无法在市面流通，被迫回炉作废。”谜底揭晓竟是“褚玉璞小三纪念币”，不禁莞尔。这些看似市井传言的说法，有时还真能与史实相互映衬，不信者就权当茶余饭后的谈资吧。

孙中山像试制样币 4

民国肇建后，孙中山先生为避免南北兵戎相见，谦辞临时大总统之位，将领导国家的重任让给了袁世凯。不料袁利欲熏心企图恢复帝制，虽其人以失败告终郁闷而死，但全国并未一统，北洋政府中亦无人有足够的威望撑起大局，倒是袁像银圆在其去职后反而日益畅行。北伐后的国民政府当然不愿意看到叛变“三民主义”者的头像继续留在国币之上，乃积极筹划以孙中山肖像为图案的新国币替代“袁大头”。

国民政府第一试——民国16年孙像中山陵壹圆

1917年国父孙中山为反对北洋政府，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又称护法政府）。1925年，改组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在次年发动北伐，1927年3月攻克南京，4月18日宣告建都，随即筹备拟发行孙中山像银圆以取代“袁大头”。

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他以南京为辛亥革命临时政府所在地，生前希望葬于紫金山麓，各界遵其遗愿进行筹备，中山陵的设计方案在同年9月选定，次年1月破土兴建，1931年底完工。新币则是由中央银行一手办理，在看过所准备的中山陵图纸后，耿爱德以顾问的身份建议由以工艺精湛闻名的维也纳造币厂总雕刻师普拉特(Richard Placht)操刀雕刻模具。由于此时陵寝才刚动工，普拉特系按设计图纸雕刻，故细节稍有出入。南京造币厂试制了480枚，但未被采纳，据说理由是当局认为其“神态面貌更似兴登堡而非孙中山先生”，可能是雕刻师不熟悉东方人面孔结构之故，未能满足国民政府的要求。



III-4-01
民国16年孙像中山陵壹圆



III-4-02
孙中山肖像



III-4-03
孙中山先生安厝

此币正面铭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将“国民政府”四字镌于币面有画蛇添足之嫌，但也显示了新政府欲与代表袁世凯旧势力的北洋政府划清界限及主导新国币造币权的意图。由于没有新样可供选择，促使俗称“孙小头”的开国纪念币大量制造，直到新国币船洋的定案与开制。

国民政府第二试——民国 18 年孙像三帆壹元样币

北伐军攻克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随即令南京造币厂制作新版银圆取代袁像币，因筹备仓促，新银圆显得粗糙。然而筹备中的民国 16 年中山陵图案币也不尽如人意未被采纳，于是 1929 年（民国 18 年）南京政府研拟新国币方案以取代“袁大头”及“孙小头”，并邀请美国、奥地利、意大利、英国及日本等国家造币厂雕刻模具送样比稿。

新币正面仍采用孙中山先生肖像，上镌“中华民国十八年”，背面为三桅帆船，面额“壹元”分列两旁，俗称“三帆”银圆。五国所雕刻的币模均颇精美，但皆未采用，1929 年 6 月 4 日由于南京造币厂因电线走火焚毁，故只在杭州造币厂试制了少许样币，其中以签字版最为罕见。尔后意大利造币厂所雕孙像在民国 21 年获选为金本位币制的银圆图样。此事泉界耳熟能详，惟其中有一段轶事鲜为人知。

这 5 种含签字版共 6 式的孙像“三帆”银圆，各自的出处在早期并不十分清晰。由于船洋新国币正式发行时模具由美国费城造币厂代制，故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此肖像为美国所刻，如蒋仲川 1939 年出版的《中国金银镍币图说》即是。书内尚将奥地利版归为英国版，而英国版则归为意大利版，等等。后来英国版由美国钱币专家包克（Bowker）发表文章指出，在英国皇家造币厂 1929 年的年度报告中有此事之记载，并借该报告所刊图片而验明英国版正身，同时得知此版雕刻师乃英国皇家造币厂的琼斯(Langford Jones)。

奥地利版则因有耿爱德与维也纳造币厂雕刻师普拉特（Richard Placht）两人的直接通信，所试制的各式面额的样币也逐一得到确认，普拉特即民国 16 年孙像中山陵银圆的雕刻师。奥地利版是唯一有辅币的品种，计有“半元、贰角、壹角”及“国币伍拾分、国币贰拾分、国币拾分”两系列；均仅制作 2 套，其中前者为银质，后者为镍质。意大利版的正名，归功于币面上有雕刻师莫蒂签名(A. Motti Inc.)及罗马造币厂厂记(R)，

III-4-04
意大利签字版。正面有雕刻师签字 A. Motti Inc.，背面右下角五点钟位置为罗马造币厂厂记 R，罕见



莫蒂全名 Attilio Motti（1867—1935），于 1913 至 1935 年间担任罗马造币厂总雕刻师。此“张冠李戴”的情形，在施嘉干 1949 年所编《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中完全更正，“认祖归宗”大功告成。此中只有日本版的身份未改，有趣的是当耿爱德以信函致日本大阪造币局询问详情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无案可查。



III-4-05
意大利版



III-4-06
英国版



III-4-07
日本版



III-4-08
美国版



III-4-09
奥地利版

III-4-10

奥地利版镍辅币系列。“国币伍拾分、国币贰拾分、国币拾分”样币，存世只有2套。2006年嘉德秋拍中，以总价人民币220万元成交



III-4-11

奥地利版银辅币系列。“半元、贰角、壹角”样币，存世也只有2套。诺曼·亚克斯旧藏







III-4-12

民国18年孙像“三帆”银圆规划时所用的孙中山先生塑像

III-4-13

奥地利雕刻师自藏的加厚细齿版样币。此加厚的细齿版是维也纳造币厂雕刻师普拉特（Richard Placht）试制后自藏的样币，并非如其他的均出自杭州造币厂，2010年12月Ponterio香港拍卖会上出现后方为国人知晓

金本位银圆 5

币制紊乱的现象非中国独有，而改革至迟却属少见。前清时，朝廷就对此状况十分头疼，在银本位、金本位间摇摆不定。由于当时各国币制多半已放弃银本位而改行金本位，使金银间的兑价差距拉大，习用白银的中国在对外贸易及赔款偿付上非常不利，但中国又没有实施金本位的条件，故金汇兑本位主张甚嚣尘上。争议过后，无论是 1910 年（宣统二年）颁布的《币制则例》，还是 1914 年（民国 3 年）颁布的《国币条例》皆暂以白银为本位，惟国民政府财政当局始终念念不忘推行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制。

“金本位”国币的筹划

1929 年（民国 18 年）国民政府聘请美国经济专家甘末尔（Edwin W. Kemmerer）来华，协助调查财政币制等状况，并代立法案。此由专家组织的甘末尔设计委员会随即拟就《中国逐渐实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建议中国应实行金本位制，该币制仅须规定货币价值的单位而没有必要发行金币，等于是金汇兑本位制。草案制定发行代表黄金单位的信用银币，每单位含纯金 0.601 866 克，价值相当于 0.4 美元；因为其单位代表的黄金价值超过银币本身的材质价值，故称“信用银币”。

与此同时，新建的上海造币厂亦竣工，并开始进行新国币的设计。新国币正面的孙中山肖像采用 1929 年“比稿”时的意大利版图样，背面双桅帆船则参考上海中央造币厂美籍总技师赫维特（Clifford Hewitt）所设计的竣工纪念章上的形式，模具委托美国费城造币厂总雕刻师辛诺克（John Sinnock）制作。

字边及梅花边样币

金本位壹圆新币原本的设计与后来量产的船洋相似。国民政府欲将旗帜上的“青天白日”表现于新币上，因此图案加上旭日与象征三民主义的 3 只海鸥；又因财政部要求将“金本位”字样标示其上，故将海鸥移到水面。“金本位币壹圆”仅试制若干，存世有直齿边与光边两类。在光边中尚有极罕见的阴打“中华民国中央造币厂”字样及“❀”梅花图样的版式，此应为原本之设计，以与银本位银圆的形式相区别，且可使伪作及锉边困难。1916 年（民国 5 年）9 月币制委员会呈财政部《草拟试行银辅币办法》，讨论如何与旧币暂时并行流通的问题，其中第八则即有“宜用洋文 The

III-5-01
前上海中央造币厂 1930 年落成时的外景





III-5-02
民国 21 年金本位壹圆，样币

III-5-03
民国 21 年金本位半圆，样币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四字，使较难以伪造，且与旧铸小银圆截然易辨”之议。推测最后因民族意识兴起之故，才决定不用外文字样。

同时期的美国硬币采用字边技术的只有两款金币，皆使用三簧片式夹模法于印花时压出凸起的图文。使用此法的印花机需加装配件，当时中央造币厂的既有设备无此配件，故改用滚压方式制作，但试制时遭遇困难。辛诺克于模具运出后于 1931 年 11 月 10 日给赫维特的信函内特别提到，需要重压才能将中文字样滚在壹圆币的边道上，该厂在中心盘与滚字模板方面“花了很大的工夫，在试制成功前仍有很多严重的障碍有待克服。在这一两天内会再进行另一次尝试，希望能够更接近贵方的要求”以及提到“原模、二元模及工作模的制作相当顺利，不日即可完成，但在满足边道设计上遇到一些麻烦，有关的诸多新特性试验超出我们的经验”等语。信中还提到“金本位币壹圆及半圆币模已于数周前运出，半毫及贰仙币模亦于 11 月 5 日交运。另有四分之一仙币模，因体积太小无法雕成，请剔除之……”。由此看来，金本位系列币的最初设计规划中，较今人所见到的还要多出一种。

根据此信函的内容及观察实物后推测，前者指的是有“中华民国中央造币厂”文字边的原始设计，后面提到要进行的尝试只是带“❀”梅花图样的修改版本；如从实物及图片观察，可判断费城造币厂当时是以印花后的光边币进行滚字，但无法克服滚字压力所造成币缘凸起的问题，即产生类似“饼干边”的波浪形币边现象，以及字间距不一的问题。此费城造币厂总雕刻师辛诺克与赫维特往来信函的原件现存于纽约美国集币学会（ANS）博物馆。

“中华民国中央造币厂”九字在设计上是沿着边道“竖排”的，换句话说将硬币置放于平面时，文字是“躺平”的。此设计使文字方向只有顺时针与逆时针之别，可避免出现钱币正面朝上时文字头朝下，从而使民众以为文字是颠倒的误解。



III-5-04
民国 21 年金本位壹毫，样币

III-5-05
金本位币壹圆梅花边样币。仔细观察可见钱币边缘呈现出波浪状的“饼干边”





III-5-06
金本位半毫镍币，样币



III-5-07
金本位半毫铜币满穿，样币



III-5-08
金本位贰仙镍币，样币



III-5-09
金本位贰仙镍币满穿，样币

民国21年三鸟壹圆银本位币虽亦为试制文字边样币，推想可能也因制作难度太高的原因，发行时未予采用。

“甘末尔草案”与“关金券”

1931年世界经济萧条，银价大跌，2月按原方案草拟的新币单位价值已跌至0.2美元，此刻中国若对外交易以银兑金，成本加倍，雪上加霜。同年9月，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制，随后日本、美国、加拿大等相继废除或停用，世界范围内的金本位币制开始崩解。甘末尔的金本位币制计划因不适合中国国情，招致各界反对而未冒然施行。新国币到正式发行时又改回银本位制，“草案”遂不得实施，但其引发了一项关税新政值得一提。

中国关税一向以海关两（关平）白银为结算单位稽征，然而对外赔款及债务本息的偿付却是计以黄金。征银而付金，在银价暴跌时国家财政损失惨重。因此很早就有人主张海关应另行造币，专作缴纳关税之用，并与金本位货币之间维持一个固定的比价。国民政府采纳甘氏建议，在1930年2月1日宣布将海关进口税改征金单位，发行“关金券”纸币，此海关金单位（Customs Gold Unit）“关金壹圆”值纯金0.601 866克，即甘氏草案所设计的单位。进口商按汇率以银洋、英镑或美金向海关兑换，亦可向中央银行购买关金券缴纳，如此一来国际金价波动产生的风险由进口商承担，海关税收在对外赔款及偿债方面则没有顾虑。根据《海关十年报告书》（1922—1931），1931年中央银行售出的关金达1亿圆，“中国自采用关金征收进口税款后，所有以关税担保的外债都得以如期偿还”，就此而论，“甘氏草案”对中国财政不无贡献。

III-5-10
关金券壹圆。名义上价值纯金单位，等同金本位币一圆的海关金单位纸币，俗称“关金券”



民国18年金本位壹圆银币铜样

存世有一种正面为美国版“民国十八年”孙像配背面“金本位币壹圆”的铜样，一般认为是造币厂的“戏作币”（mint sport），包括耿爱德也持



III-5-11
民国 18 年美国版孙像配“金本位币壹圆”银币铜样，2009 年北京诚轩拍卖出品

此看法。理由是甘末尔的海关金单位计划是他 1929 年 11 月抵达上海后开始收集资料，次年秋将完整报告呈交财政部，并于 1931 年 5 月向大众公开，之后才向美国费城造币厂下发模具订单的，故认为该铜样是杭州造币厂在上海中央造币厂正常运转之前的戏作币。

笔者注意到此所谓“金本位错配币”只有美国版，而且是铜样，若为杭州厂戏作应有其他国家的造币厂版本。研究后相信是费城造币厂在接到订单后，完成雕刻较容易的背面即先行以自有的民国 18 年三帆版孙像面进行试打，待此较为费工的人像正面完成后再正式制作试样。

孙中山像帆船银圆 6

币制迟迟未能定案，对金融活动造成的不便影响到经济发展，各界废两改元（圆）呼声四起，官商看法也渐趋一致。而随着全球经济的萧条，加上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侵占，时局的动荡令各行各业均受波及。1931 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金融瘫痪，上海钱庄与银行纷纷要求内地以现金清帐，造成上海银圆过剩，行情惨跌，有舆论认为应趁此时机施行新的币制。在银两使用的萎缩及银圆普及的趋势下，“废两”的阻力在减少；而银圆充裕，实施后不会影响市场资金的流通；银圆行情的低落，也使政府在制定银两与银圆换算办法时困扰较少。此时，中央造币厂也已建成，准备就绪，银圆供应能力已不是问题。

废两改元，毕其功于一役

各项条件的成熟，促使当局决心在 1933 年 3 月 10 日正式实施“废两改元”，所有上海市及江苏省内各公私款项的收付、债权债务的清算、交易税收、国外汇兑及各商店标价，均改用银圆计算。上海实施“废两改元”后，银两与银圆不再相互折算，各界称便，非常顺利。财政部自 4 月 6 日进一步推广至全国，上海、汉口及天津等地银钱公会立表支持，此三大重要商埠的配合带动了全国货币市场。同年 9 月，财政部令全国银炉停业，拆除炉灶不得私铸，并撤销公估局。支配中国近千年的银两制度正式步入了历史，中国的银本位币制终于趋向稳定与统一。

“废两改元”的成功，需要源源不绝的重量及成色皆精准的银圆供应来支撑。担任此重要角色的是上海中央造币厂所出俗称船洋或“帆船银圆”的新银本位币。财政部在公告“废两改元”前两天颁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明定其铸造权专属中央造币厂，旧有各厂局一律停废。“银本位币定名曰元，总重 26.697 1 克，银八八，铜十二，即含纯银 23.493 448 克”，此标准是以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旧有一圆银币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上海规圆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币一圆为一定之换算率；成色较先前《国币条例》规定的低百分之一，目的是再次利用“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法则，将旧银圆回炉改制，减少推行新币的阻力。

“废两改元”的前锋——“三鸟”银圆

1933 年 3 月，新银本位币在中央造币厂正式开制发行。此币正面图案与金本位币相同，背面中间为双桅帆船，右有太阳，3 只海鸥飞翔在上，



左右分列面额“壹圆”二字。原设计用意为象征三民主义引领中国扬帆出航，如旭日升起，前途光辉灿烂。惟前一年刚发生一·二八事变，中日双方在上海鏖战月余，后经协议停火，故此原来象征国民党徽之日出与三鸟被附会为日军压境、敌机临头，甚至有人把三鸟飞翔说成东三省在九一八事变后“飞离”中国。在市面谣言传出后，当局即修改模具，将旭日与三鸟除去；同时把年份改为“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于5月发行，已制成的“三鸟”银圆回炉重制，以后发行者，俗称船洋。民国21年“三鸟”银圆共生产了226万枚，除5万枚左右流入市面外，其余皆回炉熔毁。一份1937年（民国26年）美国纽约钱币商印行的目录显示，全新品相者索价6美元，约合当时中国的法币20圆，可购得黄金2钱。

III-6-01
民国21年“三鸟”银圆。设计原意是象征三民主义引领中国扬帆出航，如旭日升起，前途光辉灿烂。但因先前刚发生一·二八事变，币面原来象征国民党徽之日出与三鸟被附会为代表日军压境、敌机临头，甚至于把三鸟飞翔形容成东三省在九一八事变后“飞离”中国。民国21年“三鸟”银圆共生产了226万枚，除5万枚左右流入市面外，其余皆被熔毁

银两制度的终结者——船洋

民国22年船洋共生产了4 640万枚。1934年10月以后出厂的纪年改为民国23年，至1935年底，生产了约9 878万枚。在不足3年的时间里，总计生产了1亿4 744万枚。据当时担任财政部顾问委员职务的耿爱德表示，船洋币模全数由美国费城造币厂代制，平均该厂每月使用模具40套，初期每模寿命只有4万～6万枚，后来逐渐提升，总平均值每组冲压寿命为20.8万枚左右。以产量而言，每日工作10小时生产约21万枚。

船洋制作精美，整齐划一，生产标准甚高。因重量与成色必须精准才能确保“废两改元”最终成功，故每一枚币压印后均经称重、目视外观以及听音等环节，剔除次品，次品淘汰率约15%。船洋各版并无明显差异，耿氏将民国23年船洋分为一正四副：币边凸缘宽约1厘米者为正，窄缘者为副。另外，背面的“圆”字、水波、船锚及甲板等亦稍有不同，泉界以往多不重视。

III-6-02
民国22年船洋，改自民国21年“三鸟”银圆

虽然白银在中国货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世界潮流不是如此。到20世纪初时，西方主要国家皆已放弃贵金属本位币制，改革为管理通货的纸币本位币制，使白银从货币变成了商品，故银价逐渐滑落。因此1933年7月，各主要产银国和用银国为维持世界白银的产销秩序，在英国伦敦签署了《白银协定》。该年年底银价开始回升，而次年中旬美国为刺激国内景气，宣布白银国有化，导致全球银价大涨。于是，我国银圆大量外流，通货紧缩，出



现金融危机，且外汇存底大幅减少。

因此，1935 年（民国 24 年）11 月 4 日政府紧急实施法币政策，改行管理通货制。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3 家银行所发行的纸钞为法定货币，限时收兑市面流通的银圆，使银圆不再具有货币属性。次月，又规定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亦为法币。从此，银圆的生产也画上休止符。据估计，当时银圆流通额约 6.5 亿圆，实施法币政策后约收回 4 亿圆，并于 1936 年及 1937 年依先前与美国签定的协议，输出白银 2 亿多盎司，以换得外汇与担保贷款，这笔巨款对抗战初期的国内财政，有极大的帮助。



III-6-03
民国 23 年船洋。数量甚巨，1949 年金圆券崩盘后又续造一批

在银圆时代，中国物价堪称稳定，实施法币政策初期，亦算平顺。当时美金一元的官价约合法币三元四角，但后来随着抗战爆发，通货急剧膨胀，纸钞信用一落千丈。1949 年（民国 38 年），局势对国民政府更加不利，才发行的金圆券已贬值至骇人听闻的地步，民众对纸币毫无信心，当局被迫于 7 月初正式公告恢复银本位币制，并重新制发与民国 23 年船洋形式完全相同的银圆。当时除了上海中央造币厂生产以外，成都、重庆、广州、台北等地都曾生产。另外，当局亦向美国订购 3 000 万枚。总计上述各厂在 1949 年所造船洋约 4 500 万枚。云南当时也制作 176 万余枚。综观这一版开幕于上海，落幕在台北的孙中山像帆船银圆，生产总额接近 2 亿枚。



III-6-04
开工时的上海中央造币厂外景



III-6-05
熔炼处。根据熔炉容量按照银圆成色88%配料。初期以进口纯银条为原料，后来改用元宝



III-6-06
印花间。中央造币厂有压力160吨的主币印花机9台，供压造壹圆及半圆银币。压印时坯饼由送饼装置自动送至模圈中加工成型，单机产量每分钟105枚



III-6-07
听音验币。目视检查表面有残缺及花纹不清晰之次品，并以听声剔除币内因有气孔而造成的哑版，此处发现的废品约为1%，不良品约占成品的15%，大多数是重量不准



III-6-08
装箱待运。每5 000枚装一箱，法定误差 ±40克之内，若超出，则全箱退回熔化重造，故船洋信誉卓越

上海中央造币厂生产船洋的场景，摄于开制初期。资料来自前上海中央造币厂厂长陈行 1935 年刊印的《工作经过报告书》，陈行于 1935 年 1 月以中央银行副总裁身份兼任厂长，1937 年 4 月辞职，职位由席德柄接任。

未发行的民国 24 年船洋

1935 年实施法币政策时，民国 24 年帆船银圆的模具早已备妥，与先前各年所出不同的是有“中圆”此一面额，并制成样币若干，材质银、铜均有。由于当时银价波动剧烈，亦规划过小型版式，但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没有收录。无论何种面额，大小两种版式均非常稀少。



民国 25 年船洋

民国 25 年船洋的图案与普通船洋无二，规格同薄片型，一圆直径为 32 毫米，成色 72%，重 13.5 克，为美国费城造币厂试制样币。有些书籍记载“帆船版”为旧金山造币厂生产，然而旧金山厂所出者为重 20 克、直径 35 毫米的民国 26 年布图下 S 版，此说不正确。

美国的造币总厂是费城造币厂，模具的设计与雕刻由其负责，原模（master die）制成后再复制二元模（hub）交各分厂如旧金山造币厂、丹佛造币厂等转制工作模（working die），加上厂记后生产钱币，发行流通。中美间委托币模的制作时均交由费城造币厂负责，分厂无雕刻师。

III-6-09
民国 24 年帆船中圆，样币

III-6-10
民国 24 年帆船壹圆银币铜样（小型），直径 32 毫米。此枚出现于 2007 年嘉德秋拍，解说中注明是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中编号 634 之币，经核对，实为编号 632Z 之币

III-6-11
民国 25 年帆船壹圆与中圆



有安全齿边的民国 25 年小型船洋

民国 25 年船洋本已属稀见，然而还有一种齿边带有凹槽的版式，更为罕见。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记载，1936 年 7 月 9 日中央银行副总裁送交美国驻上海财务专员尼可森（M. R. Nicholson）缩小版新制银圆 4 种形式，规格如下。

一圆重 13.348 55 克，直径 31.75 毫米；中圆重 6.674 275 克，直径 25.4 毫米。成色均减为 72%，一圆币以银价的外溢点（shipping point）为每盎司 1.05 美元作基准，中圆则是 1.01 美元，基准点差异的原因不明。厚片型中圆有两种，皆重 9.0 克，直径略有不同，分别是 25.4 毫米及 27 毫米，其银价的外溢点则为每盎司 0.75 美元。书中说明，此 4 种银圆因币坯过薄，均不适用安全齿边。但因耿氏未见过实物，故无法确定其设计为布图或帆船。依照耿谱其厚度应为 1.32 毫米，比目前使用的人民币五角硬币（约 1.60 毫米）还薄，如此之厚度上再加入安全齿边，其制作确有困难。即使是厚片的两款中圆，也不过是 1.78 毫米及 1.57 毫米，比目前使用的人民币一元硬币（约 1.85 毫米）都薄。



III-6-12
有安全齿边的民国 25 年小型船洋。中国 2006 年 6 月北京诚轩春拍出品编号 1656 之民国 25 年帆船安全齿边银圆，成交总价人民币 22 万元。目前存世仅知 2 枚，这枚原先为英国收藏家 W.von Halle 所有，出现于 1966 年 11 月伦敦 Glendining 公司举行的拍卖会，后落入美国收藏家古德曼之箧，1991 年 6 月加州拍卖会以 1 980 美元成交，同场另一枚的成交价则是 1 540 美元。过去的诸图录均无凹槽齿边的照片，仅有文字描述，甚为遗憾，此附加的特写图，补充了记载之不足

据美国钱币专家史博禄的研究，这种带有凹槽边的民国 25 年船洋，是上海中央造币厂用英国提供的坯饼制作的。英国政府早在白银危机后的 1935 年 9 月即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赴华协助币制改革事宜，提出建议之一就是仿效英镑在 1920 年将银币成色由 92.5% 减至 50% 时所用的办法，新发行的低色银币采用不同的边道以资区别。同时还送交坯饼供国内试制，此即这种有凹槽边银圆的由来。由于当时美英在争夺国际金融的主导地位，都希望其本国货币成为中国外汇储备的结算货币，因此当美方知道后极力反对，故这一计划没有继续进行，仅制作了极少量的样币。

孙中山像布图银圆 7

1934 年 6 月美国的白银国有化政策，导致全球银价由前一年的均价每盎司 0.43 美元大涨至 0.54 美元，使我国银圆大量外流，通货紧缩，外汇减少，引发金融危机，因此改行管理通货制的法币制度，废除了银本位币制，经发了船洋的停产。国际银价稍后回落，由 1935 年的均价每盎司 0.58 美元降至 1936 年的 0.45 美元。在谋划纸钞取代银本位币的同时，政府也对现行的银圆策划着减色、减重的方案。

民国 25 年孙像布图银圆

1936 年（民国 25 年）5 月，中美两国从各自利益出发，签订了《中美货币协议》。中方售银换取外汇及美方贷款，充作法币准备金之用；美国向华购银稳定白银市场价格，另外，要求中国仍使用银圆并由美方造币厂代为制作，同时放宽用银限制以支撑白银持续的需求，美方主要目的是以此“护盘”手法获得其国内白银派议员在政治上的支持。根据此约，中方向美方订购一圆及半圆银币各 500 万枚，合计 750 万圆。从 1936 年 6 月到 1937 年 1 月止，中方售予美方白银共计 7 000 万盎司，售价为每盎司 0.45 美元，后来又陆续出售 2 亿多盎司。依据美官方资料，1938 年旧金山造币厂曾依约生产重 20 克的一圆及重 10 克、成色皆为 72% 的半圆一批。因抗战未交运即遭销毁，仅极少数样品流出，此批量生产但未发行的银圆即民国 26 年布图下 S 版，“S”乃旧金山造币厂厂记。



III-7-01
民国 25 年孙像布图壹圆

由于国人用银已久，故实施法币政策之初，为避免人心浮动，中央银行尚无意完全禁用银圆，计划以缩小尺寸、减轻重量及降低成色来防止私毁，偷运出口。此举一方面出于配合美方应付国内政客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预作准备金以防推动纸币取代银币期间遭受阻力时的不时之需。然而，此计划受中美货币谈判的影响而搁置，随着法币政策的成功、金融情况的好转及抗战爆发，政府乃顺势全面停用银圆，将白银出售换取资金充实国库以应付战时经济。笔者认为当时时局动荡，银价剧烈波动，中国深受其害，法币政策使银价与汇价脱离关系，若银圆恢复流通反而妨碍法币的推行。此为未雨绸缪及求得稳定之计，中美两国各取所需，笔者并不认同若干学者谓此举全为虚晃一枪的说法。

这段时期所规划的减重降色银圆，正面均为孙中山侧面肖像，有民国 25 年及民国 26 年两种年份；背面为古布图或帆船，部分版式亦曾以铜、镍等材质试打，民国 25 年布图银圆以大小、厚薄与重量的不同，可分出以下若干版式。



III-7-02
民国25年孙像布图壹圆银币黄铜样。美国费城造币厂造



III-7-03
民国25年孙像布图壹圆银币镍样。美国费城造币厂造

民国25年布图银圆之一：较标准船洋小，一圆直径为35毫米，成色72%，重20克；中圆直径为27毫米，成色72%，重10克，面背外圈有云雷纹装饰。前上海中央造币厂的模具皆委托美国费城造币厂制作，系试制的样币。改成古布图案的目的是财政部计划发行减重、降色银圆时用来与标准船洋区分的。

民国25年布图银圆之二：尺寸小、重量同，一圆直径为32毫米，成色72%，重20克；中圆直径为25.5毫米，成色72%，重10克。美国费城造币厂试制的样币，又称“厚片”。

民国25年布图银圆之三：其规格较上述更小，一圆直径为32毫米，成色72%，重13.5克，重量为标准船洋的一半；中圆直径为25.5毫米，成色72%，重约6克，各自比50美分银币及25美分银币的尺寸稍大而含银量更低。在银圆时代，国币与美元的兑换率为2：1，此举可使币材含银价值合理化，对我方有利。美国费城造币厂试制的样币，又称“薄片”。

民国26年孙像布图银圆

民国26年布图银圆背面下S版，一圆直径为35毫米，成色72%，重20克；中圆直径为27毫米，成色72%，重10克，此即当年向美方订购、由旧金山造币厂于1938年大量生产者（一圆324万枚，中圆648万枚）。抗战胜利后的次年，美方曾将一圆及中圆若干枚各装一箱，运交上海中央银行。当时战事方殷，故到达后中方未及时处理，可能有极少数流出。根据耿爱德了解，1947年首次在上海发现，由于极罕见，被误以为样币。由于战乱之故，这两箱银圆之后的下落无人知晓，其余仍存放在美国的部分于1953年运台入库保管，但处理情况不明，可能被悉数销毁。由此事例可了解，制作数量的多寡并不重要，关键是存世量有多少。此版产量虽巨，但所知存世量远低于民国25年各版孙像样币，因系未发行币，珍罕程度不言而喻。

III-7-04
民国26年孙像布图壹圆背面下S版。美国旧金山造币厂造

III-7-05
民国26年孙像布图中圆背面下S版。美国旧金山造币厂造



肆



民国银圆

地方篇

1 四川省造银圆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四川革命党人首先在重庆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并以“汉”字旗为义军标志。经过几番争战与协商，四川在次年归于一统，军政府接收了原度支部成都造币分厂，改名为四川造币厂。1912 年（民国元年）4 月开始以军政府名义发行形式与众不同的新币，正面铭文“四川银币”，背面中央有一大圈，内刻篆书“汉”字，圈外环绕 18 颗圆星，代表 18 行省。这就是所谓的“四川汉字大洋”，或称“大汉银币”。

军政府造“汉字四川银币”

“汉”字银圆是由成都造币厂开始制作生产的，正面中心刻有花饰，据称是芙蓉，以代表产地别号芙蓉城的成都，相传后蜀皇帝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花，成都因而得此雅称。

“汉”字大洋的重量不是标准库平，而是采用四川通用的九七平，只相当于库平七钱一分。这种既减重又减色的银圆，版式极其杂乱。上海外商银行于 1911 年时，委托南京造币厂化验该年所造的银圆，其含银量为 86.4%，而非先前的 90%。

四川币制混乱的原因

民国初年，由于袁世凯心怀不轨，造成了南北的分裂。那时，以北洋军阀为首的北京政府与孙中山组织的广州政府，形成了“一国两府”的对抗局面。四川因地理位置特殊，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而四川军阀则采取两面光的骑墙姿态；在各方无力顾及的情况下，四川有如独立王国。

四川军阀彼此争夺地盘，互不相让。1918 年熊克武在互斗中获胜，出任督军，但因兵力有限，无法控制局势，干脆在次年发布《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承认各自割据的事实，明令“就地筹款”。1922 年，军阀刘成勋击败杨森，出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为谋取私利，提高了五角辅币的生产比例。前清造币厂章程中有“辅币数量暂限定二成、成色为七”的规范。杨森在 1924 年打回四川，进驻成都并任军务都督后，为实现“统一全川”的野心筹措军费，更下令停造一圆主币，而专造五角辅币；此为“厂版”五角取代大银圆的滥觞，而后来的其他各地军阀所仿制者通称为“杂版”。当时只要有机器、工匠，大小军阀都可任意设厂造币，后来还开设了银行钱庄，大印纸钞债券，此乃四川币制混乱的原因。

1924年周西成被杨森逐出四川，撤退时将成都造币厂设备带走，并在赤水制造银圆，人称“周造汉字大洋”。次年杨森部属向成杰在合川开工造币，人称“向造汉字大洋”。成都造币厂在1927年恢复生产一圆主币，称“新汉字大洋”，把以前的称为“旧汉字大洋”。市面情况极度混乱，成都造币厂门口遭群众张贴“造毙厂”的大字报，更有人把这些滥发的通货称为“祸毙”。其所造新币系以旧有流通成色较高的一圆及五角熔毁改铸，面额仍与旧币相等，成色则减为三至四成。此币在川省按折扣行用，外省难以通用。最后因民怨沸腾，且“杂版”市价低落，私铸已无利可图，军阀只好收敛，明令各部关厂。1928年底时，“杂版”逐渐停造，但市面充斥数量仍然庞大，仅成都一地就有3 000万圆之多。次年市价“‘厂版’一圆值大洋四角，‘杂版’一圆值大洋两角”，实际价值已跌落至其材料价值以下；至此，“厂版”、“杂版”不禁自停。

民初在四川流通的银圆，除川版龙洋、“汉”字大洋外，前清的江南、湖北等地银圆以及北洋、“宣三”银圆与“袁大头”等皆全省通用；本洋、鹰洋及广东、安徽等地银圆则可在重庆使用。其他如云南龙洋、“杂版”川洋等须视各县情况折价使用。后来的“孙小头”与船洋，亦通行全川。

“大汉银币”的生产时间与数量

“汉”字大洋壹圆银币于1912年4月由成都造币厂开始生产，1924年至1927年间停产，1928年恢复生产，但次年起以生产五角为主，1933年上海中央造币厂开制，该厂改为中央造币厂成都分厂后，便停产银圆。耿爱德的资料上成都厂这段时间内共生产了6 207万枚，但他特别声明此数据未必完整。《世界硬币目录》记载则为5 567万枚，这在耿氏数据中只是1912—1923年旧版“汉”字大洋的产量（差额即新版“汉”字大洋）。重庆造币厂制作时间较迟，详情不明，有说是1919年重庆铜元局应商会委托代造“汉”字大洋，首批生产了100万枚。

1926年后，续造多批，每次数万至数十万枚。因各地军阀设厂滥造，故川版“汉”字大洋可能有七八千万枚；亦有人推测总额应接近1亿枚。不论实际数据如何，它在中国银圆产量的排名里，应列于“袁大头”、“孙小头”、船洋之后，居第四位。

至于“汉”字银辅币的产量，根据资料中的统计，五角约3 955万枚、二角约9.6万枚、一角约37万枚；以产量论，二角小洋最少。

IV-1-01
“汉”字大洋壹圆

IV-1-02
“汉”字大洋壹圆，“民”字多一点





IV-1-03
“汉”字五角

IV-1-04
“汉”字二角

IV-1-05
“汉”字一角

“点金版”与“佛手花”

“汉”字大洋的版式非常多，试举其中一圆及五角名誉品各一种。“点金版”的主要特征是“四川银币”四字中“银”字的部首金的两点与王字不连接，细分尚有“中华民国元年”的“民”字多一点及“元”字底下两笔分开等多种小版。“佛手花”是指五角的芙蓉花有如“果中仙品、世上奇卉”的佛手，此昵称十分传神。一般认为，两者均由重庆厂所造的可能性最大，都是稀少品种，后者尤其罕见。



IV-1-06
点金版“汉”字大洋名版，主要特征是“四川银币”四字中“银”字的部首金的两点与王字不连接



IV-1-07
“点金版”的“民”字多一点



IV-1-08
“汉”字五角“佛手花”

北伐前成都近郊有多少造币厂

大清王朝的骤然崩溃，使原本地方自行其是造币的情况更趋严重。民国成立后的南北对立愈加造成局面的恶化，铜元研究大师伍德华在《中国当十铜元》四川铜元篇内引用 1928 年 1 月 7 日上海发行的《中国经济周刊》（*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报道：“军队所驻之处皆私设造币厂，特别是在省城附近；成都近郊地区私设造币厂的数目超过 80 座，偏远地方的非法造币厂更不计其数，……良币都被私设造币厂搜集改铸以牟利。”另耿爱德著《中国货币论》（蔡受百译，1933 年第一版）第 424 页：“川省之军人，为军费不足，乃谋自行设厂铸币，以铸余移充军费。所需之铸币机器，则由该省铁厂及工科学校担任制造。该厂成立后，果进行顺利，于是军界争相效尤。一时此类非法之造币厂，几遍布于各重要军事地点，至民国 16 年时，仅成都左近即有 80 处。铸币所需现银，系以流通之一圆（法定成色 890‰）及半圆（法定成色 700‰）熔毁改铸。新币之币面价值，仍与旧币相等，成色则减为三至四成。此币在川省按八折或八折以下行用，外省即难以通用。民国 16 年底时，该省当局禁止续铸此类劣币，将各厂机器没收，并拟禁止其流通。”

由此可知，四川省不仅前清龙洋版式繁多，到了民国时期，所造的汉字银圆“花色甚繁，且与别省所铸者花纹迥不相同，成色亦低劣”，可见川军竞相设厂滥造钱币，导致形式及成色不一的情况在通行银圆的时代早已恶名传遍全国，只是事过境迁今人不知而已。有些藏友以为这是同厂所出的不同版别，其实是不同地方生产的，着实无法理清厂别的头绪。



IV-1-09
成都“四川造币厂”。建于 1896 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成都造币厂，位置在今锦江区镗钯街道四川省委机关印刷厂。原本在入口牌楼处有蟠龙图案及民国后改名之“四川造币厂”字样，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98 年该区域开发房地产时将此牌楼拆除。从这张取自网络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出牌楼上的“四川造币厂”书法与大汉银币铭文一致，尤其“造”字如出一辙

2 新疆省造银圆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各省接连响应，大清帝国覆灭。随着改朝换代，新疆钱币上的纪年也改为民国纪年。发行银圆的只有迪化及喀什两地，与前清的五花八门大不相同，这可能与中央的协饷不再拨交有关。

新疆省造民国壬子双旗银圆



IV-2-01
中华民国元年饷银一两二排花。迪化（今乌鲁木齐）造，新疆的流通银圆中，唯一未刻维文者，按背面的不同可分两种版式



IV-2-02
中华民国元年饷银一两四排花

迪化银圆局在民国元年造有正面为“中华民国元年饷银一两”，背面为双旗图案、“壬子”纪年的银圆。此币是新疆的流通银圆中，唯一未列维吾尔文的。民国6年时又发行正面为“中华民国六年壹两迪化银圆局造”，背面为嘉禾图案的银圆。此币加上维文，正面为“银圆”、背面为“乌鲁木齐一两”；次年续造，仅将年号改成“民国七年”。

壬子饷银一两的特殊之处除了无维文外，是新疆唯一兼用阴阳历的银圆。背面双旗图案是竖条，与标准五色旗的横条不符，可能是传达至塞外的信息有误所致；机器压力不足，花纹不明显，甚至有局部模糊现象。存世有一两及五钱两种面额，民国6年版及7年版只有一两。

喀什在民国元年至民国5年间造有正面为“中华民国新疆喀造饷银五钱”，背面为双旗图案、维吾尔文的银圆。维文上方意为“中华民国”，下方意为“饷银五钱”；交叉的双旗，也是不合规范的竖条。此币只有五钱一种面额，以正面左右的图饰为五星、花饰或花朵，可分多种版式。

IV-2-03
中华民国元年饷银五钱二排花、四排花





IV-2-04
中华民国 6 年迪化银圆局造壹两



IV-2-05
中华民国 7 年迪化银圆局造壹两



IV-2-06
中华民国新疆喀造饷银五钱。背面双旗、回历 AH1330（1912 年）



IV-2-07
喀造饷银五钱左右花饰不同，版式杂多

“新疆省造币厂铸”银圆

新疆因其特殊环境，始终非中央政府能完全掌控，1946 年（民国 35 年）时，中央银行在迪化、哈密两所分行发行新疆省流通券，以收回地方钞币发行权，达到统一货币发行之目的，未料仅仅 3 个月便因故停摆。于是特准新疆商业银行在财政部派员监督下续发省钞，同时由该行向央行缴纳黄金 5 万两，作为发行准备金。这批黄金经迪化分行点收后，先运至兰州再转到上海，由中央银行总行集中保管；另一方面，当时亦交央行美金 40 余万元，委托购买进口工业用机器设备。后解放战争的战火扩大，这些机具未能运交。

到 1949 年（民国 38 年），局势对国民政府当局更加不利，前一年 8 月才开始发行的金圆券已贬值至骇人听闻的地步，其与银圆的比价，黑市价最低时竟暴跌至面额的二十亿分之一！新疆商业银行于 1946 年时发行的纸币，面额最高者不过 500 圆，次年最高面额为 2 000 万圆；1948 年时，已暴增为 5 亿圆面额，次年改组为新疆省银行，起初发行 100 万圆、300 万圆及 600 万圆 3 种面额纸币，后改以千万圆为单位，最后甚至发行了 3 亿圆、6 亿圆、30 亿圆、60 亿圆超高面额的纸币。

此系新疆省银行在金圆券发行之初，未实施币制改革所引发的结果，按理来说，其应比照金圆券发行新钞，结果竟以已经作废的法币与该省钞的原定比率，按照金圆券收回法币的标准发行新钞，故新发行的省钞一开始便远远低于金圆券价值。由于全国民众已对纸币毫无信心，中央政府被迫于 7 月初正式公告恢复银本位币制，并重新制造发行与民国 23 年版船洋形式相同的银圆。

在公告恢复银本位币制前，青岛市已于 5 月 14 日请求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发行银圆辅币券。5 月 20 日，哈密分行致电已由上海搬迁至广州的中央银行总行，报告新疆即日起实施币制改革，恢复银本位，并自行筹制一圆银币，规格为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 90%。7 月 1 日规定以银币每圆收回原新省纸币 6 000 亿圆。（金圆券为 5 亿圆兑换银币一圆）

此币正面中央镌直列“壹圆”二字，嘉禾环于两侧，外环上刻“新疆省造币厂铸”，下书“民国卅八年”；背面中间有阿拉伯数字“1”，圈内有维吾尔文，读音 dollar，为“圆”之意，外圈上为维吾尔文，意为新疆省造币厂铸，下为公历纪年“1949”。维文读法由右向左。

新疆自实施币制改革后，因库存白银有限，时任省主席的鲍尔汉曾向中央银行总裁徐可亭请求收回原先缴纳的发行准备金。但因形势紧急，中央财源困难，无力归还。到 9 月底间，新疆易帜，这笔帐就结不成了。

新疆的造币设备向落人后，造币工艺也欠精湛。以往所出各种钱币，质量粗糙且版式复杂，向居中国钱币之冠，这次也不例外，若要谈到品相分级，更是令人头疼。据哈密分行 1949 年 6 月的报告，当时所称重的银圆，重量在库平七钱五厘到库平六钱八分之间，成色尚达标准，部分还超过。后因需求量大，在银根吃紧之下，开始减色生产，故总体而言，成色极不均匀。若简单地加以区分，此种银圆差别明显，其稀少的版式为：空心壹圆版，分“方足 1”及“尖足 1”；“方足 1”版，有大、小花之分；童体字

版，此版字体笔画特殊，如习字幼儿所书得名，亦有数种；“一九四九年”版，改民国年号为公元纪年。其他依字体粗细、大小、“壹”、“民”、“国”、“八”等字写法各有所区别，如要细分就得费点工夫，不下数十种。

此种银圆发行之初，新疆当局严禁携出省境，流入中原极少。中国近代机制币权威耿爱德认定为样币，评价甚高。因此早期泉界视为梦寐以求的珍品，耿氏《中国币图说汇考》及旧版《世界硬币目录》上估价达 500 ~ 600 美元。早先在外地及海外市场索价甚高，等到改革开放后老钱币“巨量喷出”，新疆钱行情顿时崩盘，由红转黑，价格少了个零，许多钱币商“吃金吃银变吃铁”。这般如云霄飞车的场景，大概已成绝响，未来难以再看见。



IV-2-08
“卅八年新疆省造币厂铸壹圆”。中华民国年号的末代银圆，新疆钱币发行史上唯一以“圆”为单位的银币，1949 年 5 月底开始生产



IV-2-09
“空心壹圆”版，方足 1

IV-2-10
“一九四九年”版，民国年号改为公元纪年，系 1949 年 9 月底以后的产品

3 云南省造银圆

武昌起义后，云南成立军都督府响应革命，为安定市面及解决财务问题于1912年（民国元年）2月成立官办富滇银行，除专营存放、抵押、汇兑业务外，兼发行纸钞与银圆，代表省政府执行地方金融政策。军政府也在云南光复后接管造币分厂，停产一圆主币，而专事生产后来称为“半开”的五角辅币。

“新云南”银圆

由《昆明市志》记载的“细字细龙”来看，云南在民国成立后所造银圆，即泉界所称的“新云南”。云南造币厂的统计显示，截至1935年（民国24年）6月，共计生产银币“一圆”212 302枚、“五角”88 530 025枚、“二角”207 321 285枚、“一角”3 986 444枚，总额约3.5亿枚。但这只是该厂“自铸自发”的数字，不包括代富滇银行及商号委托搭造的部分，故并不完全，仅能作为银圆数量的参考。

云南“唐继尧像拥护共和纪念”三钱六分

在这产量巨大的“五角”银币中，估计数量最多的是“新云南”，而较少的是有唐继尧肖像的“拥护共和纪念”三钱六分银圆。这俗称“唐像”的银圆又分侧像与正像两大版式，由1918年（民国7年）10月22日省财政厅送银圆模型至云南商务总会函的“前奉令铸造本省纪念银币，业经遵办并呈报在案。惟查前次模型未臻完美，不便赓续多铸”及币面铭文的职务“军务院抚军长”来看，侧像币应是最初发行的，制作于1916年（民国5年），理由是云南为讨伐袁世凯称帝而设立的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于1916年5月8日，同年7月14日撤销，而档案中记载的“民国五年，发行纪念护国当五十文之黄色唐像大铜币，因质量较佳，均被奸商销毁……”亦可为佐证；正像币则是民国7年奉督军省长公署训令发行的，按原函的“铸造二十万圆，由富滇银行发行”应是40万枚；但也有数据说共生产了200万枚，成色与“老云南”半圆相同。或许是海关报告中记载“去年银圆不敷应用”之故，云南造币厂历年统计报表上此年共造“五角”1 533万枚，较前一年高出四成，但说明栏内未批注是否包括“纪念银币”。

IV-3-01
唐继尧肖像



富滇银行是地方政府的省立银行，被当政者视为军费浩繁时的筹款工具，因滥发纸币最终不能兑现，导致信用破产无法维持而业务停顿。1932年（民国21年）6月奉命歇业，由富滇新银行接办，管理地方金融，发行



IV-3-02
唐侧面像“拥护共和纪念”三钱六分。1916年（民国5年）造，较少

IV-3-03
唐正面像“拥护共和纪念”三钱六分。1918年（民国7年）造，数量甚多，因由富滇银行发行，其产量未列入云南造币厂历年统计表中

新币。据节录自富滇新银行库藏部《云南货币汇编》数据，唐像“五角”的含银量在82%以上。

唐侧像与正像银圆制作时间的先后，过去看法较为分歧，现在基本上都认同“唐侧”先、“唐正”后。在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中，以伍德华在1921年6月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 *The New China Review* 中的 *Tang Chi-Yao Coins* 一文最早讨论唐像币。其结论是：侧像币是先发行的版本，流通时间很短就被正面像取代，可能是督军（唐继尧）不满意之故，其内容与上述档案吻合。住在上海的伍德华还说，一位重庆的记者与一位成都的访客告诉他，唐像银圆在四川流通甚广，比当地造币厂出的还多。可见生产时间颇长、数量颇多，绝非原函中的区区20万圆而已。

云南双旗半圆与二角

富滇银行营运期间委托云南造币厂制发的半圆银币，先后达7 000余万圆，也就是说约有1.5亿枚之多；而商号委托搭造者亦巨，早已无数字可查。其成色原延续前清及民初条例的86%，但民国9年省政府指示在暗中减至50%，据称是“商务总会秘密请求，以杜法商吸收之弊”。

由云南造币厂的统计表及报告来看，民国9年至民国19年并未生产半圆银币，因此这些低色五角，显然都是代商搭造的所谓“俗称细龙，市上又细分为秃爪、二珠、三珠、二板、三板、钢板、铜板”等新云南银圆，含银量在40%～41%。而富滇银行在关张后，由富滇新银行于民国21年7月1日接管开办，管理地方金融，发行新兑换券纸币。

或许是要整顿金融或其他原因，这一年云南造币厂重新雕刻以双旗为图案，钤有“民国二十一年”及“库平三钱六分半圆银币”字样的新币，另有图案设计相同的二角银毫。据资料记载，半圆双旗的成色为39%～40%，二角双旗则为37%；《富滇新银行档案》记载，半圆含银



IV-3-04
双旗“半圆银币”

IV-3-05
双旗“贰角银币”

50%，二角含银 45%。该行与云南造币厂约定“行方送交生银，厂方送交成币”，若云南造币厂统计表包括全部生产数据，则五角产量至民国 23 年 1 月止为 23 044 870 枚、二角为 2 984 050 枚。

胜利纪念堂二角

抗战胜利后，由于之前连年兵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景气呆滞，通货膨胀，法币发行额在八年抗战中暴增 400 倍，与黄金及美元之比价贬值的速度更是以千百倍计。百废待兴的局势被人谋不臧以及接踵而来的内战搞得支离破碎，纸币已难以流通。

在各地纷纷使用银圆的情况下，云南省也不例外。但废除银本位已超过 10 年，很多被改制成饰物或熔化销毁，此时所留下的旧银圆根本不敷市面流通之需，民国 38 年（1949 年）5 月经省府会议决定，利用云南造币厂旧址成立“银币铸造所”，雇工购料及整理厂房修配机器，在 7 月开制，至次年 1 月止，共造银币 5 642 997 枚，以孙像船洋、“袁大头”及云南半圆为主，其中 1 226 890 枚为以昆明市抗战胜利纪念堂为图案的二角银毫，习称“胜利堂”或“大会堂”。其产量虽有具体数字，但成色不详，推测应不会比旧二角银毫高。



IV-3-06
“大会堂”（或称“胜利堂”）二角银毫

湖南省造银圆 4

虽然湖南省在清代开局制造银圆一事上并不顺利，但在进入 20 世纪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因市面制钱缺乏，转而生产铜元，直到 4 年后因朝廷整顿而关闭。辛亥革命后，湖南局便又立即重新启用，大量鼓造十文及二十文铜元。因此湘省在必要时，可利用造币厂现成的设备改制大小银圆。

币面铭文洪宪纪元的银圆只有一种，而且是在地方发行，并非由天津造币厂筹备。财政部只规划了小飞龙十圆金币而无通行的一圆银币，很难令局外人理解。袁世凯洪宪称帝时，长沙造币厂曾制作一批“洪宪元年中华银币”一角纪念币，随着袁撤销帝制即被收回销毁。



IV-4-01
湖南“洪宪元年”壹角。洪宪纪元的银圆，仅此一种

湖南“洪宪元年中华银币开国纪念”壹角

前天津造币厂高管李伯琦留下的有关记载对局外人了解当时的情况十分有帮助：“洪宪一角开国纪念币，民国五年广东造币厂铸（按：原文误，是湖南造），大小成色重量，与一角通行角洋同，面中华帝国四字拱列（按：原文误，为中华银币四字，左右有湖南二字），上洪宪纪元四字（按：原文误，为洪宪元年四字，下另有开国纪念四字），背即宣统三年一角之旧模，一屈尾行龙，左向，尾绕壹角二字，此币是厂自铸，未奉令亦未呈报，不特收藏家多未见，且多未知，盖数极少，广东旋独立（按：原文误，应是湖南），已铸者，亦追回销毁也。”

意大利驻华外交官罗斯于 1917 年发表的文章记述，此币曾有一批以铜制成者在长沙的银钱兑换店出现，旋即消失无踪。出示此一角纪念银币的造币厂官员告诉他只制作了少数的银角，多半已回炉销毁，没有流出厂外。

IV-4-02
“湖南省宪成立纪念”壹圆



“湖南省宪成立纪念”壹圆

民国 9 年底，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控制了湖南的局势，并召开湖南省议会，积极倡议联省自治。次年 4 月赵由省议会选为省长。民国 11 年（1922 年）1 月 1 日赵公布“湖南省宪法”，推动联省自治，发行了“湖南省宪成立纪念”壹圆。此币设计与其他不同，正面左右两侧分列面额“壹圆”字样，而非置于中间，嘉禾图案内为三横，有说此乃八卦中代表吉祥的“乾卦”，也有说为“十一年一月一日”之意，笔者倾向于“乾卦”说。产量不详，由所见者的品相多数良好来看，未真正流通。此外，十文及二十文的省宪成立纪念铜元亦有发行，但存世数量不多。

5 贵州省造银圆

贵州在清代未设造币厂，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极其有限，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互争地盘。重庆铜元局即在内乱中多次遭掠夺，部分设备被时任四川讨贼军第3师师长周西成搬到贵州与四川交界的赤水，成立赤水兵工厂，同时仿制“四川大汉银币”及“孙小头”，俗称“赤造”银圆。

全球知名度最高的中国银圆——汽车币

1926年6月，当周西成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并兼第25军军长后，为改善财务、整理金融，即下令搬迁机具于贵阳城外南郊，设立了贵阳造币厂，继续制作汉字川洋。而在1925年间，贵州发生干旱导致饥荒与斑疹伤寒的流行，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乃拨款救济。但当时贵州并无铁路、公路，交通完全依靠步行，赈灾工作不能有效地推动。次年周西成乃要求义赈会派遣工程师托德（Oliver Todd）协助该省开辟可供汽车行驶的公路。在规划与指导结束后，由一位曾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受训过的王姓中国工程师负责实施，然后托德就转往其他省份继续别的任务。1928年（民国17年），一条以贵阳为中心，西起安顺北至桐梓的省道正式竣工，为表彰贵州首建公路，周

IV-5-01
“汽车币”，国际闻名的 Auto Dollar

IV-5-02
“三根草”版，少见



西成命造币厂制作银圆5万枚以资纪念。据中国人民银行贵州分行所编《鉴别金银技术资料》(1973)记载，汽车币重25.63克，成色79%。

此币正面中央为团花，环列“贵州银币”，外圈上为“中华民国十七年”，下为“壹圆”；背面中央一辆汽车置放于草坪之上，外圈上书“贵州省政府造”，下列“七钱二分”。此币俗称“汽车币”，乃世界上唯一以汽车为图案的流通银币，因此在国际上知名度极高。尤其在号称汽车王国的美国，即使不收藏钱币而喜爱车辆的玩家，也会将其纳而藏之，何况是热衷集币的藏家了。

另值得一提的是，币面草坪中隐约地以线条勾划出“西成”二字。按惯例，在钞票或钱币上镌刻的暗记，多为雕刻师名号，未曾有以下令制造者为名之例。据说此举遭人非议，也有若干传言。美国《纽约前锋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于1933年（民国22年）12月曾刊载："贵州省政府主席周西成之死归咎于迷信。"新闻报道中表示，“这位致力公路建设、拓宽贵阳街道并发行‘汽车银圆’的省主席，在1929年企图平定军队动乱时，因所搭乘汽车超越自己部队太远，遭对手包围被杀身亡。而当地的卜卦者认为，周西成在下令制作这枚汽车币时，就注定要死于非命，且必定与汽车有关。传说，当初周西成本想仿效袁世凯与孙中山，把自己的肖像摆在钱币上，但于法无据，故退而求其次，改在币面中藏暗记。算命的说，这犯下大忌，必遭天谴；而名字在车轮下，更代表要横死于汽车相关事故。这位省主席之死，对贵州省而言，是一件憾事，因为他正在推动兴建两条可供卡车通行之公路。”

“汽车币”尺寸与“袁大头”相当，可按字体以及车头、车门、车轮、草地等图案的差异，分出多种版别。由于制作数量不多且为行用币，品相佳者极罕见。周西成死后不久，汽车银圆在市面上就绝迹了。





IV-5-03
草坪上的“西成”暗记



IV-5-04
汽车币多数是“两根草”版，“三根草”版很少

周西成的汽车

托德于1927年（民国16年）8月返回贵阳时，非常惊讶，因为省长周西成身着白色军服，配戴镶金指挥刀，非但率领官兵万名在军乐队演奏下于市郊迎接，还开了一辆美国七人座轿车！而贵州在一年前连手推车也不曾见过，当时亦无可通外地的公路。原来是周西成省长在得知托德将再度光临后，立刻向广州方面订购车辆，并将汽车拆卸后以人力搬运至贵阳的，路上费时达两个月，最后在托德抵达3天前才刚刚送到。也就是说，从零件组装到试车在3天内全部完成。

周西成的这辆汽车是什么牌子的呢？托德在回忆录中只说是美国制



IV-5-05
照片中着中式服饰的即周西成，驾驶座上的是美籍工程师托德，右方穿西装的是华籍工程师，其旁戴帽的是托德夫人。此照片是公路开通典礼上所摄。贵州原无可供汽车行驶的公路，故此车是于广州购得后，将其分拆以人力运至贵阳再组装而成的

的七人座轿车，而所附照片则是没有车窗的敞篷车，形式与币面上的汽车每边有车窗三片完全不同。经美国钱币学者请老爷车专家比对后，确认是1925年生产的哈德生（Hudson）牌软顶汽车，根据资料显示，该厂牌车在20世纪20年代时曾大量销售至远东地区。但从时间上来看，可能周省长购买的是一辆二手货汽车而不自知。后来周西成在1928年又订购了16辆汽车，结果如何并不清楚。

[周西成小传]

周西成（1893—1929），名世杰，字西成，贵州桐梓人。1913年（民国2年）入贵州讲武学堂，同时加入国民党。1923年，四川与贵州两地军阀争战时，任川东边防军第2师师长，于7月、8月、9月3次攻击重庆及铜元局，威胁杨森等部后方，因而名声鹊起；11月，由广州大本营任命为四川讨贼军第3师师长。次月，杨森夺回重庆，周率部退回黔境，驻守赤水一带。1926年1月，北京政府任命周西成兼暂编陆军第11师师长（中央番号），4月入黔，6月宣誓就任省长，正式主政贵州，旋兼任国民革命军第25军军长。1929年（民国18年）5月，因派系争夺，叛将李晓炎与云南龙云之滇军攻黔，周率部迎战，在黔西关索岭被敌抄袭，中弹负伤落水而亡，时年37岁。

[托德小传]

托德（Oliver J. Todd，1899—1973）此人颇具传奇色彩，其先祖在17世纪移民美国。获密歇根大学工程学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托德加入法国陆军担任工兵上尉。战后于1919年来华，协助大运河山东省部分的河川整治工作，1921年加入美国红十字会在山东的饥荒赈灾行动，1923年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成立时受聘为总工程师，曾修筑黄河堤防，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返美，惜该坝于战争期间为延缓日军攻势遭炸毁。日本投降后再度来华，以联合国资助经费进行黄河堤防修缮工程，在内战夹缝间仍聚集民工20万人，于1947年完成任务。托德在华前后23年，其间勘探长城以南的14行省，修建了4 000公里的道路，完成了堤防、隧道等土木工程。他还熟识各地军阀，包括吴佩孚、冯玉祥及阎锡山。

乱世出名品——竹子壹圆与“黔”字廿分

抗战结束后，国内通货膨胀加剧，纸钞信用一落千丈，为稳定物价发行的金圆券不过数月即形同废纸。民众对纸币毫无信心，国民政府只好于1949年7月初正式公告恢复银本位制，并重新制造发行与民国23年版船洋形式相同的银圆。

当时除中央造币厂在上海生产外，也曾委托成都、重庆、广州、台北等地制作，另亦向美国订购。总计国内外各厂在1949年共生产船洋约4 500万枚。驻守贵州的第89军军长刘伯龙亦曾在贵阳附近的龙里县私造低色减重船洋约3万枚。

由于贵州省已无造币厂，故不曾受中央银行委托代制。该省财政厅乃自行筹办，除沿用周西成时期所留场所和部分机器设备，另行在广州招募技工、购置印模及造币机器。1949年10月安排就绪，并由省府委员会通过《贵州省造币厂组织条例规程》，规定鼓造各类银、铜币，交贵州省银行发行。

11月初，样品完成送建设厅化验，结果重量与成色同船洋。此币式样十分别致，颇具贵州银货“传统特色”。正面为贵阳名胜甲秀楼，楼门间有一“谷”字暗记，楼底有英文“TLK”。据悉谷字代表省主席谷正伦，英文“TLK”则有说代表厂长谢杰民，如与周西成并论，两者沽名钓誉程度可谓“不遑多让”。甲秀楼的外圈上书“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下书“贵州省造”。背面为金竹三枝，左右分列“壹圆”二字。这种俗称“竹子币”的银圆，在收藏界亦颇有名气。若确按船洋规范制作，其成色为88%。依竹节粗细、甲秀楼上层楼窗形状可分不同版式。甲秀楼位居城南2公里，建于明万历年间，高20米，为古代建筑杰作。贵州各地竹产丰富，元代曾置金竹府于广顺，贵阳设市时也以竹枝为市徽。

此币生产时间甚短，当红军由湘西进入贵州省天柱县后，造币厂即于11月11日停摆，据报仅出产万余枚。造币厂员工撤离贵阳，所出银圆被省府在当地和迁往云南途中作为薪饷、资遣、杂支等费用发放而流传于外。红军控制后，部分员工向军管会缴交厂方资产，移交清册中仅少许简单工具，并无生银及钢模。因模具可能外流，故有人怀疑某些版式为后来所造，然而坊间仿造品更多，收藏者应特别注意。



IV-5-06
贵阳名胜甲秀楼。位于贵阳市城南的南明河上，以河中一块巨石为基地建成。现存建筑是在宣统元年（1909年）重建的

IV-5-07
“竹子币”。民国38年贵州省造竹子币，就是国际上很有名气的Bamboo Dollar，与“汽车币”互为呼应，为中国末代流通银圆之一

IV-5-08
“竹子币”有圆窗及方窗两版，以方窗版为罕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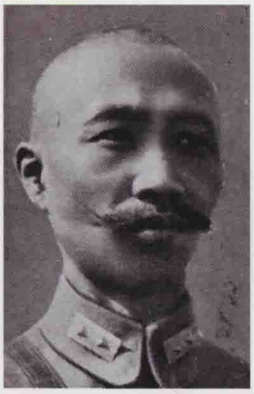
“黔”字廿分小洋



IV-5-09
“黔”字廿分银币

1949 年兵荒马乱的时候，除了竹枝银圆，贵州省也制作了一批为数不多的廿分银毫，背面有“黔”字，特征十分明显。据说该币成色与竹节壹圆同为 88%，若属实，银毫有如此之高的含银量则十分罕见。因为银毫不是法定无限偿付的主币，数量只要够市面流通即可，属于有限偿付性质，不过基本上没有流通。另有两种背“50”、“20”的半圆及二角银币，亦非常罕见，应属样币性质。

贵州省在银圆时代最通行的是“袁大头”与“孙小头”，全省各县皆畅用无阻，其次是川版，“汽车币”仅在少数地区行使，半圆与双角银币流通甚少，可能是恢复银本位后，没有量产银辅币。



IV-5-10
谷正伦肖像

[谷正伦小传]

谷正伦（1890—1953），字纪常，贵州安顺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入日本振武学堂，后参加同盟会，辛亥年返国，追随黄兴，效力革命。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南京政府成立后任首都卫戍司令。1932 年（民国 21 年）1 月，政府成立宪兵司令部，调首任宪兵司令，有“现代中国宪兵之父”称誉。1935 年 11 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弟谷正纲、谷正鼎三人同时当选中央委员。1940 年 11 月，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1947 年，调任粮食部部长。1948 年，派贵州任省政府主席。1950 年赴台，任“国策顾问”。3 年后病逝于台北，享年 64 岁。

甘肃省造银圆 6

清同治年间左宗棠在甘肃设机器局用造弹壳机器短暂地制作过一批"足银壹钱"的方孔银钱，但未正式设立造币厂。1920 年（民国 9 年）2 月，孔繁锦任陇南镇守使，号称陇南王。孔为筹措军饷及解决市面钱荒，先以翻砂浇铸方式制作铜币，后来购置机器在天水设厂，专造铜元，此为甘肃置机器造币之始。1926 年 8 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入甘将孔氏逐出，到兰州任督办的刘郁芬，将机器及技工迁移至兰州成立甘肃造币厂。次年 11 月由省财政厅拨款 20 万圆兴建厂房，于一年后竣工开制银圆。

甘肃造币厂及"甘肃版"袁像银圆

造币厂的设备是孔繁锦早年设厂时向湖北汉阳周恒顺机器厂购入的，技工也在汉阳招募。1928 年，国民军掳获凉州镇守史马廷骧的 200 万两白银，有了本钱后开始制造银圆，造币厂建在兰州萃英门的甘肃机器局旁。模具由江西人陈发坤按民国 3 年版"袁大头"的形式雕刻，以过去没有机器造币厂的偏远地区来说，技术可说十分高明。

甘肃造币厂生产的民国 3 年版"袁大头"，版式与其他地区出品有明显差异，主要是肩章部分类似民国 10 年版"袁大头"，背面嘉禾亦有区别，泉界习称"甘肃版"。其重量、尺寸虽然与规定相近，但成色较低，仅含银 82%，后来逐步减少竟降至 70%，因此并不受商民欢迎。据记载，美国传教士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赴甘肃敦煌时，"该地仍习惯以银锭切割作为货币使用，银圆虽通行，但非全盘接受。本国龙银遇上香港站洋时要贴水，'袁大头'则普遍受到欢迎，其中以民国 3 年版价值最高。当孙中山像银圆出现时，这个戈壁小镇完全不愿接受，认为新总统像银圆的头像太小，毫不出色。除了嫌头像太小之外没有听到其他解释，只是没有人用。"另 1930 年左右，甘肃厂亦曾代制"藏洋"卢比，尺寸约半圆大小，据说其上肖像为宣统皇帝，但实际上与四川卢比上的光绪像无多大出入，其较明显的差别在头大颈短、帽顶有珠饰，重量稍轻而含银仅 50%。因掺铜太多会露出铜色，俗称"红洋"。



IV-6-01
甘肃版"袁大头"。肩章部分类似民国 10 年版，背面嘉禾亦有区别，俗称"甘肃版"。

民国 3 年加字甘肃"袁大头"

1930 至 1931 年间，邓隆担任造币厂监督时，生产过正面袁像左右刻上"甘肃"二字的民国 3 年版"袁大头"。此币系冯玉祥部充作军饷之用，

成色仅 82%,流通也不广,估计生产了数万枚。在各种版本的“袁大头”中,这是唯一加注地名的,非常特殊,是颇受藏家关注的热门品种,因此出现许多伪仿及改造贴字的假货,泉友有意收藏时,须小心谨慎。



IV-6-02

甘肃加字版“袁大头”。市面有不少改造贴字者,与其他民国 3 年版大头比较,其肩章类似民国 10 年版。真品之“肃”字略向外歪斜,下方靠底部亦有制模时轮廓内缘马齿压成的轻微痕迹

民国 17 年甘肃省造孙中山像壹圆

1928 年(民国 17 年)甘肃造币厂开工后,曾制作一种国父像银圆,其正面为孙中山肖像,上书“中华民国十七年”;背面为青天白日徽,上书“甘肃省造”,左右为面额“壹圆”,下刻满文,币上刻满文的现象是民国银圆中仅见的。此币重量及尺寸与标准“袁大头”同,成色 88%,有宽边、粗字、细字之别,但泉界并非十分重视其差异。其制作数额不详,而大部分被冯玉祥所属国民军孙连仲部东下时携走散失,在甘肃境内没有流通,存世也少。

在各省自行制造的银圆中,此币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采用孙中山先生的正面肖像,非常特别。据了解,冯玉祥对于孙先生十分尊敬,在“北京政变”后,原拟请孙中山赴京主持国政,但奉系张作霖反对,改成共商国是。中山先生接获电报后于 1924 年 11 月中旬离开广州,12 月初抵达天津,月底始至北京,而冯玉祥此时已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次年 3 月孙中山病逝北京,两人没有晤面。冯常以未能亲见中山先生为终生遗憾,故笔者推论冯玉祥掌握甘肃造币厂后即制此币表达崇敬之意。

1935 年 11 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甘肃造币厂奉命停办,机器设备归该省制造局(即甘肃机器局)保管。甘肃厂的产能号称日产 10 万枚,但因原料及资金问题从未达成此额,实际数据目前无可查找。据退职员工回忆,若原料充足,日产银圆三四万枚不成问题。抗战期间,中央造币厂开办兰州分厂,以收购来的民间制钱专造壹分铜币。后因原料无以为继,仅一年余即停产。

1949 年郭寄峤任省主席,在金圆券发行失败市面改用银圆时,派人在制造局内架设临时工棚重开造币厂。由于原有机器已损坏,改以压模机用人工操作造币,但因库存白银有限及产能不足,加上开工期仅 2 个多月,只制作了少量银圆。



IV-6-03

民国 17 年甘肃省造孙中山像壹圆

伍



近代银饼与银两币

1 台湾"老公银""如意""笔宝"银饼

海岛形态的台湾自古有大量的海上活动，故西方银圆很早就在台湾通行，然而在19世纪初的嘉庆道光年间，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激增，对外贸易由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银价上扬，民众习称为番银的外国银圆身价自然也随之高涨，台湾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发布禁令，禁止洋银出口。这时候的台湾，要稳定物价又要有足够可供流通用的银圆，就只能自己制造了。

老公银——中国留传最早的银饼

台湾地区最早出现的圆形银货币是俗称"老公银"的银饼，它就是引文所描述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也是留传下来的银饼中年代最早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收藏价值，有关它的制作时间，缺少官方记录，仅能从各类中外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

台湾有"三年小反，五年大乱"、"五年一小反，十年一大反"的谚语，故民间传闻中有"银牛"贮存在公库以应变时作为兵饷之说。而道光十四年（1834年）《宣宗皇帝实录》史料有载："酌拨十万两，发交道库，以备公要需。……此项银两，着真成台湾道专款加谨封贮，不得与府库收缠，致滋弊混，如遇重大紧要事件，着该道一面酌拨，一面自行具奏……"清代史料亦有道光十六年因匪徒滋事而拨数万银的记载，可见准备"银牛"以应动乱的说法足以采信。这段记载重要之处在于事件发生的时间与银两"发交道库，再拨府库"的记述，依此可推测台湾老公银的发行时间应该是在此之后。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广州印行的第三版英文《中国通商手册》中（*Chinese Commercial Guide*）描述中国货币的章节里记载着福建省当局司库（The provincial treasurer of Fukien）发行一种以土法制造的银币，重量相当七钱二分，达到某种程度的流通。正面是寿星图，上有"道光年铸"及"库平柒二"、"足纹银饼"的字样；背面图案是一只三足鼎炉，表示为官府钱币，另有满文"台湾"。文中还说这种中国银币的工艺非常粗糙，可以推论，该银币是在台湾使用或制造的。在咸丰六年（1856年）刊印的第四版上，只稍微改了几个字，内容没有变动。但是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第五版上，加了几点非常重要的补充。首先，此银饼在道光十八年发行，大小如西班牙银圆。其次，指出在1842年已经减重，到1845年时已比原来轻了5%。1929年出版的耿爱德著《中国货币论》（蔡受百译）、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1965年第三版）上有关老公银的描述即据此而来。

由上述考证可以判断，老公银始造于道光十八年（1838 年），后来重量逐渐减轻至六钱八分，而且发行多年，记载与存世的后期所造银饼实重吻合。其减重原因可能是成色过高之故，按所谓的“足纹”含银达 93.5%，而最流行的墨西哥鹰洋的成色是 90.2%，同样重量时老公银所含纯银超过鹰洋，减重后略低于鹰洋。

存世的道光老公银，币面都有戳记，有的非常多，这是因早期民众担心银币有伪或其中夹有铅锡，故使用錾子敲打以辨良窳；而老公银工艺较为粗糙，不若西洋银圆精美，自然所受待遇较差，留存下来的凿痕累累，完整的罕见。当时其流通应相当普遍，据彭信威教授调查，上海钱商王守义在抗战胜利后两次赴台收购钱币，曾取得上千枚寿星银饼；或许此量略为夸大，但不会是寥寥无几，可能其中有不少因戳记太多成为烂版而不受欢迎，从而回炉化银。

台湾老公银是使用简单的机械工具及粗制铁模打造而成，因此模具寿命不长，需要经常更换，若仔细比对每一枚钱币，可能枚枚都不同，戳印中有些并非流通时发生，而是发行前加盖的。中国在早期虽有多地仿造西洋银圆，但这些所谓的广板、福板、杭板、苏板等，都是仿造且成色低劣，接近伪作，没有什么研究与收藏的价值。彭信威认为“最重要而且还留传下来的”只有福建、台湾两地的几种银饼。其中又以寿星图的老公银为最早，故其在中国货币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V-1-01
道光年造“大清国宝”老公银，是首次出现“大清”字样的清代货币，目前所知是孤品。此版的拐杖为实心，寿星下方有“足纹”二字，背面是三足鼎炉图案

台北鸿禧美术馆收藏一枚铭文为“大清国宝”的道光年造老公银，目前还未见第二枚。这是清代货币上首次出现“大清”字样，具有非同一般的历史意义。此版寿星所持拐杖为实心，正面寿星下方有“足纹”二字，背面是三足鼎炉图案。尔后所造者改为“足纹银饼”，在寿星右下角有喻万年之意的“卍”字或“十”，拐杖则有实心与空心两种。重量足库平柒二，多在 26.5 ~ 27.0 克，为早期老公银。

稍后在正面“库平”二字旁添加“官局”合体字样，“官”字下半借用“局”字的上半。重量在 25.0 ~ 26.5 克，约合六钱八分，与外文文献记载吻合。可能是减重后引起民众疑虑，故加上官局二字表示并非民间私版。符号也分“卍”字、“十”字两种。另外，还有背面加上“癸二”及“二癸”阳文字样的版式，非常少见，此二字含意不明，或许是匠名，是重量在六钱八分左右的后期减重币。亦有一种打上类似“成记”字眼的合体文戳印，辨认为所谓“成记”只是推测，有待考证。

各式老公银通常镌有“卍”字、“十”字两种，前者为常见的民间吉祥图案，后者无特殊意义，推测或许是工匠因模具容易损坏须不停地重刻，新刻模具时，为省工省时草率行事而为，此外，拐杖之实心及空心之分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V-1-02
改为"足纹银饼"的寿星银饼，正面右下角有"十"，此枚拐杖为实心



V-1-03
寿星右下角有喻万年之意的"卍"字，此枚背面有多个"十"，
罕见



V-1-04
减重后加上"官局"合体字样，"官"字下半借用"局"字的上半，
重量约合六钱八分，与外文文献记载吻合。此版拐杖为空心



V-1-05
非常少见有"癸二"阳文字样的版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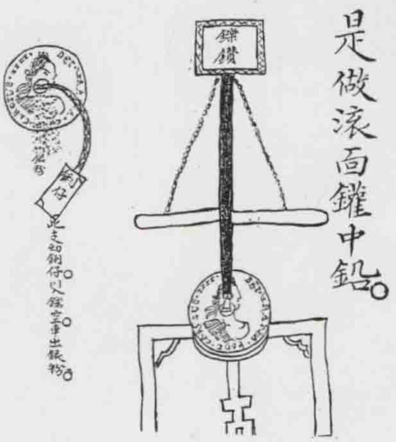
V-1-06
"二癸"，罕见



V-1-07
老公银通常戳印多，仔细观察十分有趣

老公银由于寿星造型古朴可爱十分讨喜，加上吉祥寓意浓郁，深得藏家青睐，因此很早就有伪品出现，甚至于还有“铜样”，有意收藏者宜加注意。原则上，台湾银饼是人工打造，本身不很规范，流通时又多次被戳印鉴定，所以状态各自不同，若所见戳记很少且版式完全相同者出现，不可见猎心喜而冒然购入。

道光年造台湾老公银背面上的满文正确译法是“台湾府库”。当时台湾归福建省管辖，清朝继承元明以来的分省建制，以省为地方上的最高行政机构，下设府、厅、州、县，构成地方上的省、府、县三级基本行政系统组织。是故公库在福建为“道库”，在台湾则称“府库”。



V-1-08
旧时代生活物价低，银的价值相比之下非常高，不肖之徒偷银是常见的现象，这幅出自清代古籍的插画或可说明一二

如意银饼

如意银饼的发行也缺乏官方文献的记录，其生产背景基本上是延续老公银：作为军饷以应付本地的动乱。

清朝在历经康熙、雍正、乾隆3个接连的盛世后十分富庶，但随着近代鸦片的大量进口及“鸦片战争”的失败，国家与民间的大量财富不断被“倒光”及“盗光”，咸丰时期（1851—1862）的太平天国事件犹如雪上加霜，财源更是左支右绌。此时地处边陲的台湾若出现骚动，已无法再依赖海峡对岸福建的支持，必须自力募兵，以平乱局。

据台湾货币史权威曾泽禄研究，1851年至1854年间担任台湾兵备道的徐宗干曾主张劝导本地富绅办团练、捐输作军饷以捕盗匪，并有拨“存银二千两发局铸洋钱发军饷衣服”之记载。另在连横的《台湾通史》亦有记载，咸丰三年时因林恭之变“藩库不至，而府库存元宝数十万两，滞重不易行，乃为权宜之策，召匠鼓铸，为银三种，曰寿星，曰花篮，曰剑秤，各就其形以名，重六钱八分，银面有文如其重，又有府库二字，所以别洋银也，是为台湾自铸之银”。林恭之变发生于1832—1853年，是台湾地区发生的15次动乱中规模最大的。

这些记载与实物比照后是吻合的。如老公银后期减重5%、存世数量多证明其制作时间长，以及银饼上的图案所谓“花篮”是指聚宝盆图形上有花、即现称的如意银饼；“剑秤”是指交叉在钱囊上两支有如长剑的笔，即现称的笔宝银饼。由此亦可推测寿星银饼虽然没有“军饷”二字，但实际上就是用来支付兵勇及相关费用之饷银。三者从工艺上比较，寿星银饼最为粗糙，也符合最早记载于文献；如意银饼制作优于前者，在文献上出现的时间也晚15年；而笔宝银饼的整体状态最精致，虽与如意银饼同期，但应在其后问世，至少制作期较长。

如意银饼应如《台湾通史》所载于咸丰三年（1853年）发行，从留存实物只有一种版式判断，制作期很短暂。虽然发行时间不长，但

V-1-09
如意银饼。存世仅留下一种版式



戳记依然很多，这是当时环境下的特色，银货都要经过錾印鉴定是否灌铅夹锡以辨真伪。如意银饼重六钱八分，实重 24.9 ~ 26.3 克，正面有“府库军饷”四字，意为台湾府库发行的军饷，故可认定为具有官方地位的正式货币而非民间私版。银饼正面图案是聚宝盆及珍宝树，中间有“宝”字，两侧是“卍”（万）字，即万宝聚财的吉祥语。背面为两支交叉的如意，配合正面即“万宝如意”也；左右有“足纹通行”四字，下方有“六”字戳印，此为“亠”与“八”的合体字，而“亠”是商场记帐用的代码，故此“六”意思是“六八”，即重六钱八分；另尚有“昇平”印记，可能是制作工匠铺号，保证银饼的成色，这是古今全球通行的惯例，在贵金属制作的首饰、器皿上留商号名，以示负责。

笔宝银饼

笔宝银饼重 25.0 ~ 26.5 克，正面图案也是聚宝盆，中间有“宝盆”二字，因流通之故不明显，左右则为“军饷”二字，底下有“足纹通行”四字，但常因背面相对位置敲打印记而有局部模糊的现象。背面是交叉在钱囊的两支笔宝，寓意“必保”，而钱囊形状是民间携带系在腰上的小钱包；底部有“六八足重”四字，有些写成“六八是重”，左右各有 3 个圈连接的三星图形，戳印分“库”及“粮”两种。笔宝虽发行时间较长，但可能因比如意银饼稍重而被囤积熔化。上海钱商王守义在抗战胜利后到台湾收购钱币，虽取得大批寿星银饼，但如意与笔宝银饼却只有“几十枚”，推测可能由于寿星银饼造型古朴可爱、吉祥寓意浓厚而更为讨喜，遂被民间保留；如意与笔宝则多数送进了熔炉以至于今日所见不多。



V-1-10
笔宝银饼

与老公银一样，如意与笔宝这两种银饼很早就有伪品存在，藏家在收集时宜加注意，其辨识原则是相同的。

[相关链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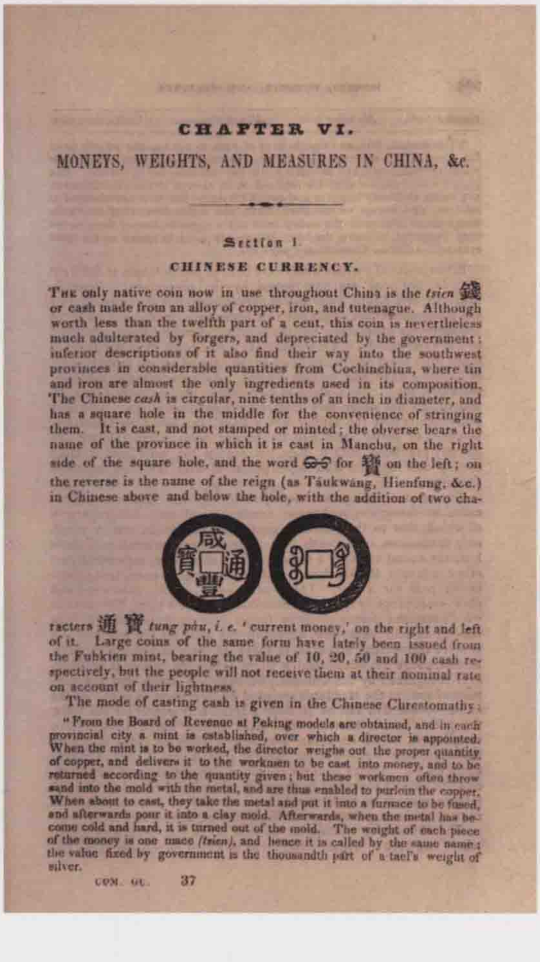
《中国通商手册》（*Chinese Commercial Guide*）的初版由《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于 1835 年发行，由当时在广州替英国商行担任中文翻译、后来成为外交官的英国传教士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执笔，为外国商人对华贸易提供沿海各主要港埠的有关商务信息。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门户大开，因此在 1844 年发行增订版，由于执笔人感染霍乱英年早逝，故保留原作者名氏。1848 年因该书内容实用颇受欢迎而再版，内容几乎没有变动。五口通商后，上海、香港、福州、宁波等地发展迅速，逐渐取代广州与澳门，而且日本、暹罗与西方的贸易额也大幅增长，因此由曾任《中国丛报》主编的美国人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修订后在1856年发行第四版，并陆续更新数据，在1863年印行第五版，是西方了解中国事务的重要参考资料。

初版作者马儒翰之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牧师，独立完成了新约全书的翻译，后来他与另一位合作，在1819年底完成全部新旧约的翻译，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因为马礼逊的翻译工作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所以一般仍以马礼逊的译本为第一本基督教中译圣经。

第四版作者卫三畏也是学者兼传教士、外交官，来华43年，著有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英华分韵撮要》，西方人学习汉语及粤语的字典），退休后返美任教于耶鲁大学，是美国第一位传授中国语言学及文学的教授。

《中国丛报》在1832年5月（道光十二年）发刊，为美国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牧师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在广州创办，每月一刊，马礼逊为主要执笔人，内容以介绍洋商在华商务及中国社会的动态为主，1851年2月停刊。《中国丛报》在发行期间详细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均来自早期传教士的第一手材料。传教士以及其他在华西方人在该刊留下大量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的珍贵史料，对这段时期的清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CHAPTER VI.

MONEYS,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CHINA, &c.

Section 1.

CHINESE CURRENCY.

The only native coin now in use throughout China is the *tsien* 錢 or cash made from an alloy of copper, iron, and tutenague. Although worth less than the twelfth part of a cent, this coin is nevertheless much adulterated by forgers, and depreciated by the government; inferior descriptions of it also find their way into the southwest provinces in considerable quantities from Cochinchina, where tin and iron are almost the only ingredients used in its composition. The Chinese *cash* is circular, nine tenths of an inch in diameter, and has a square hole in the middl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stringing them. It is cast, and not stamped or minted; the obverse bears the name of the province in which it is cast in Manchu,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square hole, and the word [Manchu] for 寶 on the left; on the reverse is the name of the reign (as Táukwáng, Hienfung, &c.) in Chinese above and below the hole, with the addition of two characters 通寶 *tung pàu, i. e.* 'current money,' on the right and left of it. Large coins of the same form have lately been issued from the Fuhkien mint, bearing the value of 10, 20, 50 and 100 cash respectively, but the people will not receive them at their nominal rate on account of their lightness.

The mode of casting cash is given in the Chinese Chrestomathy:

"From the Board of Revenue at Peking models are obtained, and in each provincial city a mint is established, over which a director is appointed. When the mint is to be worked, the director weighs out the proper quantity of copper, and delivers it to the workmen to be cast into money, and to be returned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y given; but these workmen often throw sand into the mold with the metal, and are thus enabled to purloin the copper. When about to cast, they take the metal and put it into a furnace to be fused, and afterwards pour it into a clay mold. Afterwards, when the metal has become cold and hard, it is turned out of the mold. The weight of each piece of the money is one mace *(tsien)*, and hence it is called by the same name; the value fixed by government is the thousandth part of a tael's weight of silver.

COM. GU. 37

V-1-11

《中国通商手册》除了有沿海地区各主要港埠的商务信息外，还对日常使用的各种货币以及彼此的兑换都有相当叙述。此书在道光年间初版，咸丰六年发行第四版，由附图的已是"咸丰通宝"可知其随时更新

2 福建“漳州军饷”银饼

福建地处沿海，对外贸易活动频繁。随着造船及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上丝路日益兴旺，丝绸、茶叶、瓷器等成为主要外销商品，外洋商人便以西方所使用的银圆与中国交易。由于成色、重量划一，计算及行用比银锭更为方便，故俗称“洋钱”的西式银圆自明末起就已在中国各沿海地区流通，亦包括福建。

漳州军饷



V-2-01
所谓的“左签”，是将押文解释为左宗棠、朱成功、成功

“漳州军饷”是中国大陆地区最早仿西式银圆制作的银质货币，也是具有重要历史及收藏价值的文物之一，但其始铸时间及发行背景说法不一。如明永历三年至六年（1649—1652 年）郑成功所造说、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所造说、同治三年至四年 （1864—1865 年）所造说等。由于缺乏官方文献记载，究竟如何仍不明确，尤其发行的背景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外文资料中对发行年代比较具体，1863 年（同治二年）香港出版的第五版英文《中国通商手册》有以下的记载：“在靠近厦门的漳州于 1844 年（道光二十四年）试制银币，起初发行者重七钱四分，但很快即减轻了 15%，不久就完全退出流通。”此即耿爱德《中国货币论》论述的根据，也是将押文译成“为七十四”的由来。虽原文没有斩钉截铁地说是“漳州军饷”，但因其明确指出是在漳州制造，故钱币学界采纳此说的颇多，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亦倾向于此说。

“漳州军饷”上的花押有不同形式，解释因人而异，如“为七十四”、“如吉如利”、“曾国荃”（俗称“曾签”）；“朱成功”、“成功”、“左宗棠”（俗称“左签”）；“谨慎”、“谨性”，等等。



V-2-02
将其解释为曾国荃而得名的“曾签”版，也有译成“为七十四”、“如吉如利”。较“左签”稀少，两者的“通”字顶部的笔法不同，分别为“コ”及“マ”



V-2-03
漳州军饷的“谨慎”或“谨性”版

上海银饼 3

外国银圆在明末源源流入中国后影响力日增，至清道光年间“洋钱盛行，凡完粮纳税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也就是说洋银还得到官方的认可。其中通行最广的是俗称“本洋”的西班牙银圆。本洋事实上是在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生产的，墨西哥 1823 年独立，次年起发行自己的银圆，俗称“墨洋”，因币面上有老鹰图案而又称“鹰洋”。从此，流入中国的本洋开始锐减，至咸丰年间，上海通行的本洋兑换汇率远超过其所含银价行情。咸丰六年，上海洋商决议以鹰洋取代本洋为结算货币；与此同时，上海当局也进行了自造银币的尝试。

中国最早的一两银饼——上海银饼

1856 年（咸丰六年）11 月 29 日英文《北华捷报》报道，上海道除推行鹰洋外，亦采用土法制造一两重银饼来流通，但此举对商业不会发生影响，因为每月只能生产 3 000 枚。泉界首先关注此事的是早年来华、协管墨海书馆而热衷收藏中国钱币的英国人伟烈亚力，他于 1857 年底在上海文理学会以“大清国硬币”为题发表研究心得，并登于次年会刊上，提到“当伪品混入流通后，民众对新币的信心迅即消失，目前已经很少出现，只能在收集的情况下找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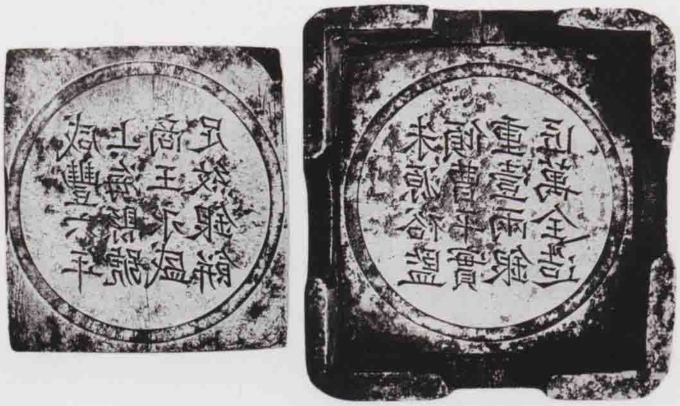
此一两重银饼的面文有“上海县”及“足纹银饼”字眼，因而俗称“上海银饼”，它是中国早期银饼中唯一详细记载制作时间、发行缘由及制作过程的。除了在铭文上有明确的标示外，还要归功在华洋人的记录。创办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仁济医院的英国传教士兼医师雒魏林于 1861 年伦敦出版的《在华医药传道纪事》书中叙述上海银饼制造及流通的情况：“这种银饼因质软不经用，制作程序繁杂，在交给民众后，无论数量多寡即被回炉熔化成传统银锭，其结果就是停产。银饼圆坯经逐一称重，过轻或过重都立即回炉，合格则用锤子打平并用锉刀修整，然后送去压印……，压



V-3-01
“商郁森盛·匠平正造”最为罕见

印模具乃方形钢材雕刻而成。压印时用一块重约 200 磅的花岗石，从高约十　的木架垂直落于模具上。窄钢槽上刻有交叉形花纹，工匠在银饼顺着滑槽溜下时用木锤敲打，使钢槽上的花纹转印至银饼的边道上。”

上海银饼“金生丽水”



V-3-02
存放于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商王永盛·匠万全造”钢模，四周有千字文的“金生丽水”四字

上海银饼中的“商王永盛·匠万全造”钢模被雒魏林带回了英国，在 1901 年转存于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此模具在“造”的“告”字第一笔与第三笔间有明显的刻划痕，由其他存世实物上观察，此版均有此现象，系雕刻不慎所致。

学者根据此币模照片观察，其下模凸出的外缘模圈挤压在方形模具中，没有焊接或用铆钉与模具固定。外缘模圈本身则整片在对角线处焊接而成，由底部很容易辨认。上模的正背部有反写汉字“成”（译音）；4 个角落各刻有一字，排列方式有点特别，以左上、右下、右上、左下对读为千字文上的“金生丽水”。下模外缘模圈四周出现“成”（译音）字多次，目的不明；背部有一个模糊的“金”字。

上海银饼在 150 多年前发行，虽然仅昙花一现，并无实质的影响，但它是中国商埠重镇上海最早自制的银币，也是中国现存最早以两为单位的银饼，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此银饼由号商所造，号商即沙船商，从事沿海运输，对上海港的形成与发展有重大作用，直到同治年成立轮船招商局后，才开始没落。上海银饼因制作方法简陋，一经发行赝品百出，以致信



V-3-03
“商经正记·匠丰年造”

V-3-04
“商郁森盛·匠丰年造”

V-3-05
“商王永盛·匠万全造”



V-3-06
“商经正记 · 匠万全造”五钱

V-3-07
“商郁森盛 · 匠王寿造”五钱

用扫地，旋即宣告废止，多数回炉铸锭，因此存世量极少。

上海银饼全套共6枚，计一两4种、五钱2种，由郁森盛、王永盛、经正记3家号商发行及平正、万全、丰年、王寿4名工匠造。一两有“商王永盛·匠万全造”、“商经正记·匠丰年造”、“商郁森盛·匠丰年造”、“商郁森盛·匠平正造”4种，其中以“商郁森盛·匠平正造”最为罕见；五钱2种，为“商经正记·匠万全造”及“商郁森盛·匠王寿造”，后者无外郭。

[相关链接]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英国人，1847年来华，协管墨海书馆。1857年发起成立上海文理学会，次年加入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因与更早在香港成立的英国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无从属关系，以上海地理位置在香港之北故称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简称“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后因双目失明，于1877年返英，逝于伦敦。伟烈亚力著作极多，以科学及文艺为主，最知名的是1867年出版的《中国文献记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英国人，1838年来华，在广州、澳门传教施医，鸦片战争中随英军北上到定海，1843年抵沪，次年创办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曾返英3年后再度来华，在北京开设医院，兼任英国公使馆医师，1864年退休。著作有《在华医药传道纪事》、《北京及其附近略记》。

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1851年世博会结束后次年在原址上建成，原名南肯辛顿博物馆（South Kensington Museum），1899年为表彰维多利亚女王及其夫婿阿尔伯特亲王而改名，以展出装饰艺术品及当代名师杰出设计而闻名于世。

4 贵州“黔宝”银饼

昔日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之谓的贵州，因土地贫瘠、地处偏远之故开发较迟，清代虽设局铸造过制钱，但不曾有现代化的机器造币厂。然而在这般时称为鬼方地、战国时称为黔中地的地方，却在清光绪年间出产一种向来受到藏家重视的大珍——“黔宝”银饼。

光绪年贵州官炉造“黔宝”银饼

“黔宝”银饼有“光绪十四年”及“光绪十六年”两种纪年，前者另见半圆型，两种版式存世皆仅知数枚。昔时泉界大家如蒋仲川、施嘉干、张璜、马定祥及耿爱德等均视其为名贵之品。由于尚未见贵州地方文献中有所记载，其来龙去脉不详，众说纷纭。

清代沿袭了明代银两与制钱并行的币制，制钱官铸，民间不得私造。贵州黔宝局是雍正八年（1730 年）于毕节城内开铸的，铜料因自产不足需从滇省购入，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黔宝局移至省城贵阳。咸丰、同治年间云南事变及太平天国运动使铜源供应不济，铜价上涨，铸钱中断。《贵州通志》载“光绪初，因滇铜缺乏，废贵阳宝黔局”，但没有注明哪一年废局。黔宝银饼的铭文是“光绪十四年”及“光绪十六年”，而贵州官钱局乃光绪三十四年设置，时间上难以符合。

V-4-01
“光绪十四年贵州官炉造”黔宝银饼之一

V-4-02
“光绪十四年贵州官炉造”黔宝银饼之二



仔细检视各黔宝银饼，可观察到其图纹的高点与地章齐平，此乃古代玉器之“大斜刀”斜面雕刻方法制成，并非由模具压印，故所见各枚均不相同且重量不一。手工逐枚雕琢之物难以批量生产，且贵州市面交易以小银锭为多，故制作黔宝的目的应非作流通货币之用。由“官炉造”字样来看，应是官方委托银匠制作。经查同治七年（1868 年）贵州曾请洋匠麦士尼（W. Mesny）至黔修造大炮，稍后在省城贵阳南门外设置一所小型机器局，但创立时间无从查考，应与此没有关联。至光绪年间，当时贵州巡抚潘蔚曾在青



溪开办一座新式炼铁厂，初期使用土炉，后从英国订购设备，在光绪十四年（1888 年）安装完成，该厂后因缺乏资金及原料，加上管理与技术能力不足，于光绪十九年停办。推测制造"黔宝"的目的可能是纪念新式铁厂开炉的"吉祥钱"，此论正确与否尚待进一步考证。

V-4-03
"光绪十六年"黔宝银饼，罕见

V-4-04
"光绪十四年"小型黔宝银饼。"黔宝"银饼有"贵州官炉造"字眼，但并非模具压印，系以古代玉器之大斜刀方法逐枚雕刻制成，故所见各枚均不相同。仔细观察可看出其图纹之高点与地章齐平





V-4-05
西周凤龙纹饰玉佩。大斜刀雕成的西周玉器，拓片可见其斜刀的运用，粗细对比流畅生动，大斜刀琢法的成熟可能要到西周中期。上海博物馆藏

5 “上海壹两”与“关平壹两”

19世纪中期起墨西哥“鹰洋”虽逐渐取代西班牙“本洋”，成为中国内地流通最广的银圆，但尚未完全站稳脚跟。香港因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开埠以后并没有专用货币，一直沿用内地流通的各式货币。1859年港督罗便臣（Sir Hercules Robinson）上任后，为推广香港贸易及取代来源不稳定的鹰洋，积极争取在香港发行货币，除了在当地使用，也着眼于内地的银圆需求，于是专门为此试造了两种龙银。

“上海壹两”的来龙去脉

香港造币厂在罗便臣的策划操办下，向英国购置机器于1866年5月7日正式开张。港厂规划之初，原本是想以该厂制造的银圆占地利之便来取代墨西哥银圆，但港府错估形势，未考虑到民众倾向使用熟悉的货币，对新制的香港银圆并未全盘接受。这座耗资45万圆的造币厂营运后恰逢景气低迷，月收入只有1万圆。当新任港督麦当奴（Sir Richard Macdonnell）了解到这座造币厂的规模远超出其自身需求时，就想把产品卖到内地，并企图垄断市场以谋取最大利益。

V-5-01
“上海壹两”无外射线版。“上海壹两”分无外射线及有外射线两版。无外射线者纯属样币，极罕见

V-5-02
“上海壹两”有外射线版。曾批量生产随即销毁，数量虽稍多但也稀见



1867年香港造币厂刻模试制了一套样币，为了更容易使中国政府接受，正面采用象征中国帝王的龙纹图案。同时考虑到上海是重要新兴港埠，以为采用上海平法有助销量，因此文字使用“上海壹两”，可能是错认上海通用的银圆含银九八，故将成色定为98.2%；其重量则采用相当于漕平一两的566格令（合36.67克）。背面为英国王室及嘉德勋章图案（Royal Arms & Garter）。样币送了一组到北京但未被认可，此套样币泉界习称“上海壹两”。钱币界最早对其进行考证而有具体结论的是中国机制铜币大师伍德华。他在1922年便开始注意此币，至1937年在上海 *China Journal*（《中国杂志》）上发表研究心得，其

间除了向前香港造币厂雇员探询外，也亲至北京英国使馆及英国伦敦外交部寻找档案，前后费时近 15 年。他的结论是“上海壹两”(Shanghai One Tael) 是误写，应该是“壹上海两”(One Shanghai Tael)；“上海”一词是称量单位而不是地名，即其本意是“漕平壹两”，并非只是在上海行用。伍德华也指出，所谓“上海工部局委托制造”之说不正确。

“上海壹两”产生的背景，是香港造币厂在为其产品谋求出路。为此香港总督麦当奴在 1866 年 8 月及 11 月两次去函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经其向总理衙门的恭亲王请求后，海关同意缴税时比照本洋、鹰洋接受香港银圆，但实际使用数量太少于事无补。因此，香港造币厂厂长乾打（T. W. Kinder）请新上任的雕刻师史特（Mr. Sherd）担纲试制针对内地市场的“上海壹两”。1867 年 3 月先送正面铅样给港府参考，报告中说明“背面模具已在最后修整阶段，以及二钱的设计较简略谈不上艺术，以便快速雕模生产……”云云。同年 5 月 11 日送一两币 11 枚至北京，没有提及二钱；但在香港造币厂第三季报告书中记载有一两模具正二背一，二钱模具正背各二，显示后者模具是在 8 月至 10 月间完成的。



V-5-03
“上海贰钱”样币，据悉只试制了 5 枚

“上海壹两”系列银币共有 3 种版式，其中一两 2 版、二钱 1 版。无外射线版一两及二钱未获批准。有外射线版一两当时曾批量生产，但随即依令销毁。据了解，二钱试制了 5 枚，其中的 1 枚被殖民地政府官员留作纪念品，这枚稍后卖给一位收藏家，并在 1912 年 6 月转手，又于 1922 年 3 月拍卖时被伍德华竞价买下；而伍德华在 1928 年又购得 1 枚，显示另外 4 枚并未回炉销毁。

“关平壹两”

“上海壹两”推行失败后，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Thomas F. Wade）认为采用上海平法徒然划地自限，应采用海关平法为宜。他还亲手绘制草图，除龙纹图案外全部使用汉字，如“中华通宝”、“壹两”及“同治年铸”等，并将此建议提交港府。币模由英国皇家造币厂雕刻，1867 年底至 1868 年初间制成“中外通宝 · 关平银壹两”5 枚一套的样币送至香港。

但因阿礼国在 1866 年 12 月致港督麦当奴的回函中，曾提到清廷由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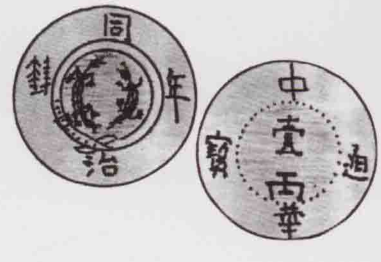
V-5-04
“关平壹两”

V-5-05
“关平一钱”。2012 年 4 月香港 Ponterio 拍卖出品，以 107 550 美元成交，合人民币 67.7 万元

V-5-06
“关平二钱”。2007 年 11 月北京诚轩拍品，成交总价人民币 53.7 万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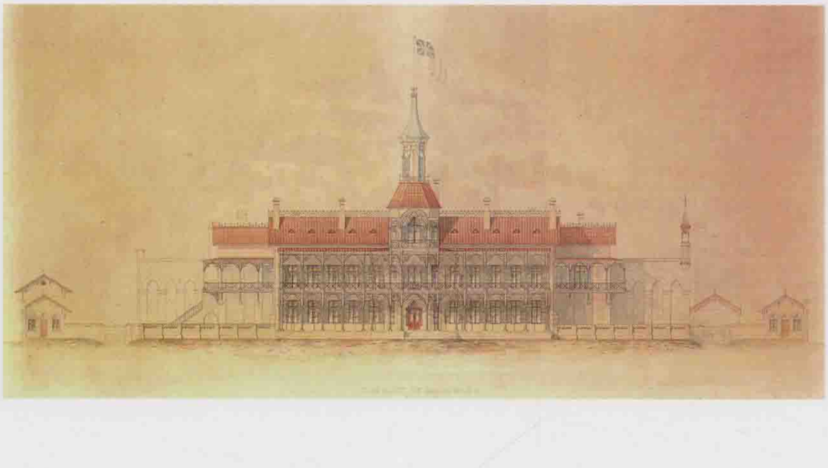
V-5-07
威妥玛所绘的“同治年铸”、“中华通宝壹两”草图

V-5-08
“关平壹两”设计构想图及币模，现藏于英国皇家造币厂博物馆

不久前未能顺利发行咸丰大钱，故预期银圆的推广发行也会遭遇困难，因此兴趣索然。阿礼国就呈送上海壹两样币之事与恭亲王会谈后，于1867年11月22日再去函港督，指出有关香港造币厂及其产品的推广事宜在最好的气氛下尚无法谈妥，故认为没有继续的必要。港督以清廷对机器制造之任何形式银圆的提案都没有兴趣而决定关闭香港造币厂，最后整厂卖给了日本，后者以此成立了大阪造币局，“关平壹两”制发一事因而不了了之。

如果用“漕平壹两”及“关平壹两”来依序排列香港造币厂为自身存续而努力试制的这一系列样币，其演变即有了合理的解释。英国皇家造币厂博物馆藏有“上海壹两”样币1枚及“关平壹两”的全套样币5枚、币模及设计图，是香港造币厂前厂长乾打过世后，其家人于1888年所捐赠的。惟由于以往信息不发达，国内泉界几乎无人知悉，而“关平壹两”币面上又未注明年份，事过境迁考证不易，还因币面有太极图而曾被人误以为出自韩国。这是一套极富故事性的珍稀钱币。

V-5-09
香港造币厂设计图



"富字一两"与"鹿头一两" 6

所谓"富字"及"鹿头"一两银饼为"二战时中国远征军发饷用"之说，最早见于1949年施嘉干编著的《中国近代铸币汇考》。此论近年来已被修正，现在就谈谈相关的史地背景，来了解这种特殊银饼的来龙去脉，还原它的真实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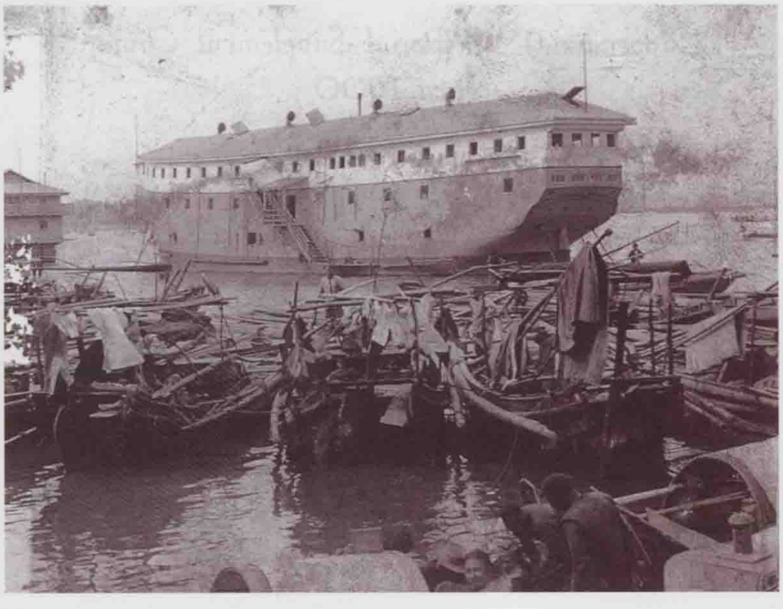
产地与起源

这种称不上"币"的银饼，其实是二战期间法国人在越南河内所生产，作为向印支半岛山区土著购买鸦片之用的贸易银币，产于1943年。当时该地区由法国维希政府管辖，鸦片实行公卖，以往商人多半用法国所出的安南贸易银圆（即坐洋）支付，但其一圆主币到1928年后便不再生产，银圆来源日益减少，二战的爆发更使其后续供给中断。而内陆土著又拒收纸币或其他非银质货币，故殖民地政府就在河内新设造币厂，将搜罗来的各类银器熔化制成钱币形状的银饼，供鸦片贩子用来交易。而当地的土著随即将其熔化，打造成当地人喜爱的银饰或铸成银条储藏。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赴当地采访时仍然见到这种习俗。



V-6-01
银匠在新铸银条上打戳记。一位新娘在20世纪70年代约值三四根银条。富有人家常将银条埋藏地下以保安全，这或许是大多数富字银饼的结局。此照片刊于1974年1月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印支半岛北部由当时云南省主席卢汉的部队受降。在受降期间，该军没收了大批物资，其中包括许多鸦片与银圆。1946年撤离时，把这些东西都带回了云南。尔后内战发生，经费未能足额拨交各省，这些战利品就被滇省当局出售或当军饷发放，部分亦随民众避难而外流，香港钱肆是最先出现富字银饼的地方。钱商与藏家很自然地便假设这种"银币"产于云南，并将其上文字误以为缅甸文。正因如此，它们被当作"云南—缅甸边区银币"了。《世界硬币目录》中，它们现已改列法属印度支那栏中，可谓验明正身，尘埃落定。在国外，其常被称为"鸦片贸易银圆"(opium trade dollar)。鸦片名词系英文opium音译，阿芙蓉则源自阿拉伯语afyun。提炼鸦片之罂粟自唐代便由阿拉伯商人引进中国，作为治痢之药。明朝时始取汁制成鸦片，仍以医疗为主。



V-6-02
20世纪初停泊于上海黄浦江口存放鸦片的仓库船



V-6-03
富字一两、半两

产量与种类

富字银饼的制造时间为1943年底至1945年初，为时约2年，产量尚无确切数据。若以当时鸦片产量及产地价格相当于等重的白银来推论，产量总额约400万枚。以此估算，两年时间约平均日产万枚尚属合理，晚清各省自设的小型造币厂大约就是如此规模。由于该地土著习惯银饼到手即熔化改铸，故产量虽多，但与存世量不成比例。据法国钱币专家蒂埃里的介绍，法国士兵离开越南时带走相当数量的富字银饼，20世纪80年代法国的钱币店可大量购得此种银饼，谈不上珍贵。但由于法国、越南皆有同好对此种银饼抱有兴趣，加上我国集币风气日盛，且币面的“富”字又吉利讨喜，目前不但市场价格已不可同日而语，要收齐全套也不那么容易了。

这种外观不起眼的鸦片贸易银圆，一两币有“富”字及“鹿头”两种，可细分4版，半两币只有“富”字一种2版，其中富字币在重量、尺寸上有别；鹿头则分大小，其中以大鹿头为少见。在生产时间的先后上，一般以鹿头币面文字“正银一两”的语法源于“一两正银”的修正而视为后来所造。

V-6-04
鹿头一两

V-6-05
大鹿头一两，较罕见。在制作时间的先后上，一般以鹿头币面文字的语法经过修正为依据，视为后来所造



陆



近代金币与金章

1 大清金币

在古代，由于开采量低，黄金从未在中国货币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也从未出现过流通用的金币。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列强竞相采用金本位制，导致金贵银贱，使银两本位制的中国在对外汇兑上损失巨大，币制改革之议逐渐兴起，但清政府并不积极。甲午战败和庚子之变后，因政府赔款皆以黄金支付，白银兑黄金的下跌造成偿付时所谓的"镑亏"剧增，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外币汇兑价损失。于是朝廷急谋对策，再次仿效西方，从速实施金本位之币制。

中国最早的机制金币——光绪丙午、丁未大清金币

在四起的改革声中，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1903年4月）下令于京师设立铸造银钱总厂，但随即以建厂需考虑取水运煤之便而将厂址改在天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1905年8月），财政处奏报天津厂于五月开机先行试造铜币，并附《银钱总厂简明章程》呈阅："命名曰户部造币总厂。所造三品之币，即文曰大清金币、大清银币、大清铜币，通行天下以归一律。"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总厂试制"大清金币"，币面镌帝号及岁次"光绪丙午年"造，次年再造岁次改丁未（1907年）的金币，这是中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制作的金币，也是清代唯一的一次。由于朝廷对近代货币学的认识非常有限，币制争议没有结论，使清政府在"圆两之争"与"金本位"、"银本位"的各种主张间举棋不定。造币总厂无所适从，忽依前说，忽依后说；许多版本的样币根据不同的提案产生，无疾而终的两款大清金币即其中之一。清末民初的中国钱币有许多令今人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事，只有了解那个时期的特殊背景，方可如中国货币史权威彭信威教授所言"才能说明中国货币史上的许多现象"。一两重的大金币，在行用上不切实际，但金本位之目的是在稳定汇价，并非要使用金币，他解释说"把中国的币值钉住黄金的价值上，人民仍可以用银圆或铜元"。

VI-1-01
光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2011年北京诚轩春拍出品



根据历史资料，银价在跌落后逐渐回升，光绪三十一年时已等于庚子赔款的基准，随后继续攀升。虽然银价的变动会造成其他损失，

但偿付外债时没有“镑亏”的问题，中国在庚子赔款的偿付上还因此有所“镑盈”。金本位制的优点是汇价的稳定和对“镑亏”的预防，此刻对清政府来说，改革的动力大不如前。加上之前朝中重臣张之洞等的反对，尔后形势的发展更削弱它的好处，清政府自然也就没有推行金本位的兴趣了。当时中国黄金开采量非常低，根据美国造币厂 1907 年度的报告，该年中国开采黄金的总量是 6 771 公斤，仅占当年全球产金量的约百分之一，数量根本不足以支撑金币的发行。

大清金币存世量由泉界耆宿的论述中可略窥一二。1943 年 5 月《泉币》第 18 期记载张䌹伯于 1920 年间得吉林厂平三钱银币一枚，意大利外交官罗斯见后愿以丙午及丁未大清金币一对交换；当时厂平市价一百数十圆，而金币每枚不过五十圆。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厂平银币之价犹昔，而金币每品，万金亦不易得”；另戴葆庭在 1943 年 9 月《泉币》第 20 期中提到丁未一两金币“图案简洁，文字纤秀，与丙午金币，同属稀品”，“当时以铸额不多，而金本位制又未确定，流入市侩之手，多熔为饰物，昙花泡影，亦可叹也。民初，其价甚廉，近以金价沸腾，亦随之激涨数十倍”。

因这两款金币呈请制作的公文档案尚未见披露，近年来有若干言论指其为臆造，造成藏家及商家的困扰。2010 年出版的《造币总厂》一书中刊载了曾任职天津造币厂的李伯琦在 1934 年以李国瑰之名发表于《学风》第 4 卷第 6 期上的《中国金币考》内的一段记述颇具参考价值：

“大清金币，光绪丙午、丁未年，北洋厂铸，乃日本雕模，较一般银圆略大，用赤金，重库平一两，背蟠龙文，面中‘大清金币’四字，左右‘丙午’或‘丁未’二字，下‘壹两’二字。”“……袁项城督直时，铸千枚进呈慈禧太后云：‘备慈圣年赏之用。’实则臣贿其君，于《币制则例》毫无根据，故名曰币，实不得谓之币。间有流落人间者，多售于银楼，或改制簪珥。故铸数虽多，而人间见者鲜。”

由于条例此时尚未确立，“无法可违、无法可循”，所根据的是《银钱总厂简明章程》。大清金币的性质或有可非议之处，但其真实性无庸置疑。李伯琦此文指其为日本雕模也解释了何以“文字纤秀”，币模委托日本并非没有先例，如“户部一两”银币即由大阪造币局代刻模具。另其说也与民初价廉及“流入市侩之手，多熔为饰物”之说一致。

大清金币无满文有违体制之说不成立

有一种说法认为，此两种大清金币因无满文而违背大清体制故不被采用，但在此之前的四川卢比、新疆银圆，以及后来试制的几种样币与依据《币制则例》发行的多款银、铜币也有无满文的情况，故此论难以成立。

丙午金币以边道及龙外侧云朵大小，有齿边小云版、光边大云版之分。丁未金币亦有大、小云版，以大云版为罕见。2011 年 1 月在与美国纽约国际钱币展（NYINC）同时举行的 CNG（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Inc.）钱币公司拍卖中，一枚经 NGC 鉴定为 MS64（目前评分最高）的光



VI-1-02
依据《币制则例》量产流通的宣统三年大清铜币十文并无满文，此新国币系列中，只有壹圆银币有满文，此前一年试制的“宣统年造”系列样币中的铜币亦无满文，证明无满文有违大清体制之说不成立



VI-1-03
光绪丁未年造大清金币

VI-1-04
目前评分最高的丙午金币（MS64），2011 年 1 月美国 CNG 出品

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在多轮竞价后以 22 万美元落槌成交，加上 15% 的手续费，总价超过人民币 160 万元；丁未年（评分 MS61），落槌价 6.5 万美元，加上手续费近人民币 50 万元。一般而言，NGC 公司以鉴定世界钱币著称，另一知名的评级机构 PCGS 主要鉴定美国及加拿大币，故目前拍卖公司送评的中国装盒币以前者居多。钱币送鉴定的优点除了真伪的辨别外，由第三方评定品相可以减少买卖双方主观评价的争议，对钱币本身而言也可以得到更佳的保护，避免保管不当而降低了价值。

白云苍狗，世事无常

丙午及丁未大清金币问世时，中国产金量甚少且国力衰微，缺乏推行金币的条件。美国造币厂 1907 年度报告估计中国开采黄金总额是 6 771 公斤，占全球产金量比例仅略超过百分之一。1949 年，中国黄金产量仅逾 4 吨。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已跻身世界主要产金国之列。2011 年，中国黄金产量达到 360 吨，已连续 5 年位居全球第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金生产国。

袁世凯侧像洪宪飞龙金币 2

实现金本位制是晚清及民初政府币制改革的目标，发行金币的构想并未因改朝换代而终止。民国元年的孙像开国纪念币虽有金质的，但只能算银币金样而非金币。民国3年秋，币制局在草拟币制整理办法时，计划新币制分为三期，首先是统一主币，其次是统一辅币，最后为推行金本位。“洪宪纪元”金币就是财政部配合袁世凯登基称帝时，规划发行的一种金币。

袁世凯的皇帝梦 “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

曾任职天津造币厂的李伯琦在两篇文章中均提到此事。《中国金币考》记载：“洪宪金币，成于民国四年冬。其时，袁项城改政体之说甚嚣。周学熙长财政，令总厂铸此，纪念新皇。初议雕袁项城正面像，正面雕刻既艰，费时又久，且印花非一次可成，而大典筹备处，期其速成，急于星火。遂取其易者，用五分面像。是币虽标明拾圆，而周学熙密计，俟袁项城登极，诏下铸若干万枚，颁行各省，饬令倍价收买，预计可筹款若干万元。纪念虽异正币，若借此敛财，亦失币制原理矣。旋帝制取消，此币亦不复铸，惟进呈大典筹备处二十四枚，都中各要人，分有之，留厂者八枚，各重要职员，得其一。中外好奇博古之士，争求此币而不可得，故每枚价值曾涨至五百元。求金币而不可得者，遂将此银质样本镀金，聊以自娱，故世有‘洪宪有伪币’之谣。迨民国九年直皖战后，曹锟据总厂为省有，此币钢模尚在，复私铸二百余枚，然金皆八成。此则真为赝鼎矣，而世人莫之辨也。”



VI-2-01

“洪宪纪元”拾圆纪念金币。袁世凯称帝改洪宪纪元后天津造币厂所制，俗称“小飞龙金币”

《中国纪念币考》还记载：“民国五年造币总厂铸，纯金九成，重库平二钱二分，面袁世凯，军服露顶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飞龙，（龙有两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针，天子当阳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一统意也。（帝国国旗，拟即此式）上中华帝国四字，下洪宪纪元四字，左右拾圆二字，略较小，背边皆轮齿纹，亦意大利技师鲁乔奇雕模，故甚精，时周学熙长财部，令多铸，拟颁发各省县，令长官，倍值收藏，人必一枚，且令劝导士绅收买，谓筹款之一助也。先铸十二枚，进呈大典筹备处，适帝制撤销，遂停再铸，嗣京中显贵，多向总厂索此，乃又铸百枚，以分应之。”

VI-2-02

Giorgi 签字版“小飞龙金币”（非原大）。“小飞龙金币”亦有签字版，存世只有数枚，非常罕见



上述两则记载略有出入，综合后推论此意大利技师乔奇（L. Giorgi）雕模的“洪宪飞龙”金币，总数在120～250枚，亦有罕见的银质样币5～10枚，以往数据中均未见有数量记录，李氏此说至少可供参考。另存世极少的签名版在文内则未提及，也应系技师乔奇自行制作，用以留存纪念，如意大利外交官罗斯就藏有洪宪飞龙金币签名版。罗斯在他1917年的文章

中提到：洪宪飞龙拾圆金币在天津造币厂试制时，由厂长亲自监督，仅制作了极少数呈上，随后模具即运至北京，厂内连样币都没有留下。

过去笔者曾耳闻小飞龙金币因有两种材质而颜色不同，当时，尚认为此并非试造样币而是小批量制作，对为何会使用两种金料而百思不解，如今恍然大悟。至于罗斯谓无样币留厂一事，是厂内各要员朋分之故。

此洪宪小飞龙金币因是西洋人设计，故龙的姿态与传统中国龙纹不同，由于有翅膀且朝“左”飞行，被穿凿附会为“飞向西天”的不祥之兆。这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趣谈。其实大清帝国的黄龙旗，不也是如此吗？



VI-2-03
“小飞龙”半成品铅样（非原大）。“小飞龙”币模雕刻过程中的铅样，龙身无鳞片，两翼也不完整，这是雕刻师在制作到一半时以软质金属打样检视效果。上有“1A FEMM 9.2.16”字样，后半的数字表示日期为1916年2月9日。马定祥旧藏。一般来说，雕刻师在镂刻模具时，会不断地以软质材料如蜡或黏土压印检视其效果，至相当程度时再以如铅之类的软金属试压，多次修正至完全满意后再将钢模进行热处理硬化。此类半成品事后皆由雕刻师销毁或自留，有些成品的铅样，通常是内部审核用，很少流出

VI-2-04
“小飞龙金币”铜样（非原大）

“洪宪纪元”金章

存世有一种非常罕见的二角银币大小的小型金章，正面袁世凯像上方有“洪宪纪元”四字，背面的飞龙采用“宣统年造大清铜币”的龙图；其尺寸与五圆金币相当，原本应是准备发行五圆金币，但龙图占满背面，无空间标示面额。其制作目的颇费猜疑。

根据中国银行1916年（民国5年）12月9日函：“现铸开国纪念币，敝行为应酬各机关之需要，拟备铸本银圆五千圆，商请换给十圆金币五十枚，五圆金币三百枚，一圆金币三千圆，如何交付，统希见复办理。”造币总厂在同年5月回复：“查此项庆祝币，现时正筹开铸，至两种金币售兑如何作价，将来铸行之际，尤应函请部示办理。”据此判断，这两种金币即有面额的“小飞龙”及此无面额的五圆型金章。推测其用途即当纪念章出售以作为“筹款之一助也”及“应酬各机关之需要”。

另有以民国3年袁像二角银币正面模搭配的金章，可能是试作或戏作，无论其产生于何种背景，这些特殊时代所造就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均值得珍藏。



VI-2-05
袁世凯像“洪宪纪元”小型金章。推测原本计划发行五圆金币，因筹备过于仓促而使用宣统年造大清铜币的龙图，无空间加上面额

VI-2-06
民国3年袁像小型金章

袁世凯像洪宪飞龙金银章 3

袁世凯背弃民国，复辟帝制在当时是件大事，然而在制作“洪宪纪元拾圆”金币这一带有“中华帝国”开国性质的纪念币时竟无发行银币的计划，令人颇感意外。或许确如李伯琦《中国金币考》“正面雕刻既艰，费时又久，且印花非一次可成，而大典筹备处，期其速成，急于星火。”可以解释。

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银章

存世有与小飞龙金币设计相近的无面额大飞龙银章，李伯琦在《中国纪念币考》文中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描述，尤其用“今特表而出之”作为结语以示慎重。特抄录全段如下：

“洪宪一圆纪念银币，成色重量一如通行币，面袁世凯大元帅冠服像，即义技师所雕，一圆共和纪念银币旧模，背飞龙，同洪宪纪念金币，放大而去拾圆二字，此币实戏为之也。乃民国八年，造币总厂诸雕刻学生，从义技师习雕刻，艺已成，平时皆取其师之已雕成者，摹刻之，予偶见唐学生，摹刻飞龙模最佳，因命再刻，去拾圆二字，复取袁像，共和纪念币旧模合印之，百枚，略分赠本厂重要职员及友人，余藏之，未便示人也。后予去职，留模未毁，后来者，取而印多枚出售。复以六七成金印之，号称洪宪大金币，重价出售。”

“某君亦喜藏古今泉币者也，某年见予所藏近代各币，曰，君藏虽高富尚无洪宪大金币，我昨以百圆易得一，可喜也，言之有傲色，予曰，赝鼎也，洪宪时，那得有此，某君正色，力辩非伪，且述其所闻以讹传讹之掌故，以证之，予不觉哑然失笑，曰勿与予争辩，他人可不知，予焉能不知，伪即予所作也。予不过印银耳，后人变本加厉，又印金矣，且予留以自玩，自欺未敢欺人诈财也。并为述其始末，某君不觉傲色立消，嗒然若丧矣，予一时好奇，而戏为此，若不言，终无知者，即当时虽有知者， 数人，今或已均不在人世，即伪印金以欺人者，虽知本无金质者，或尚不知，并银亦为伪造，予虽无欺人之心，终恐收藏家为予所误，今特表而出之。”

以上即此俗称“大飞龙”银章

VI-3-01
大飞龙银章





VI-3-02
大飞龙金章签字样

被称为“戏作币”的由来，由李伯琦的“予虽无欺人之心，终恐收藏家为予所误，今特表而出之”的口气可知是慎重其事而非戏言。因背模非意大利技师乔奇雕模，故老一辈收藏家有不同看法，如前香港钱币会长张璜在其《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内写道：此乃造币厂雕刻师所作，且经厂长下令制成，可收入书中；而配上签字版未列入，由读者自行决定是否有收藏价值。另有羽毛冠接近币缘的“冲天冠”版，工艺粗糙，明显是不同雕刻师的手笔，可作为确有徒弟临摹之佐证，笔者认为，亦应归入“由藏家自行决定是否有收藏价值”之列。

此外据笔者观察，所有乔奇雕刻的币章均有其签名，只有此大飞龙没有，由小飞龙的例子来看，乔奇在正面采用的是“袁三”图样而把签名刻在背面，若洪宪纪念飞龙银章是其手笔，必然也会镌上。仔细比较龙图时



VI-3-03
大飞龙“冲天冠”版。雕工无法与乔奇的作品相比，显然非其手笔



VI-3-04
大飞龙铜样。马定祥遗藏之大飞龙签字红铜样，仔细比较有所不同，又是另一“他人雕刻”的佐证

发现，两者的形状略有不同，与惯例不符。大飞龙上既没有面额，也未标示重量，也不同于后来的段像“执政纪念币”及徐像“仁寿同登纪念币”，在其上标示为“纪念币”，故在此视之为“纪念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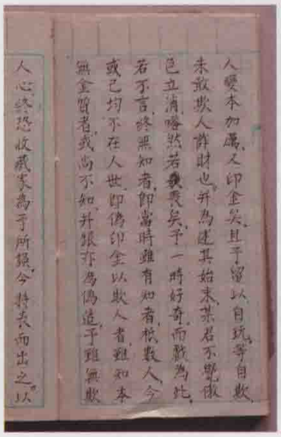
本世纪初，笔者在美国加州长滩钱币展（Long Beach Coin Show）上，见有一展位展出“美国费城造币厂制袁世凯像金章”，经PCGS鉴定装盒品级为MS63，索价1.5万美元，并附有当年客户委托文件及收据共3张，文件有George T. Morgan的署名，即摩根银圆的雕刻师。由其上记载而知此章乃1921年11月间美国知名币商Henry Chapman委托提供模具的费城造币厂代制大飞龙金章25枚、银章50枚。3月时先期制作了大飞龙金章3枚，材料费81.65美元，代工费3.13美元，管理费0.52美元，合计85.3美元。其余于11月制作，黄金材料费610.57美元，白银材料费68.39美元，合计材料费678.96美元，另加代工费93.22美元。看来李伯琦所说的“后来者”非但加印银章多枚、搞出个大飞龙金章，最后索性连模子都卖了。

目前市场上并不受其为“戏作”的影响，各版大飞龙包括金章在内仍然是热门之品，深受藏家喜爱。好的藏品是不会寂寞的，“自娱并自若，莫管他是是非非真真假假徒乱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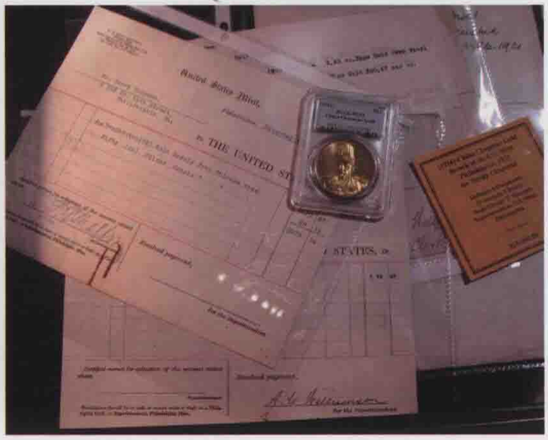


VI-3-05
大飞龙金章。李伯琦表示，在其离职后继任者又加制金质若干

VI-3-06
大飞龙金章异版。此枚与一般所见又有区别，正背面细节均有出入，以羽毛冠及肩章处最明显。证明有多人雕刻，才能出现多种版本



人變本加厲，又印金矣，且予留以自玩，等自欺，未敢欺人覬財也，并為述其始末，某君不覺微色立消，嗒然若喪矣。予一時好奇而戲為此，若予不言，終無知者，即當時雖有知者，僅數人，今或已均不在人世，即偽印金以欺人者，雖知本無金質者，或尚不知，并張冠為偽造，予雖無欺人心，終恐收藏家為予所誤，今特表而出之，以



VI-3-07
《中国纪念币考》抄本节录。“勿与予争辩，他人可不知，予焉能不知，伪即予所作也……虽无欺人之心，终恐收藏家为予所误，今特表而出之。”

VI-3-08
大飞龙金章美国版。2002年美国加州币展出现名家收藏的美制大飞龙金章，附造币厂明细表。显示费城造币厂代制大飞龙金章25枚、银章50枚。当时黄金每盎司20.67美元，照片中的金章去向不明，而相关文献于2012年4月香港Ponterio拍卖时，以2988美元售出

4 袁世凯像嘉禾金币

财政当局始终怀有推行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的念头，除了前清时的大清金币两种外，1919 年天津造币厂又尝试制作了袁像嘉禾金币两种。这是中国近代首次以中央名义正式对外制作发行的金币。

民国 8 年袁世凯像嘉禾金币



VI-4-01
民国 8 年袁世凯像贰拾圆金币。正面自民国 3 年袁像银圆的图案修改而来，背面仍用嘉禾图案，两面皆有边饰花纹

VI-4-02
民国 8 年袁像拾圆金币

1919 年（民国 8 年）天津造币厂以原民国 3 年袁像系列银圆的图案为原型，再度尝试发行金币，制作面额为“拾圆”及“贰拾圆”金币两种，由当时财政总长曹汝霖负责此案。1920 年 11 月曾拜访天津总厂的伍德华对此记述颇为详细，被耿爱德引用于《中国货币论》内，其译文为：“此币非临时纪念性质，盖其时当局确有制发金币供应市面流通之计划。惟嫌发行过早，事前筹划未能周详，故结果如昙花一现，旋即消灭。此币所造不多，出厂后即由政界、银行界及收藏家搜括一空，绝未能在市面流通。”

李伯琦《中国金币考》有载：“民八十圆、二十圆金币两种，均民国八年总厂铸，亦鲁乔奇雕模，用美国币制花纹，与一圆袁像大圆相同，惟面背四周，多汉文边耳。某年，《晶报》载袁寒云所纪，谓民八十圆金币正面与洪宪金币同一模，大谬。民八十圆金币，不特较洪宪金币多汉文边，且袁像亦较小多多矣。”“依据币制例，可完全称正币者，惟民国八年十圆、二十圆金币耳。是时与日本有币制借款之议，名为币制借款，实则供安福系之用。不得不略事鼓铸，掩人耳目。嗣借款之议未成，金币亦停铸。所成者十圆八十枚、二十圆四十枚，徒供世人把玩耳。”

笔者比较，此两种金币之袁像是采用二角与一角银币的冲头，而非洪宪小飞龙金币的袁像，故“较小多多矣”。其所提到的袁寒云，是袁世凯次子。

事实上，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战各国大多是实施金本位制的主要国家，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各国纷纷发行不兑现的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金本位制于是开始瓦解。战后直到 1929 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一段稳定时期内，各国曾企图恢复金本位制，但由于金币流通的基础已被削弱，无法恢复如前。北洋政府在发行这两种被认为是最典型的金本位金币时，金本位制已经式微。用一句商界的话来说，民国 8 年袁像金币在上市前就已是过时的产品；但若是为了敛财或派系私利而发行，那就另当别论了。



VI-4-03
拾圆金币铜样

5 唐像金币与滇字金币

1919 年（民国 8 年）10 月 8 日，云南拥有发行货币特权的富滇银行奉督军省长公署训令，以讨袁护国战争时曾发行“以志拥护共和之盛”的纪念银币，但以仅搭放军政机关之薪俸而流传未能普及为由，再度致函云南商务总会“宜铸金币流通行使，俾人人于共和纪念永志不忘”，由富滇银行发行金币两种：甲种每枚重库平二钱五分，合本省通用银币十圆；乙种每枚重库平一钱二分五厘，合本省通用银币五圆。并订次日先发行已制妥之甲种十圆金币，至于乙种五圆金币，当时尚未制成，“俟铸出发行时再为照印式样，送请查照”。

唐像“拥护共和”纪念金币

发行金币的目的其实并非引文中官样文章所说的那般冠冕堂皇。根据海关《蒙自口报告书》记载，真正原因是银根紧缩。主要是云南财源以往仰赖个旧矿场所产之锡出口换取大量现金，此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国际锡价在欧战终止后跌落、南洋锡加入竞争、滇锡纯度不如南美新法开采矿区所出且内含砒霜，导致最大客户美国不再购用等）而滞销。个旧锡业之萧条可由矿工人数从一战期间的 11 万人骤降为停战后的 3 万人可知。然而，进口物资反而增多，造成现金流失，当局遂下禁令管制银圆出口，而商人却将在外销货所得留置境外以便偿付进口货款来对应。如此一来，银圆更加缺乏。对此困境，富滇银行只有发行纸币应付，这样便造成纸币充斥市面，于是民间囤积之风更盛，形成恶性循环，富滇银行亦受其害。

一战结束后，银价上涨，金价下跌，欧美黄金大量售至远东地区，此时滇锡在香港的存货亦换得黄金 30 余万两。富滇银行于是大肆购买金条及外国金币，认为银价高涨若发行金币将不会被熔化改售，因为此“当银币拾圆”的金币，其材料只值银币 8 圆。据说刚发行时“农民疑为铜质，尚未肯收用，宁愿收用纸币”。

五圆金币在次年初才发行，初期两者通行无碍。不过唐像金币有法定面额而缺乏价值弹性，且找零不便，对市面交易帮助有限；加上这一年银价也开始滑落，金币价值倍增后，“该金币遂泯然无迹”。虽然年底时公告禁运金币出口，但金条、金叶形式的黄金依然可取得出口许可，故 1919 年共有价值关平银 314 262 两的黄金自云南出口。

海关资料显示，十圆金币在 1919 年 10 月发行至年底时已达 900 万圆，即相当于 90 万枚。其他数据表示，次年的五圆金币到秋末冬初时已超过 600 万圆，即至少 120 万枚；不过亦有五圆金币的发行额折合 100 万圆及



VI-5-01
“拥护共和纪念金币当银币拾圆”无数字版，NGC MS62。埃及逊王法鲁克（King Farouk）旧藏，1954 年被埃及政府拍卖。1974 年在纽约现身，被华裔陈氏家族购入，美国 Ponterio 公司征集后于 2011 年 8 月在香港以总价 26 888 美元售出，约合人民币 17.2 万元。同场次另一枚法鲁克王旧藏无数字版 NGC MS61，成交价 16 730 美元，1 分之差竟然少卖了 1 万美元，价差约三分之一



VI-5-02
唐像“当制钱五十文”纪念铜币，直径 39 毫米，有红铜及黄铜两种材质

30 万圆的说法，若属实，则其数量在 6 万～20 万枚。由于金价的持续上涨，商人有利可图，纷纷把这些金币运往沪、港甚至缅甸销售，1922 年富滇银行发出通告限期收回，委托金铺熔化后售至沪、港等地。这两种唐像纪念金币因为是代督军省长公署制造而交富滇银行发行的，故云南造币厂历年统计报表上未列，准确数量无从查证，但存世不多。

1916 年（民国 5 年）伦敦市场上金银的比价是 30.1∶1，此后逐年下跌，到 1919 年金币发行时跌至 16.3∶1，次年更是滑落到 15.3∶1，但探底后旋即回升至 25.5∶1，1922 年时达到 27.4∶1，后市更高，币材价值是面额的两倍自然会令钱币从市面上消失无踪。所谓“拥护共和”纪念金币其实是唐继尧利用当时金价低落的机会，想在云南实施金银复本位制，以取巧方式解决因银币缺乏引起的金融困境，美其名为“永志不忘”，而非真心“拥护共和”而纪念。不过，这是中国货币史上首枚真正流通的金币，比起其他只是样币或制成而没有发行的金币，应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与历史意义。此外，唐像币还是金、银、铜 3 种材质俱全的近代机制币，值得大书特书。

唐像纪念金币上的数字

富滇银行发行的唐像纪念金币，在背面的旗帜下有一个阿拉伯数字，这个数字在当时也引起疑虑，在发行后的当月底，外交部特派云南交涉的官员徐之琛即接获法方照会，询问市面五圆金币与 10 月间所送币样不同，除颜色较浅，重量、成色不一外，旗下有 1 字，且该币遭滇越铁路公司、东方汇理银行等拒收一事，并请“明白示复”。

此函直到次年 6 月中方才发文回应：“查国旗下未有 1 字之金币是初次所造，国旗下有 1 字之金币是此次所造……一律行使，由政府完全担保，按币面定价兑付银币。”虽如此说，但以往国内硬币加造时似无此习惯，何况五圆金币尚未发行，实际生产形制与提交金融机构样本不符确实令人不敢轻易接收，且公函上只确认加字版是真品而并未说明真正的原因。对中国钱币素有研究的史博禄就这个谜团提供了解答：1935 年，大英博物馆收到一套捐赠的云南金币，附带一封短信，提到十圆金币发行后币模即告失窃，之后造币厂在新币模上面加刻数字“1”或“2”以示区别。由于五圆金币并没有同时发行，因此无数字的只有样币而没有流通币流出；如此作伪者若以官模私造低色劣币将无法得逞，并会被寻线破获。这也解释了

VI-5-03
“当银币拾圆”背“1”，直径 24 毫米，重 8.5 克

VI-5-04
“当银币伍圆”背“2”，直径 19 毫米，重 4.5 克



何以无数字之十圆金币罕见的原因，除生产期短、产量低外，民众因担心被部分机构拒收而至发行的富滇银行换取新版。至于无数字的五圆目前尚未发现，因为只有样币送金融机构，故可能皆被收回销毁。伍德华与耿爱德的文献上注明无数字十圆金币背面珠圈数目是103粒，有数字的是99粒；他俩都没有见过无数字版五圆金币，耿氏书中只有编号而没有图片。

“滇”字拾元及伍元金币

此币面镌“滇”字及面额“拾元”或“伍元”的金币，其出处和性质并不明确。按泉界一般的说法，认为是1927年（民国16年）云南范石生部移防广西时，在百色制成作为发放军饷之用。属稀有品种，但制作粗略，容易仿冒。

自民国成立后，硬币上常以五谷嘉禾为图案，取丰岁足民、劝农务本之意，“滇”字金币也是如此，是民国钱币的特色之一。

范石生（1887—1939），滇军将领，曾加入同盟会，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在滇军服役时立有战功。后追随孙中山先生，任师长、军长，授上将军衔。1932年辞职，以军事参议寓居庐山。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范石生回云南昆明行医，1939年遇刺，不幸身亡。



VI-5-05
“滇”字金币拾元

VI-5-06
“滇”字金币伍元

6 龙凤觳觫金币

龙凤觳觫图案除了出现在民国12年一圆及民国15年二角及一角银币上以外，还出现在一种极罕见的民国15年“山东省金币”上。这枚金币也是采用此所谓带有“浓厚帝王色彩”之封建时代象征的标志为主图案。

民国15年“山东省金币”

有关此山东省所造的“拾圆”及“贰拾圆”金币的文献资料非常缺乏，由于山东当时没有造币厂，而此两种金币工艺又十分精美，形制与民国15年龙凤二角、一角大致相同，觳觫图案应是使用同一冲模制作，推断应出自天津造币厂。此时掌握鲁省军政大权的是声名狼藉、外号“狗肉将军”的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其绰号来自其爱推牌九，并非爱吃狗肉的嗜好，据说他有各国籍之姨太太35 人，由于记不得名字给她们每人一个编号。

这两款漂亮的金币制作数量非常稀少，可能是金料缺乏之故。有说某次张要晋升部下为将军颁发勋章时，因为金子不够，他竟用香烟盒的箔纸做成星星的形状来代替。有趣的是，当年因金料不足没有生产，如今山东省的黄金产量居中国首位，2011年产量超过100吨，创历史新高，成为中国第一个黄金年产量超百吨的省份。

VI-6-01
民国15年“山东省金币”拾圆。2011年诚轩春拍出品，品相极佳，没有鉴定入盒，以总价人民币34.5万元成交。





VI-6-02
民国15年“山东省金币”贰拾圆。此枚于2011年8月在香港拍卖会拍出，埃及逊王法鲁克旧藏，由于流传有序的名人效应加上品相颇佳(NGC MS-64)，以总价179 250美元售出，约合人民币115万元。同场次另一枚法鲁克王旧藏NGC MS-63的拾圆金币，成交价是89 625美元，约合人民币57万元

7 孙中山像布图金币

1949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入上海，“中央造币厂”于 4 月底迁台，同时筹划在成都设四川厂，并于 8 月 1 日起生产金条、银圆供饷项之用。在此期间，四川厂除试制民国 38 年金币及多款样币外，还试制了孙中山像布图计重金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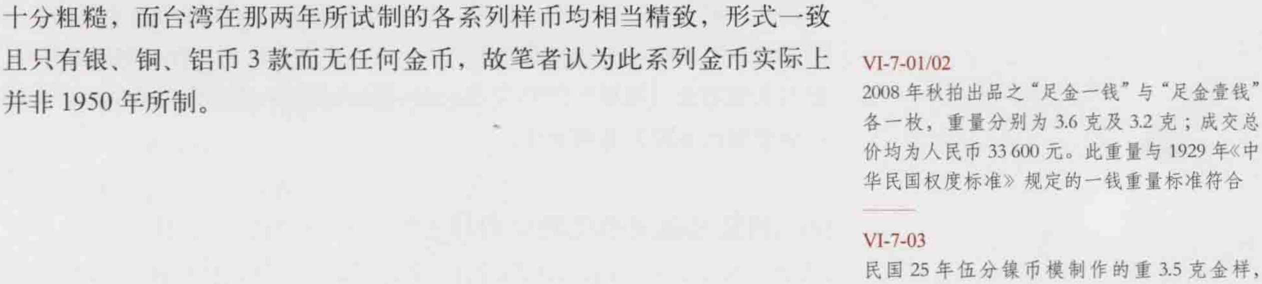
计重的“民国三十九年”孙像布图金币

孙像布图金币共有四钱、二钱及一钱 3 种重量，币模系由布图镍币修改而成，四钱及二钱使用的是原民国 25 年廿分及拾分镍币中“A”厂记之奥地利版模具，一钱采用民国 29 年伍分镍币模具。三者将纪年修改成“民国三十九年”（1950 年）并去除了背面的纪值文字。标示计重一钱者有“足金一钱”与“足金壹钱”两种；计重四钱及二钱者背面无文字。耿爱德在查证此样币的真实性时曾函询政府某权威人士，这位授意制造此币但不便透露姓名的高官表示：在通货急剧膨胀时，发行不能兑换的纸钞已毫无作用，故当时试图制作包括小型金币在内的金属硬币，但因没有足够黄金，并未实施。

由于 1949 年年底时成都亦即将解放，四川厂遂于 12 月 8 日停工，故此样币虽镌刻“民国三十九年”，推测应是前一年雕模试制而预备次年发行。若是“三十九年”所制，则应是迁厂后生产于台湾；但此组模具十分粗糙，而台湾在那两年所试制的各系列样币均相当精致，形式一致且只有银、铜、铝币 3 款而无任何金币，故笔者认为此系列金币实际上并非 1950 年所制。

VI-7-01/02
2008 年秋拍出品之“足金一钱”与“足金壹钱”各一枚，重量分别为 3.6 克及 3.2 克；成交总价均为人民币 33 600 元。此重量与 1929 年《中华民国权度标准》规定的一钱重量标准符合

VI-7-03
民国 25 年伍分镍币模制作的重 3.5 克金样，此币应是与上述金币在同一时期改模之前的试制币，并非民国 25 年时所造



8 金圆券金币

"盛世收藏，乱世黄金"，在通货急剧膨胀之时，发行不能兑换的纸钞已毫无作用，国民政府在1949年这中国近代史上动荡最激烈的当头，试制了小型金币力图以最后一搏来稳住崩盘中的金圆券，但终因缺乏足够黄金而未能实施，金圆券金币亦成为中国近代金币的绝唱。

抗战胜利 法币贬值

自1935年（民国24年）11月4日起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改行法币政策后，中国正式走上以纸钞为主币的管理通货制之路。由于实现了币制的统一，至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物价仅有轻微上涨，工商贸易均转趋繁荣，法币政策堪称成功。抗战期间，战火波及皆为较富庶的省份，除沿海港口全数失陷不能收取关税外，沦陷区亦无税可征，各地的税收也都锐减，军费及各项开销则极为庞大，物价上涨自难避免。至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并未有好转，通货膨胀更严重至无法收拾的地步。以发行额而言，抗战前法币发行约14亿圆，胜利时已是5 500余亿圆的惊人数字，8年暴增400倍。以汇率来说，抗战爆发以前，1美元可兑法币3圆4角，官价与市价同；抗战胜利时官价为20圆而市价已到439圆，1948年（民国37年）8月官价暴跌为12 000圆，而市价到了令人咋舌的48万圆。若以黄金计，抗战初期每市两合法币100圆，其余同期分别是17.5万圆与6亿圆，涨幅高达600万倍，法币形同废纸，信用无力维持。有关法币及金圆券之发行情况，因数据来源不同而有所差异，以上数据来自前"中央银行国库局"副局长党恩来（宇平）1983年在台北《钱币天地》杂志所发表的《中央银行钞券发行史料》系列著作。

兵荒马乱间筹备的金币样

为挽救颓势，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并于民国37年（1948年）8月23日发行金圆券。法币每300万圆折合金圆券一圆，以金圆为本位币，每圆法定含金0.222 17克。金圆券发行额在10月底前尚未超出原定的20亿圆，故初期的确暂时稳住了市面金融，但之后兵败如山倒，金圆券改革终以惨败收场。当局在军事上连番失败，9月济南，10月锦州、长春，11月沈阳等战役以及12月关键性淮海会战的惨败，宣告军事上大势已去；而金融上入不敷出又无法获得外部贷款援助，债台高筑之下，金圆券在极短的时间内重蹈了法币滥发的覆辙，发行额在1949年1月底暴增至200

余亿圆，至4月底南京失守时已达到了以兆计算的天文数字，物价较币改初期已膨胀100万倍。当时财政山穷水尽，收入仅及支出的5%～10%而已。且美国特使马歇尔调停国共和谈失败，于1947年1月返美任国务卿后致力推动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并停止对华援助，不打算对摇摇欲坠中的国民党政权伸出援手。金圆券币值一落千丈后即告崩盘，而民众也纷纷自行开始使用银圆，除上海的中央造币厂在1948年11月恢复生产银圆外，各省亦自行筹银制造。银圆虽可通行，惟数额较大时，要用金条才能应付。在此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中央银行曾规划制作新版金银币多款，但均未发行，其中特别在1949年间以银、铜试制多种金币样，但因局势的剧变无疾而终。

民国38年金圆金币

金圆券发生通货膨胀的初期，国民政府为维持金圆券信用，于1948年11月11日由行政院通过《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以金圆为本位币，每圆之法定含金量为0.044 434克（按：即贬值80%），由政府铸造交由中央银行发行之。”在这种构架下，中央造币厂筹备雕刻了一系列的金币，面额分计值与计重两种，以往认为是在成都的四川分厂制作。两面内齿采用类似袁像五分镍币的边饰，背面的嘉禾设计亦十分类似。

（1）计值系列

⊙“金币贰拾元”

正面除纪年“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外，还标示“金币”二字，背面刻面额“贰拾元”，直径19毫米，只有铜样存世。

⊙小“金”字“当银元贰拾元”

中心有圆孔设计，正面除上方为相同年号外，下方刻“当银元贰拾元”六字，背面为嘉禾环绕圆孔，上端镌刻“金”字，直径21毫米，仅见满穿之镍样。

⊙小“金”字“当银元拾元”

设计同“当银元贰拾元”，正面下方刻“当银元拾元”五字，直径17.5毫米，存世有未穿孔银样及铜样两种。

（2）计重系列

⊙大“金”字“伍钱”

正面设计为梅花形图样中刻一“金”字，绕以链条形饰圈，国名与纪年分列上下；背面刻面额“伍钱”二字，衬以嘉禾。直径28.2毫米，齿边，存世有银样及铜样两种。



VI-8-01
“金币贰拾元”金币铜样

VI-8-02
小金字“当银元拾元”金币银样



VI-8-03
大“金”字“伍钱”金币银样

VI-8-04
大“金”字“贰钱伍分”金币银样

VI-8-05
小“金”字“贰钱”金币银样

VI-8-06
小“金”字“壹钱”金币银样

⊙ 大“金”字“贰钱伍分”

设计与大“金”字“五钱”同，背面刻面额“贰钱伍分”四字，直径21毫米，也只有银样及铜样两种样币存世，另见有单面铜样。

⊙ 小“金”字“贰钱”

形式与中心有圆孔设计的小“金”字计值系列类似，但正面国名与纪年上下分列，圆孔两侧为“贰钱”二字；背面完全相同，有银样及铜样两种样币存世。

⊙ 小“金”字“壹钱”

设计与上同，圆孔两侧为“壹钱”二字，直径17毫米，有银样及铜样币两种样币存世。

此计重系列的规格应是参照国民政府1929年（民国18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权度标准》设计制造的，该标准规定重量计量以公斤为标准并与市斤通用，即1公斤等于2市斤，1市斤为16两，1两为10钱重31.25克。1钱等于3.125克。

（3）无面额系列

此币正面上方为“中华民国”，下端为纪年“三十八年”，中心梅花图样绕以链条形饰圈，背面嘉禾设计类似“袁大头”，但未标示面额，一般认为是在四川成都造币厂筹备雕刻。此直径38毫米，重仅26.2克的银样，由于币面未标示“金”或“金币”字眼，有说是恢复银本位之试制一圆银币样，亦有认为是一圆金币银样，但上海造币博物馆藏有一只背面铭文为“壹两”的币模，故应为“金币壹两银样”。

VI-8-07
无面额的“金币壹两”银样

以上金币共计8种版式，样币材料则有银、铜之别。由于是在动乱时期所制，数据十分缺乏。在泉界文献记载中，以耿爱德与葛拉汉（David Graham）在美国集币协会《集币家》杂志1957年所发表的 *Coinage of the Chinese Émigré Government 1949—1957*（《1949—1957年间中国流亡政府试制币》）小册记录得最为完整。耿爱德是著名中国机制币大师，在华居住47年；而葛拉汉在当时台湾主要负责经济援助运作的美国“驻华共同

安全分署”(Mutual Security Mission to China),即后来的“美援公署”。此二人对中国钱币研究均极为深入，加以身份特殊，故集有上述除壹两银样外的全套金币样本，其文中表示，计值与计重两系列是雕刻师董益谦在台北所作,没有发行任何金币成品,只有银样及铜样,保存在台湾银行、“中央银行”、“财政部”及台北“中央造币厂”。

按董益谦毕业于天津造币厂雕刻学校，承袭该厂洋技师乔奇技艺，1936年（民国25年）进入上海中央造币厂，故仿袁像镍币之边饰有脉络可寻。1949年迁厂时，董未至台北。上海造币厂复工后，担任雕刻技师。

综上所述，此8种版式之金币模具出处可排除耿氏制作于台北之说。因这些银样及铜样多在上海发现，且上海造币博物馆藏有一只铭文“壹两”的背模，故可能是在上海造币厂雕模；另一种可能是董益谦在四川厂时所作，上海造币厂所存币模在其复工归建时缴库而得。至于是否有部分模具在台湾，还有待进一步的查证。

计划赶不上变化

总体来看，中央银行筹划金本位制的构想可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当金圆券匆促发行时所计划推出的民国37年伍角银辅币虽在一个半月内完成模具准备并开始生产，所制成的8万余枚来不及出厂就销毁了。而民国38年的“金币贰拾元”，以其铜样的尺寸来看，其成品约重5克，应该是按原发行办法的“每圆法定含金0.222 17克”的金本位制设计的，但紧接着的《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使规定的含金量减至约0.4克后即作废。诚如筹备者所言：在通货急剧膨胀时，发行不能兑换的纸钞已毫无意义，即便是贵金属硬币，其上标示的面额也已与现实脱节。在兵败如山倒的局势下，一切都是白费心机，试图制作金币不如制作金条。在局势动荡及物价大幅上涨的双重困境之下，纸钞如粪土，只有大额用金条、小额用银圆才能应付。

当局在兵荒马乱时期筹备发行的这些金银币，留给后人更多的是一段触目心惊的历史与无限感慨。



VI-8-08
民国37年伍角银币。已制妥8万余枚未发行而销毁，存世仅有少量银币及若干铜样。通货膨胀时，即使是贵金属币，所标示的面额也已与现实脱节

本节所附的民国38年金币银铜样为马定祥旧藏，征得其哲嗣马传德同意后摄影，并由其提供规格数据。民国37年五角银币为北京诚轩拍品。



VI-8-09
金圆券崩盘后币值一落千丈，由此同为民国38年发行的金圆券纸钞其面额为壹佰万圆，可知通货膨胀的速度。金圆券纸钞面额最大为伍佰万圆，但形同废纸，此时只有银圆与黄金具备实质的购买力。由于绝大多数的金圆券为蒋介石肖像，其在世期间台湾所发行的新台币纸钞皆无蒋氏肖像，可能是财政当局为了避免勾起民众不必要的回忆与联想

9 伪“满洲国”金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占领东北后，1932 年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同年设立“满洲中央银行”，发行所谓“国币”以统一该地区紊乱纷杂的各式货币。初期实施不能兑换的虚银本位制，1935 年废除，采用通货管理制，挂钩日本金圆，成为日币的附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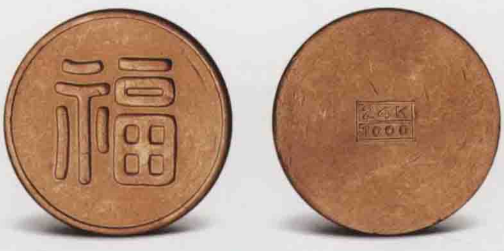
伪“满洲中央银行”的“金币”

“满洲中央银行”曾制作“金币”多种，一般如耿爱德 1954 年著《中国币图说汇考》所载，认为是该行成立时所制。然而耿氏后于美国集币协会（ANA）1959 年 5 月份的 *The Numismatist* 刊物上发表新论，指出正确制成时间是 1944 年，当时霸占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军部为加强支撑“满洲中央银行”的纸币，饬令大阪造币局制作足色“金币”一批，作为该行的货币发行准备。此批黄金的数量不详，据悉在次年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自东北的银行掠走价值约 300 万美元的黄金，按当时的国际金价换算，应在 8.5 万盎司以上，故可能大部分被苏军劫走。耿氏指出，这批金币虽由国家造币厂制作，尺寸、成色、重量精准，但未标示发行国家、面额或重量，也没有齿边之类的基本防伪设计，故其属性有待探讨。



VI-9-01
大福金章。1944 年日本关东军令大阪造币局造“福”字金章。背面成色印记在下方，尺寸较大，重 37 克

目前发现的存世实物，重量上只有 31.25 克及 37 克两种，前者的重



VI-9-02
小福金章。背面成色印记在中心的“福”字金章，尺寸较小（30 毫米），重 31.25 克



VI-9-03
富贵万年金章。成色印记在背面中心，尺寸较小(30 毫米)，重 31.25 克

量依据应来自国民政府 1929 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权度标准》，该标准规定重量计量以公斤为标准并与市斤通用，即 1 公斤等于 2 市斤，1 市斤为 16 两，1 两为 31.25 克。按这些“金币”正面汉字的不同、背面 24K/1000 成色印记形式的差异来区分，共计 10 种版式，其中以正面“禄”字最少，耿氏仅辗转获得一幅由大阪造币厂厂长提供的素描图。由于这些“金币”的详情是在其著作出版后获悉才撰文公开，故此信息并未在国内广泛流传，国内一般仍以为是抗战前所制。

“满洲中央银行”的纸钞发行准备用“金币”，以“福”字较多见。虽成色、重量精准，但设计简单，亦无精致图案，因而极易仿造，收藏者应仔细比对，慎防伪品。



VI-9-04
由大阪造币厂厂长提供耿爱德的素描图，以正面“禄”字章最少

“满洲中央银行”

“满洲中央银行”是 1932 年合并了原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省官银号与边业银行而设立的，同年 7 月 1 日正式开业。总行大楼坐落于吉林长春，为西方古典风格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地上 4 层，地下 2 层，由日本西村设计所设计，大林组施工。1934 年 4 月动工，1938 年 8 月主体落成，是伪满时期称“新京”的长春最大的建筑工程。



VI-9-05
吉林长春的“满洲中央银行”总行大楼

10 中央造币厂金条



VI-10-01
金条在中央造币厂内被打上戳记

黄金自古以来就受世人喜爱，也是时局动荡时最常被当成保值工具的物品，业务应以造币为主的中央造币厂即多次因形势所需而铸金条。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不外乎收兑黄金以防止黄金外流、充实法币准备和抑制通货膨胀；抗战后期采取的是抛售黄金与黄金储蓄并用政策，以稳定币制；内战时期则由于通货急剧膨胀，被迫再度铸造金条。

抗战进入尾声之际，因黄金储蓄到期，内迁的中央造币厂特别在重庆租用厂房，把从美国进口的400盎司大金砖冷轧切割，改制成小金条，1945年8月至1946年2月间共制出各种重量的小金条42.7万余根，总计144万余市两。昆明分厂亦铸黄金厂条8万余市两。

中央造币厂迁回上海后，因金圆券发行失败通货膨胀急剧恶化，交易必须使用黄金、美钞及银圆。除再度奉命开工生产帆船银圆外，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间，中央造币铸造计重153万市两的金条111万余根。1949年8月才再度在成都开工的四川分厂，赶制银圆外也兼铸金条，10月间战况危急出现挤兑时曾通宵加班，计造重27.8万市两数量不详的厂条。

这类打上孙中山肖像、布图与“中央造币厂制”戳记的各款金条中，有一种标示“饰金原料成色八七五”者，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在台湾为供应银楼首饰业者及工业用金原料而发行的，其成色低是因当时环境特殊，台湾当局对黄金还有处于管制阶段，与前述代用货币性质的厂条的意义不同，台湾直到80年代才放开黄金条块的公开买卖。

以上的厂条或饰金原料的戳印、字轨、成色及形式各有不同，重量有10两、5两、3两、1两及5钱、1钱。

VI-10-02
规格少见的“民国三十四年中央造币厂铸”布图3两厂条，成色99.6%，重量92克

VI-10-03
有孙中山肖像、布图与“中央造币厂”、“饰金原料成色八七五”戳记的5两金条







柒



苏维埃红军银圆

苏维埃红军银圆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1927年国共决裂后，于各地控制区域内组织工农建立苏维埃政府。在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地处经济落后地区，时常受到封锁及包围。为维护与稳定根据地的金融，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红军开办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设厂所造银圆分两类，一种是可以到国民政府统治区（白区）使用的仿孙像及袁像银圆，一种是在根据地（苏区）流通的苏维埃银圆。

苏维埃共和国银圆

以“苏维埃共和国”名义发行的银圆，最早是1931年红三方面军第八师在湖北房县所设立鄂北农民银行，发行正面为列宁像、背面为镰刀斧头图的“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国币”壹圆。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同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后才成立的。次年红军撤离后停止发行。这种银圆为手工打造，工艺粗糙，因其发行时间短，至今留存极少。



VII-01
列宁像“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国币”壹圆。工艺粗糙，存世甚稀，尚未发现品相完好者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行址设在瑞金叶坪。同年开始制作二角银币及五分、一分铜币，数量颇多。二角银币有1932、1933两个年份，但目前所见多数为1933年版。1934年10月，红军主力撤出进行“长征”，遂停止发行。

川陕省工农银行于1933年发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造币厂造”壹圆在该地区流通使用。这是苏区银圆中存世量最多的，此版有1933、1934两个年份，前者罕见，大多数为1934年版，以正面五星及背面镰刀、



VII-0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贰角，1932年版，此年份的少见



VII-0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贰角，1933年版



VII-04
“川陕省造币厂造”壹圆，镰刀在上



VII-05
“川陕省造币厂造”壹圆，铁锤在上

VII-06/07/08
1934 年川陕省造币厂造版别甚多，由正面五星大小、形状以及背面字形、镰刀及铁锤细节可容易辨认出差异









VII-09/1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制”壹圆。罕见

铁锤的差异可分多版。1935 年 4 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省根据地后停造。

陕北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于 1935 年发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制”壹圆银币，背面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字样，通行于陕北地区。同年 11 月后，因统一改用苏维埃纸币而停止发行，并全数收回。



VII-1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制”壹圆银币钢模。2011 年北京诚轩秋拍出现的币模一套，其为极原始的半手工半机器制成，由此可知当时苏区生活条件之恶劣。此制造手段与正规造币厂相比，相去甚远

苏维埃政府银圆

1930 年 7 月底红军攻占湖南长沙，随即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发行“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壹圆，背面为仿“袁大头”的嘉禾图案。与此同时，湖南平江县的苏维埃政府也发行“平江县苏维埃政府”壹圆，这两种银圆都标示“一九三一年制”。1931 年 11 月，湘鄂赣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上述两地的苏维埃政府撤销，银圆也停止发行，故存世数量有限。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银圆由安徽省金家寨附近设立的造币厂制作，正面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一九三二年造壹圆”字样；背面中央为地球上镰刀、铁锤图案，外圈刻“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字样。1932 年 10 月，红军撤离该区后停造。

由于各根据地生活条件差，加上受到军事打击及经济封锁的影响，造币工艺与设备无法与有规模的造币厂相比，制作较为粗糙且版式杂多。早期所造者存世十分稀少，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角及川陕省造币厂一圆两种为多。



VII-12
“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壹圆



VII-13
“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一九三二年造”壹圆



VII-14
“一九三二年造”背面“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壹圆。
币面俄文



VII-15
“中国苏维埃造”壹圆。据《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记载，
此为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在福建崇安所造



VII-16/17
苏区铜元。中华苏维埃通货中也发行诸多铜元，好品罕见



VII-18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旧址。位于江西瑞金洋溪村刘氏四祠堂，前身是兴国县东村乡造币厂，1931 年 11 月由临时中央政府接管迁至此地，改名中央造币厂，1934 年 10 月关厂

VII-1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银圆钢模。创办之初中央造币厂沿用原有的简陋设备，1932 年 3 月在福建上杭缴获机具一批后才开始以机器造币，日产量以千枚计。以目前所见遗留下来的实物观察，苏维埃红军银圆的制作方式类似上海银饼。只使用上下模压印图案，没有模圈，边齿另以滚压成形



捌



币海掇英

延伸篇

1 臆造币

收藏本是闲暇怡情之事，忙里偷闲之余将藏品拿出把玩一番，赏心悦目，其乐无穷，钱币形小更是如此。然而此道买贵尚可假以时日等待还本，最忌讳的乃吃进冒牌货，轻者兴致索然，重者更是欲哭无泪。不过中国钱币，尤其是近代银圆中有一枝具有特殊时代背景的奇葩，那就是大量的臆造币。

钱币收藏的中国特色

这些臆造币生产的时间约在北洋政府逐渐瓦解、控制力减弱、各厂人事行政处独立状态之时。此时的天津总厂仅空有虚名，业务也无法正常进行，由1924年11月6日天津《大公报》刊载“欠薪不发，并先后裁去工人甚多”可见窘态。北伐后中央政府改首都为南京，原来的“直隶”反而降为“地方”了。在各厂自谋生路的情况下，加上当时信息闭塞，不肖商人就利用机会凭空想象“创作”了一批无中生有的钱币，利用藏家的猎奇心态牟利。最早对此深入研究的是上海怡和洋行职员雷本·邓肯（Raeburn Duncan），他多次撰文发表收集中国钱币的心得，1938年6月登载于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杂志》上的《不存在的钱币》（*Coins that Never Were*）一文，对早期臆造及假币有相当详尽的记述。

邓肯文中披露了66种臆造的币章，包括金质5种、银质49种、铜质10种及合金2种，以一圆银币大小的形式为主。据他研究，这些臆造币章

VIII-1-01
苏维埃字戳“袁大头”。原版数量有限，仿老假制出的新假非常多。区别在老假“苏维埃”三字字尖分岔

VIII-1-02
“正宗”老假的字尖分岔，要仔细比对。同样是假，新假不如老假是硬道理



多数来自京津一带，主要是卖给外籍人士与本地收藏家。卢沟桥事变后供应中断，店家常以洋泾浜英语“New cargo no can come”（新货不能来）告知洋人。由于生意兴隆舍不得放弃，这些商人又开始在上海近郊制作。邓肯对中国机制币颇有钻研，其另一篇1937年发表的《中国苏区币钞》(*Chinese Soviet Coins and Notes*)，是首次论述江西、湖南、四川革命根据地货币的研究文章。他在上海的西人泉币会担任了6年名誉总干事，其藏品去向不明，有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落入了日本人手中。另据郁祥桢著《钱币丛谈》，上海经营“麒麟钱币社”的钱商平玉麟曾担任福建造币厂雕模工，与当时在天潼路一家银楼工作的江阴人李仲清（负责制作模具加盖在银圆上），合谋臆造了所谓的苏维埃加戳版“袁大头”。推测“平记出品”的多种臆造币都来自其手笔，传说此人因此被人告发而遭官府逮捕关入大牢，最后死在狱中。

迷惑方家

这些臆造的币章固然蒙骗过许多外国人，包括以钻研中国币闻名的大藏家耿爱德、伍德华等，然而连著有《最近上海金融史》(1933)，并在1932年1月至7月间任上海中央造币厂厂长，担任过上海三大商业银行之一的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副总裁及代总裁等职的徐寄　也曾“吃药”。在他1934年2月完成的《近代泉币拓本》中，有一成是臆造之品，两年后刊印的“补遗”里“西贝货”竟占三成，合计收录的292枚中竟有45枚冒牌货，约占一成五，“吃药”的比例之高令人惊讶，可见作伪者的大胆与信息的严重闭塞，不只是外国人才上当。

在探讨这一课题时，我们应认清这些“钱币”是为欺骗收藏家而伪作臆造，并非为流通而假造，这两种性质是截然不同的。然而，它们由于所处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自成一格，颇受一些藏家的喜爱。近年来受盛世收藏之风的影响，逐渐为更多藏家青睐而纳入箧中。

顺藤摸瓜型

开国纪念银币只有一圆一种，钱商就比照“袁大头”系列依样画葫芦制作出了孙像、黎像、袁像共和纪念“中圆”。湖南洪宪元年只发行过壹角，臆造出“壹圆”；唐继尧拥护共和只发行过“三钱六分”，臆造出“七钱二分”。民国18年一分铜币设计与制作都很出色，就搞出个“壹圆”银币。徐世昌纪念币仁寿同登图案太复杂，就臆造改成“双旗”铜元。又如京局有银币全套5枚，因毁于庚子之变，臆造者就搭便车制作出一枚可以“改写”中国机制铜币史的“京局十文”铜元。这种借用既有钱币添油加醋编些故事的臆造币非常之多，一时不察，极容易被迷惑。



VIII-1-03



VIII-1-04



VIII-1-05



VIII-1-06



VIII-1-07
银质“光绪八年厂平半两”臆造币。八年版厂平银两币存世的只有壹两铜样确知是真品。由于该系列币图案简洁，钱商很早就仿照伪作银质，后来再加上半两。在国外发现甚多



VIII-1-08/09/10
相对于银圆而言，铜元的臆造币少，但铜元形制小且滥造现象普遍，本身的工艺多半较差，这些臆造币仍具有欺骗性

移花接木型

台湾“龙马图”邮票十分漂亮，作假者也将之应用到银币上，臆造出大清“台湾军饷”壹两。后来大概觉得这种币面图案的花饰很特别，又加上了广东、广西、甘肃等几款。孙像有一圆开国纪念银币，钱商把正面换成骑马图。

VIII-1-11
有模有样的“台湾军饷”壹两臆造币





无中生有型

袁世凯称帝固然酝酿已久，但官府的造币厂没有得到命令亦无法制作相关纪念币，因此大典筹备处成立后虽“期其速成、急于星火”，但毕竟雕刻师雕刻制模也需要时间，即使本领再好，也是如此。不过这对事后诸葛亮的臆造币来说不是问题，“丙辰纪念”就是一例。此外，既然能够臆造出孙像骑马图开国纪念银币，当然也不能少个老袁骑马的洪宪纪念银币了。



VIII-1-12
“丙辰纪念”臆造币。该品种还见金质全套

VIII-1-13
“洪宪纪元”臆造币。正面为袁世凯骑马图

东施效颦型

北洋政府时代天津造币厂精美的人像币是藏家搜罗的目标，钱商拿不出正品，如法炮制些类似产品让泉家望梅止渴。譬如“民国十八年”孙像背地球壹圆银币非常稀少，故仿其样式，臆造出“总理纪念”银圆。此外，凡是当上总统、执政的都曾制作纪念币章，其他各大军阀自然不能示弱，因此人像臆造币最为风行。钱商丰富的“创意”，也是今人乐于收藏它们的原因之一。



VIII-1-14
“总理纪念”臆造币。背面地球雕工甚精



VIII-1-15/16/17

五彩包浆的臆造币。臆造币被洋人购去的颇多，由于保管良好加上环境因素，许多产生了迷人的五彩包浆，非常具有观赏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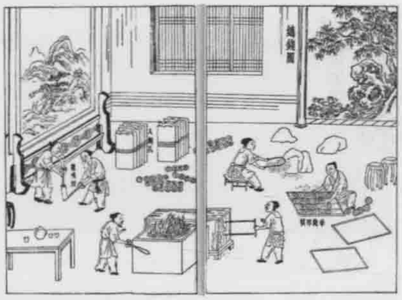
VIII-1-18

“浙江省造”慈禧太后像银币拓图。出自徐寄庼《近代泉币拓本》。徐氏是浙江人，钱贩连他老家没出过的玩意儿都敢拿来诓骗，可谓胆大包天

2 “铸币”与“机制币”

所谓“铸币”，乃是将金属加热熔化成液体后，浇入钱范（模型）中制成的货币。东方古钱均以此法制作，源自中国。西方的古币，最早是将琥珀金（金银合金）加热熔化，倾成小粒，再趁热用锤敲打印上图案制作货币，故称打制币 (hammered coins)。此法源自今土耳其西部的古国吕底亚 (Lydia)。浇铸法必须是高温施工，进入近代后，此法在机械化、自动化及高速化上都有困难。18 世纪末西方的造币设备改以蒸汽机推动后，可在常温下施工，钱币得以大量生产，两者优劣立判，浇铸法自然被淘汰。近代机器造币技术传入中国后，中国传统的“铸币”也走入历史，被“机制币”取代。

机器是如何造币的



VIII-2-01
《天工开物》里的“铸钱图”。中国古代以浇铸法造币

⊙ 熔铸

按规定成分称重配料，熔解浇铸成长条形锭块。浇铸温度影响损耗及成品质量，温度太高则损耗增加，温度太低则在轧片时容易裂开。

⊙ 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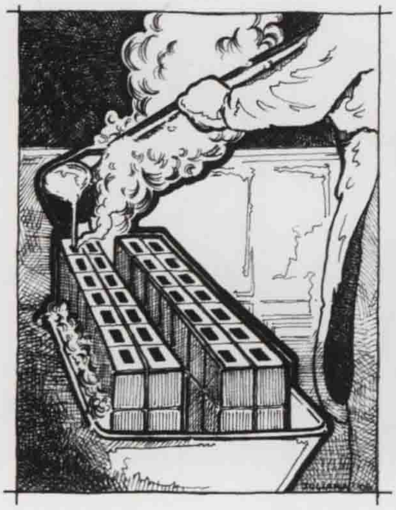
锭块须经粗碾及精碾等十二三道的程序制成轧片，中间剪断一次以缩短条片长度，然后再碾至预定的厚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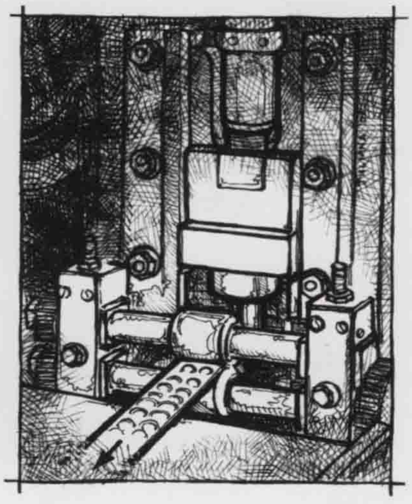
⊙ 冲饼

条片经冲饼机加工制成坯饼。条片宽度视硬币尺寸每排可冲二三枚或



VIII-2-02
近代的机器造币机。英国退辣车伦制造厂 (Taylor & Challen) 是重要的造币设备供货商，中国也是其客户之一





更多。

⊙ 光边

冲饼机打出坯饼，筛选剔除瑕疵品后送到光边机。光边机的作用是将坯饼边缘毛头去除及滚厚，使制成的硬币图案不易磨损并可迭起，同时使外径一致以便印花加工。凸缘是现代机制币的主要特征，在此先滚厚亦可减少印图纹时所需压力，且能延长机具寿命。

⊙ 烘洗

坯饼经冲打及光边加工后硬度变高，故须退火软化，然后经过酸洗、滚光及烘干，坯饼这才较为光洁。坯饼软化后除便于压印外，亦可延长模具寿命。

⊙ 印花

坯饼成叠装入印花机的储饼筒，由机内抱钳自动送入模具印花后推出。一套模具是由上模、下模及模圈三者组合而成的。正、背面及边道（齿边或光边）一次成型，如硬币是丝齿边，模圈内表面有槽可挤出直线状丝齿，若硬币是光边则模圈内表面光滑。字边及鹰洋边等非丝齿边的制作，需要额外设备或另行加工。印花所需压力视硬币材质、大小及图案而有所不同，以一圆银币为例，需 150 ~ 160 吨重量的压力。压印的速度每分钟 60 ~ 90 枚，当今所造印花机速度数倍于此。

⊙ 检查计数包装

钱币制成后工人以目视检查，剔除瑕疵品再行计数，然后包装入库。

VIII-2-03 熔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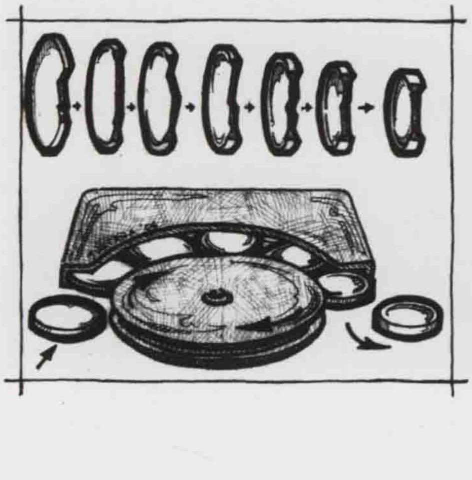
VIII-2-04 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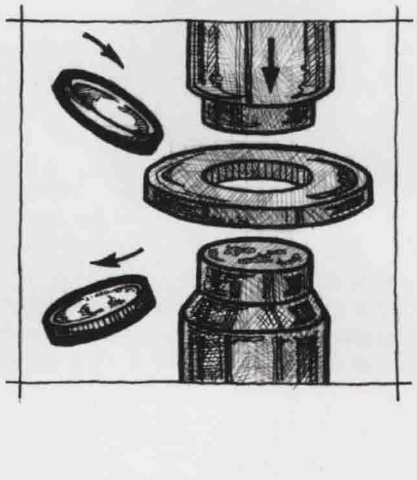
VIII-2-05 冲饼

VIII-2-06 光边

VIII-2-07 烘洗

VIII-2-08 印花





3 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史事

在谈论中国近代机制币时，经常会提到现为伯明翰造币厂的英国喜敦厂，但该厂的相关细节在钱币书刊上常一笔带过，缺乏完整的描述，因此泉界流传着许多矛盾甚至错误的说法。对于中国机制币的发轫，该厂涉入甚早，广东钱局的成立即由其协办，而清末各省造币设备竟有三分之一购自该厂，可见其与中国近代机制币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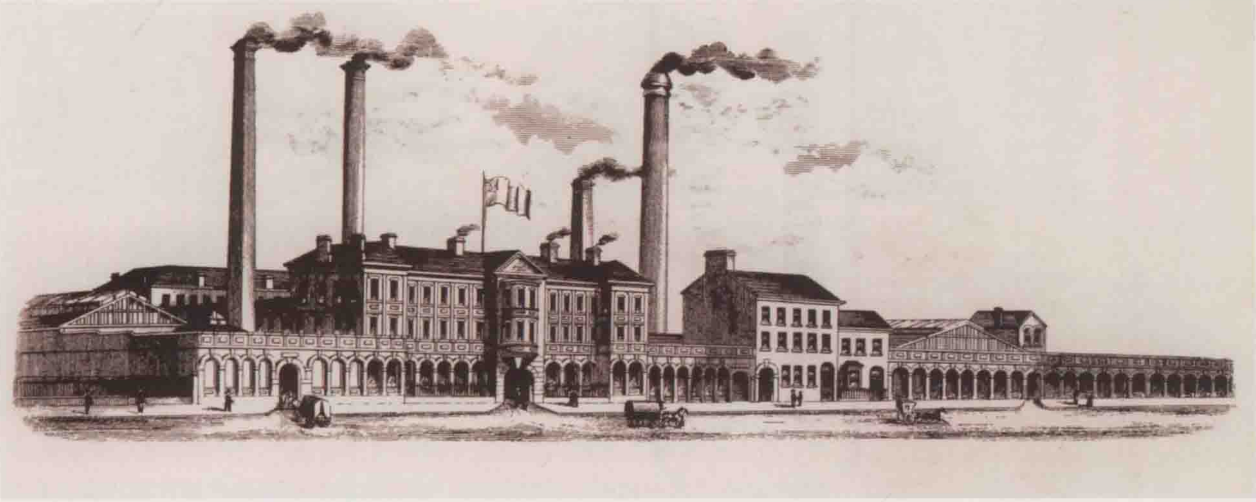
伯明翰造币厂简史

伯明翰造币厂原名喜敦工厂，是罗夫·喜敦（Ralph Heaton，1755—1832）于1794年在英国伯明翰郡所创办的，初期制作铜器而未涉足造币事务。由于当地有一著名的苏活造币厂（Soho Mint）忙着为外国客户造币而生意兴隆，不过，该厂在难以应付订单的情况下经常需要周围的非铁金属类工厂的支持，因此伯明翰郡不少工厂参与到供应铜片及坯饼等“下游”产业链中来。担任制模与铸铜师的罗夫·喜敦之子罗夫·喜敦二世（Ralph Heaton II，1794—1862）也因此利用场地加入了制模业务。苏活厂后来歇业，于1850年拍卖设备，开拍那一天，小喜敦竟买下其中最重要的4台造币印花机与6台冲饼机，剩余机具乏人问津，最后也由其轻易购得，满载而归的小喜敦旋即将厂更名为“喜敦父子工厂”（Ralph Heaton & Son），自此开始其真正的造币事业。故虽该厂声称开办于1794年，并不能追溯此为造币之始。1889年喜敦父子工厂更名为伯明翰造币厂（The Mint，Birmingham，Ltd.）。

喜敦父子工厂成立当年底即开始造币，在喜敦二世主持的12年间，该厂是英国皇家造币厂重要的下游供货商，产品包括成币与币坯，客户还包括委内瑞拉、印度等国。喜敦二世逝世后，工厂由喜敦三世（1827—1891）接手，当时喜敦三世虽然只有35岁，但在厂内已工作22年。1889年，喜敦四世（1864—1930）担任总经理时，方年仅24岁。他于1920年退休，遗缺由妹夫波梅继任，随后而来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该厂经营产生了严重的影响。1935年5月，喜敦家族交出了伯明翰造币厂的控制权。

全球委托伯明翰造币厂造币的国家超过100个。20世纪初，伯明翰造币厂平均每周生产硬币100万枚、坯饼60万枚。直到1979年时，其仍为50个国家造币，产量曾破纪录地达到每周1 300万枚。该厂在19世纪后期曾协助多国设立现代化造币厂，也是目前历史最悠久的私人造币厂。除了产销硬币外，伯明翰造币厂也供应与造币相关的机器设备，如印花机、冲饼机、光边机、压钢模机等。其最早的一笔生意是1864年为缅甸建立

VIII-3-01
喜敦三世（Ralph Heaton III，1827—1891）。在其任内，伯明翰造币厂开始与中国有业务往来



VIII-3-02
19 世纪末的伯明翰造币厂

只有一台印花机的曼德勒造币厂。其后有许多国家向该厂订购机器，包括日本、罗马尼亚、哥伦比亚、德国、印度、瑞典、葡萄牙、智利、澳大利亚、泰国、尼泊尔、阿富汗及芬兰等，而最大的客户就是中国。该厂总计销售的造币用印花机在 355 台以上，其中至少有 270 台卖到中国，可惜伯明翰造币厂观念保守，把这门生意看成配角，不重视技术上的改进，机器性能落后的结果导致订单愈来愈少，到 20 世纪中期结束了在中国的业务。

与中国的往来及国内记载之补遗

中国近代机制币的积极推动者，当属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其筹划的广东钱局备有制银圆用印花机 4 台、制铜元用印花机 86 台，合计 90



VIII-3-03
广东钱局在 1893 年时赠“博明冈喜敦厂”特制的“技擅华洋”金牌一枚

VIII-3-04
七钱三分反版。中国最早正式以机器制造的银圆，由伯明翰造币厂负责供应设备及模具



VIII-3-05
19 世纪末时伯明翰造币厂的广告章，有红铜、黄铜及镍质，以镍章多见

台，规模远超过只造金银币的英国皇家造币厂的 8 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造币厂。

根据伯明翰造币厂的档案，清代各地从该厂订购造币设备除广东钱局外，至少还有湖北、江苏、湖南、陕西、北京、浙江、安徽等地的银铜元局。1905 年后，则无添购机器的记录。伯明翰造币厂所生产的机具设备能在我国有如此优异的成绩，主要是协办广东钱局十分成功，带动其他的省份跟进。其次是上海代理的瑞生洋行（Buchheister & Co.）非常积极，除了广东钱局是与伯明翰造币厂直接往来外，其余都由该洋行代理。广东钱局由于成效良好，1893 年时还特制“技擅华洋”金牌一枚赠予“博明冈（即伯明翰）喜敦厂”。

伯明翰造币厂的档案澄清了许多国内有所遗漏或错误的记述，如“湖南光绪元宝七钱二分”在 1974 年英国钱币学者披露以前，几乎不存在国人的记忆中；“浙江省造光绪元宝”楷书版的正确生产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而非光绪二十四年。至于“二战中，喜敦厂为德军所炸，业务中断”，以及“20 世纪 60 年代喜敦厂停产”云云，完全是子虚乌有。事实上，伯明翰造币厂 1862 年所建的厂房，在二战中虽遭到德国轰炸机的近弹波及，但未被直接命中，只有屋顶与玻璃窗受到轻微损坏，故迄今仍然安在。所谓业务中断，乃是二战期间英国所有工厂均投入军工生产，该厂转而生产制造枪炮弹壳用的铜片与飞机引擎零部件等，在此期间伯明翰造币厂的硬币年产量约 1 800 万枚，只有战前的四分之一。



VIII-3-06
1900 年 1 月驻英国公使罗丰禄访问伯明翰造币厂，该厂特制纪念章一枚。同年 3 月 6 日，罗丰禄签署了一份向京局供应造币设备的合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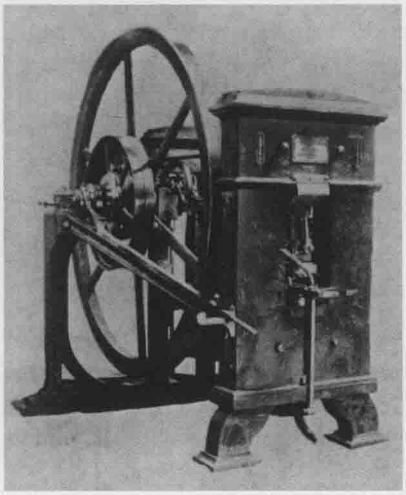
百年老店吹起熄灯号

百年老店伯明翰造币厂熬不过时代的变迁，其走进历史是因其最主要的客户英国皇家造币厂在2001年取消了彼此间40年的长期合约而导致业务急剧萎缩，即使争取到欧元的部分订单以及进行了裁员，仍无法渡过资金周转不灵的难关。2003年3月，伯明翰造币厂停工后找不到金主接手，5月22日董事会宣布永久停业，给这家百年老店正式谱上了休止符。伯明翰造币厂后来由该郡的 JFT Law & Co Limited 及 Stirchley Machine Tools. Ltd 两家公司接手，前者是拍卖公司，后者是买卖新旧机器设备的公司。曾闻在原址上改建博物馆的说法，目前所知部分附属建筑已拆除，除仍然接受委托制作纪念章外，并无其他进一步的变化。

VIII-3-07
21世纪初的伯明翰造币厂主建筑,矗立150年，二战时该市遭德机轰炸，厂房未损毁，却熬不过业务萎缩，风光不再

VIII-3-08
伯明翰造币厂1899年时售至中国的印花机，机器上有代理商“上海瑞生洋行”的铭牌





4 近代机制币著名人物列传

收藏，不仅是收藏文物，也是收藏文化。收藏也无国界，因此当外国人与中国发生接触时，或因仰慕中华文化，或因业务的往来，常有意无意地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雪泥鸿爪。由于空间的阻隔与时光的流逝，他们的事迹逐渐被人淡忘。但是，前辈先进是吾人鉴往知来的标竿，在此，笔者特别介绍几位与中国机制币较有关系的外籍人士，用另一种方式来增广见闻。

与中国机制币渊源深厚的两位“韦恩”

我国机制币的发轫，得助于洋人之处甚多，若以个别论，最早涉及而又为众人所周知者，当属负责协助广东钱局建厂及机具安装试车的英国人爱德华·韦恩(Edward Wyon，？—1906)。爱德华率领包括主计长、轧片机师、印花机师及制模师洋匠4名驻在广州两年，由于成效良好，爱德华被延聘为广东钱局监工，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9月)调派北京筹办简称“京局”的京都制造银圆局，并应喜敦氏之请代表洽商添购机具设备事宜。爱德华在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因“办事出力”获颁双龙宝星勋章。爱德华在北京筹办“京局”期间遇上义和团之乱而受困外交使馆区，虽爱德华本人并未在事变中受伤，其妻却于围攻期间过世。爱德华·韦恩约于1905年回到英国再婚，随即启程返回中国，次年拟在退休前携眷至日本度假，未料途中在神户得急症于8月16日病故。

另一位韦恩是英国著名的雕刻师艾伦·韦恩(Allan Wyon，1843—1907)，广东七三系列的币模即出自他手，此系列币模系受喜敦厂委托在制成后转交广东钱局，此事曾刊载于1888年5月19日的伦敦《图画报》(*Graphic*)杂志。韦恩家族名声在国外集币界可说如雷贯耳，其先祖1727年自德国科隆移居英国，19世纪初即在伦敦开办私人的雕刻坊，替各工厂雕刻生产钱币及奖章或纪念章用的模具，艾伦继父兄之后主持该工作坊，并非受聘于任何造币厂的雕刻师。由于中方满意且各方合作愉快，故后来许多来自英国的中国钱币模具皆由艾伦操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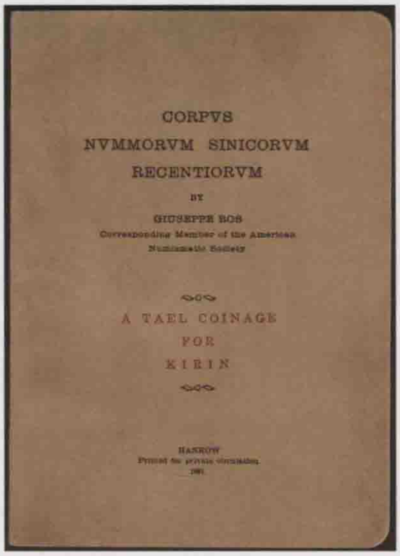
韦恩家族中与造币相关者不少，因此常遭张冠李戴。提起后代成员中有数十人担任雕刻师(die engraver)或制模师(die sinker)，几近主宰19世纪英国币章之雕刻。而雕刻师这种工作，除了要长久磨练技艺才能纯熟外，还要具有天分，故这一行业常会出现世袭现象。譬如艾伦逝后其子小艾伦(Allan G. Wyon)克绍箕裘，惟由于缩刻机的兴起，手工雕刻逐渐被取代，小艾伦没有在币章雕刻方面发展而成为著名的人像雕塑家。

VIII-4-01
艾伦·韦恩逝世纪念章。其子所刻，背面右下有其A. G. WYON签名



被遗忘的中国机制币学者——意大利外交官罗斯

朱塞佩 · 罗斯(Giuseppe Ros 1883—1948)，意大利那不勒斯人，那不勒斯大学东方学系毕业，1905 年进入意大利外交部，1910 年派赴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家返回意大利，后再度来到上海。1921—1924 年担任驻汉口领事，1924 年 3 月改派北平，1926 年任中国治外法权研究国际委员会意大利代表补佐，1931 年任上海中日停战监视军民委员会意大利委员，1936 年底改派驻广州领事，1942 年升任总领事，1946 年自外交部退休，1947 年任私立海南大学昆虫学及拉丁语教授，1948 年 6 月 18 日在大学附设的海南医院病逝。



VIII-4-02
罗斯 1921 年在汉口自费出版的小册子《吉林银两币》

罗斯才华横溢，对中国机制币极有兴趣，凭着外交官的身份常能获取外界无法得知的信息，他发表过若干论述文章，其中以在 1917 年(民国 6 年)上海出版的英文《亚洲文会北华分会年刊》上所登载的《中华民国钱币》(*Coi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一文最为重要，在这篇专题报道中，罗斯将其亲身前往各主要造币厂收集的硬币及资料作了系统化的分类整理，现为考证许多民初中国钱币的依据：如上五星孙像开国纪念银圆及袁像十文铜元的制作地点及时间、宣统年造系列币模的来源等。撰写此文时，他还获得服务于中国海关、邮政等单位的洋人协助，信息提供者包括雕刻师乔奇本人。伍德华及耿爱德的著作中很多论述都曾引用他的资料。

罗斯其余著作尚有在汉口自行出版的小册子《近代中国钱币》(*Modern Chinese Coinage*) (1919) 及《吉林银两币》(*A Tael Coinage for Kirin*) (1921)。他也在《北华捷报》等英文报刊上发表钱币有关论述，罗斯原本有意对中国近代钱币进行系统性的写作，惜未实现，而已发表部分没有汇集整理成书出版，也未译成中文，这是他未能广为其本国学界及我国泉界所知的主要原因。

罗斯也是欧洲人士里收集中国书籍的佼佼者，据估计其藏书有七八万册，连同小册超过 10 万册。其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所收集的地方志、少数民族图谱等非常丰富，这些成为他藏书中最耀眼的部分。可惜其藏书均未加盖印记，下落追踪困难。罗斯本有意将藏书中最重要者捐赠意大利政府，却遭到婉拒。1928 年北京图书馆公布购得罗斯部分藏书，另满铁大连图书馆在 1929 年购得一批，部分在 20 世纪 40 年代由台北总督府购得，战后转入“中央图书馆”台北分馆。罗斯至前私立海南大学任教时还兼任图书馆馆长，亦无偿赠送中国历代有关海南岛的珍贵历史文献三十余箱及大量动植物、矿物及昆虫标本给该校。

罗斯收藏的珍稀钱币颇多，惟明细及最终流向不明，最可能的流向是由其再婚的中国籍妻子在罗斯 1948 年逝世后移居香港期间，以零星或分批方式出售了。笔者猜测，其藏品多数应落入前香港钱币研究会会长张璜之手，而中国龙银的大名誉品“奉天癸卯壹两”则很可能为其旧藏，另“宣统元宝庚戌春季云南造”银圆亦系其收藏之一。

意大利籍雕刻师路易奇·乔奇

中国近代机制币的工艺史上，有一位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众人耳熟能详的意大利籍雕刻师路易奇·乔奇(Luigi Giorgi)。

乔奇来自意大利米兰的琼森工厂(Stabilimento Stefano Johnson S.P.a)，有关他的公开记载，最早见于任职上海意大利总领事馆参赞的罗斯于1917年发表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亚洲文会北华分会年刊》中，在那篇有关民国时期钱币的专论内，数次提及乔奇作品与诸多得自乔奇本人的信息，如宣统三年大清银币的雕模由其担纲一事。

乔奇于1910年（宣统二年）聘任天津造币总厂总雕刻师，到职后随即进行宣统三年大清银币的筹备，清代钱币中有乔奇签字的只有宣统三年大清银币一种，这是大清王朝的末代钱币。泉谱上首见于耿爱德1954年出版的《中国币图说汇考》，该书第476页记载的宣三壹圆银币中有一款正面左下刻“L Giorgi”，并指出L字母后无点，但没有图片也未说明文字的刻法是阴是阳。1981年张璜编著的《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第20页编号33的图片，在正面“年”字左方有阴刻英文签字，此应即耿谱所描述者。

VIII-4-03
民国8年外交部与财政部之间为是否留用乔奇之事有多次公文往来，此其一



乔奇在华任职期间的情况，可由李伯琦于1945年9月《永安》月刊发表的《中国纪念币考》中略知一二：“总厂所聘雕刻技师，由义国（当时译作义大利，简作义国）驻京公使所介绍，三年为期，民国二年来厂，三年满，续聘三年，义技师初来华，尚谨饬，久则渐染恶习，又兼翻译从中播弄，逢雕祖模时，必借端要挟需索，盖义技师不解华语，时北方亦罕有国人通义语者，多方觅得王某，能义语，使之充翻译，给厚薪，王已觉奇货可居，又本非学校所习，乃使馆司贱役者，已不知品行，更富奴性，崇西人，轻国人，三年再满，即辞义技师，革翻译，义公使受其托，来请再续聘，未之允，然义技师在造币厂六年，曾遴选学生六人，从之学雕刻，六年技亦成。”这是对乔奇最详细的叙述，由李氏原文来看，洋技师乔奇“在造币厂六年”，应于民国8年（1919年）解职，此段记述可与其他文献交叉对比，予以补充及印证。

但是李伯琦没有把乔奇在前清户部造币总厂的年资计入，在罗斯的文章及耿爱德与乔奇本人的通信中，均指出他是1910年上任的。造币总厂



VIII-4-04
宣三签字版（非原大）。乔奇签字版币多见于民国期间发行的，龙洋上非常罕见，此为2011年1月德国Kunker公司在柏林拍卖的宣三签字版，是近年公开出现的第二枚，以46万欧元成交，与诚轩2010年秋拍总价人民币448万元相近



VIII-4-05
几种乔奇签字版钱币（非原大）

在民初兵变中烧毁后未原地重建，乔奇后转往另辟建之新厂任职，“在造币厂六年”中的造币厂是指新建完成的天津造币总厂。除此之外，有关其离职一事在外交部档案中也有记载。外交部在 1919 年 7 月至 8 月间与财政部至少有 3 次公函往来，记载“义使馆节略一件：造币厂雕刻师义人佐治（即乔奇）免除职务请予以优待由”、“义人佐治在造币厂任雕刻师九年”及财政部回函“义人佐治氏请留用事请无庸置议”等，可证明拒予续聘以及乔奇请使馆说项之事属实。耿爱德为编撰《中国币图说汇考》，在 1953 年 4 月向已退休居意大利的乔奇本人搜集一手资料。耿氏收到乔奇的回信，声明“彼曾于 1910—1920 年服务于天津造币厂，担任首席设计师及总雕刻师”，此得自乔奇本人的回复可确认洋技师路易奇 · 乔奇应是 1910 年抵华并任职造币总厂，与罗斯的记述相吻合。民国 8 年遭解职后，乔奇并未立即返国，而是一度滞留中国，企图通过关说续聘，未遂意后才离去，故其自述的日期为李氏所记之次年是有合理解释的。

民国钱币出自乔奇之手的计有共和纪念壹圆银币、共和纪念十文铜币、民国 3 年袁世凯七分脸、袁世凯侧面像、民国 5 年壹分及五厘铜币、洪宪纪元拾圆金币，以及龙凤龖齾银币图样等，另有奖牌数种。由于国人对钱币上标注雕刻师署名这一千年西洋传统并不了解，故财政部初见币样袁像下方镌有技师名字而大惊，谓传之后世，必误认币中之人为乔奇，令其去除。至今中国钱币上不镌雕刻师之名，故有签名者皆为珍品，龙银签字版更为此中瑰宝。

伍德华生平及其著作《中国当十铜元》

伍德华（Alphonse Marie Tracey Woodward），1876 年生于印度洋中的留尼汪岛。1879 年定居日本。伍德华年幼即养成收藏之癖好。16 岁时就撰写邮票文章在邮刊上发表。后专事着重于日本邮票研究，不久成为日本、朝鲜、中国台湾邮票之权威，1928 年出版 *Postage Stamps of Japan and Dependencies*（《日本及其属地邮票》），此书获得 1929 年英国皇家集邮学会（RPS）年度奖，至今仍为该领域的权威之作。

1911 年至 1916 年间曾先后住过新加坡及伦敦两地，之后移居中国，直到 1930 年举家迁往法国。1937 年伍氏因日本侵华回到上海清理财产，次年乘船回法国时于旅途中去世。留居上海期间，伍德华开始写作有关中国钱币的文章，在 1921 年与 1922 年几次在上海出版的英文 *The New China Review*（《新中国评论》）杂志上发表介绍各地金银铜币的文章，如袁世凯、倪嗣冲、唐继尧等人像币章，然而回响最多的却是叙述山东机制铜币的那篇，促使他的研究开始集中于铜元，不久该杂志停刊。随后 *The China Journal*（《中国杂志》）月刊在上海发行，适逢杂志主编担任当时上海研究中国钱币的“西人泉币会”（Numismatic Society of China）会长，力邀伍德华撰写中国十文铜元系列专文，于是伍德华以“Notes on the Provincial Minted Coins of China（中国各省机制铜元）”为题，自 1926 年 5 月至 1935 年 12 月间陆续发表 18 篇有关中国各省当十铜元的论述。伍氏回法国后将抽印本加以整理装订，汇编成书出版。重新命名为 *The Minted Ten-Cash Coins of China*（《中国当十铜元》），1936 年时只发行了区区 95 册。

中国十文铜元产量超过 300 亿枚，流落国外的数量庞大却无英文书籍可供参考，且原版书印量又极其稀少，因此有人为方便集币者，在加入行情价格后，于 1972 年在美国重新翻印此书，使之成为中国十文铜元的经典参考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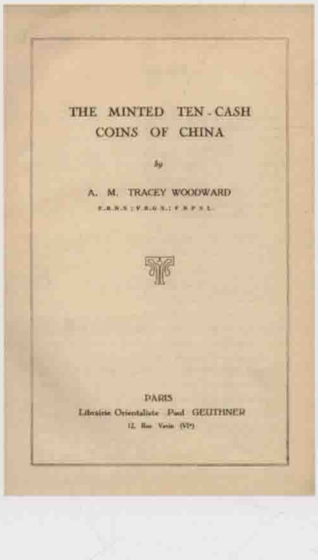
伍德华治学严谨，他为了弄清上海壹两的来龙去脉，除了从前香港造币厂退休雇员那里获得资料外，也亲自至北京的英国使馆查询，没有结果后委托在英国的友人至伦敦外交部寻找档案，前后费时近 15 年才发表其心得。

伍德华的钱币藏品极为丰富，根据耿爱德的形容在洋人中是首屈一指的。辞世后全数由其遗孀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美国分批处理，详情不明。据了解，当时经过埃及国王法鲁克等多位藏家挑选后再打散出售。2008 年诺曼 · 亚克斯（Norman Jacobs）及 2011 年罗宾逊(Frank Robinson)向香港拍卖会提供的拍品中，有相当数量的伍德华旧藏，其中包括庚戌春季云南造七钱二分银圆。

VIII-4-06
伍德华肖像。摄于日本，刊于 1928 年出版的《日本及其属地邮票》

VIII-4-07
《中国当十铜元》原版扉页，1936 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只发行了 95 册




THE MINTED TEN-CASH
COINS OF CHINA

by

A. M. TRACEY WOODWARD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2, Rue Vavin (V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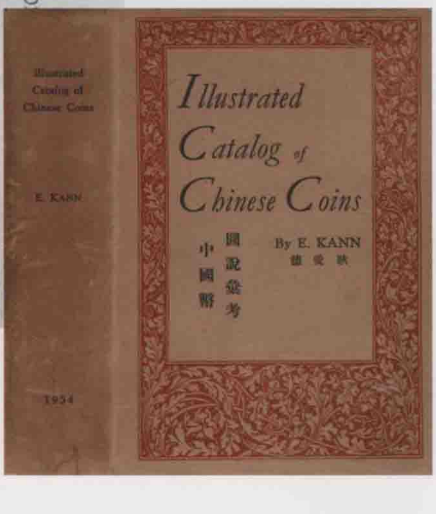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机制金银币大师——耿爱德

在近代中国机制金银币方面谈得上有研究及收藏丰富的很多，但两者皆备且经常发表心得并出书论述的就很少了，而其中数据详尽完整者，当以耿爱德（Eduard Kann，1880—1962）为佼佼者。耿氏发表的文章极多，为我国泉界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其著作《中国币图说汇考》（*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更使中国钱币在国际上大放光芒，贡献不可磨灭。

耿爱德，1880年6月21日生于奥地利。1901年入英国银行业服务，次年派往中国，他对中国及中国事物十分喜爱，中国就成为耿氏留居长达47年的家园。耿氏到中国后先在俄亚银行（Russo-Asiatic Bank，前身即华俄道胜银行）日本分行工作，接着调任长春分行经理。任职期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杭州、烟台等地的分行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耿氏的奥籍身份使其处境艰难，于是迁居北京，1917—1919年任职于中法实业银行（Banque Industrielle de Chine）。20世纪20年代间受聘于中华懋业银行（Chinese-American Bank of Commerce）。30年代后自行创业，在上海从事金银条块的买卖中介，曾任中央造币厂顾问委员会委员。二战结束后稍事休养接连赴美国游历，1948年4月时还拜访了费城造币厂，1949年5月离华前往美国，居住洛杉矶，曾在市郊的大学授课3个学期。耿氏定居美国后，开始写作《中国币图说汇考》，于1954年自费出版。书中图片多数为其藏品。由于他长期从事金银业，对中国货币有相当造诣，故该书迄今仍为一本重要的中国金银币参考书。后因需求甚殷，乃于1966年再版。1962年7月30日耿爱德逝世，得年八十有二。



VIII-4-08
耿爱德。摄于洛杉矶寓所，刊于《中国币图说汇考》，照片右侧为其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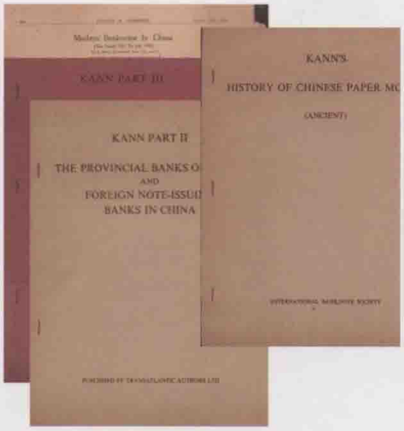


VIII-4-09
《中国币图说汇考》1954年初版

耿爱德藏品的下落

除了金银币以外，耿爱德对纸币、银锭所藏数量也很大，在与西方人士中的同好比较私人藏品时，耿氏虽自认不如伍德华，但今后恐怕也无人能出其右。耿氏在1954年时为筹措出版经费曾卖了部分藏品，其他藏品则在他逝世后分三批出售，第一批于1971年6月出售计1 200种，其中大多是极珍贵的钱币；第二批于1971年9月出售计535种，以新疆钱币为主；第三批于1972年3月出售，该批是耿氏的杂项集藏。耿氏也收藏银锭200件左右，但未公开拍卖。英国大英博物馆现藏有中国银锭332件，其中有190件系耿氏旧藏，1978年时由大英博物馆购得。

耿爱德收藏的纸币后来也未公开销售，可能是1954年时就已一并卖出。1995年8月香港钱币拍卖会上出现一本耿爱德的 *Paper Money in China*（《中国纸钞》），是耿氏早年陆续在《中央银行季刊》所发表文章的抽印本合集；另有一册装有208张纸钞的收藏簿和一批“由加利福尼亚州绅士多年收集的精彩纸钞”，可能也是耿爱德的遗物。至于其藏书则下落不明，按理耿氏对中国货币钻研如此之深必然拥有极多资料，但其遗孀否认她曾留下任何书籍、笔记或未出版的手稿；笔者曾自书商处购得极少有耿氏笔迹的校对用稿件，推测藏书未被妥善处理而散失，对此感到非常遗憾。其邮票集藏则在1963年2月由邮商公开拍卖售出。在2008年2月，大约400张来自于耿爱德旧藏的中国纸币被意外发现，同年11月于纽约公开拍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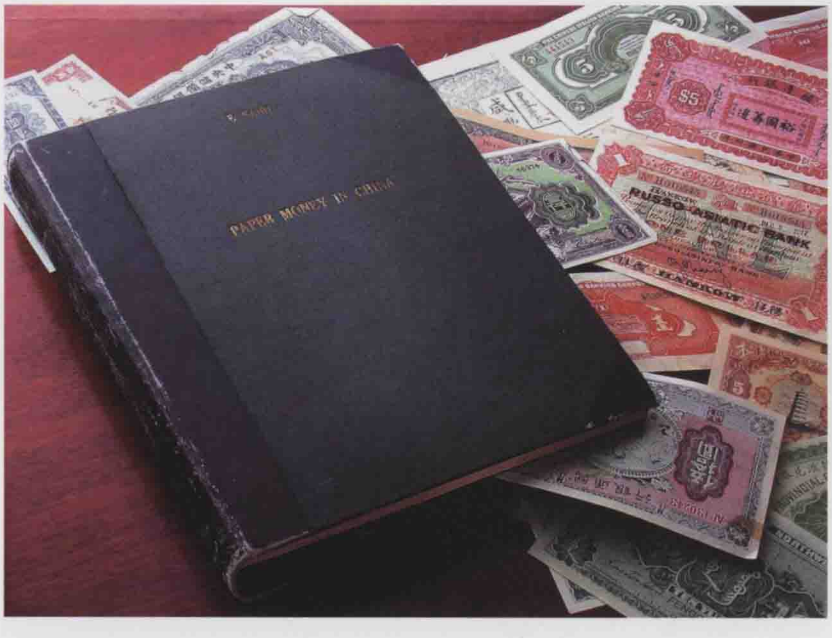


VIII-4-10
在英国用平装本小册子印刷发行的 *History of Paper Money in China*，分三册，是耿爱德有关纸币论述最完整的缮集，可惜未再版

耿爱德的著作

VIII-4-11
耿爱德纸币旧藏于1995年香港泰星阁公司拍卖会拍出，此为其私人保存的 *Paper Money in China* 抽印本及其中之部分纸钞装订册

耿爱德著作以书本方式印行的只有两本：《中国币图说汇考》（*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1954年的初版为牛皮纸灰色书皮，1966年版为白纸红色书皮；《中国货币论》（*The Currency of China*）为黑色书皮，1926年上海初版，1927年修订后再版。其他著作约35篇刊于各杂志上，全部以英文发表。



耿爱德论出生是奥地利人，论喜好是中国人，论国籍是美国人，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不仅丰富了集藏者的知识，也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史料，而他与伍德华追根究底的精神尤其值得后人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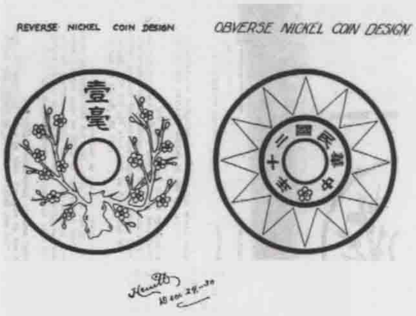
上海中央造币厂的洋技师赫维特

老上海时代的中央造币厂在 1920 年（民国 9 年）开始筹建，原名上海造币厂，开办之时聘美国人克里夫 · 赫维特 (Clifford Hewitt，1869—1942) 任总技师，协办建厂。赫维特曾负责马尼拉造币厂的筹建事宜，当时担任费城造币厂机械总工程师（chief mechanical engineer）一职。



VIII-4-12
赫维特

赫氏的任务除了规划新厂外，还参与币制改革及金本位币的设计与试制方面的工作，与费城造币厂著名的总雕刻师辛诺克 (John R.Sinnock) 有密切往来。据赫维特表示，金本位币壹圆原本的设计与后来量产的船洋相似，惟南京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为国民党徽，欲镂刻于币面，因此加上象征意义的旭日与海鸥；又因财政部要求将金本位字样标示其上，故再将海鸥移到水面。也就是说，船洋各式银圆问世的顺序恰与原始设计构思相反。另外，半毫镍币亦由其设计，所有币模均在费城造币厂雕刻试制后，再送交上海的赫氏。赫维特亦曾于 1932 年率同技师温宗禹博士（化验师，麻省理工学院毕业）、黄福祥（熔炼师，加州大学毕业）、钟望荣（铸造师，耶鲁大学毕业）三人赴美国费城造币厂学习考察。



VIII-4-13
赫维特签名之金本位币"壹毫"原设计草稿。实物为壹圆按比例缩小，乃现实与设计出入之一例。另原本有四分之一仙，因尺寸太小，无法雕成而剔除

他在职期间最早的作品是“民国 19 年春中央造币厂工竣纪念章”，这枚正面为国父孙中山先生侧面肖像，背面为帆船旭日的纪念章，在人像右下方的英文缩写“CH”，即赫维特名字的缩写。赫氏前后在中国留居时间为 10 年左右，1933 年 4 月银本位币船洋正式开制后解约离职，中央造币厂改聘另一位美国人葛莱德博士代之。当时原厂长郭承恩辞职，由卢学溥继任，赫维特的解约或许与此人事变动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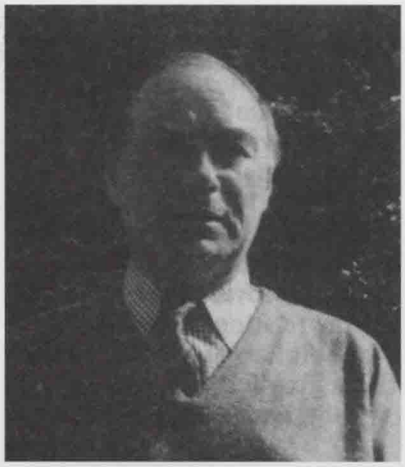
赫氏对上海中央造币厂的兴建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前新币的设计贡献良多，甚至还称得上是船洋的设计者。虽然众人皆知船洋正面肖像采用的是民国 18 年五国比稿中的意大利版，但背面帆船反而与赫氏设计的“工竣纪念章”非常相近，把这项荣衔挂在赫维特名下并无不当。

赫维特个人收藏试制金本位币时所用的照片、草图、文件与各式样币，曾于 1968 年、1971 年两次在美国集币协会（ANA）大会中展示。这批包括金本位币壹圆铜质试制币、金本位币半毫试制币、船洋三鸟壹圆铜质试制币、民国 22 年船洋壹圆铜质试制币、“工竣纪念章”等在内的藏品，在 1975 年 8 月 ANA 拍卖会上，被一位钱商买下，后捐赠给了设在纽约市的美国集币学会（ANS）博物馆。



VIII-4-14
民国 19 年春中央造币厂工竣纪念章。人像右下方的英文缩写“CH”，即赫维特名字的缩写。Goodman 旧藏，直径 40 毫米。有银质与铜质两种，后者有的镀金

李察·伟德——享誉国际的英籍中国机制币专家



VIII-4-15
李察·伟德。摄于20世纪80年代末，与伍德华、耿爱德等相比，李察在收藏上望尘莫及，但因其专注于钻研中国机制币史得以在这领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大师”称谓当之无愧

由于环境的变迁，收藏及研究中国钱币的外籍人士在二战后显著减少。只因中国采用机器造币之初乃仰赖西洋提供造币设备，故在接近源头之便的条件下，这些外籍人士虽身处境外，依然在所谓“中国情结”的驱动下取得了相当成果，李察·伟德（Richard N.J. Wright）即其中之一。

李察·伟德，英国人，海军中校衔退役。1931年生于伦敦的一个海军世家，1932年淞沪抗战时其父随舰在外围观察战情，因此李察在该年仅周岁之际便到过香港，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44年他加入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时常至远东地区。1960年他开始对中国钱币感兴趣，当时在香港小街可随处购得货真价实的银圆。后慢慢地转向老银币的研究，“学问之道，往往始于玩好。由玩好而生兴味，由兴味而起研究，由研究而成学问。以玩好始，以学问终。”这段泉哲张䌹伯前辈在《泉币》发刊辞中的话，加在李察身上可谓十分贴切。

清末民初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动乱造成的资料散失使后人对早期的许多状况理不清头绪。李察在深入后理解到，中国改用机器造币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当初各省造币厂在开办时多半由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工厂协助建立，因此西方的造币厂、博物馆、政府档案与图书馆中，能找到相关记录及当时的报纸、杂志等，这些史料可以厘清以往的诸多疑问。于是在闲暇时投入大量精力奔走英国的公众档案室（Public Record Office，PRO）、外交事务部（Foreign Office）、图书馆、博物馆及影响早期中国机器制币史最巨的伯明翰造币厂。除获得极为珍贵的资料外，亦使李察得以与图书馆及博物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李察·伟德很早就发表研究心得，崭露头角之作是刊登在1974年英国皇家集币学会年刊*Numismatic Chronicle*上的*Som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Origins of the Milled Coinage of Imperial China*（《深入探讨中华帝国机制币的来源》），披露并证实了湖南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圆是伯明翰造币厂所制，并首次披露了照片，使之成为中国银圆藏家追逐的新目标。此外澄清的还有陕西省造光绪元宝、浙江楷书等珍稀银圆的出处及制成时间，以及厘清关平一两银币模具乃由英国皇家造币厂雕刻的史实。李察·伟德又接连于1976年、1978年在此重量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The Silver Dragon Coinage of the Chinese Provinces，1888—1949*（《1888—1949年之中国各省龙银》）及*The Silver Coinage of China，1912—1928*（《1912—1928年之中国银币》）两篇极富价值的实证性论文。尔后包括大英博物馆专家在内的研究中国近代币的欧美学者，都引用其披露的文献。李察·伟德的其他著作散见于各钱刊，因皆为英文期刊国内订户很少，故流传不广。总体说来，他对中国近代机制币研究的成果未能系统地集结成书出版，也缺乏完整的翻译转载，其在学术上所作的贡献虽在国际泉坛享有声誉，然而国人对他的了解却极为有限。



VIII-4-16
湖南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此枚即1974年伟德披露时的原品，台北鸿禧美术馆旧藏，2006年诚轩拍品。泉界皆知为银币大珍，却不知是他发掘的

2009年4月，香港的一场以“李察·伟德研究中国钱币集藏”为名的拍卖会，虽受金融风暴冲击的影响，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其他在华外籍人士

留居在华的外籍人士收藏及研究中国货币较知名且发表过文章或出版书籍者颇多，他们常入境随俗的依中国姓氏取名，如以下的畲德、卜士礼、马士、骆仁廷、邱文明等。

畲德（Frederik Schjoth），挪威人，约1866年来华，1876年任职中国海关在广东汕头的潮海关。1903年被任命为挪威驻华总领事。1929年出版《中国货币》（*Chinese Currency*），此书内容即其收藏，是早期西方人了解中国古代钱币的必备参考资料，此书经他人修订先后于1965年、1976年再版。其藏品于1929年左右，捐给了挪威的奥斯陆大学。

拉姆斯登（Ramsden，Henry A. 1872—1915），曾为古巴政府派驻日本的代表，娶日籍女子为妻并长住日本从事邮币生意，对收藏及写作十分狂热，发表著作80篇以上。1911年，他在日本发表《近代中国铜币》（*Modern Chinese Copper Coins*），是最早对中国机制铜元论述的专著，1962年美国集币协会（ANA）杂志再度刊出并印成小册。拉姆斯登收藏钱币约15 000枚，去世后遗藏转让，在1917年夏捐赠纽约市的美国集币学会（ANS）。



VIII-4-17
卜士礼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英国传教士，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到上海协助管理墨海书馆。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首届年会当选副主席，格致书院创议董事之一。因双目失明返英，后病逝伦敦。伟烈亚力著作以科学文艺为主，最知名的是《中国文献记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1867）。有关中国钱币方面的则是1858年发表在北华支会年刊的《大清国硬币》，此为英文文献里最早对中国钱币叙述的文章之一。其收藏可能被其他在华洋人接手。



VIII-4-18
马士

卜士礼（Stephen Bushell 1844—1908），英国人，1868年至英国驻北京使馆担任驻馆医生，在中国居住长达23年，不仅精通中文，还出版了许多关于中国艺术、钱币、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著作，1900年退休后回到英国。他是19世纪中叶以后对中国美术品最有研究的西方人士之一。他曾就中国古钞及钱币方面写成论述数篇，最知名的是1900年发表在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年刊对伟烈亚力的《大清国硬币》进行的补充。他的藏品在1921年被当时居住上海的伍德华购得，估计在1950年代拆散卖出。

马士（H.B.Morse，1855—1934），原籍美国麻省，1874年自哈佛大学毕业，同年考入中国海关，任职35年，1909年退休，1917年入籍英国。马士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研究中国外交关系与汉学的专家，后来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即其门生之一。重要著作是《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1910），另有《中国泉币考》（1906）、《中朝制度考》（1908）、《中国公行考》（1909）、《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五卷（1926—1929）。马士本人亦收集中国币钞及邮票，中国古钞捐赠母校哈佛大学，钱币捐赠英国大英博物馆。



VIII-4-19
骆哈特

骆哈特（H.Stewart Lockhart 1858—1937，又名骆仁廷），苏格兰人，英国官员，1879年奉派到香港见习，热爱中国文化，同辜鸿铭、徐悲鸿、熊式一等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过从甚密。1895年任辅政司兼华民政务司，成

为仅次于港督的第二号人物。1902 年调任威海卫行政长官，1921 年退休，回英国后被认为是“中国事务重要权威人士之一”，曾任伦敦大学汉学教授。骆哈特在钱币方面的著作有 1895 年出版的《远东货币》三卷，1915 年在上海出版的《骆哈特中国铜币藏品选集》（*The Stewart Lockhart Collection of Chinese Copper Coins*）。



VIII-4-20
邱文明

邱文明（Coole Arthur B 1900—1978），美国堪萨斯州人，父亲是卫理公会牧师，6 岁随父亲来华，长大后回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后再次来到中国，1948 年返美。邱文明自幼即开始收藏，亦承其父衣钵在华传教，曾参加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殇礼。邱文明担任天津汇文中学商科主任时于 1936 年编成《中国历代五金钱币》（*Coins in China's History*），次年增订再版。邱氏一直在华北地区传教，直到 1948 年返美，继续在教会工作，晚年迁居科罗拉多州丹佛。邱文明于 1967 年发表《中国古今泉币辞典》（*Encyclopedia of Chinese Coins*），共出版 7 册，但仅是其研究的部分成果，赍志以殁，令人惋惜。邱文明的收藏以古钱为主，此外还收藏大量有关中国钱币的资料，据称是全球最完整的，现保存在美国集币协会（A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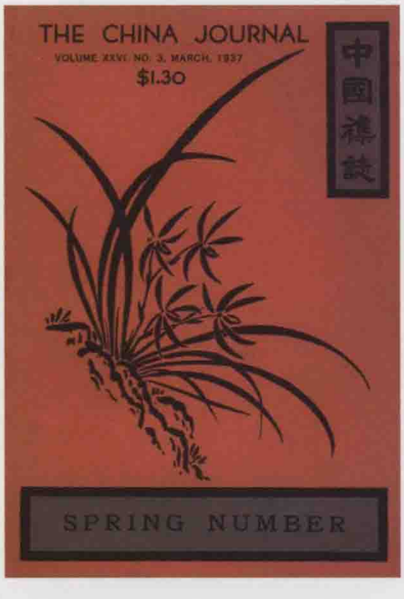


VIII-4-21
霍华德 · 包克

包克（Bowker Howard 1891—1970），美国明尼苏达州人，年轻时加入美国海军服役。20 世纪 30 年代曾驻防上海，直到 1939 年调返美国本土，二战结束后退伍。与其他以传教或担任官职而长期留居中国的洋人不同，包克是驻华时间仅数年的军人，却对中国邮票和钱币产生了浓厚兴趣，研究也颇深入。他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写作，后以钱币为主，发表文章 70 余篇，遗憾的是著作没有合集成书，只有一本由美国集币学会（ANS）在 1943 年出版的小册：《远东集币图书纂要》（*A Numismatic Bibliography of the Far East*），内记录有关远东地区货币的 910 种论述或书籍，及 70 种欧美钱币商目录。藏书可与邱文明匹敌，邱氏的是以中文图书为主，而包氏的则以洋文图书居多。

雷本（Raeburn Duncan），上海怡和洋行职员，发表过多篇中国机制币文章，最重要的是 1938 年登载于英文《中国杂志》上的《不存在的钱币》（*Coins that Never Were*），对早期臆造及假造币有相当详尽的记述，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另一篇是 1937 年发表的《中国苏区币钞》（*Chinese Soviet Coins and Notes*），首次对革命根据地货币进行研究。雷本亦在上海的西人泉币会担任了 6 年名誉总干事，其藏品去向不明，可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落入日本人手中。

以上介绍的知名外籍人士著作均以英文发表，故国内泉界对这些著作尚十分陌生，惟对不识中文的外国集币者而言，则为收集研究中国货币的主要资料。



VIII-4-22
英文版的《中国杂志》，雷本发表的《中国苏区币钞》即刊登此期

我国的近代机制币雕刻师

晚清时中国才引入机器造币，因此传统的雕刻工艺在引入初期派不上用场，必须仰赖外国人代劳。然而中国人以手巧闻名，只要有正确的指导，假以时日仍可迎头赶上。譬如光绪二十一年湖北银圆局继广东钱局之后 6 年开张时，即无须倚靠外援，甚至 4 年后其主管王承恩奉召北上筹办京局，临行前制作紫铜样币“携之至京，陈之各堂，以示无须赁用洋匠之意”。遗憾的是，与书画家相比，工匠的地位卑微，不被视为艺术家屡屡因居幕后而受忽视，如提到紫铜样币时只说“沪匠黄某所镌”。故各厂各币模究竟出自何人手笔，外界很难得知，仅有少数因缘际会在走过的岁月中留下了只字片语。



VIII-4-23
雕刻师周志钧。本图片由嫡孙周光真先生提供

笔者以目力所及，为曾经在中国机器造币用模的雕刻上有贡献的雕刻师们记上一笔，让吾辈在玩赏之余还能知道是谁给了我们这些。钱币上有雕刻师的署名，这在西洋已有千年的传统，几乎与其硬币的历史一样悠久，因此意大利外交官罗斯在访问各厂时，留下了一些中国籍雕刻师的名字：雕刻宣三壹角银币背面的天津厂余子贞、雕刻孙像五星版开国纪念币的南京厂何子梁、雕刻黎元洪像银圆及袁世凯小面像十文铜元的武昌厂朱子芳、雕刻袁世凯大面像十文铜元的王少贤。除此之外，前天津造币总厂李伯琦提到该厂有学生唐尚金“摹刻飞龙模最佳”、“孙中山纪念金币，民国元年，南京厂铸，雕刻者陈技士，大如二角小银圆”等，然而，其他北伐之前各厂的文献记载中就很难找到技师的身影。因此虽津厂出品了不少精美的人像币如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褚玉朴、张作霖，乃至“孙像背地球”等，但都无法确定是由哪位雕刻师所操刀。

北伐成功后，上海筹措多年的中央造币厂成立，因制度完备，情况改善。虽欠完整，但仍可从零星的文献中梳理出若干雕刻师的经历。

周志钧（1894—1937），江苏丹徒人，字鑫甫。宣统二年（1910 年）进



VIII-4-24
周志钧（一排右四）在 1937 年 4 月上海中央造币厂欢迎新厂长席德柄就职纪念时之留影（局部）



VIII-4-25
周志钧操刀的民国25年宪政纪念币。无面额，尺寸同一圆银币，肖像有3种形式，此七分脸铜样为目前仅见，马定祥旧藏

入北洋政府主持的天津造币总厂，师从意大利籍雕刻师路易奇·乔奇习艺，1933年（民国22年）3月上海中央造币厂正式开制时任“雕刻技正”（“技正”是旧时中国办理技术事务人员的官职，这里相当于总雕刻师）。1937年5月因急症在家中去世。兄周景贤在北京财政部印刷局任职，兄弟俩娶的是两姐妹。周志钧虽是开制时已任职，但当时模具都是进口，挥洒的空间十分有限；可确定由其操刀的是尺寸同一圆银币但无面额的民国25年宪政纪念币，有3种形式肖像，目前只有铜样存世。

董益谦（1907—1980），河北沧县人。天津造币厂雕刻学校毕业，1926年（民国15年）进津厂任雕刻员。1932年至1935年在山西工作，1936年（民国25年）1月入上海中央造币厂任雕刻技佐，次年5月雕刻技正周志钧病逝，6月定由董益谦暂代。7月厂里又改派黄伟存负责雕刻室，董随即在当月辞职回山西工作。1938年董到重庆，8月担任成都分厂任雕刻技士股长，1940年（民国29年）9月调升总厂荐任技士。他的作品颇多，早期的如阎锡山像“主张公道”章；到成都分厂后受命雕刻委托上海美商北极公司（American Engineering Co.）代制的民国29年铝辅币的原模；后期的民国38年金币系列以及台湾伍角银币、壹角铜币的比稿等。1949年迁厂时董未到台北，上海造币厂复工后留下担任雕刻技师。董益谦技艺承袭自天津造币厂洋雕刻师乔奇及其弟子周志钧，可算是隔代传人。

黄伟存（1892—？），广东顺德人。广东雕刻研究所习艺，先在广西梧州造币厂任雕刻师，1937年（民国26年）2月由中央造币厂技正王寿全介绍聘任技佐，同年7月起主理雕刻室，9月调至武昌分厂任雕刻股长。1938年（民国27年）武昌分厂撤至桂林，黄伟存调至桂林分厂任技师兼雕刻股长。1945年（民国34年）8月在昆明分厂担任技佐兼雕刻股长。抗战胜利后各分厂移转至上海，然而黄去向不明。在桂林厂时，黄伟存雕刻了许多小铜章模具。

中央造币厂在抗战前虽已购置缩刻机，但尚未启用战事已爆发，在搬迁后方时散失。根据前台北“中央造币厂”副厂长徐宝麒回忆，当时该厂钢模都是以手工直接雕刻，而非现在先塑制石膏模型，再用雕刻机缩刻。

以上所介绍的是清末及民国时期的中国造币厂雕刻师中的一小部分，期盼未来能挖掘出更多的史料，让这些受传统“厨师不上桌”观念束缚的能人才俊能走出幕后，接受大众的评价与掌声。



VIII-4-26
董益谦到成都分厂后受命雕刻委托上海美商北极公司（American Engineering Co.）代制的民国28年伍分铝辅币。诺曼·亚克斯旧藏，珍稀



VIII-4-27
黄伟存雕刻的桂林分厂五周年纪念章，有红铜及白铜两种

浅说钱币品相鉴定 5

钱币的真伪及品相好坏，向来是藏家最关心之事，也是促成钱币品相分级的原动力。而这也一直是钱币交易中争议最大的部分，从而直接影响着藏品的价值。近年来邮购及互联网的发展，使许多商家网上交易的比例日益扩大，甚至超过了店面买卖，在收藏者无法上手鉴别而只凭眼力挑选心仪钱币的情况下，所谓“第三方鉴定”的出现使客观评价钱币价值成为一种可能，目前也被越来越多的收藏者所接受。

“第三方鉴定”的萌芽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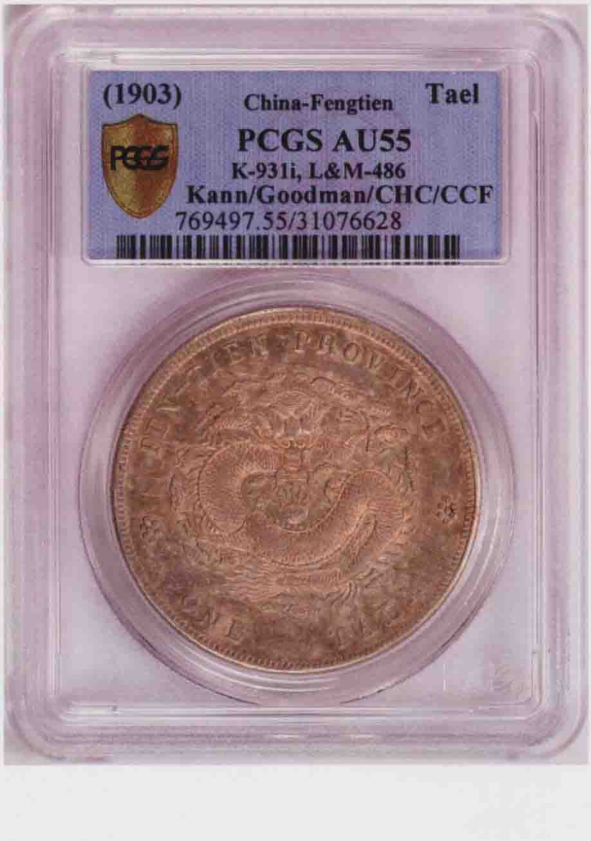
三十多年以前，美国出现了第三方收费鉴定钱币的服务，被美国集币界称为革命性的发展。这些几百年前就存在的问题，开始有了解决的办法，“评级”减少了买卖双方由真伪与品相问题而起的争议，也使集币的风气更加旺盛。

早期美国钱币界对品相的划分与其他地区一样，仅大致分为G (Good)、VG (Very Good)、VF (Very Fine)、XF (Extremely Fine) UNC (Uncirculated) 等几级而已，张三的XF可能是李四的UNC。1949年薛顿（William Sheldon）出版的《美国早期一分币》一书，用数据对硬币的品相从1～70予以分级，并附带各等级的价格。此法原本专用于1793—1814年份的大型一分铜币，薛顿将市场价与品相等级挂钩的尝试没有成功，但分级制度本身却引起广泛的注意。

1972年美国集币协会(ANA) 成立鉴定服务组(Certification Services，简称ANACS)，因财政部及钱币馆藏丰富的史密斯松宁博物馆均在华盛顿，为方便运作当时设在该处，1976年才迁回ANA总部所在地科罗拉多州。鉴定从酌收费用的服务性组织成为协会的营利性机构，此举减少了假币的泛滥，使收藏活动步上正轨。

革命性的变化发生在1986年，由7家知名币商联合在加州组成“专业钱币分级服务公司（Professional Coin Grading Service，简称PCGS)”，从此，“鉴定评级”正式走上了商业化道路。1987年“钱币鉴定公司(Numismatic Guaranty Corporation of America，简称NGC)”在佛

VIII-5-01
PCGS评级的龙银大珍奉天癸卯一两





VIII-5-02
ANACS、PCGS、NGC 的钱币鉴定盒

罗里达州成立，加速了品相鉴定评级制度的发展。初期市场目光集中在出厂状态的未流通 MS（mint state）级品相，除部分人士外，还没什么人注意近未流通的 AU（Almost Uncirculated）级，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些“一分之差”的观念逐步建立，将集币事业向着普及化推进了一大步。

钱币品相以数字细分等级的美式做法，基本上适用于 19 世纪及 20 世纪在模具制作与机器设备等有关工艺已相当精进之下所造的硬币，并不宜套用于无一定规范的粗制币或手工锤打币，故虽有风行全球的趋势，欧洲大部分国家及日本都尚未跟进，仍旧采取 XF、UNC 等约略分级法。这些地区的资深币商或藏家虽觉得买卖双方对裸币的评级的不一致确实是交易的最大问题，且第三方鉴定装盒已是挡不住的潮流，但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无需急于仿效。

国外较知名的“评级币”鉴定公司

第三方鉴定风气在美国形成后，成立了不少鉴定公司，最多时超过 20 家，目前信誉最佳的 PCGS 与 NGC 是目前主要的两家；最老牌的 ANACS 因在 1990 年及 2007 年先后被转售，两次易主及迁移后评价已不如前，原因之一是客户对于保证之是否延续并不确定，此外盒子设计多次更动，也影响到客户的信任感；1998 年成立的 ICG（Independent Coin Grading）也位于佛州，历史虽短，口碑尚佳。以上 4 家属于市场上比较认可的鉴定公司，其余的不受重视，有些已停业。

鉴定评级的标准各家不同，各人的“眼力”也不一样，加以良莠不齐，鉴评的结果自然就有差异，即使在崇尚科学及制度的美国，也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鉴评的标准无法统一，“各人心中一把尺”是所有收藏者与币商心中的共同之痛。有人提倡让“电子识别系统”取代人工来鉴定评级，但光泽及美观度无法以仪器辨认，尤其光度、色彩吸引力的认定极为主观，依靠的是观察者的眼光。电子识别系统可以协助钱币的鉴定评级，若想全面取代鉴定师，路途还十分遥远。

国内的“评级币”鉴定公司

由于包括纸钞在内的钱币送评鉴定装盒已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国内早有同好呼吁设置国人自己的鉴定公司。经过多年酝酿，2011 年底，北京公博古钱币艺术品鉴定有限公司（GBCA）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正式注册的历代古钱币鉴定公司，象征与国际潮流的接轨。



VIII-5-03
GBCA 鉴定盒有中文说明，对不谙外文的藏友颇有帮助；并有尺寸、重量的标示，提供较详细的信息

评述与小议

盛世兴收藏，国内近年来集币风气渐盛，也开始重视品相；然而假币的横行及一些人社会诚信的缺失，使得“评级币”受到追捧。在借助鉴定公司的盒装币来提高收藏档次之余，我们仍应自我培养泉识，不宜迷信盒装币或停留于“比分数”的层面，也不能过度追求好品相而忽略了好品种。多数的收藏家与币商都认同，“品相评级是艺术，而不是科学”，而鉴定公司的本质是生意人。他山之石，也可能“攻错”，我们可从国外演变的经验，来思考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式。切忌闭门造车不经科学论证，若理论或实践上都无法与国际共识接轨，就会给自己与泉界造成损失。

VIII-5-04
美国每种钱币都有鉴定的重点，照片附图上的红色区即币面最高点区域；彩绘图是品相分级时有无碰痕的观察区，以红色、橘色为最重要区域，黄色为次要区域，绿色、蓝色位置的缺陷对评分的影响相对较小

VIII-5-05
即使是新发行的钱币也立刻制定出标准。精密的仪器可帮助判断以减少人为疏失，虽然“品相评级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但不能没有依据，采用科学方法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01] 张家骧．中华币制史．北京：北京民国大学出版部，1925

[02] 金国宝．中国币制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03] 陈度．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上海：瑞华印务局，1932

[04] Kann E．中国货币论． 蔡受百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0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

[06]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编．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07] 兰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

[08]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09]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0]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1] 汤国彦主编．云南历史货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12] 吴志辉，萧茂盛．广东货币三百年．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

[13]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数据汇编第三辑．金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4] 董文超．中国历代金银货通览币．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15] 李春年．中央苏区货币文教图鉴．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

[16] 张惠信．中国货币史话．台北：台扬出版社，1994

[17] 沈阳造币厂编．沈阳造币厂图志．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18] 李允俊．晚清经济史编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9] 戴建兵．白银与中国近代经济．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0] 吴弘明编译．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21] 王永生．新疆历史货币．北京：中华书局，2007

[22] 刘辉主编．五十年海关各埠报告 1882–1931．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

[23] 张俊英主编．造币总厂．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0

[24] 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62）

[25] 丁进军编．晚清各省铸造银圆史料选辑．历史档案，1997（1）

[26] 丁进军编．晚清各省铸造银圆史料续编．历史档案，2003（3，4）

[27] 丁进军编．晚清各省铸造银圆史料续编．历史档案，2004（4）

[28] Wylie A. Coins of Ta-Tsing or Present Dynasty of China. Journal of the 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 1858(6)

[29] Smith O./ Janvier H. Coining Machinery in Chinese Mint. Cassier Magazine , 1903 (5)

[30] Hocking WJ. Royal Mint Museum Catalogue Vol. I 1906/Vol. II. London , 1910

[31] Annu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the Mint. Washington DC, 1911

[32] Annual Report of the Director of the Mint. Washington DC, 1912

[33] Ros G. Coi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Royal.Asiatic Society.Shanghai, 1917

[34] Woodward T. Tang Chi-yao Coins. The New China Review, 1921(6)

[35] Woodward T. The Influence of Yuan Shih-kai on Chinese Coins. The New China Review, 1922 (4)

[36] Raeburn D. Chinese Soviet Coins and Notes. The China Journal, 1937 (3)

[37] Raeburn D. Coins That Never Were. The China Journal, 1938 (8)

[38] Woodward T. The Coins of Shanghai .The China Journal, 1937(8)

[39] Kann E. The History of Minting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1939

[40] Ferracute . Ferracute 1863-1943.New Jersey, 1943

[41] Bowker H. F. Sun Yat-sen Dollar Essays. The Collector’s Journal, 1945(11/12)

[42] Kann, E. 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 Kansas, 1954

[43] Bowker H. F. Centennial of a Shanghai Coin, The Numismatist, 1956 (9/10)

[44] Kann E. Gold pieces of Manchuria. The Numismatist. 1959 (5)

[45] Kann E./Graham D. Coinage of the Chinese Emigre Government 1949-1957. Reprint from The Numismatist. Kansas, 1967

[46] Todd O J. The China That I Knew. Calif, 1973

[47] Smith B. Obscure Chinese Province Issue Popular Auto Dollar. World Coin News, Dec. 19. 1975

[48] Wright RNJ. Some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Origins of the Milled Coinage of Imperial China.Numismatic Chronicle, 1974

[49] Wright RNJ. The silver Coinage of the Chinese Provinces 1888-1949.Numismatic Chronicle, 1976

[50] Wright RNJ. The silver Coinage of China 1912-1928.Numismatic Chronicle, 1978

[51] Wright RNJ. The Hong Kong Mint Taels. The Numismatic Circular, 1980 (11)

[52] Ching D. Mystery Shrouds Origin of Kirin 50-Cashes, World Coin News, Aug. 4.1981

[53] Sweeny J. A Numismatic History of The Birmingham Mint. Birmingham, 1981

[54] Cox & Malim. Ferracute-The History of an American Enterprise. New Jersey, 1985

[55] Cribb J. Money in the Bank-The Hongkong Bank Money Collection. London, 1987

后 ◎ 记

历史，是一连串的偶然与必然。我个人在收藏上走入机制币这个圈子亦复如此。幼年时收集自信封剪下的世界各地邮票开始，从中获得许多的乐趣与知识。后因学业及工作的忙碌而中断，等有暇再想重温旧时乐趣之际，邮票多半已改为胶版印刷，美感及质感远远不及传统的雕刻版印刷，遂觉无趣。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生活无虑但谈不上富裕，父母省吃俭用之下，留下一些小本经营的周转资金，故年节给我压岁钱时曾以老银圆代之，把玩起来非常有趣。偶尔亲朋长辈出国归来也会赠送我少许外国钱币，更增加不少知识，饶有趣味。

我在校学的是机械工程，就业后的工作与此有关；在职期间又对研发及营销较有心得，习于零组件的制作流程与成本分析、产品的市场定位与区隔。当对集邮感到索然无味而要转移收藏项目时，由于兴趣广泛因此进行了一次自我评估，在衡量了自己的财力与专长之后，很自然地瞄准了对初学者而言门槛较低的钱币。当时自己对古钱看不出名堂，也求教无门；机制币则与个人专长可以搭上，相对较为熟悉能少走弯路。从此，选择以机制银币作为收藏主力，银锭为辅。

移居国外后，虽少见实物，然而拜科技进步及网络发达之赐，数据及文献较容易收集，且风险低，无伪品之虞；又发现洋人对中国机制币研究的成绩与资料均颇丰硕，改以搜集书籍及研究考证为主，币章收藏次之。

兴趣可培养，专业靠训练。我习于事先评估的作风，在收藏经历中从投资角度看是没能掌握时机，然而在研究方面，专业素养起了极大的作用。

本书的完成，要感谢的是内人刘晓佩全力的支持，以及家人孙瑜与孙仕桦的帮助，使我没有后顾之忧。撰写时鞭策我的同好先进，不计其数无法一一列举，在此致最大的谢意与敬意。

孙　浩

2011 年 10 月，美国洛杉矶

策划编辑 励　真
责任编辑 励　真
装帧设计 房惠平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www.sstp.cn

上架建议：收藏·鉴赏

ISBN 978-7-5478-3113-7

9 787547 831137 >

定价：180.00元

易文网 www.ewen.co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年银圆　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
作者=孙浩编著
页数=252
SS号=14074107
出版日期=2016.06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号=978-7-5478-3113-7
中图法分类号=K875.6
原书定价=180.00
主题词=硬币（考古）-中国-近代
参考文献格式=孙浩编著.百年银圆　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06.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壹　清代银圆——地方篇
　1　广东省造银圆
　2　湖北省造银圆
　3　北洋造银圆
　4　江南省造银圆
　5　安徽省造银圆
　6　奉天省与东三省造银圆
　7　吉林省造银圆
　8　黑龙江省造银圆
　9　四川省造银圆
　10　浙江省造银圆
　11　福建省造银圆
　12　台湾省造银圆
　13　“京局制造”银圆
　14　湖南省造银圆
　15　云南省造银圆
　16　陕西省造银圆
　17　山西省造银圆
　18　新疆银圆
　19　西藏银圆
贰　清代银圆——总厂篇
　1　造币总厂
　2　“圆两之争”时期试制的样币
　3　“宣统年造”大清国币系列样币
　4　“宣统三年”试制的样币
　5　“宣统三年”大清银币之“曲须龙”
叁　民国银圆——人像篇
　1　开国纪念人像银圆
　2　袁世凯像银圆
　3　北洋政府造人像银圆
　4　孙中山像试制样币
　5　金本位银圆
　6　孙中山像帆船银圆
　7　孙中山像布图银圆
肆　民国银圆——地方篇
　1　四川省造银圆
　2　新疆省造银圆
　3　云南省造银圆
　4　湖南省造银圆
　5　贵州省造银圆

6　甘肃省造银圆
伍　近代银饼与银两币
1　台湾“老公银”“如意”“笔宝”银饼
2　福建“漳州军饷”银饼
3　上海银饼
4　贵州“黔宝”银饼
5　“上海壹两”与“关平壹两”
6　“富字一两”与“鹿头一两”
陆　近代金币与金章
1　大清金币
2　袁世凯侧像洪宪飞龙金币
3　袁世凯像洪宪飞龙金银章
4　袁世凯像嘉禾金币
5　唐像金币与滇字金币
6　龙凤黻黼金币
7　孙中山像布图金币
8　金圆券金币
9　伪“满洲国”金章
10　中央造币厂金条
柒　苏维埃红军银圆
苏维埃红军银圆
捌　币海掇英——延伸篇
1　臆造币
2　“铸币”与“机制币”
3　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史事
4　近代机制币著名人物列传
5　浅说钱币品相鉴定
参考文献
后记
封底